

社会主义何去何从？
工人民主与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阶级政
治

作者

张跃然

译者

范刚 达斯弗谢米尔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部社会学系博士学位论文

负责委员会：

Cihan Tugal 教授，主席

Laura Enriquez 教授

龙彦教授

Dylan Riley 教授

黄韵然教授

2024 年春季

译者说明

文中所引的历史材料引文，系由英文论文翻译而来，非中文材料原文。

目录

摘要：社会主义何去何从？工人民主与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阶级政治	5
图表目录	6
致谢	7
大事年表	9
导言：中国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阶级分析	11
定义基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	16
理论介入一：国家社会主义下工人运动作为“自我限制的内在批判”	19
理论介入二：消极革命作为对工人行动的回应	22
理论介入三：经济主义、生产主义偏见与消极革命的失效	25
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阶级分析理论	27
实证章节提要	30
第一章 南斯拉夫的启示：中国的精英政治、跨国社会主义和推进“工人自治” 1978-1980	33
争相否定晚期毛主义	35
中国后毛泽东时代早期的“南斯拉夫热”	38
容忍“南斯拉夫热”	45
赵紫阳的南斯拉夫式政策实验	46
职工代表大会负责（或不负责？）	52
章节结论	60
第二章 1981 年的小型消极革命：应对全国性劳工骚乱浪潮的政策演变	61
重要角色介绍：中华全国总工会	62
第一幕：南斯拉夫的启示、波兰团结工会和中国的劳工动乱	69
第二幕：劳工骚乱应对策略的不断演变	77
第三幕：小型消极革命的发生	81
章节结论	87
第三章 生产和生活的政治：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车间动态和工作场所民主困境	89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工作场所民主实践：分配正义	89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工作场所民主实践：其他问题	95

中国政治经济的有利变化	98
“民生福祉”问题成为“干扰”？	103
第四章 1984 年的反民主转折：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危机和剥夺工人权力的霸权主义策略.....	107
厂长负责制的反民主转变	108
归咎于工人的社会主义国家财政危机.....	113
谁来代表国家？	120
通过将车间选举重新定义为霸权工具来拯救车间选举	121
案例研究：霸权企图的适得其反.....	125
章节结论.....	127
第五章 用金钱收买民主：管理层专制与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脱轨，1984-1989....	129
厂长负责制时代车间紧张局势加剧	131
购买工业和平	137
购买工业和平的通货膨胀效应	143
寻找政策解决方案	148
章节结论.....	151
结论：现实社会主义下“真正的乌托邦”	153
尾声：1989 年及其后	153
对比较社会主义研究的启示.....	156
对当下和未来的反资本主义战略的影响	159
方法附录	163
资料来源及其收集	163
源材料使用的挑战	164

摘要: 社会主义何去何从? 工人民主与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阶级政治

本文旨在提供一种基于阶级的分析, 探讨中国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本文的核心论点是, 作为意识形态与修辞话语中被赞颂为中国社会主义“领导阶级”的城市产业工人, 在七十年代末与整个八十年代与党国(也即“党和国家”)的互动, 是推动中国资本主义转型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 本文认为这一时期城市工人与党国的互动模式, 既塑造又打乱了领导人在社会主义框架内推动初步市场化(即建成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尝试。虽然后毛时代的党内领导层将市场社会主义作为摆脱 1970 年代末深刻危机的出路, 但城市产业工人与党国的互动方式, 在整个 1980 年代引发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在日益加剧的周期性危机的压力下, 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在十年内就崩溃了。正是在市场社会主义崩溃的背景下, 全面转向资本主义才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这成了统治精英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不懈追求的目标。

基于广泛的历史资料, 我通过追溯中国“长 80 年代”(从 1976 年毛泽东时代结束到 1989 年民主运动之间的时期)围绕工厂民主问题展开的一系列政治争论和政策举措、及其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来阐明我的论点。这些争论和博弈不仅在塑造中国企业改革的轨迹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命运。

图表目录

图形

图 1：中国“漫长的 80 年代”的连锁危机	16
图 2：精英政治领域的示意图（1980 年中至 1981 年中）	77

表格

表 1：中国从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	15
表 2：1978-1989 年中国城镇居民总收入统计	140
表 3：1978-1989 年工作场所民主与工人收入增长	141
表 4：1979-1988 年价格指数	143

致谢

这篇论文是一段漫长的思想和政治旅程的产物，这段旅程历时近十年，曲折离奇。首先，我要感谢我在中国访问过的六个国家档案馆的档案管理员，他们帮助我查阅文件，使得我在非常困难和混乱的时期继续进行研究。我还要感谢几位与我分享个人经历、观察和见解的亲历者。如果没有他们的慷慨，这项研究就不可能实现。

我的论文导师 Cihan Tugal 对我帮助极大，他对我的思想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向我介绍阅读葛兰西的艺术，到让我对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复杂性产生敏感度。他从一开始就相信这个项目（当时我则信心不足），并且继续对它保持着执著的热情（而我却一再陷入自我怀疑和绝望）。他对我情感上的支持与他对我的严格要求不相上下。他不断地向我抛出一个又一个大问题，似乎相信我能找到所有答案。虽然最后我没能找到，但研究结果因此变得更好，也更有创见。

我的论文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为这个项目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Laura Enriquez 激励我不断审视以批判和比较的方式研究“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意义。Yan Long 帮助我弄清楚，当我沉浸在实地工作的混乱中时，我真正要去哪里，因为其中似乎有无数的方向。Dylan Riley 坚持不懈地追求分析清晰度，这迫使我提出了一个更清晰的论点。Winnie Wong 提供了社会学学科范围内通常找不到的智力刺激，并帮助我拓宽了受众。

此外，还有两位不在我的论文委员会的学者值得特别感谢。十多年来，沈原一直是我的重要导师。他对优秀社会科学研究的愿景极大地塑造了我的学术品味，他不懈地努力将学术与实践相结合，影响了我与所研究世界的关系。我感谢他总是鼓励我进行有意义的研究。迈克尔·布洛维的指导对我帮助很大，帮助我弄清楚我渴望成为哪种学者，并拓展了我的学术可能性。这篇论文本身就证明了他的学术是多么鼓舞人心。我也感谢迈克尔一再为我提供情感关怀，并以各种方式让我的研究生院生活更加轻松。

我要感谢 Joel Andreas 在我构思这个项目时给予我的重要启发。我感谢 Ghaleb Attrache、Samuel Chan、Yige Dong、Xiaojun Feng、Qiang Fu、Kyuhyun Han、Gail Hershatter、Ho-chiu Leung、Simon Sihang Luo、Mengting Ma、Wilson Miu、Micah Muscolino、Jonathan Smucker、Garrett Strain、Eylem Taylan、Zoe Mengyang Zhao 和 Weiqin Zhou 对本论文部分前几稿提出的有益反馈。我还要感谢 Aaron Benavidez、Bart Bonikowski、Nitsan Chorev、Elisabeth Clemens、Isaac Dalke、Kristen Ghodsee、Andreas Glaeser、Huajie Jiang、Rebecca Karl、Danya Lagos、Tyler Leeds、Shiding Liu、Martin Lockett、Monica Prasad、Mary Shi、Yihui Su、Lao Tian、Shaoda Wang、Guanchi Zhang、Luyang Zhou 和 Yan Zhu，感谢他们的建议、问题和其他形式的干预，帮助我在大大小小的方面改进了我的工作。

感谢 Selda Altan、Ho-chiu Leung、Linzhuo Li、Wilson Miu、Yue Chang、Steven，感谢 Steven Zhao 教授、周鲁阳教授和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让我有机会在讲座、会议和研讨会上展示我正在进行的工作。感谢叶氏家族基金会、开封

基金会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下单位提供的资金支持，使我能够进行这项研究和撰写这篇论文：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文理学院和社会学系。

这篇论文所提出的根本问题源自自我自己在太平洋两岸的劳工组织工作。我与中国劳工活动家同事的多次交谈帮助我理解了我的研究如何能够解决当今劳工运动面临的一些问题。我非常感谢这些同志，不幸的是他们的名字不能透露。在美国，我感谢 Alexa Nicolas、Keith Brower Brown 和 Yuanqi Lyu 与我共同探索劳工运动的愿景，这种愿景既包含组织的艰苦工作，又具有激进的民主性。

多年来，在我曲折的思想和政治旅程中，我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团体，董一格、赵蒙昉和骆思航。这些亲密的朋友教会了我很多关于学术诚信、积极性和生活的意义。我们相互给予的支持，被证明是这个充满不稳定的世界不可或缺的支柱。在伯克利，Chris Chan 给了我一种家的感觉，巧妙地支持了我度过一些最艰难和最焦虑的时刻。在中国，王驰、闫公望、张亚辉和赵旭豪让我的实地考察经历比本来要轻松得多，更有治愈作用。我还要感谢李翘楚和方然，我非常想念他们。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搭档邵城阳，他让我相信有些事情值得为之奋斗，有些生活值得过。他帮助我思考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激发了我的思想追求。他还给了我勇气去面对一个人试图融入学术界和活动界时必然会遇到的创伤和精神压力。他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的精通以及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渊博知识，为这篇论文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兴奋和突破常规的感觉。他教会了我生活在革命的爱情中意味着什么，以及生活在一段既浪漫又友爱的关系中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一切，我永远心存感激。

大事年表

1976 年 9 月

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大清洗

1978 年 3 月

一个大型官方代表团前往南斯拉夫进行为期三周的访问

1978 年 10 月 11 日至 21 日

全总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全国工会体系的重建

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邓小平在党内权力的巩固和华国锋的边缘化

1979 年 6 月

中华全国总工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寻求推翻对赖若愚的政治判决（该报告的结论在 9 月得到了党领导层的认可）

1980 年 2 月

赵紫阳开始在党中央任职

1980 年 8 月 14 日

波兰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罢工开始

1980 年 8 月 18 日

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呼吁清除党内的“封建主义遗产”，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包括企业管理改革

1980 年 9 月 - 1981 年中

劳工抗议浪潮席卷中国

1980 年 9 月

赵紫阳提出南斯拉夫式的“职工代表大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体制

1980 年 10 月至 12 月

全国选择 44 家工厂进行“职工代表大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试点

1980 年 11 月至 12 月

华国锋被废黜

1980 年 12 月 16 日至 25 日

党的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一项大幅度削减经济开支的计划,并采取镇压手段应对持续的基层骚乱

1981年5月29日至6月8日

全国企业民主管理会议

1981年7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国营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

1982年12月4日

宪法修正案获得批准

1983年12月

党的领导层开始推动厂长负责制

1984年2月7日至25日

彭真率团访问杭州及上海就推行厂长负责制进行前期研究

1984年5月18日

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通知,正式推行厂长负责制

1984年10月至12月

厂长负责制企业向职工随意发放奖金的现象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警觉

1985年1月

赵紫阳提议派“国家代表”限制公共企业工人对他们厂长的施压

1986年12月

赵紫阳和国务院开始呼吁全面推行企业承包制

1988年4月13日

企业法最终版本获批准

1988年8月-9月

党和国家宣布即将进行价格改革后,引发了一波恐慌性抢购

1989年4月至6月

民主运动浪潮席卷中国

导言：中国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阶级分析

中国从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历史一直是广受研究的社会科学主题。促成学术界关注的因素有两种。首先，中国影响深远的转型使其成为过往数十年内增长最快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之一，对全球经济秩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部分学者甚至认为，中国令人瞩目的资本主义崛起为新自由主义时代全球资本主义注入了活力。¹其次，与东欧和前苏联国家所经历的转型相比，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并无国家解体或共产党下台的情况，因此显得鹤立鸡群、耐人寻味。数代学者都在试图解释是怎样的因素推动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转型，塑造了中国转型的独特轨迹。在浩繁的研究文献中，一些最具影响力的论述聚焦于个别领导人的决定性作用或精英政治的动态发展，²农民、新兴私营企业家与基层官员等基层行动者的创业精神，³知识与专业技能的重要性，⁴以及中国既有政治经济体制的特征。⁵

本文旨在提供一种基于阶级的分析，探讨中国的资本主义转型。本文的核心论点是，作为意识形态与修辞话语中被赞颂为中国社会主义“领导阶级”的城市产业工人，在七十年代末与整个八十年代中与党一国（也即“党和国家”）的互动，是推动中国资本主义转型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本文认为这一时期城市工人与党一国的互动模式与方式，即塑造又打乱了党领导层在社会主义框架内推动初步市场化（即建成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尝试。也正是在市场社会主义脱轨的背景下，全面转向资本主义才会成为统治精英在九十年代孜孜以求的诱人选项。本文基于广泛的历史文献资料，⁶追溯围绕工作场所民主问题的一系列政治争论与相对应的政策调整，以及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后果，阐述了如下论点：这些政治争论与政策调整在中国的“长八十年代”（从毛泽东时代结束的1976年到1989年的泛民主运动）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它们不仅塑造了中国企业改革的轨迹，还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命运。

我的论点基于对中国后毛泽东改革时期的独特理解。安舟（Joel Andreas）在讨论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的经典著作《亚当·斯密在北京》⁷时指出，毛泽东去世后不久（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的中国政治经济与随后几

¹ Ho-fung Hung, *The China Boom: Why China Will Not Rule the Worl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² Charles Bettelheim, 1978, "The Great Leap Backward," *Monthly Review* 30(3): 37-130; Joseph 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M.E.Sharpe, 1994;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³ Yasheng Huang,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Victor Nee and Sonja Opper, *Capitalism from Below: Marke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Yuen Yuen Ang, *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⁴ Julian Gerwitz, *Unlikely Partners: Chinese Reformers,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Isabella Weber, *How China Escaped Shock Therapy: The Market Reform Debate*, Routledge, 2021.

⁵ Susan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Chenggang Xu, 2011,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4): 1076-1151.

⁶ 有关我的原始材料以及分析手法的详细讨论，见方法论附录。

⁷ Giovanni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21st Century*, Verso, 2009.

十年的性质截然不同。⁸在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市场机制得到恢复与加强，农业与工业领域中的小规模私有生产及企业蓬勃发展。同时期，大规模的城市产业仍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主导，⁹乡村工业“兼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小规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¹⁰而私有资本积累的逻辑主要局限在沿海地区的几个经济特区。安舟将这种结构称为“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¹¹然而，本文更偏好“市场社会主义”一词，因为这种结构确实与东欧各国数十年来施行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极为相似。¹²相比之下，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的统治精英就明确沿着资本主义路线推行经济改革。正如安舟所述，九十年代初以后，“中共大力鼓励私有资本部门的发展，并在九十年代末主导了绝大多数公有企业的私有化”。¹³本文遵循安舟的论点，将中国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概念化为一种双重过程：首先是“长八十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时期，然后是九十年代及其后的资本主义大转向。¹⁴从市场社会主义时期向资本主义时期的转向构成了重要的断裂。

解释这一断裂对于清晰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至关重要，本文的目标正在于此。本文在坚持这一断裂应当得到解释的同时，还反驳了两种常见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安舟本人亦部分认同，即资本主义是市场化加深后的自然产物：越来越多的市场化不可避免地导向资本主义。¹⁵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东欧各国不同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尽管总是充满矛盾，但仍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匈牙利超过了二十年，在南斯拉夫可以说存在了四十年。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相比之下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显得十分短暂。¹⁶第二种更具阴谋论色彩的观点认为，毛泽东以后的中国领导层一直打算引入资本主义，而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伪装，不过是这一长期谋划的第一步。¹⁷这种观点不仅忽视了党领导层在“长八十年代”中反复警告不要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框架（尤其是在城市产业领域）的言论——其中一些警告在本文中有所引用——而且也忽视了政策方案是由意图与环境共同促成的。即使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层始终怀有资本主义意图，但也必须具备某些条件才能允许或迫使他们公开实施这些意图。本文旨在

⁸ Joel Andreas, 2008, “Changing Colours in China,” *New Left Review* 54:123-142.

⁹ Ibid, p.129.

¹⁰ Ibid.

¹¹ Ibid.

¹² Włodzimierz Brus and Kazimierz Laski, *From Marx to the Market: Socialism in Search of an Economic Syst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¹³ Joel Andreas, “Changing Colours in China,” pp.129-130.

¹⁴ 这一概念化可以与 Laura Enriquez 的观点相呼应，她认为中国后毛泽东时代早期实施的改革努力旨在重新建构社会主义，而不是迅速撤离社会主义。见 Laura Enriquez, *Reactions to the Market: Small Farmers in the Economic Reshaping of Nicaragua, Cuba, Russia, and China*,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0.

¹⁵ 另见 Chuang Collective, 2017, “Red Dust: The Capitalist Transition in China,” *Chuang Journal* Issue 2, pp.173-182.

¹⁶ 将资本主义视作市场自我加强后的产物的观点，也受到费尔南·布罗代尔与乔万尼·阿里吉的有力挑战。尽管布罗代尔与阿里吉的论点主要涉及现代早期欧洲资本主义的起源，但其逻辑同样可以适用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见 Fern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 II: The Wheels of Commer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Verso, 1994.

¹⁷ 关于这种观点的批评，另见 Chuang Collective, “Red Dust.”

解释这些条件是如何形成的。

本文认为，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内爆之所以显得迅速，是因为城市产业工人与党一国之间的互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党领导层面对毛泽东晚年遗留下来的各种危机，诉诸于初步市场化措施，而工人自下而上的行动迫使产业工作场所的部分民主化被纳入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政策。然而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工人的车间民主实践很快就引起了统治精英的不满，他们在八十年代中期转而抑制工作场所的民主化。在持续市场化的背景下，工人对工作场所民主倒退的反应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影响，导致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并最终在 1989 年引爆了民主运动。1989 年的政治危机向党领导层发出明确信号：市场社会主义在中国行不通。统治精英被迫作出抉择：回归正统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或是全面转向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只有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可能被排除后，资本主义转型才成为统治精英眼中更诱人的选项。历史人类学家吴一庆的研究启发了我的分析，他认为后毛泽东时代的市场改革是统治精英预防下层政治压力而采取的策略。¹⁸然而本文的观点与吴一庆对此的诠释存在显著分歧，本文还强调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框架内的市场化并不能解决基层行动者——尤其是城市产业工人——引发的政治经济问题。这一灾难性的失败是党领导层自九十年代起超越单纯的“市场改革”，引进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将剖析本文所呈现的历史叙事。七十年代毛泽东去世后的几年内，中国的社会主义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层试图通过开启一系列初步市场化改革应对这一危机。当时精英内部的斗争促使领导层中一个强大派系（以邓小平为首）寻找意识形态上的替代方案，从而重新构想社会主义，否定晚期的毛泽东主义，建立合法性并巩固权力。在此背景下，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地缘政治和解恰好使得众多中国知识分子与政策制定者开始关注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结合了市场化与“工人自主管理”，似乎是一种颇具前景的意识形态替代方案。这种对南斯拉夫模式的迷恋不仅“向下”传播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也“向上”影响到党一国的高层。1980 年秋，新任总理赵紫阳甚至在中国国企中推动进行南斯拉夫式工人自主管理的政策试验。

邓小平及其同僚认为这种“南斯拉夫热”有利于削弱晚期毛泽东主义的合法性并树立后毛泽东时代“改革派”领导形象的总体目标，因而对此采取了容忍甚至鼓励的态度。然而，这种对南斯拉夫模式的广泛迷恋也给这些精英政治家带来了痛苦的烦恼。南斯拉夫的影响以及南斯拉夫式的政策试验激发了中国工人以新的、更大胆的方式表达他们在工作场所争取更多民主的要求。受到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爆发的鼓舞，这些影响在 1980 年最后几个月与 1981 年上半年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劳工骚乱浪潮。对独立工会的明确要求以及独立组织的实际实践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

党领导层密切关注波兰的事态发展，同时不断被提醒文革期间工人造反运动的“恐怖”。他们将 1980 年至 1981 年的劳工骚乱视为一场紧迫的政治危机。在官方工会系统，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领导干部的操控下，党领导层于 1981 年

¹⁸ Yiching Wu, 2005, "Rethinking 'Capitalist Restoration' in China," *Monthly Review* 57(6): 44-63; 2013, "Coping with Crisis in the Wak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ward a Historical Critique of Chinese Postsocial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1(4): 1-32.

中期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消极革命”策略。一方面，他们作出部分妥协，推动国企中建立工作场所民主的制度；包括大力支持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简称职工大会）的赋权，并认可实施车间选举企业厂长的提议。另一方面，他们严格限制了工作场所民主的发展，明确规定工作场所民主应在企业党委的领导下运作，并悄悄搁置了赵紫阳在不到一年前推出的更为激进的南斯拉夫式实验。这种部分民主化产业工作场所的“消极革命”与当时如火如荼的初步市场化改革相吻合，特别是扩大国企管理和财务自主权的政策。这种初步市场化确实使得工人能以他们认为符合需求且有意义的方式行使工作场所的民主权利。

因此，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短短几年间，城市产业工人与党一国之间的一系列互动带来了一种独特的市场社会主义结构。这一结构将初步市场化与国企部分但实质性的民主化相结合。它展示了许多在东欧的各种市场社会主义中也能找到的特征，特别是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模式。然而，党领导层很快就发现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结构存在问题。局限于工作场所的经济民主（就是说总体规划不存在民主）与初步市场化的结合，使得工人倾向于以“经济主义”的方式行使工作场所民主。换句话说，工人们往往关注与他们的生计息息相关的物质问题。党领导层长期以来对工人的“经济主义”抱有根深蒂固的轻视。因此，当政治精英面对财政危机采取了诸多尝试却始终未能缓解时，他们将目光投向工人的物质需求与民主权利，意图通过加强掌控为党一国增加收入。1984年，党领导层推出了一项改革，决定限制工作场所的民主，将管理权集中到企业厂长手中。

因此，经过调整的市场社会主义结构成为中国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特征。这一时期企业自主权进一步扩大，但工作场所民主却逐渐倒退。同时，数百万城市产业工人依然在社会主义工作场所的各项制度中享有相当大的权力，尤其是在就业保障方面。这种修订后的市场社会主义结构比八十年代早期的结构存在更严重的问题。工人对管理人员专制的不满激增，车间内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由于：一、解雇工人仍然困难；二、企业厂长不愿放弃他们的专制权力；三、企业在管理自身财务方面变得越来越自主，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不断给工人全面加薪成为企业领导平息或预防车间紧张局势最便捷的方式。因此，反直觉的是，1989年的反民主转向带来了工人货币收入的无序且迅速的增长，而这种总收入的增长通过各种机制加剧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现有研究已经充分表明，对八十年代中后期通货膨胀猖獗的不满是激发1989年民主运动中群众积极参与的重要原因之一。将因果链条拼接，我们就能将1989年的重大政治运动，至少部分地追溯到1984年后工作场所民主的倒退。

八十年代中后期失控的通货膨胀与1989年爆发的民主运动，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解体。这些事件向党领导层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工人阶级（基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框架）所保有的制度性权力，似乎与市场机制的运作无法调和。既然市场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统治精英不得不在两条路之间做出抉择：要么通过政策遏制并逆转市场化（即回归正统的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要么摧毁社会主义基本框架（即开启资本主义）。¹⁹在1989年至1992

¹⁹ 正因如此，如现有文献广泛记录所述，八九年后的数年（1989—1992）见证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一方是“保守派”，试图逆转市场改革，重新确立更多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传统要素；另一方是“改革派”，寻求比八十年代任何时期的中国都要激进的方式推进市场改革。见 Yang Jisheng, *Political Struggle in China's Era of Reform*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zhongguo gaige niandai de zhengzhi

年的两条路线之争中，后者成为统治精英更加青睐的选择。随后中国经济彻底市场化，国家不遗余力地推动私营资本的发展，并大力私有化国有企业（伴随而来的是大规模的裁员、工人权益的终结以及巨大的社会苦难），²⁰从而真正走向资本主义。从这个角度看，“长八十年代”中市场社会主义的失败为九十年代及以后的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表 1 概述了这一演变轨迹。

表 1：中国从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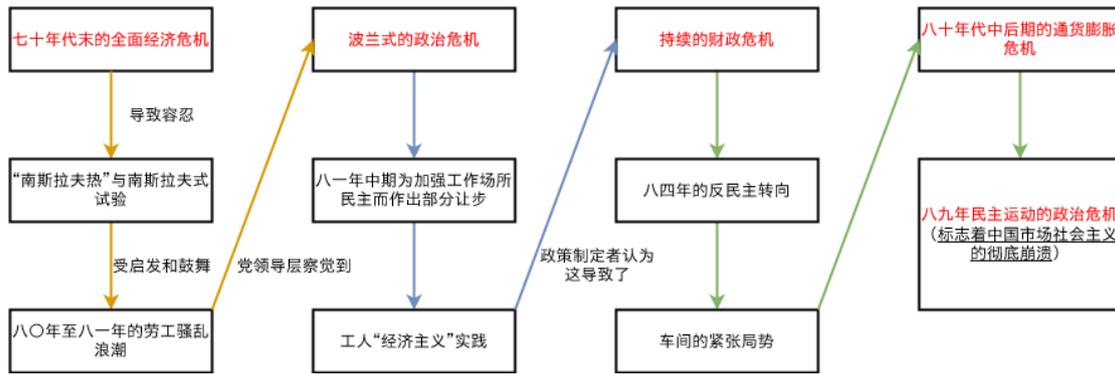
时期	结构	结果
1978—1984 (市场社会主义第一阶段)	初步市场化 工作场所民主加强 总体经济规划不存在民主	统治精英暂时容忍工人经济主义
1984—1989 (市场社会主义第二阶段)	加深市场化 工作场所民主倒退 社会主义下工人保有的结构性权力	通货膨胀猖獗 八九运动爆发
1989—1992	两条路线：逆转市场化或清除社会主义工人阶级	
1992—2000	“改革派”胜利：鼓励私营资本 清除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	开启资本主义

本文的核心论点可以换一种角度表述：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层将市场社会主义视为解决七十年代末深刻危机的出路。但在整个八十年代，城市产业工人与党一国的之间的互动模式与方式引发了一场又一场危机。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在不断加剧的危机循环中不到十年便宣告崩溃。邓小平及其同僚希望通过容忍“南斯拉夫热”来巩固他们作为开放和改革派领导的公众形象，但这一“热潮”反而助长了以工人骚乱浪潮为表现形式的政治危机。统治精英对此危机的回应是引入部分工作场所民主化，而这恰与初步市场化吻合。这种安排催生了工人的“经济主义”实践，党领导层担心这种实践会加剧党一国持续的经济危机。随后，改革派领导决定放弃工作场所的民主化，但 1984 年的反民主化转向却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进而酝酿了 1989 年爆发的政治危机。八十年代末的政治经济灾难迫使党领导层意识到，若要打破这一连串的危机，就必须终结社会主义产业工人阶级存在的条件——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开启资本主义。图 1 展示了这一论点。

douzheng), Hong Kong: Excellent Culture Press, 2004, chapter 7; Julian Gewirtz, *Never Turn Back: China and the Forbidden History of the 1980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chapter 15.

²⁰ Ching Kwan Lee,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William Hurst, *The Chinese Worker after Soci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图 1：中国“长八十年代”危机链



要全面阐述本文核心论点的分析要点，就必须对社会主义下工人与党一国的互动方式提出若干理论介入。首先，我认为二十世纪的国家社会主义在结构上赋权并鼓励工人要求更多民主，并部分实现他们作为社会主义“领导阶级”的假定地位。但国家社会主义使得工人难以将自己视为公共财产的所有者，工人的民主诉求通常未能触及全社会范围内的经济和社会规划——而这恰恰是实现任何社会主义项目真正之解放潜力的关键。我将这种动态称作“自我限制的内在批判”。其次，我主张，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下，统治精英往往倾向于通过一种可以被概念化为“消极革命”的政治策略来回应工人的民主诉求。他们一方面努力消灭工人的独立组织，另一方面又通过政策逐步赋权工人，特别是在工作场所中。第三，我认为，当这种消极革命策略与社会主义初步市场化相结合时，往往会陷入一个特定问题，即工人在车间民主中的“经济主义”实践。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统治精英长期以来反感工人的“经济主义”，而持续的财政危机迅速促使他们撤回了消极革命中作出的妥协。这种消极革命的失效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最终导致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失败。最后，我将这些介入综合起来，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阶级理论。与那些将转型描述为消极革命的学者尤为不同，²¹我的理论认为，随着消极革命策略走向瓦解并被认为不再可行，正是这一事实，为全面转向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本章剩余部分将逐一详细论述这些理论介入，并概述实证章节的内容。

定义基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

本文并不打算深入探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定义的复杂争论。然而，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论文而言，某些操作性定义仍是必要的。我同意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定义资本主义的基本框架：“资本主义是一种系统，在这种系统中，商品和服务，甚至包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是为了获利交换而生产的，就连人类的劳动力也是市场上出售的一种商品，所有经济行为者都依赖于市场。”²²我补充两点。首先，这个定义的有力之处在于，它与那些仅依据商业、市场或利润生产的存在定义资本主义的观点不同。²³它强

²¹ Elaine Sio Ieng Hui, *Hegemonic Transformation: The State, Laws, and Labour Relation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Palgrave, 2017; 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chapter 6.

²²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Origin of Capitalism: A Longer View*, Verso, 1999, p.2.

²³ Andre Gunder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调资本主义是一套完全依赖市场的系统：生产单位“依赖市场获取生产资料”。²⁴因此，在资本主义下，市场不仅提供获利交换的机会，还迫使所有生产单位参与利润最大化。若不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将无法持续获得生产资料，因为生产资料只能通过市场购得。其次，伍德将人类劳动力的商品化（即工资劳动）视为资本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近期关于资本主义历史的文献对这一概念提出了挑战，这些文献认为资本主义除了工资劳动外，还使用了多种传统的、超经济的劳动形式，例如奴隶制、契约奴役以及债务约束等。²⁵结合这些修正主义的贡献，我建议放宽伍德的定义：与其将工资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的定义特征，不如说，基于利润最大化的需求对劳动力进行调配与再生产，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定义特征。

二十世纪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通过以下方式试图否定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²⁶首先，它通过建立以计划为基础、对公众负责的机制来分配生产资料，消除对市场的完全依赖。尽管市场在不同程度上仍被允许发挥作用，但大量的生产单位不再依赖市场获取最重要的生产资料。²⁷其次，它很大程度上废除了基于利润最大化的需求对劳动力进行调配与再生产。具体而言，社会主义在制度上承认大量工人——包括产业与农业工人——作为其生产单位的公民，赋予他们一系列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待遇，这些权利不会因生产力需求的变化而被轻易削减。²⁸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核心步骤是用各种形式的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尤其是在大规模工业领域。²⁹公有制不仅使生产单位摆脱对市场的依赖，还促进了工作场所向权利公民

Volume 1: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Jairus Banaji, *A Brief Histor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Haymarket Books, 2020. Robert Brenner calls this line of theorization “neo-Smithian Marxism”. See Robert Brenner, 1977,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04: 25-102.

²⁴ Wood, *The Origin of Capitalism*, p.2.

²⁵ Sven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 Vintage, 2015; Caitlin Rosenthal, *Accounting for Slavery: Masters and Manag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Andrew B Liu, *Tea War: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in China and Ind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This line of theorization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Rosa Luxemburg’s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1913).

²⁶ 这里我关注的是如何定义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而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理想为何。与那些认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未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否认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学者不同（例如，见 Michael Lowy, 1991, “Twelve Theses on the Crisis of ‘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 *Monthly Review* 43(1): 33-41），我认为这些经验构成了严肃地超越资本主义核心制度框架的尝试，社会主义是分析这些经验（包括失败的经验）的一个有力概念。

²⁷ 生产资料非市场化分配的可行性是“社会主义计算争论”的核心议题。见 Oskar Lange, 1936,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Part One,”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1): 53-71; 1937,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Part Two,”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2): 123-142.

²⁸ Joel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7-8. Also see Tuong Vu, 2005, “Workers and the Socialist State: North Vietnam’s State-Labor Relations, 1945- 1970,”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8(3): 329-356; David Ost, *The Defeat of Solidarity: Anger and Politic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and Mark Pittaway, *The Workers’ State: Industrial Labor and the Making of Socialist Hungary, 1944–1958*,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2.

²⁹ John Martin, 1911, “An Attempt to Define Socialism,”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2): 347-354.

共同体 (communities of rightful citizens) 的转型。

但公有制也被证明存在棘手的难题。在大多数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大部分公有财产的实际所有权并不是由名义上的所有者（即全体人民）行使的，而属于他们的政治代表——官僚化的党—国。³⁰换句话说，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往往会倾向于将公有制转变为国有制。中国的社会主义时代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公有制分为两种：“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³¹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大部分工业经济被划归为“全民所有制”。但“全民所有制”企业并没能建立相关的机制，能让全民共同参与决策，或是能全民民主决定如何分配企业生产活动产生的剩余价值。相反，作为全民代表的党—国实际上成为了企业的所有者。³²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国营企业”在日常与官方话语中可以互换使用。此外，尽管工业经济中一些战略意义较小的部分被划归为“集体所有制”——这些企业名义上由其工人集体所有——但许多此类企业实际上也同样由党—国管理，或作为规模更大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附属单位运营。³³

正是这种公有制与国有制的混同，而非诸如“单一政党在政治中的主导地位”等政治现象，定义了二十世纪大多数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项目属于“国家社会主义”。³⁴这里需要澄清下。尽管公有制与国有制的混同意味着公有企业的工人事实上是党—国的雇工，但国家社会主义下党—国作为“老板”与工人的关系，和资本主义下的雇佣关系存在根本区别，原因有二。首先，无论是老板还是雇工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市场的依赖：名义上的公有制（即实际上的国有制）企业并不依赖市场获取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同样，工人也不依赖市场获取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这些通常由他们的企业提供。其次，由于大量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工人，在制度与意识形态上被承认为工作场所共同体中天经地义的合法成员，这为他们向“老板”与管理人员提出权利诉求时提供了强大且独特的依据，³⁵而在资本主义中不存在这种依据。

³⁰ Milovan Dilas,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57]1983; Gyorgy Konrad and Ivan Szelenyi,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Role of the Intelligentsia in Socialism*,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8; Evan Luard, *Socialism without the State*, Springer, 1979.

³¹ Jean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18.

³² Fureng Dong, 1989, "On the Question of the Forms of Socialist Ownership in China," *Chinese Economic Studies* 23(1): 8-23.

³³ Jianzhong Tang and Laurence JC Ma, 1985, "Evolution of Urban Collective Enterprise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04: 614-640. 五十年代中期农业集体化后，中国的农村公社也被指定为集体所有。然而，讨论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性质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³⁴ 基于此定义，我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并非对立的范畴。社会主义政权可以既是“国家社会主义”也是“市场社会主义”。只要他们在加强市场机制运作的同时（只要这些市场机制没有广泛到恢复对市场的依赖，以及基于利润最大化的需求部署、再生产人类劳动力），继续维持公有制与国有制的混淆。这段描述适用于新经济体制后的匈牙利、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以及“长八十年代”的中国。南斯拉夫或许是个例外，因为那里确实出现了纠正公有制与国有制混淆的严肃尝试（详见第一章）。

³⁵ Li Huaiyin, *The Master in Bondage: Factory Workers in China, 1949-201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chapter 3.

理论介入一：国家社会主义下工人运动作为“自我限制的内在批判”

本文的第一条理论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促使工人通过一种我称为“自我限制的内在批判”表达诉求。这一主张有两方面。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在结构上倾向于激发工人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另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往往将工人的民主运动引向对工作场所民主与独立组织的诉求，而非针对总体经济规划的民主。我将逐一阐述。

国家社会主义在结构上赋能工人自下而上的行动主义，关于这一论点最为著名的表述来自麦克·布洛维与亚诺什·卢卡奇。在《光辉的过去》一书中，³⁶他们主张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无意中为工人提供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定义上的³⁷）“内在批判”的肥沃土壤。两个过程在其中发挥了作用。首先，国家社会主义下的生产过程本质上有助于工人发展团结和自主性。社会主义生产总在短缺状态下运作，³⁸这要求车间层面灵活的工作组织与即兴发挥。这种灵活性意味着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至少享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概念与执行上保持一定的统一性，车间有可能转变为一种自我组织的生产单位。这种自主性，以及由此发展出的团结感，培养了工人潜在的政治能动性。其次，由于国家社会主义下劳动力剩余的集中管理与分配是清晰可感的，因此需要一种强大的合法化意识形态，并且要周期性地彰显它的存在。这种意识形态之所以有力，并不是因为工人被欺骗并相信它能准确反映现实，而是因为它与现实存在巨大反差。政权所宣扬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实际现实之间的差距，为工人提供了意识形态和话语上的武器，使他们能够依据这种意识形态要求政权承担责任。

我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其他政治特征也能强化这一赋权效应。在此，我们应当重新审视斯考切波的经典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³⁹尽管该书前半部分关于社会革命如何发生的讨论引发了众多学术辩论，但书中被忽视的后半部分对当前的讨论尤为相关。斯考切波在后半部分指出，**革命中的**阶级动员轨迹从根本上塑造了**革命后的**国家制度。在法、俄两国，随着革命进程中城市群众的自发动员逐渐耗尽，加上农民顽固抵制国家建设，国家制度变得越来越压迫和僵化，无法实现其解放潜力。然而，在中国，共产党依赖农民的积极动员，这一遗产促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特的革命政权，致力于促进广泛参与，并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由官僚和专家建立的常规化阶序统治”。⁴⁰

斯考切波的见解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通过广泛且持久的乡村动员上台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至少包括中国、拉丁美洲的古巴以及尼加拉瓜等案例）中，**全体民众阶层**的群众动员在政治（例如财产社会化、反官僚化）与经济（例如生产动员）方面持续发挥核心作用。正如理查德·费根（针对古巴）与劳拉·恩里克斯（针对尼加拉瓜）指出的那样，对于那些经济欠发达的社会主义项目而言，

³⁶ Michael Burawoy and Janos Lukacs, *The Radiant Past: Ideology and Reality in Hungary's Road to Capitali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³⁷ 关于马克思对内在批判的概念化，见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1843).

³⁸ Janos Kornai, 1979, "Resource-Constrained versus Demand-Constrained Systems," *Econometrica* 47(4): 801-819.

³⁹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⁴⁰ *Ibid.*, p.236.

持续的群众动员是生死攸关的问题。⁴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群众动员对国家社会主义而言往往产生矛盾的效果。一方面，动员通常是自上而下发起和执行的。另一方面，为了获得实现宏大目标所需的真正参与，这类群众动员往往不得不为群众创造至少是间歇性的自由空间，使他们能够自下而上地行使自己的能动性和主动性。被动员进入这些空间的人群，反过来可能会发展出更为独立与颠覆性的政治意识，并提出超出政权精英规定的愿景和诉求。因此，动员号召与政治活动虽然最初是自上而下，但在基层实践中往往会“失控”，被动员的群众逐渐形成独立性与颠覆性的意识。例如，中国就曾发生过这类情况，尤其是在五十年代初期与后期的工人群体中。⁴²

国家社会主义的赋权效应还使得两个额外因素进一步放大。首先是它的群众组织。这些大多数是法团主义性质的组织，虽不正式隶属于党一国系统，但通常作为其接触、组织、控制与动员群众的渠道。然而，负责这些群众组织的基层干部与群众有着密切联系，并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他们很可能对群众中出现的颠覆性不满与诉求产生强烈的同情，甚至协助表达这些不满与诉求。此外，由于这些群众组织通常在政治权力领域中处于边缘地位（第二章将进一步探讨），即便是这些组织的最高领导层也可能支持自下而上的不满和诉求。现有关于国家社会主义下工会⁴³和妇女⁴⁴组织的研究暗示了这种动态。其次，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批判”往往会产生跨国共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产生的民主诉求，可能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基层行动者提供理解自身处境与表达类似诉求的视角。⁴⁵这不仅是因为各个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之间的基本政治经济格局相似，还因为官方的阵营话语鼓励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之间的团结。⁴⁶

总而言之，由于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跨国动态的影响，国家社会主义表现出一种自下而上激发工人民主行动的倾向。中国是这种现象的典型案例。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工人颠覆性和民主性的行动以周期性的模式反复出现：例如1951—1953年、1956—1957年以及1966—1967年。1980—1981年的劳工骚乱浪潮以及1989年工人积极参与的民主运动，都是本文论证与叙述主线的主要部

⁴¹ Richard Fag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Cub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Laura Enriquez, *Agrarian Reform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Nicaragu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7.

⁴² Nara Dillon, *Radical Inequalities: China's Revolutionary Welfare Stat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 Elizabeth Perry, 1994, "Shanghai's Strike Wave of 1957." *The China Quarterly* 137: 1-27.

⁴³ Nara Dillon, *Radical Inequalities*.

⁴⁴ Wang Zheng, *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4*,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Maxine Molyneux, "Mobilization without Emancipation? Women's Interests,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Third World Socialism*, edited by Richard Fagen et.al., pp. 280-302,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6.

⁴⁵ Johanna Bockman, 2019, "Democratic Socialism in Chile and Peru: Revisiting the 'Chicago Boys' as the Origin of Neoliberalism,"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61(3): 654-679.

⁴⁶ James Mark, Péter Apor, Radina Vučetić, and Piotr Oseka, 2015, "'We Are with You, Vietnam': Transnational Solidarities in Socialist Hungary, Poland and Yugoslav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50(3): 439-464.

分，它们应当被理解为国家社会主义下工人行动主义传统的一部分。

第一条理论介入的另一方面，是对国家社会主义如何塑造工人民主诉求内容的全新理论化。我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促使工人更愿以党一国（或工作场所代表党一国的企业党委与管理干部）雇工的身份向党一国提出诉求。换句话说，工人的行动主义通常基于他们的工人身份，目标针对那些雇佣与管理他们的主体。这种行动通常由两种动机驱动：一方面是具体的物质诉求，例如加薪、社会福利以及永久就业身份；另一方面是基于公平待遇、尊严以及制止干部不当行为的道德正义感。这类诉求的范围往往比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更加广泛，但与资本主义下工人类似，国家社会主义下的工人也是基于工人的身份表达诉求。工人们往往会意识到，只有有效控制自身所处的企业，才能保障他们的物质和道德诉求，因此他们要求更多的车间民主和 / 或监督干部的权利。工人有时甚至会认识到，他们的行动力量需要独立组织，不能受到党一国的干涉，因此他们绕过工厂领导和党一国干部自发组织，或明确要求独立组织的权利。⁴⁷一定程度上，工人工作场所民主和独立组织的权利，以及 / 或是在萌芽阶段实践这些诉求时，他们就是在寻求实现国家社会主义的民主化。尽管如此，这些民主诉求的前提是工人作为工人的共同身份，而他们的诉求对象是作为雇主的党一国。

同时，国家社会主义下的工人很少要求总体经济与社会规划的民主化诉求。我认为，这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使工人自我定位成雇工而非所有者。如果工人认为自己是名义上属于全社会的众多公有制企业的所有者，那么他们本可以提出如何真正行使这些企业的所有权的问题，而这本质上是民主规划的问题。但国家社会主义恰恰使得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在此，我借鉴并批判性地修正了戴维·奥斯特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如何塑造工人自我认同的分析。⁴⁸奥斯特认为，社会主义话语中对“工人”作为普遍利益代表的推崇，反而使工人无法表达自身作为工人的具体利益（这一点对后社会主义转型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⁴⁹遵循类似的逻辑，我认为，社会主义话语和意识形态对“工人”的推崇掩盖了工人作为“所有者”的身份，从而阻止了他们基于所有权民主诉求。

以中国社会主义为例，尽管工人被誉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导阶级，但他们作为“全体人民”的一部分，也就是共同拥有成千上万家企业的所有者身份，却被严重掩盖。在阶级划分的语境中，“所有权”这一概念更多地与被剥夺财产的前资本家、前地主联系起来，而这些阶层持续被贬低。“所有权”作为阶级概念带有负面色彩，容易联想到剥削和寄生。这一现象还因中国社会主义官方与日常话语中“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互换使用而得到加强。但从技术上讲，国家社会主义下将中国工人称为“无产阶级”是不准确的。“无产阶级”的字面意思是“没有资产的阶级”，然而社会主义下的工人并不是无产者：每个工人（与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社会合法成员一道）都是“全体人民”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大量资产的所有者！这种语言上的混淆正好说明了工人作为所有者的身份是如

⁴⁷ 在此，我主张，工人对自我组织重要性的认识源自他们围绕具体的物质与道德问题所进行的具体的斗争。但在国家社会主义下，工人要想大规模接受并基于这种意识付诸行动，往往需要外部催化因素。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中，这些催化因素分别表现为 1966 年的学生造反组织、1980 年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消息，以及 1989 年知识分子关于民主的讨论。

⁴⁸ David Ost, *The Defeat of Solidarity*, chapter 5.

⁴⁹ Ibid, p.124.

何被遮蔽的。工人被引导着认为自己并非所有者。格蕾塔·克里普纳记录了资本主义下的集体所有制案例，它们的数量相当稀少，但却为经济民主的诉求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⁵⁰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武器在国家社会主义下的工人手中几乎不可用。国家社会主义引导工人远离了他们在技术上拥有的对大部分经济领域要求更多集体控制的权利。

理论介入一可以总结为，我理论化了国家社会主义如何激发工人的“内在批判”，以及这种“内在批判”如何自我限制。具体而言，国家社会主义在结构上赋予并鼓励工人更多的民主诉求；但这些诉求通常基于工人作为“工人”的身份（而非作为“公有财产所有者”的身份），并以工作场所民主和独立组织（而非民主规划）为核心诉求。这种工人“自我限制的内在批判”的动态十分重要，因为它对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接下来两节的理论介入将详细探讨这些影响。

理论介入二：消极革命作为对工人行动的回应

国家社会主义下工人“自我限制的内在批判”有时会引发统治精英特定类型的回应。一方面，统治精英通常不愿容忍工人提出独立组织的诉求，或进行初步的独立组织实践。国家社会主义政权认为这些诉求与实践具有内在的威胁性。这也是将国家社会主义概念化为“极权主义”时有一定合理性的地方。在国家社会主义下，党一国总是希望维持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地位：群众的行动只能局限在党一国相关的组织框架内。正如戴维·奥斯特所说：“国家社会主义与独立公民社会的关系必然是对立的。”⁵¹另一方面，并不罕见的是，社会主义统治精英既会镇压工人的独立组织，也会部分满足他们的民主诉求。这种部分妥协通常表现为在制度结构中逐步赋权工人，而这些制度结构最终仍由党一国主导。工作场所的有限民主化，往往是这种回应中的关键因素。

我提出通过“消极革命”这一概念来理解这种回应的逻辑，这一概念最为人知的来源是安东尼奥·葛兰西。葛兰西通过比较意大利复兴运动与法国大革命，定义了一个以“消极革命”处理基层起义动员的“复兴—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自下而上的革命性诉求“通过小剂量、合法的改革议程得到满足”，从而维持旧有统治精英的政治经济地位，“尤其是避免群众进入”更激进化的时期。⁵²吉汉·图阿尔（Cihan Tugal）对此提出了进一步的操作化阐述：

⁵⁰ Greta Krippner, 2017, “Democracy of Credit: Ownership and the Politics of Credit Access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3(1): 1-47.

⁵¹ David Ost, *Solidarity and the Politics of Anti-Politics: Opposition and Reform in Poland since 1968*,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9, 添加了强调。请注意，国家社会主义——或大体上来讲的极权主义政权——不一定与非独立的公民社会存在敌对关系。例如，见 Dylan Riley and Juan Fernandez, 2014, “Beyond Strong and Weak: Rethinking Postdictatorship Civil Socie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0(2): 432-503.

⁵²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119.

“与此相对，在消极革命中，一种自上而下的不成熟动员被‘吸纳’进现有的政治经济结构。吸纳不仅仅是简单的整合：它还涉及对某些政策与态度的彻底重塑，即使总体结构保持不变。”⁵³

在这些表述中，消极革命包含两个核心要素。一方面，统治精英需要通过具体的政策和改革，以“小剂量”的方式回应自下而上的动员中提出的部分诉求。另一方面，统治精英必须采取行动，稳定整体的政治经济结构，防止群众动员进一步激进化。从葛兰西对意大利历史的考察出发，消极革命这一概念已被应用于分析不同的政治发展，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⁵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⁵⁵，以及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崛起⁵⁶。

也有学者曾用消极革命这一概念来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总体轨迹，⁵⁷但本文并不如此使用。我的用法更为狭窄且具体：我认为社会主义统治精英有时确实采取了消极革命政策来应对工人的民主行动。更准确地说，统治精英始终拒绝容忍独立组织的存在，但反复寻求通过制度改革部分赋权于工人，以期平息他们的抗议。在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中，中国似乎更倾向于采取消极革命策略应对工人的颠覆性组织。相比之下，东欧政权对民主运动的记忆多与严厉镇压有关，这在1953年的东德、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1981年的波兰案例中都有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的特殊性，可能与其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有关，这种倾向推崇并强调群众动员⁵⁸（此处可回想下上一节斯考切波的观点）。中国社会主义精英更倾向于通过消极革命的回应来处理工人自下而上的行动，正是因为这种策略有助于将政权塑造成群众动员的拥护者与先锋，而非镇压者。

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上，有三次显著的消极革命回应，形成了几乎周期性的模式。第一次发生在1956—1957年的罢工浪潮之后，这次浪潮既提出了独立组织的诉求，也出现了独立组织的实践。党拒绝了工人的独立组织诉求，但在工作场所民主上作出了些许妥协。具体而言，党加强了对官方工会系统的控制（当时工会主张在工作上获得更多独立，并推动工人对独立组织的诉求），⁵⁹党同时也认真对待推动工作场所民主制度的努力，呼吁在企业中广泛建立职工大会，⁶⁰并颁布

⁵³ Cihan Tugal, *The Fall of the Turkish Model: How the Arab Uprisings Brought Down Islamic Liberalism*, Verso, 2016, p.23.

⁵⁴ Jamie C. Allinson and Alexander Anievas, 2010, "The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A Passive Revolutionary Road to Capitalist Modernity," *Capital and Class* 34(3): 469-490.

⁵⁵ Marcel Paret, *Fractured Militancy: Precarious Resistance in South Africa after Racial Inclus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2.

⁵⁶ Cihan Tugal, *Passive Revolution: Absorbing the Islamic Challenge to Capital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⁵⁷ Elaine Hui, *Hegemonic Transformation*; 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⁵⁸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Simon and Schuster, 1999.

⁵⁹ 张允美, 2003, 《理顺与冲突：中国工会与党-国家的关系》，载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九月号。

⁶⁰ 武汉市档案馆, XX000091-WS02-134-17, 《顾大椿同志在部分省市轻工业工会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1980年10月10日。

《鞍钢宪法》。⁶¹第二次回应发生在 1966 年最后几个月，面对工人造反运动的兴起，统治精英试图在重组的治理结构中给予造反派组织一个象征性职位，从而收编工人的独立组织。这些结构看似给予了造反派工人更多权力，但实际上仍受党一国系统的严格控制。毛泽东及其同僚在 1967 年初号召造反派组织“夺权”地方党政，同时实施军管来协助“巩固”夺权，以期达成这一目标。⁶²

第三次发生在 1980—1981 年，面对工人骚乱浪潮的威胁，党领导层听取了官方工会领导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部分民主化的措施。为了容纳并将工人的反抗情绪引导进入制度化的场域，他们推动了加强工作场所民主在企业治理中的作用，具体形式包括加强职工大会的职能，以及实施工厂主任的车间选举，但同时也强调，所有工作场所民主的制度化途径都必须在党组织的坚定领导与监督下运行。

这三次消极革命回应最终都被证明是脆弱的。⁶³对本文而言，第三次回应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它恰逢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初期市场改革浪潮。在城市产业领域，这种初步市场化表现为扩大大型国有企业在管理与财务上的自主权。⁶⁴1981 年，统治精英的消极革命回应集中于产业工作场所的有限民主化，这种回应与初步市场化形成了一种微妙且偶然的共生关系。市场改革使得工人能够以对他们而言更具实质意义的方式行使工作场所的民主权利（见第三章）。这是因为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提高了工人能够实际参与管理事务的范围。作为回报，工人在工作场所民主中的更为实质性的经验，使他们更有可能接受——或至少默许——初步的市场改革。就这样，初步市场化在无意中成为了八十年代初消极革命政策的组成部分，尽管这并非政策制定者推动市场化的初衷。⁶⁵

在更高层次的抽象意义上，这种共生动态揭示了工人的“自我限制的内在批判”与国家社会主义下初步市场化之间某种程度的结构性亲和。由于工人的民主

⁶¹ 《鞍钢宪法》据称是基于鞍山钢铁的车间实践，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广泛推广的车间民主蓝图。其核心要素包括：干部参加班组；劳动职工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技术攻关；实行干部、技术人员与职工三结合。见 Koji Hirata, “1960: The Angang Constitution: Labour, Industry and Bureaucracy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pp.310-318 in *Proletarian China: A Century of Chinese Labour*, edited by Ivan Franceschini and Christian Sorace, Verso, 2022.

⁶² 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apter 4.

⁶³ 关于第一次，六十年代初大跃进的崩溃引发了一段严厉的经济紧缩期，工作场所民主的推广重点被加强管理权威和劳动纪律所取代。见王永华，2010，《〈工业七十条〉争论始末》，载于《党史博采》第二期第 15-18 页。关于第二次，毛泽东在 1967 年通过消极革命策略平息造反派工人的尝试以灾难性失败告终。以“夺权”的名义赋予造反派组织象征性的认可反而使得许多造反派组织继续造反，违背了党领导层恢复政治稳定的愿望。这一失败迫使毛泽东及其同僚在 1968 年转向更加血腥的策略，通过武力消灭所有活跃的造反派组织，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为残酷与灾难性的政治镇压。Andrew G Walder, *Agents of Disorder: Inside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Civil War in Guangxi: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China's Southern Periphe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⁶⁴ Barry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98-108.

⁶⁵ 在此，我不同意吴一庆的观点，即初步市场化是中国统治精英在面对潜在的基层骚乱时有意作为自卫措施引入的（见 Wu, “Rethinking ‘Capitalist Restoration’ in China” 与 “Coping with Crisis in the Wak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相反，我的论点是，初步市场化与统治精英平息基层群众骚乱的努力恰好发生在同一时间，并起到了帮助作用。这种巧合与共生关系具有历史偶然性，并非出于统治精英的有意策划。

诉求往往集中于工作场所民主和独立组织，而非经济上的民主规划，这些诉求在某种程度上与市场机制的加强相容，甚至可以说从中受益。因此，初期市场改革可以部分解决工人的民主诉求，因为这些诉求具有自我限制的特征。这在国家社会主义框架下，群众潜在的容忍甚至支持市场化铺平了道路（回想下塞勒尼·伊万的著名论点，在统治精英主导的计划体制下，市场化可能被群众视为平等化与民主化的过程）⁶⁶。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工人的民主行动与统治精英的消极革命回应共同塑造了市场改革初期的特征。在八十年代初，这形成了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结构，结合城市产业企业扩大的自主权、部分加强的工作场所民主，以及缺乏民主的总体经济规划。这种结构可以被理解为南斯拉夫数十年来存在的市场社会主义与工人自我管理模式的稀释版与温和版。这种结构中的紧张关系对中国最终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理论介入三：经济主义、生产主义偏见与消极革命的失效

统治精英在八十年代初采取的消极革命策略促成了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这一策略虽然暂时平息了劳动骚乱，但在短短数年内就迅速失效。时至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统治精英实际上废除了他们在工作场所民主方面作出的消极革命妥协。为了解释这一消极革命为何迅速失效，我提出第三条理论介入：我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特定结构——包括扩大的企业自主权、部分实现的工作场所民主以及缺失民主的总体经济规划——容易引发共产主义话语中常提及的“经济主义”趋势。关于“经济主义”这一概念，最著名的解释来自列宁对资本主义下工人“工联主义”的分析，指的是工人斗争往往只关注眼前的物质诉求，而不作超越资本主义的考虑。⁶⁷在国家社会主义下，这一概念常被用来形容工人只追求短期的、眼前的以及个人的物质利益，而忽视了社会主义项目的某些更为根本的目标。⁶⁸正如本文第三章所述，工人在八十年代初进行的工作场所民主实践中，主要关注与他们的生计息息相关的物质问题，尤其是住房、招聘、工资以及奖金等分配问题。显然，这里的“经济主义”倾向十分明显。

我认为，在国家社会主义下，工作场所民主与总体经济规划缺乏民主的结合，结构性地导致了工人的“经济主义”行为。由于工人被排除在总体社会主义经济方向与命运的决策之外，工人缺乏必要的经验基础，无法将自己与社会主义应当追求的全体社会目标联系起来。由于工人在结构上被禁止“看到”更广泛的经济与社会，他们也无法“看到”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因此，工人参与企业内部的决策时优先考虑与他们生计息息相关的物质问题，也是可以预见的结果。我的论点并非对工人的批评，而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总体经济规划缺乏民主的结构性批评。此外，初期市场改革加强了工人在工作场所中的经济主义实践。随着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工人获得更多机会要求将更多资源用于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而削弱的计划体制使得应对工人微观层面的经济主义行为所带来的宏观经济后果变得更加困难。南斯拉夫就是这种动态的典型案列。数十年来，在充满活力的市场

⁶⁶ Ivan Szelenyi, 1979,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Dilemmas for Social Policy in Contemporary Socialist Societies of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9(1-2): 63-87.

⁶⁷ See Vladimir Lenin's *What Is to Be Done? Burning Questions of Our Movement* (1902).

⁶⁸ 历史社会学家董一格正在撰写的著作试图历史化国家社会主义下的“经济主义”概念。另见 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pp.97-108.

机制背景下，工人自我管理的实践长期导致经济内部严重且无法纠正的经济失衡。⁶⁹这些问题严重削弱了南斯拉夫应对八十年代外部经济冲击的能力。

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工人在工作场所民主中的经济主义实践远未达到南斯拉夫的程度。然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无法容忍这种实践，在其仅开始短短几年，约1984年前后就迅速采取措施限制工作场所民主。⁷⁰这种警惕源自偶然因素与结构性因素的结合。偶然因素是持续的财政危机，时至1983年，党一国多次努力都未能缓解这一危机。结构性因素是我所称为“生产主义偏见”的问题，这种偏见深深扎根在许多党一国政策制定者心中。这种生产主义偏见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广泛传播的口号中得到最好的体现：“先生产、后生活”。这种偏见导致了中国统治精英的普遍共识：有时可以优先考虑并满足人民的消费与生活需求，但这种优先不能持续太久，因为从长远来看，中国社会主义的重点应当始终放在发展生产上。正是这种生产主义偏见使得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约束工人的物质需求与民主权利是缓解持续性财政危机的必要措施。值得注意的是，正如第四章所述，1983年至1984年期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反复强调南斯拉夫的经济弊端，来论证约束工人权利的正当性。八十年代初期相对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结构——这也是1981年消极革命政策的成果——因为工人工作场所民主的经济主义实践与统治精英生产主义偏见之间的对峙而失效，后者完全无法容忍这种做法。

在更高层次的抽象意义上，这种根深蒂固的生产主义偏见，尽管表现得有些夸张，但实际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深层结构性紧张关系。社会再生产理论早已指出，生产（劳动者将原材料转化为产品的过程）与社会再生产（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每日与每个代际的恢复过程）之间的分离具有历史特异性，这种分离伴随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出现。⁷¹然而，国家社会主义不仅未能消除这种分离，反而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一现象。尽管国家社会主义通过各种方式试图将社会再生产集体化，但政策话语依旧维持着生产领域和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区分——这种区分通常也被称为“积累领域”和“消费领域”的区分，或用中国的术语，“生产领域”和“生活领域”的区分。生产和再生产不仅被视为独立事务，而且在政策重点与资源分配上也优先考虑生产领域，这就形成了生产主义偏见。⁷²这种生产主义偏见的根源在于，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压力下，不得不优先满足发展和工业化的强烈需求。为了生存（特别是在地缘政治意义上），国家社会主义必须在工业能力上与资本主义国家激烈竞争并努力赶超。这种竞争压力意味着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且由

⁶⁹ Ellen Comisso, *Workers' Control Under Plan and Marke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Susan L. Woodward, *Socialist Unemploym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Yugoslavia, 1945-199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⁷⁰ 相比之下，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领导层不仅允许市场社会主义与工人自我管理的结构持续了数十年，还逐步巩固了这一体系。见 Włodzimierz Brus and Kazimierz Laski, *From Marx to the Market*.

⁷¹ Cinzia Arruzza, 2016, "Functionalist, Determinist, Reductionist: Social Reproduction Feminism and Its Critics," *Science & Society* 80 (1): 9-30; Tithi Bhattacharya,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Remapping Class, Recentering Oppression*, Pluto Press, 2017; Susan Ferguson, *Women and Work: Feminism, Labour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Pluto Press, 2020.

⁷²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下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张力，见 Yige Dong, "'Red Housekeeping' in a Socialist Factory: *Jiashu* and Transforming Reproductive Labor in Urban China (1949-1962)," OnlineFirst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董一格将在它即将出版的著作中更加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

国家充当这一过程的主导者。⁷³在这种意义上，生产主义偏见可以被视作全球资本主义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烙印，社会主义最终还是无法完全逃脱这一全球体系的影响。⁷⁴

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阶级分析理论

贯穿上述三条理论介入的共同主线，是对工人历史能动性的强调。第一条介入关注国家社会主义下工人民主行动的潜力及其局限。第二条介入探讨了这种行动主义如何暂时地成为统治精英无法忽视的强大力量，迫使其做出部分妥协，引发复杂且多重的政策回应。第三条介入则强调社会主义市场化的背景下，工人日常的工作场所民主实践对经济政策造成了失衡的影响。此外，本文的实证叙事展示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讽刺。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主义领导层开始收紧工作场所民主时，车间工人的反抗带来了政策制定者未曾预料的宏观经济后果，并为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内爆铺平了道路（见第五章）。总之，本文对工人的能动性进行了广泛且多面的考察，强调了这种能动性如何在运动爆发期与日常生活中显现。这种能动性，既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既体现在颠覆性地将工人组织起来要求民主，也体现在日常反映对工厂管理不满的种种细微之举。

这种对工人能动性的广泛且多面的考察相当有助于理解本文的核心论点与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推行之所以充满了张力和危机，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能动性与党一国政策操作之间的复杂互动。工人的能动性不仅塑造了党领导层引入并调整市场社会主义的方式，最终也破坏了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可行性，很大程度上导致了1989年爆发的政治危机，这场危机严重威胁了共产党的统治。换句话说，党领导层最初通过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试图化解七十年代末的全面危机，但工人的能动性却使市场社会主义的推行偏离轨道，接连引发了一系列危机。1989年市场社会主义的崩溃向党领导层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如果要继续推行市场改革，就必须终结赋予社会主义工人阶级能动性的制度条件。因此，九十年代的市场改革明确包含了废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框架的内容——开启资本主义。本文由此提出，正是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迅速脱轨，迫使政策转向，并为资本主义转型铺平了道路。

基于这些理论介入与分析论点，本文试图构建一个基于阶级的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理论。我的理论化灵感来自对两位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批评性阅读：张春桥与柯伦泰。这两位当代社会科学中都相对鲜为人知，但我坚持认为应当将他们视为严肃的理论家，正因为他们身处实际的社会主义项目之中，使得他们的思想集中于如何**防止**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张春桥可谓是毛泽东晚年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⁷⁵他属于毛泽东手下的激进

⁷³ 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概念概括了这一必要性。见 Preobrazhensky' s *The New Economics* ([1926]1965).

⁷⁴ 某种意义上，这种烙印部分印证了沃勒斯坦的观点：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可避免地保留了资本主义特征。Immanuel Wallerstein, 1974, "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6(4): 387-415.

⁷⁵ Benjamin Kindler, "1958: Beyond the Wage: Zhang Chunqiao, Bourgeois Right, and Maoism as Theory," pp.282-290 in *Proletarian China: A Century of Chinese Labour*, edited by Ivan Franceschini and Christian Sorace, Verso, 2022.

派，这批人后来被称为“四人帮”，他们深度参与了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最激烈的政治斗争。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不久，张春桥与“四人帮”其他成员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清洗。由于其理论敏锐性，张春桥在1958年首次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后来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事实上，张春桥的理论著作，包括他在1958年⁷⁶和1975年⁷⁷撰写的著名论文，以及他在1975年和1976年⁷⁸主持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草稿，提供了对晚期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最深入、最复杂的阐述。

张春桥理论框架的基本前提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保留许多资本主义的制度遗留，即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最初由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用以讨论“按劳分配”原则的问题。⁷⁹张春桥及其同僚激进地扩展了这一概念，使其涵盖诸如商品交换、工资形式、财产的不完全社会化，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分等多种现象。根据张春桥的观点，这些资本主义的制度遗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至少在进入共产主义阶段之前）无法彻底消除，并且它们不断为某些人提供机会，使其能够通过剥削他人的劳动而牟利并积累资本。换句话说，资产阶级法权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持续生产且再生产的经济基础。这些资产阶级因素在党内凝聚成派系，试图通过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来逐步恢复资本主义。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关键轴线就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是“走资派”，试图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另一方就是试图限制（但无法废除）资产阶级法权的人。如果让走资派成功掌权，他们就会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范围，最终将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关系转变为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张春桥及其同僚在七十年代中期的写作中认为，这一过程在苏联已经完成。⁸⁰

张春桥理论中的两个观点尤其值得注意且具有实用性。首先，他正确指出了在社会主义下市场机制的扩张（也就是张春桥口中资产阶级法权的扩大）为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同那些将资本主义之兴起归因于基层创业精神的观点不同，⁸¹张春桥的理论将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视为自上而下的精英项目。我采用了这两个立场。然而，张春桥的理论也存在两个关键的局限。首先，它几乎将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中的阶级关系简化为党领导层**内部**的政治斗争：转型是否发生以及如何发生取决于“走资派”（社会主义社会中不断再生产的资产阶级政治代表）与试图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者的斗争。它不仅将转型视为精英项目，还将其视为精英**内部**斗争的产物。⁸²因此，这个理论几乎没有说明下层阶级——尤其是其中最具力量和能动性的城市产业工人——在塑造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中的作用。其次，张春桥的理论假定从资产阶级法权扩大到资

⁷⁶ 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载于《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⁷⁷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载于《红旗》，1975年第四期。

⁷⁸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小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定稿第二版讨论稿），1976年。

⁷⁹ 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1875.

⁸⁰ Ibid.

⁸¹ Yasheng Huang,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Victor Nee and Sonja Opper, *Capitalism from Below*:

⁸² 塞勒尼·伊万的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理论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因为他与他的合作者将精英内部斗争视为转型的关键驱动力。Gyorgy Konrad and Ivan Szelenyi,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Lawrence Peter King and Ivan Szelenyi, *Theories of the New Class: Intellectuals and Powe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4.

本主义转型是一个线性过程：根据这一逻辑，市场机制的引入必然会自我强化并最终发展为资本主义。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这可能是对的，但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可能持续几十年——在东欧国家如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确实发生过这种情况。⁸³反观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市场社会主义崩溃得相当迅速，直接为资本主义转型铺平了道路。张春桥的理论无法解释这一点。

我认为解决张春桥理论第一个问题的一种办法就是使张春桥与柯伦泰进行对话。柯伦泰是二十年代初期布尔什维克内部工人反对派的重要人物，那个时期她的写作同样表现出对于如何防止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强烈关注。⁸⁴根据柯伦泰的观点，工人阶级，尤其是产业工人，是俄国唯一与社会主义项目利益一致的阶级。其他主要阶级——如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前资本家的技术和管理人员——都怀有资本主义愿景，本质上与社会主义敌对。柯伦泰认为，能否防止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取决于工人而非党，取决于工人能否自我组织并行使政治领导权。因此，她提出以下措施：一、确保工会是真正的工人自我组织；二、加强工会在管理车间以及整个经济与社会事务中的权力和自主性；三、提高工人在党内的占比。而且，柯伦泰的理论警告说，如果工人政治失权、党与工人日益脱节，其他阶级中的亲资本主义倾向就将主导党的政治方向。换句话说，产业工人的政治去动员与边缘化将**导致**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

柯伦泰的理论为张春桥理论的第一个问题提供了解药。她提醒我们，在分析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时，应当重视党与工人的关系。我在理论化过程中采纳了这一观点，特别关注党一国与产业工人的关系。然而，柯伦泰的具体论点——工人能动性的政治边缘化推动了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过于简化。毕竟，她的理论基于一个非常有问题的阶级取向假设：工人支持社会主义，其他所有阶级都反对社会主义。此外，柯伦泰的理论并未解决张春桥理论的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她的理论也存在这一问题。与张春桥类似，柯伦泰认为社会主义中引入的市场机制（即二十年代初的新经济政策）会自我强化，并几乎以线性的方式迈向资本主义。因此，她同样无法解释为什么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在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存续时间存在显著差异。

对张春桥和柯伦泰理论的批评性解读促使我构建了一个基于阶级的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包括以下两个组成部分。首先，我认为“市场改革”和“资本主义”在概念上并不等同。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背景下，“市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应被视为不同的社会形态——前者不会自发地迈向后。相反，正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崩溃，迫使并为部分统治精英转向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这一点不仅在中国如此，在许多其他国家同样如此。因此，解释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应当集中在解释不同市场社会主义的结构、存续时间以及崩溃路径。其次，我提出，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与党一国的互动模式与方式是解释不同市场社会主义的结构、存续时间以及崩溃路径的关键因素。在中国，市场社会主义使得工人的能动性能够灵活且迅速地在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之间流动，而党领导层未能预见或控制这种动态。这种互动导致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尤为短暂。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探讨各国工人与党一国的互

⁸³ 关于后六八时代匈牙利市场社会主义的活力，见 Chris Hann, 2016, “Cucumbers and Courgettes: Rural Workfare and the New Double Movement in Hungary,” *Intersections* 2(2): 38-56.

⁸⁴ Alexandra Kollontai, *The Workers' Opposition in Russia*, 1921.

动模式如何影响市场社会主义的不同结构、存续时间以及崩溃路径。

最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并非一次葛兰西意义上的消极革命。⁸⁵它是财产制度的根本性变格，是通过极其残酷与压迫性手段进行的反革命。中国在九十年代持续不断地拆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清除——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苦难，⁸⁶正是这种暴行的明证。尽管如此，对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阶级理论而言，消极革命这一概念仍至关重要。这是因为资本主义转型可以被理解为对市场社会主义框架内消极革命失效的回应。具体而言，统治精英之所以诉诸反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消极革命作为统治手段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失去了信心。以中国为例，八十年代初期至中期消极革命策略的失效及其在八十年代末引发的一系列意外后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八十年代末市场社会主义的内爆表明，工人模糊但强大的能动性已无法通过脆弱的消极革命策略加以控制。在这种背景下，彻底摧毁那些允许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存在的制度，成为统治精英眼中颇具吸引力的选择。因此，对于社会主义统治精英而言，资本主义转型的逻辑是一种“别无他法”的选择⁸⁷：鉴于消极革命的脆弱及其失效，在他们看来，若想化解危机、恢复秩序并维持自身统治，也许唯一有效且光明的途径，就是采取高压的反革命，也即资本主义转型。

实证章节提要

本文的历史论述由五个实证章节构成。第一章展示了七十年代末的全面危机中，部分知识分子与政策制定者转向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模式，尤其是工人自我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以批评性地反思中国的社会主义，并设想更为民主的发展路径。这种对南斯拉夫的迷恋迅速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党内的部分主要权力人物——尤其是邓小平——容忍甚至鼓励这种“南斯拉夫热”，因为它符合且有助于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削弱晚期毛泽东主义合法性的总体目标，并树立后毛泽东领导层作为改革派的公共形象。随后，本章聚焦于南斯拉夫模式对赵紫阳的影响。赵紫阳在1980年从省级职务晋升到中国国务院总理。1980年秋，走马上任的赵紫阳推出一系列大胆的政策试验，提出自己版本的“工人自我管理”：职工大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也就是说，将企业职工大会（由工人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集体机构）设为公有制企业中的最高决策机构，厂长对其负责。最后，本章剖析了这些自我管理试验在工厂内部具体的车间动态（这些试验最终被证明是短暂的）。

第二章讲述了1981年消极革命的故事。首先，本章介绍了这场政治剧中的一组重要角色：官方工会系统（全总）的领导干部。1978年重组后，全总的干部试图平反五十年代工会系统遭受的迫害与批评，同时主张赋予全总更多的独立性与权力，并加强工作场所民主制度（尽管没有赵紫阳的自我管理试验那样激进）。随后，本章展示了全社会的南斯拉夫热如何酝酿并寄托了工人要求更多民主的基层情绪。波兰团结工会运动鼓舞人心的消息进一步催化了这些情绪，并在1980年末与1981年初爆发为全国范围的罢工浪潮、独立组织以及车间动荡。赵紫阳的自我管理试验也对这次工人斗争起到鼓舞作用。尽管这些事态发展引起党领导层的高度警觉，但也为全总推进自身议程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全总现在可以高声

⁸⁵ I thank Dylan Riley for pushing me to clarify this point.

⁸⁶ Ching Kwan Lee, *Against the Law*, William Hurst, *The Chinese Worker after Socialism*.

⁸⁷ Jeff Goodwin, *No Other Way Out: State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1945-199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辩称，为了防止工人仿效波兰组建独立工会并挑战党的权威，必须赋予官方工会更多的权力，并且加强工作场所民主制度。因此，全总在帮助党领导层于 1981 年中期制定消极革命策略回应工人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政策声明将加强职工大会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作为优先事项，这些民主化改革必须在企业党委继续作为企业治理的最高权威的前提下进行。赵紫阳的自我管理试验，由于其潜在的不稳定影响，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悄然废弃。

第三章深入探讨了八十年代初工人如何利用部分扩展的工作场所民主制度空间来解决他们关心的问题。本章提供了详细且有实感的描述，展现工人们具体如何通过企业职工大会实践工作场所民主，从而得出两个核心发现：首先，工人们利用职工大会的权力解决了广泛的问题，尤其是与他们的生计息息相关的分配性问题，例如住房、工资、奖金，以及工人子女的就业机会。其次，除了上层推动赋权职工大会的政策压力之外，工人在日常生活中施加的压力也是许多企业厂长愿意在分配问题上听从职工大会的重要原因。随后，本章试图论证，职工大会能够有效解决工人生计相关分配问题的原因，得益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政治经济结构中的两大变化：一是公有制企业从党一国手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权，二是一系列旨在积累与消费之间重新调整平衡的政策尝试。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的结构（见序言中的表 1）。与此同时，工人的车间民主实践与许多党一国官僚及企业厂长心中根深蒂固的生产主义偏见发生了冲突。这些干部领导们担心，工人实践工作场所民主的方式使得职工大会成为工人“落后意识”的表达平台。他们还担心工人的经济主义行为分散了资源与注意力，偏离了发展生产这一被认为是更重要的目标。

第四章再次从车间回到制定政策的高层，展现生产主义偏见对工作场所民主产生的致命影响，并导致市场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的解体。1983 年，赵紫阳等经济政策制定者对持续的财政危机深感不安，过去几年内他们已多次尝试解决这一问题。此前，过度的政府支出是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但时至 1983 年，问题的中心似乎转向收入不足。为了找到解决财政危机的方法，重要政治家与政策制定者优先考虑遏制工人的物质需求，并限制使工人能够提出需求的工作场所民主。换句话说，党领导层不再愿意容忍工人在工作场所民主中的经济主义行为。因此在 1984 年，党领导层一致决定边缘化工作场所民主，并将管理权集中到企业厂长手中。这标志着市场社会主义第二阶段的到来（见序言的表 1），这一阶段以加深市场化与工作场所民主的倒退为特征。虽然全总干部无力阻止这一反民主转向，但他们还是设法保卫了工人选举厂长的权利。即便是车间选举，也是被重新定义后的，实际上削弱了其民主实质。结果，厂长选举很容易被重新塑造成推动企业厂长权力集中的工具。在许多地方，选举都是预先安排好的，为的是让工人同意或至少默许厂长的权力集中。然而，本文通过一项案例研究展示了这些选举的实际效果有时可能与官方的意图背道而驰。

第五章记录了 1984 年反民主转向的经济后果以及最终的政治后果。1984 年改革后厂长获得了更大的专制管理权，工人对这种管理专制的不满迅速增加，车间的紧张局势几乎立即倍增。由于解雇工人仍然非常困难，企业厂长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确保工人服从其权威并维持车间稳定。一方面，企业厂长决不愿放弃他们的专制权力；另一方面，公有制企业获得了更大的财务自主权。两相结合，频繁的全体加薪及其他福利，成为厂长实现工业和平最便捷的手段。因此，反直觉的是，工作场所民主制度的倒退导致了工人收入无序且迅速的增长。考虑到价格

部分放开和银行系统积极满足企业的贷款需求等条件，工人收入的无序增长导致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严重的通货膨胀周期。换句话说，猖獗的通货膨胀，被普遍认为是八十年代末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1989 年政治运动的重要诱因，其可以部分追溯到 1984 年后工作场所民主的倒退。最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阶段的结构在政治与经济上都以剧烈内爆告终。市场社会主义的内爆为中国全面转型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

第一章 南斯拉夫的启示：中国的精英政治、跨国社会主义和推进“工人自治” 1978-1980

1978-1980 年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模式的迷恋，是如何导致中国市场社会主义最初那几年类似“工人自治”实验的政策？本论文的历史叙述就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本章阐明了导致这种“南斯拉夫热”的政治条件，在深度和广度两个层面剖析中国对南斯拉夫模式的迷恋，详细说明了知识分子的迷恋如何转化为实际的政策理念，并描述了南斯拉夫式的政策实验是如何在实践中展开的。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几年，中国党领导层中的一个重要派系正忙于寻找方法对晚期毛泽东思想发起攻击。因此，这些党的领导人发起了一场“准开放”，以便可以部署各种知识和话语资源——包括一些此前被禁忌的资源——来批判性地反思中国前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经验并规划其他前进道路。在此背景下，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地缘政治和解恰好促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模式，尤其是其“工人自治”理论和实践视为一种有希望的替代方案。尤其是，南斯拉夫的理论 and 实践帮助中国人理解了迄今为止在中国实行的公有制模式的缺陷。这也帮助他们设想如何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让工人成为工作场所的真正主人。

一些党的领导层容忍甚至鼓励这种对南斯拉夫模式的广泛迷恋。邓小平特别表示了部分认可，他认识到这种现象有助于实现使晚期毛泽东思想非法化并建立强调“实事求是”的替代意识形态纲领的总体目标。1980 年，赵紫阳将这种迷恋转化为具体的政策议程。赵紫阳刚从省级领导职位晋升为中央党政的主要经济决策者之一，在中国精英政治中权力基础不稳。他转而寻求利用经济学家的专业知识来提出政策理念并建立权威。结果当时在许多经济学家圈子中流行的南斯拉夫理论和实践对赵紫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利用邓小平短暂的开放态度，赵紫阳于 1980 年秋天开始推行以南斯拉夫模式为蓝本的政策议程。这一议程提议在中国的公营企业中设立工人选举的代表机构作为最高决策机构。这一相当激进和有点乌托邦的政策议程引发了 1980 年最后几个月和 1981 年初在全国 44 家工业企业进行的一系列政策试验。

本章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改革的史学研究，可以说是第一篇认真记录中国与南斯拉夫模式的接触范围及其对后毛泽东时代早期政策制定的具体影响的文章。近期关于中国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的历史研究的一个主要主题是思想、网络和资源的跨国流通如何塑造了中国的改革轨迹⁸⁸。此项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如何通过接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而最终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相应地，这些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来自资本主义核心之外的国家——特别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如何成为中国人设想、引导和反对改革进程的重要灵感来源。或许可以说，这些文献表现出目的论偏见：由于中国改革最终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对中国改革轨迹的影响引起了最多的关注，并被认为更值得研究。然而，本章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的跨国传播如何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中国改

⁸⁸ See Julian Gewirtz, *Unlikely Partners*; Isabella Weber, *How China Escaped Shock Therapy*; Peter Hamilton, *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Taomo Zhou, 2021, "Leveraging Liminality: The Border Town of Bao'an (Shenzhe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80(2): 337-361.

革中发挥了启发作用。具体而言，接触南斯拉夫相当非正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有助于为一些最早探索如何改革中国政治经济的努力提供信息，特别是围绕如何使中国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问题。

除了在史学方面的贡献外，本章还试图推进全球和跨国社会学的蓬勃发展。在研究思想、制度和政治实践的跨国传播、影响和采纳时，该领域的传统方法往往侧重于思想、制度和政治实践如何从特定世界体系的核心（通常指霸权和自由民主的西方）传播到边缘地区并塑造其影响⁸⁹。近年来，帝国和殖民主义学者对这些方法提出了挑战，他们借鉴了WEB Du Bois、CLR James 和其他去殖民理论家的著作，颠覆了传统方法。这些学者探究殖民和后殖民边缘地区的动态如何深刻影响并塑造了以大都市为核心的当代社会⁹⁰。我通过将边缘-中心的方法应用于研究 20 世纪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来推进这一知识颠覆的努力。我展示来自南斯拉夫这个社会主义阵营中被边缘化和诋毁的“弃儿”，其理论和实践如何对中国的改革政策制定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霸权国家，被广泛认为是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其全球声望有时甚至超过了苏联。

本章分为五部分（篇幅不一）。第一部分描绘了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精英政治的面貌。它展示了精英权力斗争的动态如何产生了一种准开放状态，各种知识和话语资源可以被调动起来，以质疑晚期毛泽东思想，并批判性地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第二部分接着揭示了以“工人自治”和“社会所有制”为中心的南斯拉夫理论和实践如何巧合地成为这些思想资源之一。南斯拉夫模式启发了中国人思考“公有制”可能和应该意味着什么，并在 1978-1980 年间成为全社会着迷的对象。第三部分解释了一些党的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如何以及为何容忍和鼓

⁸⁹ 约翰·迈耶及其合作者所提出的著名“世界社会”和“世界政体”方法在这方面一直占据主导地位。See, for example, John W. Meyer, John Boli, George M. Thomas and Francisco O. Ramirez, 1997, "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1): 144-181; Evan Schofer and John W. Meyer, 2005, "The Worldwide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6): 898-920; John W. Meyer, 2010, "World Society, Institutional Theories, and the Actor,"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6: 1-20. Recent scholarship complicates these frameworks, but still largely adheres to their premises. See, for example, Kiyoteru Tsutsui, *Rights Make Might: Global Human Rights and Minority Social Movements in Jap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Yan Long, 2019, "The Contradictory Impact of Transnational AIDS Institutions on State Repression in China, 1989-2013,"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4(2), 309-366; Zeynep Ozgen and Matthias Koenig, 2021, "When Global Scripts Do Not Resonate: International Minority Rights and Local Repertoires of Diversity in Southern Turkey," *Qualitative Sociology* 45(1) 149-187.

⁹⁰ See, for example, Julian Go, 2020, "The Imperial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cing: Militarization and Imperial Feedback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5(5): 1193-1254; Christy Thornton, *Revolution in Development: Mexico and the Governance of the Glob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1; Katrina Quisumbing King, "The Political Uses of Ambiguity: Statecraft and US Empir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46," dissertation completed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2018; and Ricarda Hammer, "Citizenship and Colonial Difference: The Racial Politics of Rights and Rule across the Black Atlantic," dissertation completed at Brown University, 2021.

励对南斯拉夫模式的迷恋，为这种模式的推行创造了政治条件。第四部分则聚焦于南斯拉夫模式对赵紫阳在担任中国主要经济决策者之一的第一年的影响。1980年秋，在邓小平短暂而含糊的开放态度的影响下，赵紫阳制定了南斯拉夫式的政策议程，将企业级职工委员会提升为公共企业内部管理的最高领导机构。全国44家工厂进行了一系列试验。第五部分考察了1980年底和1981年初在北京、天津、厦门和上海进行试验的实际实施情况。尽管这些试验都没有实现彻底的民主化和车间赋权，但它们仍然为许多工人提供了自下而上参与民主活动的机会。

争相否定晚期毛主义

到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时，中国精英政治舞台主要被三个派系占据⁹¹。第一派人是毛泽东的激进追随者，最著名的是“四人帮”：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党的理论家张春桥、文化评论家姚文元和造反工人王洪文。这个群体代表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遗产。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帮助宣传了毛泽东的许多激进举措。王洪文是上海造反工人的早期领导人，他迅速晋升，并于1973年被毛泽东提拔为党内（名义上）最有权势的官员之一。

第二派是“老革命家”。这些人在1949年共产党掌权之前就已经进入领导层，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继续担任关键领导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各种形式的迫害和边缘化，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和中期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平反。邓小平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他在文革初期被抛弃，但1973年重返政治中心，并于1975年成为党国行政运作的实际负责人，这两次都是得到毛泽东的允许。但毛泽东很快就认为他在破坏文革遗产方面做得太过分了，并在1976年再次对邓小平进行了批斗。邓小平被剥夺一切官职，并被开除出党。然而，在70年代初期和中期得到平反的其他“老革命家”，如叶剑英、李先念和王震，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在1976年的反邓运动中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第三派是“文革官僚”，如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吴德。这些人与“老革命”相比，级别一般要低得多，文革前曾在中国各省级党政机关和军队担任过各种领导职务。文革期间，他们被提拔到中央党政机关的领导岗位。尽管他们从文革带来的党政改组中获益匪浅，但他们与激进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太大关系。在中央的分工中，他们通常承担行政责任，而不是意识形态责任。

1971年臭名昭著的“林彪事件”⁹²之后，毛泽东一直在这三个集团之中寻找接班人。他最初对王洪文寄予厚望，因为王洪文有着造反工人领袖的背景，如果被推上党国的领导岗位，他将体现文革意识形态议程的最终胜利。然而，王的政治不成熟和总体无能很快让毛泽东失望，于是毛泽东转而支持邓小平。当邓小平在1975年初全面负责党国的运作时，很明显他获得了毛泽东的认可。但邓小平的政策纲领似乎否定了文革的许多政治成就，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愤怒。1975年底，一场针对邓小平的全面批判运动开始展开，并持续到1976年。随着王洪文

⁹¹ 弗雷德里克·泰韦斯 (Frederick Teiwes) 和沃伦·孙 (Warren Sun) 详细阐述了毛泽东逝世时中国精英政治的概念，即三个群体之间的互动。See their 2014 book,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Routledge.

⁹² 1971年9月13日，中共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及其家人和助手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不幸遇难。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神秘的政治事件之一，并引发了中共高层的重大人事变动。

和邓小平的失势，毛泽东于 1976 年选择华国锋作为他的继任者，据说他对华说“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去世后，一系列类似宫廷政变的事件几乎立即发生。华被任命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后，迅速与其他“文化大革命官僚”以及“老革命家”勾结，清洗和逮捕了“四人帮”和毛泽东的其他激进追随者。

甚至在毛泽东去世和随后发生的令人惊讶的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多个迹象指出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根本危机。1971 年林彪事件后，政治幻灭感普遍存在。到 1976 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十多年来几乎没有改善。政治理想幻灭、物质匮乏以及群众造反运动结束后挥之不去的不守规矩精神也意味着，在 1970 年代中期，中国工业界普遍存在着工人纪律不严的问题⁹³。面对这些挑战，后毛泽东时代的党领导层必须想方设法稳定中国社会，巩固社会支持。对“四人帮”的清洗使这一目标更加难以实现。如何向中国社会解释这一政治大转变：那些多年来一直被誉为毛泽东最亲密追随者的人物——包括他的妻子——突然被塑造成反派？这一复杂的合法化项目包括一些旨在实质性提升中国社会各阶层福利的政策措施。例如，1977 年⁹⁴，中国政府大规模上调了工人薪资。然而，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本质意味着意识形态话语同样是合法化的关键。

使这一状况更加复杂的是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文革官僚”和“老革命”的联盟就破裂了。1977 年，在一些“老革命”的压力下，华国锋叫停了反邓小平运动，允许邓小平重返党的领导岗位。此后，以邓小平为首的“老革命”们致力于（并在几年内最终成功）推翻华国锋和其他“文革官僚”。虽然这场权力斗争是在多个方面展开的，但意识形态的较量是一个突出的组成部分。对于华国锋和其他“文革官僚”来说，核心的意识形态任务是发展既能令人信服地为清洗毛泽东的激进追随者辩护，又能维护自身统治的言论。邓小平和其他“老革命家”则需要意识形态和话语工具来证明清洗毛泽东激进分子的合理性，同时又要让华国锋和其他“文革官僚”也成为反派。

意识形态斗争就是沿着这个思路展开的。对于“文革官僚”和尤其对于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华来说，他们继续执政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就是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指定华为他的接班人，这导致了他们继续秉持晚期毛泽东思想和文革话语的意识形态策略，而把“四人帮”塑造成这一政治路线的叛徒。这一策略在华国锋 1977 年十一大上的讲话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他在讲话中声称，粉碎“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决胜性胜利。尽管“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最终以这一辉煌胜利而告终，但华国锋坚称，未来还会有更多次文化大革命，以符合毛泽东晚期“继续革命”理论。同年早些时候，“文革官僚”派的成员还撰写了一篇社论，

⁹³ Teiwes and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p.62; Jackie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Routledge, 2002, Chapter 5; Elizabeth J. Perry and Xun Li,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stview Press, 1997, pp.191-192; Keith Forster,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1990, M.E. Sharpe, pp.226-227.

⁹⁴ 事实上，甚至在五年后的 1982 年，一些工人仍然深深地记得这波工资上涨，并对当时已被彻底边缘化于精英政治的华国锋表示感谢。武汉市档案馆，XX000091-WS04-41-10，武汉市总工会办公室编《工运情况》增刊第十期《职工群众学习十二大文件的思想反映》，1982 年 9 月 21 日。Wuhan Municipal Archive (WMA), XX000091-WS04-41-10, "Report on Thoughts Expressed by Workers and Masses While Studying the Documents of the 12th Party Congress," *Workers' Movement Bulletin Special Issue 10*, compiled by the Office of the Wuhan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September 21, 1982.

联合发表在所有主要官方喉舌（《人民日报》、《红旗报》和《解放军报》）上，其中有一句著名的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⁹⁵。这句话如此出名，以至于华国锋的意识形态纲领被俗称为“两个凡是”，他和其他“文革官僚”被称为“凡是主义者”。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的历史著作表明，华国锋的政策纲领的实际内容与毛泽东的实践大相径庭⁹⁶，而且华国锋“事实上打着毛泽东的名义进行去毛化”⁹⁷。但与此同时，“凡是主义者”对晚期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话语效忠是显而易见的。

“凡是主义者”的论调为“老革命家”及其盟友发动意识形态攻势提供了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他们的反驳坚持认为，中国人不应该遵守毛泽东的任何指示，并且，毛泽东晚期思想的许多要素，乃至其作为一个整体，都应该被批判性地重新思考。换句话说，这里的意识形态策略是试图否定毛泽东晚期思想，使“四人帮”作为其宣传者以及“凡是主义者”作为其追随者都失去合法性。另一方面，它将邓小平和“老革命家”描绘成不教条、思想开放、充满民主精神的领导人。在这一系列意识形态争论中，最著名的一幕如今已广为人知：1978年5月，南京大学哲学教授胡复明在中央党校内部理论通讯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文章，对“两个凡是”进行了尖锐而毫不掩饰的批判。几天之内，这篇文章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国多家主要报纸转载。一些“文革官僚”及其同伙纷纷对这篇文章提出尖锐批评，而邓小平和其他“老革命家”则迅速表示支持。⁹⁸

然而，仅仅攻击“两个凡是”的理论还不足以完全否定晚期毛泽东思想，仍需要对晚期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理论原则进行实质性的批评。1977年至1980年间，“老革命家”——最著名的是邓小平——发起了一系列从理论上批判晚期毛泽东思想的努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于光远在1975年至1979年间与邓小平关系密切，他在1977年委托两个写作小组对晚期毛泽东理论的两个关键组成部分进行了理论批判。针对毛泽东时代关于“按劳分配”是滋生新资产阶级的沃土的说法⁹⁹，一个写作小组的任务是论证“按劳分配”没有任何资产阶级的东西。针对毛泽东时代反对“生产中心主义”（即所谓将生产力发展置于政治目标之上的倾向），另一个写作小组的任务是论证生产力发展应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根本作用¹⁰⁰。这些写作小组撰写了大量论文来阐明这些观点，其中一些被广泛传播并发表

⁹⁵ 根据现有的证据，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华国锋本人并没有直接下令起草这篇社论，但他肯定默许了该社论的传播。See 韩钢，《“两个凡是”的由来及其终结》，载于《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1期，第54-63页（Han Gang, 2009, “The Origin and the End of the ‘Two Whatever’s’,” in CPC History Studies, Issue 11: 54-63）；《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载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第9-18页（Han Gang, 2011, “Some Historical Facts about Hua Guofeng,” Yanhuang Chunqiu, Issue 2: 9-18）

⁹⁶ 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 2011, “China’s New Economic Policy under Hua Guofeng: Party Consensus and Party Myths,” The China Journal 66: 1-23.

⁹⁷ Hao Li-Ogawa, 2022, “Hua Guofeng and China’s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ost-Mao er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11:1, 124-142.

⁹⁸ Yang Jisheng, Political Struggle in China’s Era of Reform, pp.79-93.

⁹⁹ 请参阅导言中对张春桥理论著作的讨论。

¹⁰⁰ 冯兰瑞，《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界的拨乱反正》，载于《领导者》2008年4月号。Feng Lanrui, 2008, “Theoretical Rectification in the Early ‘Reform and Opening’ Era,” in Leadership April Issue.

在党的主要喉舌《人民日报》上。于光远也召开了各种会议来推动这些讨论。这些努力，特别是对“按劳分配”的辩护，得到了邓小平强烈而明确的支持¹⁰¹。

因此，当邓小平和其他“老革命家”提倡在意识形态上否定晚期毛泽东思想，以使毛泽东的激进追随者和“凡是主义者”都失去合法性时，他们就认可了一种准开放状态，可以调动各种理论和话语资源，对晚期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和政治项目做出负面评价。需要澄清的是，我并不是说每个参与这些谴责晚期毛泽东思想努力的人都是出于帮助“老革命家”巩固权力的意图。这些参与者中的许多人或多或少都真诚地试图弄清晚期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在，批判地评估中国社会主义经验，并设想未来的改革方向。一些人确实将这种准开放视为令人振奋的自由和充满可能性的时刻。然而，我认为，这种准开放的可能性条件植根于当时中国的精英政治。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短暂开放中，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模式意外地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和政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它为许多人批判性地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并借鉴他国经验提出改革方案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参考框架。它进一步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中国后毛泽东时代早期的“南斯拉夫热”

南斯拉夫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个异类，1948年南斯拉夫主要领导人铁托与斯大林决裂后，南斯拉夫被踢出苏联集团，南斯拉夫则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提出强烈批评，并誓言要独立自主地建立替代模式。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在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一些曲折，到20世纪60年代发展成为相对稳定的体制。1970年代开始实行这种制度。该制度的关键要素是，大部分公共企业由工人自己在企业中选举产生的常设委员会管理。这些管理委员会对企业重大问题拥有决策权，包括如何分配大部分利润以及任命管理人员。这与合作社的一般经营方式有些相似，关键区别在于南斯拉夫的自我管理公共企业不由工人所有。尽管自我管理的公共企业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不受国家官僚机构的约束，但它们仍在国家设定的范围内运作。同时，引入了强大的市场机制，以在这些相对自主的企业之间进行具体的日常协调。总之，南斯拉夫模式结合了工作场所内的高度参与式民主和充满活力的市场机制（以削弱国家计划机构为代价），而工作场所以外的民主相比之下仍然有限¹⁰²。

在毛泽东时代的大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官方对南斯拉夫的态度都很尖锐。在20世纪40年代末铁托与苏联决裂后，中国跟随斯大林谴责南斯拉夫背叛社会主义事业并试图复辟资本主义。斯大林去世后，中南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短暂缓和，1955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随着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与后斯大

苏绍智，《超越党文化的思想藩篱》，载于《现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2期。Su Shaozhi, 2007, "Beyond the Intellectual Fences of the Party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Studies* Issue 2.

¹⁰¹ 黄黎，《“按劳分配”正名始末》，载于《北京日报》，2008年10月13日。Huang Li, "Reversal of the Verdict on 'Remuneration according to Work'," *Beijing Daily*, October 13, 2008.

¹⁰² Sharon Zukin, *Beyond Marx and Tito: Theory and Practice in Yugoslav Soci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Dennison Rusinow, *The Yugoslav Experiment: 1948-197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Ellen Comisso, *Workers' Control Under Plan and Market*; Pat Devine, *Democracy and Economic Planning*, Polity Press, [1988]2010; Włodzimierz Brus and Kazimierz Laski, *From Marx to the Market*; Susan L. Woodward, *Socialist Unemployment*.

林时代的苏联展开激烈的理论斗争，南斯拉夫再次成为中国猛烈批评的对象。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批评家不断谴责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和假社会主义。然而，作为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调整的一部分，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开始使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正常化¹⁰³。毛泽东去世后，这一努力仍在继续。1977 年铁托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后，后毛时代的中国领导层决定抓住机会，进一步发展同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

因此，中国于 1978 年 3 月派出了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前往南斯拉夫。代表团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常务副主任李一氓率领，负责深入考察南斯拉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为中国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恢复官方联系做准备¹⁰⁴。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南斯拉夫自称是其独特社会主义模式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到底是什么：它是否符合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宗旨和原则？它是社会主义的吗？它是修正主义的吗？代表团成员苏绍志后来回忆说，代表团特别感兴趣的是了解工人自治，这是南斯拉夫模式的核心支柱¹⁰⁵。

代表团的两位副团长之一的于光远，是邓小平的亲密伙伴，也是我们所看到的反对晚期毛泽东思想的许多思想斗争中的关键人物。在为期三周的考察结束后，于光远的个人报告非常生动详细地描述了工人自治制度如何发挥作用，以确保车间民主和工人在工作场所的主人地位（当家作主）：例如，工人委员会如何决定厂长的任命，工人委员会和管理人员之间权力和责任的具体划分，工人的收入如何确定，以及处理厂长管理专制的制度程序。¹⁰⁶他还惊叹于强烈的民主意识如何超越车间，渗透到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其他领域，包括贝尔格莱德的城市发展计划是如何民主制定的¹⁰⁷。于光远的报告中洋溢着一种对新事物的兴奋之情：“我觉得南斯拉夫的做法似乎很理想化，我不知道实际做法与理想有多接近。但我发现他们的想法确实很有吸引力。”¹⁰⁸

于光远之所以专注于南斯拉夫模式的民主方面，很可能源于他在那一历史时刻所具有的更广泛的思想关注。在文革的最后几年，于光远开始热心研究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消亡的理论。这种智力上的努力使他得出结论，文化大革

¹⁰³ 项佐涛、向康祺，《中南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基于南斯拉夫解密档案的分析》，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118-133 页。Xiang Zuotao and Xiang Kangqi, 2021, "The Process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Sino-Yugoslavian Relationship: Analysis based on Declassified Yugoslavian Archives,"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sue 2*: 118-133.

¹⁰⁴ 吴兴堂，《李一氓：新时期对外政策“两个转变”的推手》，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15 年 4 月 22 日。Wu Xingtang, "Li Yimang: The Hand behind the 'Two Transformations' in the New-Era Foreign Policy", *China Newsweek*, April 22, 2015

¹⁰⁵ Su Shaozhi, "Beyond the Intellectual Fences of the Party Culture" .

¹⁰⁶ 于光远，《我从南斯拉夫访问归来》(1978)，载于《于光远改革论集》，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Yu Guangyuan, 1978, "After the Visit to Yugoslavia", in *Yu Guangyuan on Reform*,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2008.

¹⁰⁷ 当然，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实际情况并不像于光远所观察到的那么乐观。See Sharon Zukin, *Beyond Marx and Tito*; Susan L. Woodward, *Socialist Unemployment*; and Pat Devine, *Democracy and Economic Planning*. However,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the Yugoslav experience was in itself highly significant. And the gap between this perception and the reality opens up interesting avenue for further analysis and research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¹⁰⁸ Yu, "After the Visit to Yugoslavia" .

命错误的一个重要部分体现在他所认为的毛主义晚期对“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理论误解上。他认为，毛泽东晚期思想的误解掩盖了列宁对这一概念的强调¹⁰⁹。对于于光远来说，毛泽东晚期思想以及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总体上存在着严重的民主缺陷，不断向“国家消亡”方向推进民主化应该是未来改革的重点¹¹⁰。这种担忧甚至促使他在1979年1月的理论工作会议上——这是后毛泽东时代初期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会议之一——发表了一篇关于国家消亡问题的长篇论文（形式为一系列“笔记”之一）。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国家应该逐渐消亡的理论主张相反，中国社会主义却看到了国家机器的急剧加强和扩张？国家什么时候真正开始消亡？¹¹¹于的论文具有如此大的政治颠覆性，甚至连他的政治支持者邓小平都无法接受，并下令没收会议上散发的所有论文¹¹²。不难看出，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强烈地呼应了于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化和国家消亡的关注。这种联系很可能激发了于热情地讲述他在南斯拉夫的观察。

作为一名热心的理论家，于对工人自治的理论基础特别好奇。他的报告指出，同代表团交流的南斯拉夫学者提出了一种奇怪而令人困惑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

“南斯拉夫人说，他们的所有制既不是国家所有制也不是集体所有制，他们称之为‘社会所有制’。但是，即使听了他们几次描述，问了几个问题，我们仍然没有真正理解他们所说的‘社会所有制’是什么意思。因为从字面上看，‘社会所有制’就是公有制。如果它是一种不同于国家或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他们应该解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公有制。这一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但根据他们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所有制确实与众不同，既不同于我们所知道的国家所有制，也不同于集体所有制。”¹¹³

正如于所指出的，中国代表团未能理解“社会所有制”的真正含义揭示了南斯拉夫的概念与中国人习惯的公有制的传统理解有多么不同。正如引言中已经讨论过的，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将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合并为国家所有制。但南斯拉夫的理论和实践试图重新思考的正是公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之间的这种融合。

在于光远的论述中，中国人可以理解“社会所有制”为何不是国家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但却无法理解它到底是什么。换言之，人们可以相对直接地看出，自营企业的工人名义上并不“拥有”这些企业（因此“社会所有制”不是“集体所有制”），这些相当自治的企业在任何直接意义上都不属于国家所有（因此“社会所有制”不是“国家所有制”）。但要理解这些自营企业如何属于“社会”，以

¹⁰⁹ 于光远，《文革中的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Yu Guangyuan, *Me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Guangdong Peoples' Press, 2011. In 1975, Yu had a particular interest in Lenin's treatise *State and Revolution*, according to a student and assistant of his (conversation on October 14, 2021).

¹¹⁰ 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Yu Guangyuan, *1978: The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that I Experienced*,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1998.

¹¹¹ 张显扬，《四项基本原则的由来》，载于《爱思想》，2013年9月5日。Zhang Xianyang, "The Origins of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Aisixiang*, September 5, 2013.

¹¹² 因此，我没有于光远的论文。

¹¹³ Yu, "After the Visit to Yugoslavia".

及“社会”如何行使所有权，则要困难得多。这种理解上的失败既表明了南斯拉夫夫人和中国人之间的认知不一致，也指出了南斯拉夫理论本身的模糊性。然而，于如此详细地记录这一费解时刻的事实本身，表明他确实认为应该非常认真地对待南斯拉夫的理论 and 实践，并应该努力去进一步理解它们。正是这种对截然不同的事物既困惑又兴奋的感觉，记录了中国改革者“真正”接触到南斯拉夫经验的最初时刻。

5月，代表团回国几个月后，代表团团长李一氓、副团长乔石和于光远，向中联部汇报了此次考察的主要发现。除了外债，工人自治和社会所有制也是报告重点关注的问题¹¹⁴。关于工人自治，乔石说：

“南斯拉夫从1950年开始推行工人自治，过去我们认为这是修正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但现在来看，虽然我们仍然不完全认同工人自治的做法，但应该尊重，不应该干涉。¹¹⁵南斯拉夫夫人也为此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们认为工人自治是基层民主的表现，马克思本人也说过。”¹¹⁶

关于社会所有制，乔石表示：

“过去我们批评南斯拉夫放弃公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次南斯拉夫同志告诉我们，他们认为应该改革苏联式的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把公有制改成社会所有制。南斯拉夫同志还说，马克思只讲社会所有制，没有讲公有制。虽然我们不完全同意他们的主张，但我们应该对他们的探讨持开放态度。”¹¹⁷

与此相对应，代表团向党领导提交的正式报告¹¹⁸也提出了这些论点，并得出结论：“南斯拉夫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从国内实际出发，最终走上了以社会主义自治为中心的、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¹¹⁹

换言之，与中国此前谴责南斯拉夫的做法是试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相反，代表团认为，南斯拉夫模式无疑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变体，植根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解释，尽管存在分歧，但仍然应该得到“尊重”。此外，通过反复引用南斯拉夫夫人捍卫自身模式的论证，也暗示了代表团愿意以南斯拉夫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其模式。主管外交事务的副总理耿飏也表达了这种观点。他在1978年4月公开表示：“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的标准，要求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表现出任何‘修正主义’特征，那么中国将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符合社会主义标准的国家，其他国家都不是。我们能用中国的尺子去衡量所有其他国家吗？我们不能……因此，有些制度不能用我们的标准来评估。”¹²⁰这些肯定的评价当然是出于中国与南斯

¹¹⁴ 吴兴堂，《深情思念忆乔石》，载于《当代世界》2015年第7期。Wu Xingtang, 2015. “Remembering Qiao Shi with Deep Affection”, *Contemporary World*, Issue 7.

¹¹⁵ “干涉”一词，根据其上下文和语气，应该理解为“批评”或“谴责”。

¹¹⁶ Wu, “Remembering Qiao Shi with Deep Affection” .

¹¹⁷ Ibid.

¹¹⁸ 代表团的这份正式报告与上述于光远的个人报告有所不同。

¹¹⁹ Wu Xingtang, “Remembering Qiao Shi with Deep Affection” and “Li Yimang: The Hand behind the ‘Two Transformations’ in the New-Era Foreign Policy” .

¹²⁰ 孔祥琇、赵秀松，《耿飏恢复和重建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纪实》，载于《湘潮》2009年第8期。Kong Xiangxiu and Zhao Xiusong, 2009, “Records of Geng Biao’s Efforts to Restore and Rebuild the Party’s International Liaison Work”, *Xiang Tides* Issue 8.

拉夫交好这一总体外交和地缘政治议程。毕竟，为合理化中南之间建立官方联络处（于1978年6月成立），必然要求承认南斯拉夫共产党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方。但与此同时，这些高层官员的声明既合法化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模式，也激发了知识界对南斯拉夫模式的更密切关注和公众兴趣，促使一个更为友好的政治环境形成，南斯拉夫的理论 and 实践可以被公开报道、讨论和研究。

一场热烈的爱情之火很快就燃起了。1978年夏天，赴南斯拉夫代表团在国务院理论会议上提交了正式报告。据于光远说，报告在会上“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大多数与会者都同意报告的结论¹²¹。1979年1月，党的领导又召开了一次理论工作会议¹²²，会议的讨论认为南斯拉夫脱离苏联式社会主义、探索社会主义自治是“难能可贵”的¹²³。与此同时，介绍南斯拉夫模式各方面的文章和对南斯拉夫材料的翻译在党的喉舌和学术期刊上大量出现。例如，历史学家盖尔·赫沙特（Gail Hershatte）回忆说，1979年她作为交换学者留在天津时，有关南斯拉夫的资料“充斥着报纸”¹²⁴。

许多知识分子圈子对南斯拉夫模式的迷恋迅速增长，其中于光远在其中许多场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78年5月，中国著名的《世界经济》杂志主办了一场关于南斯拉夫经济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党政机关、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多所大学和新闻机构的230多人参加了会议，于光远、陈翰笙、宦祥等著名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出席了会议¹²⁵。几个月后，于光远发起成立了南斯拉夫经济研究所。不到一个月，研究所“应社会迫切要求”编写了一本关于南斯拉夫经济基本情况的小册子，并在随后的几年继续撰写和翻译了一系列有关南斯拉夫经济的手册和指南¹²⁶。这些材料特别受到年轻一代和刚进入大学的学生的欢迎。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的雷颐回忆说：“从我们大学的墙报到年轻人制作的小册子和杂志，到处都是‘南斯拉夫理论’。1978年秋天进入大学后，我和当时在工厂工作的

¹²¹ 于光远，《三中全会和国务院务虚会》，载于《上海综合经济》，1998年第11期。Yu Guangyuan, 1998, “The Third Plenum and the State Council’s Theoretical Conference”, Shanghai Economic Summary, Issue 11. 于在回忆录中还提到，以谷牧副总理为首的西欧五国代表团的报告也“在会议上受到了一些关注”。于的叙述似乎暗示南斯拉夫的报告比西欧报告更受重视，也更受关注。然而，在今天的传统叙事中，谷牧出访西欧通常被描述为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重要事件之一，而出访南斯拉夫的代表团却很少被提及。这种事后看来重要性可能与当时历史参与者自己对这两个代表团重要性的认识不同。

¹²²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于光远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他关于国家消亡的颠覆性论述。

¹²³ Zhang Xianyang, “The Origins of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¹²⁴ 盖尔·赫沙特（Gail Hershatte）对本论文章节先前草稿的评论，于2022年6月在加州大学研究生中国改革开放史研讨会上发表。

¹²⁵ 雷颐，《改革初期的思想历程》，载于《经济观察网》，2012年7月3日。Lei Yi, “The Intellectual Trajectory in the Early Reform Era”, Economic Observer, July 3, 2012.

¹²⁶ 江春泽，《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历程》，载于《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Jiang Chunze, “The Intellectual Trajectory to Explor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Witnessing Significant Reform Decision-Making: Oral Histories of Reform Participants,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8.

同学¹²⁷都渴望获得这些材料，于是便在图书馆里尽情阅读我们能找到的一切。”¹²⁸

与此同时，南斯拉夫成为中国游客最喜爱的旅游目的地之一。1978年和1979年，有30多个中国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其中包括1978年8月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率领的国事访问，陪同人员还包括未来的总理赵紫阳（当时是四川省委书记；下文将详细介绍他）¹²⁹。另一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组成的代表团于同年11月启程前往南斯拉夫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访问¹³⁰。

1980年5月，随着南斯拉夫经济研究所（如前所述，为于光远所创立）翻译出版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的主要思想缔造者之一爱德华·卡德尔（Edvard Kardelj）的论文集《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公有制矛盾》，这股“南斯拉夫热”达到了顶峰。这部奠基性的理论论文集充分阐述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模式背后的思想原理，阐明了传统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中“公有制”的陷阱和危险。该著作发展了一种另类的、明显具有南斯拉夫特色的“社会所有制”概念。这本书的出版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件意义重大的思想事件¹³¹。它的影响深远而广泛。例如，当时还是大学生的雷颐回忆说，这本书出版后，“我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了好几遍，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¹³²他回忆起南斯拉夫的理论和实践如何帮助许多像他一样的年轻知识分子重新思考“公有制”可能和应该意味着什么：

“我当时的同学中，很多都是工厂出身，有不少当过车间主任、厂长、厂党委书记，他们切身感受到了‘国营企业’，或当时更常说的‘全民所有制’的弊端，包括效率低下。但我们更困惑的是，这真的是‘全民所有制’吗？全民所有制到底是什么？除了斯大林模式，还有其他的全民所有制形式吗？当时传入中国的南斯拉夫理论，从1950年代起就对斯大林的‘全民所有制’模式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分析，直接为我们提供了思想资源。”¹³³

雷颐在这里所说的“斯大林模式”是一种传统的公有制模式，它将“全民所有制”等同于“国家所有制”。¹³⁴这一等式确实是前几十年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一个核心特征。在这个中国社会主义诸多方面被重新思考的历史时刻，雷颐和他的同学们正在思考一个问题：企业归全民所有到底意味着什么？反过来，“全民”共同所有到底意味着什么？“全民所有”是否总是必须以事实上的国家所有制来实施，还是可以有其他安排？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和“社会所有制”理论与

¹²⁷ 由于高等教育和入学制度在1966年至1976年间遭到破坏，随后又进行了彻底重组，许多初中或高中毕业生最终花了大量时间在工厂当工人或当农村公社成员。1977年恢复了常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有关文化大革命十年高等教育重组的更多详情，参阅Joel Andreas, *The Rise of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¹²⁸ Lei Yi, "The Intellectual Trajectory in the Early Reform Era".

¹²⁹ 朱良，《铁托与华国锋互访：改革开放初期重要外事活动》，载于《炎黄春秋》，2008年第8期。Zhu Liang, 2008, "The Mutual Visits Between Tito and Hua Guofeng: A Significant Diplomatic Event in the Early Reform Era", *YanhuangChunqiu*, Issue 8.

¹³⁰ Lei Yi, "The Intellectual Trajectory in the Early Reform Era".

¹³¹ 2021年10月14日与于光远的学生兼助手的对话。

¹³² Lei Yi, "The Intellectual Trajectory in the Early Reform Era".

¹³³ Ibid.

¹³⁴ 然而，从分析的角度看，公有制与国家所有制的等同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普遍现象，而不是一种独特的“斯大林主义”现象。我感谢Cihan Tugal帮助我厘清了这一点。

实践成为这些年轻思想家沿着这些思路进行思想探索的重要灵感来源。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对南斯拉夫模式的迷恋是如何在知识界展开的，从受到高层政治家关注的领军人物到仍在上大学的年轻学生，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许多知识界人士。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对南斯拉夫模式的迷恋绝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事情。它已经深入到中国社会的许多基层角落。下一章将详细讨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模式以及它在中国启发的政策试验对中国工人产生了什么影响。现在，我想放大“南斯拉夫灵感”可能影响普通工人的一个渠道：中国的官方工会系统——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后毛泽东时代的初期也与南斯拉夫工会有着密切的交流。

1977年11月南斯拉夫工会代表团访华后，全总又于1978年11月和1979年5月两次派代表团访南，代表团均由全总副主席率领。应全总邀请，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一名理事¹³⁵于1979年10月底和11月初来华访问了两周，就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和工会工作作了专题讲座。在北京共安排了三次讲座，其中两次向中国工会干部介绍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及工会在其中的作用，每次约有800人参加。另一次在中央党校安排的讲座，向中央党校的200名教职工介绍了共产主义联盟在社会主义自治中的作用¹³⁶。

在北京以外，南京、上海和成都也举办了三场讲座，每场讲座都吸引了600到1,500名听众，其中大多数是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¹³⁷。这些讲座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南京，一些听众提出延长讲座时间的请求，许多人要求第二天获得讲座的文字记录和录音，计划在自己的工厂里播放¹³⁸。在上海，听众在讲座后的问答环节提出了近百个问题¹³⁹。六场讲座收到的问题范围很广，既有理论性问题，例如国有制和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的区别、计划和市场在南斯拉夫经济中的作用，也有非常实际的问题，例如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角色，工会在住房分配中的作用以及工会和厂长之间的纠纷如何解决¹⁴⁰。

全总干部普遍对南斯拉夫模式重视工人民主表示热烈赞赏。在南斯拉夫讲师1979年巡回演讲后，全总国际部报告说：“根据目前收集到的初步反馈，听课者对南斯拉夫经验的四个方面最感兴趣，他们认为这些方面值得学习和借鉴。”在这四个主要经验中，第一条是“南斯拉夫工人确实是主人，因为他们掌握着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权。他们的民主协商精神是好的。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是经过群众讨论、自下而上，并有制度制约，防止官僚主义”。¹⁴¹不过，也有一些工会干

¹³⁵ 这个人的名字的中文音译是安蒂-布迪米尔。我没能找到这个名字的英文拼写。

¹³⁶ 上海市档案馆，C1-4-205-16，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接待南斯拉夫工会报告员计划》。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C1-4-205-16, 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the ACFTU, “Plan to Receive the Yugoslavian Union Lecturer” .

¹³⁷ 上海市档案馆，C1-4-205-30，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外事情况简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C1-4-205-30, 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the ACFTU, “Brief on Foreign Affairs” .

¹³⁸ Ibid.

¹³⁹ 上海市档案馆，C1-4-205-25，上海市总工会国际联络部《外事情况简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C1-4-205-25, The International Liaison Department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Brief on Foreign Affairs” .

¹⁴⁰ SMA C1-4-205-25; SMA C1-4-205-30.

¹⁴¹ SMA C1-4-205-30.

部，虽然同意南斯拉夫的经验确实值得钦佩，但是却觉得南斯拉夫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差距太大，这一经验并不适用。对他们来说，工人的自治权和工会的力量在毛泽东时代的几十年里已经被抑制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没有基础来建立充满活力的工作场所民主¹⁴²。

容忍“南斯拉夫热”

1978年，党内高层的“老革命家”尤其是邓小平公开表示容忍甚至鼓励这种对南斯拉夫模式的普遍迷恋。当然，这种公开姿态的部分动机是两国之间正在进行的外交和解。但我认为，这种容忍同样是出于其他原因：为了边缘化以华国锋为首的“凡是主义”派，邓小平试图树立自己作为思想开放、民主精神和寻求改革的领导人形象。1978年9月，邓小平巡视东北，并发表一系列讲话和公开评论，这些讲话和评论为几个月后他最著名的一次讲话铺平了道路。在这次讲话中，他敦促中国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明确阐述了他反对晚期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纲领¹⁴³。9月16日，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期间在长春会见干部时发表了一次尖锐的讲话，其主要内容是无情地攻击“两个凡是”。讲话包括以下段落：

“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哪怕一个小企业，一个生产队，都要民主管理。你看南斯拉夫的企业管理，我们当然不能完全照搬，那里的管理者是工人选举出来的，一年没有好结果，就要换人。我们的生产队为什么不民主管理呢？”

¹⁴⁴

尽管邓小平坚称中国“不能完全模仿”南斯拉夫，但他对南斯拉夫工人自我管理模式——更具体地说，工人选举工厂经理的权力——表示赞赏，因为这种民主的实践被认为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如果管理层一年没有好结果，就要换人”。换句话说，邓小平公开认可了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模式，他将南斯拉夫模式作为否定“两个凡是”严格遵守晚期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有用元素。

同年11月，邓小平接受了美国记者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的采访。诺瓦克特别询问邓小平，中国是否采取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模式，邓小平回答说：

“各国之间有很多差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发展制度，当然我们需要学习他们的经验，但不能机械地吸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决定。最根本的是要承认我们落后了，我们目前的很多做法是错误的，需要改革。我们需要承认这一点，并找到适当的方法。”¹⁴⁵

¹⁴² Ibid.

¹⁴³ Yu Guangyuan, 1978: The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that I Experienced.

¹⁴⁴ 于光远，《我忆邓小平》，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第195页。Yu Guangyuan, *Deng Xiaoping in My Memory*, Zhejiang People's Press, 2018, p.195. 有趣的是，这段提到南斯拉夫的文字在1983年出版的官方《邓小平文选（1975-1982）》中同一篇讲话的版本中消失了。我的判断是，于光远的版本是可信的。我咨询了于光远的一名学生兼助手（2021年10月14日对话），他告诉我，于光远的回忆是基于当时第一手的笔记，而于光远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人。至于为什么这段文字没有出现在官方出版的版本中，我将留给读者去猜测。

¹⁴⁵ 《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Chronology of Deng Xiaoping (1975-1997), p.438, Beijing: Central Literature Press, 2004.

一方面，邓小平认为中国不能“机械地吸收”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模式。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应该研究南斯拉夫的经验，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本质上，邓小平提倡开放思想。对邓小平来说，这种开放思想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中国“落后，我们目前的许多做法是错误的，需要改革”。邓小平似乎并没有热情地接受南斯拉夫模式。但他再次部分地、有条件地认可了人们对南斯拉夫模式的持续迷恋，并将其包装在一个整体论述中，强调需要改革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后期继承下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许多缺陷。

有意思的是，华国锋在 1978 年 8 月访问归来后，明确提出了对南斯拉夫模式的担忧。据陪同华国锋的一名人员说，南斯拉夫模式的几个方面给华国锋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华国锋在与陪同人员交流时首先提到的是：

“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基本制度有好的一面，它发扬了民主，调动了地方和基层工人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各共和国权力过大，分散了联邦中央的权威。当铁托的个人权威还很强的时候，这还不算什么，但如果这个权威被削弱了，就可能出事了。”¹⁴⁶

从某种意义上说，华国锋是有先见之明的：南斯拉夫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民族矛盾在铁托逝世后迅速加剧和爆发，最终导致了巨大的悲剧。然而，对于我们的分析目的而言，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和华国锋对南斯拉夫模式的态度之间的微妙差异是如何受到他们在精英权力斗争中所处地位决定的。尽管邓小平承认南斯拉夫模式不应该直接模仿，但他还是多次以肯定的语气提到南斯拉夫模式，认为这是中国人在“实事求是”时应该学习的东西。相比之下，华国锋特别关注并公开强调的，恰恰是南斯拉夫模式的一个令人不安的方面：过度的权力下放。

总而言之，尽管邓小平没有主动“学习南斯拉夫”，但他公开表示的容忍和部分支持为“学习南斯拉夫热”的兴起创造了政治条件。邓小平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话语表达将学习南斯拉夫的开放态度融入到他整体上强调驳斥“两个凡是”、诊断晚期毛泽东主义的问题和规划改革道路的过程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学习南斯拉夫热”依赖于 1970 年代末中国精英政治中特定的权力斗争格局。

赵紫阳的南斯拉夫式政策实验

1980 年 2 月，赵紫阳在北京首次亮相，开始在中央党政任职，并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赵紫阳从四川省领导职位被提拔上来，彼时被寄望成为中国经济事务的最高监督者¹⁴⁷。这是“老革命家”及其盟友为边缘化华国锋而采取的众多举措之一，华国锋不得不在同年 9 月将总理职位移交给赵紫阳¹⁴⁸。然而，1980 年时赵紫阳自己的权力基础并不稳固。赵紫阳之前没有在中央党政工作的经验，完全是一个“新人”，缺乏建立权威的具体基础。政策问题的最终决策权掌握在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等“老革命家”手中。中央政府中原本应该向赵紫阳汇报工作的重要经济机构特别是计划委员会和财政部却像“独

¹⁴⁶ Zhu Liang, “The Mutual Visits Between Tito and Hua Guofeng: A Significant Diplomatic Event in the Early Reform Era” .

¹⁴⁷ 他在北京的最初职位是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主任。他很快于 1980 年 9 月升任总理。

¹⁴⁸ 华国锋卸任总理时，仍担任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1980 年最后几个月，中共不得不采取更多措施，彻底边缘化华国锋。

立王国”一样，有自己的方式规避赵紫阳的权威。一位对当时经济决策内部运作有第一手了解的知情人告诉我，“赵紫阳任职（在中央政府）的头几年，无法控制这些重要政府机构”，因为这些机构受其他主要官僚的影响，这些官僚早已在这些机构中积累了权力，如副总理余秋里和康世恩¹⁴⁹。此外，其他据称与经济决策关系不大的政治家，如主要负责党的组织工作的胡耀邦，也偶尔会干预¹⁵⁰。

赵紫阳在党中央的权力领域中处于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作为一个局外人，他努力在经济政策制定中建立自己的声音和掌控力。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赵紫阳开始密切关注学术经济学家中新兴的思想潮流。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新的政策理念，以建立自己独特的纲领性声音，并基于经济学知识能力建立自己的权威。据上述消息人士称，“刚开始的时候，赵紫阳并没有太多自己的政策议程”¹⁵¹。相反，他观察并吸收了经济学界的流行趋势。事实上，赵紫阳与各种学术经济学家团体保持密切联系，并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是赵紫阳整个 80 年代任职期间的显著特点，已经被许多研究者所注意到¹⁵²。上述消息人士与我分享了一件生动有趣的轶事：“有一天，赵紫阳递给田纪云¹⁵³一份由经济学博士撰写的博士论文，并请他仔细阅读。然后他对田说：‘毕竟，这是博士写的，你怎么能看懂呢！’”¹⁵⁴显然，赵对自己似乎是唯一一位能够理解经济学博士论文的人感到非常自豪。

由于赵紫阳追随 1980 年北京经济思想界的思想潮流，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许多经济学家热衷于研究南斯拉夫模式的理论和实践。1978 年 9 月，赵紫阳曾陪同华国锋对南斯拉夫进行国事访问（当时赵紫阳还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这一定使赵紫阳更加热衷于研究南斯拉夫模式。南斯拉夫模式对赵紫阳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如何改革中国工业企业方面的影响，在赵紫阳 1980 年 8 月 11 日在沈阳参观一些企业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¹⁵⁵。赵紫阳在那里说：

“扩大企业自主权，必须解决工人主人翁问题。从根本上讲，扩大企业自主权，不应该理解为把管理权下放给厂长，而应该下放给工厂工人。因此，民主管理、工人主人翁问题，都要好好研究。职工代表大会要不要设常务委员会，哪些问题应该由职工代表大会而不是厂长来处理，都要好好研究。目前看来，全民所有制企业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并没有让工人有主人翁的感觉。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人更有主人翁的感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工人更有雇佣劳动者的感觉。这从根本上打击了工人的积极性。扩大企业自主权之后，必须明确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工人作为工厂和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参与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来。分配剩余产品……毛主席关于民主管理的思想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过去工厂的自主权很小，所以这种思想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工人对于工厂

¹⁴⁹ 2021 年 10 月 14 日与于光远的学生兼助手的对话。

¹⁵⁰ 赵紫阳，《改革历程》，新世纪出版社，2009，第三部分第五章。Zhao Ziyang,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Zhao Ziyang*, Simon and Schuster, 2009, Chapter 5 in Part 3.

¹⁵¹ 2021 年 10 月 14 日与于光远的学生兼助手的对话。

¹⁵² See, for example, Julian Girwitz, *Unlikely Partners*; Isabella Weber, *How China Escaped Shock Therapy*.

¹⁵³ 田纪云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也是赵紫阳在经济政策制定领域的最亲密盟友之一。

¹⁵⁴ 2021 年 10 月 14 日与于光远的学生兼助手的对话。

¹⁵⁵ 赵紫阳之所以到访这些企业，是因为这些企业从党和国家手中获得了更大的经营自主权。

的长远建设计划、资金的分配等问题，一直没有权力。这也许是长期以来压制工人积极性、影响工人真正关心工厂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必须看到，扩大企业自主权，从根本上讲，是扩大工人的主人翁意识，使工人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使他们有权利参与分配剩余产品，包括对干部的监督。**在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地位问题上，南斯拉夫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当然，我们不一定非要采用他们所采取的具体形式。”¹⁵⁶

这段长引文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赵紫阳在此阐述的关于如何改革中国公有企业的愿景是，既要让企业从党和国家手中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又要赋予工人参与企业内部决策的权力。赵紫阳认为，过去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管理过于“高度集中”，企业“几乎没有自主权”，必须按照党和国家机构的具体指示去做事。赵紫阳认为，这限制了车间民主，使工人感到“像受雇的雇佣劳动者”。因此，赵紫阳主张在企业内部赋予工人权力，包括“长期建设计划和资金分配”等重大问题。只有将企业的管理自主权扩大和赋予工人企业内部决策权结合起来，才能确保“工人与生产资料统一，并有权参与剩余产品的分配”。其次，赵紫阳特别将这种思路与南斯拉夫人的“突破性进步”联系起来，相当直接地承认了他的思想灵感来自何处。

同年9月中旬，赵在省委书记会议上再次发表类似言论。在讲话中，赵再次强调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框架下赋予基层权力，不过措辞更加复杂：

“过去，国营企业实际上是把全民所有制变成了国家所有制。在国有企业中，厂长掌握着全部权力，工人被当作雇佣劳动者对待，对企业的命运、管理和长期发展不感兴趣。这从根本上伤害了工人的积极性。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人是工厂和生产资料的主人。他们不仅有权参与企业的管理，而且有权参与劳动剩余的分配。但目前公有制企业，也就是国有企业，工人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剩余分配等，几乎没有权力，没有体现出主人翁的地位。工人说：我们自己都做不了主，怎么当主人呢？所以，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根本，就是要解决工人在企业内部的地位问题。”¹⁵⁷

在这里，赵紫阳对“国有”和“全民所有”做了一个重要概念区分。在前者中，党国由其任命的厂长所代表，像资本主义雇主一样专制，雇佣劳动关系基本保持原样。在后者中，工人将被赋予相当大的权力，不仅可以管理**生产过程**，还可以管理**剩余的分配**。赵认为，中国过去宣称实行的是后者，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前者。赵在这里暗示，这两种公有制的区别，也是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前者没有废除雇佣劳动，因此与资本主义没有本质区别；后者则忠实地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

¹⁵⁶ 赵紫阳《用改革的思路解决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有关问题》，1980年8月11日，载于《赵紫阳文集（第一卷）》，第61-67页。Zhao Ziyang, “Using the Reform-oriented Approach to Address the Issues Related to Enlarging Enterprise Autonomy”, August 11, 1980, in *Collected Works of Zhao Ziyang (Volume 1)*, pp.61-67. Emphasis added.

¹⁵⁷ 引自：郭峰，《在辽宁省工会优秀积极分子、先进工作者、先进集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摘要）》（1980年11月18日），载于《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有关文件汇编》第68-71页。Quoted from: Guo Feng, “Speech at the Convention to Honor Exemplary Union Activists, Cadres and Collectives of Liaoning Province (summary)”, November 18, 1980, in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pp.68-71.

我们可以对赵紫阳的言论做出两个关键的观察。首先，赵紫阳在这里使用的概念词汇以及论点本身与爱德华·卡德利在前文提到的著作《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公有制矛盾》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本书于 1980 年中期在中国出版，就在赵紫阳发表这次演讲的几个个月前，并在出版后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轰动。在书中，卡德利提出了这样的论点：抨击国有制是一种退化的公有制形式，它保留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提倡“社会所有制”。没有证据表明赵紫阳本人读过卡德利的著作，但其思想影响（可能是通过北京的经济学家圈子）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赵的论点以及它所依据的南斯拉夫理论也存在问题。虽然“国有”不构成真正的“全民所有”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但很难看出仅仅赋予企业工人权力如何能使这些企业真正为“全民所有”。企业工人完全可以拥有“不仅在企业管理方面，而且在剩余劳动分配方面”的重大权力，但“全民所有”应该要求更多。作为集体所有者的“全民”（或称“公众”、“社会”）应该在这里发挥一定作用。“全民”而不仅仅是特定企业内的工人如何才能对所述企业行使某种所有权？赵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这不仅反映了他思想的局限性，也反映了南斯拉夫理论本身的模糊性。

然而，赵紫阳在 1980 年初秋的多次表态显然表明了他对大幅度扩大国营企业工人民主权力的热情。同样明显的是，南斯拉夫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种热情。

赵紫阳的言论影响广泛，多份官方文件和基层官员讲话均引用了这些言论¹⁵⁸。巧合的是，1980 年中国精英政治的格局为赵紫阳将他的热情投入政策制定提供了机会。到 1980 年，邓小平和“老革命家”在边缘化华国锋及其盟友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最终胜利尚未确定，因为华国锋仍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尽管他的实际权力已大大削弱）。为了证明剥夺华国锋的领导职务并彻底废黜“两个凡是”的合理性，邓小平需要提出一整套改革言论，引导中国走出晚期毛泽东思想的阴影（“两个凡是”就是这个阴影的体现）。这一要求导致了邓小平及其同僚在 1980 年中期经常引用的一种论调，将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的弊病归咎于“封建主义”的遗留问题。相应地，这种论调将改革定义为从社会主义中根除“封建主义”。据说，这种根除将给中国带来经济进步和社会主义民主¹⁵⁹。

被邓小平错误地归咎为“封建主义”之一的就是党在各个领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包括对公有企业的管理。从 1950 年代末开始，全民所有制企业大多实

¹⁵⁸ 1) Guo Feng, "Speech at the Convention to Honor Exemplary Union Activists, Cadres and Collectives of Liaoning Province (summary)". 2) 贾庭三,《在北京市民主管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81年6月24日),载于《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有关文件汇编》; Jia Tingsan, "Speech at the Work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Management in Beijing (summary)", June 24, 1981, in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3)《云南重机厂党委报告》,载于《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有关文件汇编》;" Report by the Party Committee of the Yunnan Heavy Machinery Factory", in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¹⁵⁹ 阮铭,《历史转折点的胡耀邦》,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1年,第42-48页。Ruan Ming, Hu Yaobang at the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River Edge, NJ: Global Publishing Co., 1991, pp.42-48.

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¹⁶⁰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党委在企业中拥有最高权力，厂长和管理人员都要服从于党委。这种制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短暂中断，随后于1960年代末在中国的工厂实行军事管制。企业党委的管理权在1970年代初基本恢复。1977年，“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正式恢复。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国营企业也规定设立“职工代表大会”，即由职工选举产生的基层代表机构。但根据官方规定，职工代表大会也受企业党委的领导，这些“民主管理”机构实际掌握的权力非常小。¹⁶¹

在邓小平看来，这种由党来掌控公共事务的管理安排，导致企业经营不善，党的机关负担过重。因此，必须改革这种“封建主义”弊病。然而，管理制度应该改革成什么样子的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邓小平本人更喜欢他所说的“在‘工厂管理委员会’或‘董事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设想的这种制度是把企业内最大的管理权交给一个拥有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委员会。但他也愿意探索其他选择，以符合他著名的“实事求是”口号，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为赵紫阳在赋予工人权力方面的热情提供了机会。

1980年7月，赵紫阳与一些其他经济要员私下拜见邓小平，汇报一系列经济问题。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建议“从现在起，取消党对企业的一元化领导，党委只起辅助作用”。赵同意“‘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不应再坚持”，但理由是在企业管理中“只有改变党委的地位，职代会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对于赵的评论，邓回答说：“我认为我们应该下定决心进行改革。应该有一个**董事会**或**联合委员会**负责制定基本政策原则并进行监督，由经理独立履行职责。”¹⁶²

这段对话值得仔细分析。赵不反对邓小平关于废除企业党委在国营企业管理中的最高权力的呼吁，但两位政治家对应该用什么来取代它有不同的看法。对赵来说，将党委降为辅助角色的目的是让职代会行使更多权力。他在这次谈话中主动提到职代会，这表明，在这个时候，他真正关心的是赋予国营企业工人权力。另一方面，邓小平并没有否定赵的想法，但他确实表达了自己对管理安排的偏好：“董事会”或“联席会议”将成为企业内的最高权力。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呼吁对党和国家机构进行全面政治改革，彻底铲除“封建主义”遗产。许多学者和大众认为，这次讲话是邓小平民主情绪和开放思想的顶峰¹⁶³。这次讲话也标志着几个月的激烈行动的开始，这些行动成功剥夺了华国锋的官方领导头衔和剩余的政治责任。

¹⁶⁰ 这一制度有时被官方称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这有效地进一步制约了厂长相对于企业级党委的管理权力。

¹⁶¹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职工代表大会普遍不复存在。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中国工厂内自发涌现出许多群众组织。工厂随后被指示建立“革命委员会”，自发的工人组织可以获得代表权并参与管理事务。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实施军事管制期间，这些企业级革命委员会的实际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在20世纪70年代初，管理权力开始重新回到重建的企业级党委手中。后毛泽东领导层下令在1977年广泛恢复职工代表大会，回归其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形式。有关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车间权力安排的各种曲折，请参阅Joel Andreas的《Disenfranchised》第5章和第6章。

¹⁶² 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1980卷）》，第104-106页。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0), edited by Fang Weizhong, pp.104-106. Emphasis added.

¹⁶³ See, for example, Julian Girwitz, Never Turn Back, chapter 8; Yang Jisheng, Political Struggle in China's Era of Reform.

这次著名的讲话中有一段关于改革国营企业管理安排的内容。在讲话中，邓小平公开了他一个月前已经向赵紫阳表达过的内容：

“要有准备、有步骤地改革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建立由厂管委员会、董事会或经济联席会议领导和监督的厂长、经理负责制。”¹⁶⁴

四天后，在同一次会议的小组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必须取消，先试一下，但不必慢，这都已经想得很清楚了。”¹⁶⁵邓小平坚决要取消“党管厂”的企业管理模式。但当谈到应该用什么来代替时，尽管邓小平表达了自己的偏好（“厂长负责制，由工厂管理委员会、董事会或联席会议领导”），但他不那么明确的语言和明确支持“试”却巧妙地表明了他对“百花齐放”的开放态度，即可以尝试各种管理安排。

邓小平提出要废除“党负责”模式，并进行试点，不久之后，赵紫阳就抓住了机会。9月中旬，在上述省委书记会议上，他做出了决定性的决定。一方面，正如前面所讨论的，赵紫阳发表了精辟的论述，阐明了“国有”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另一方面，他公开提出“职工代表大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作为企业改革的样板。¹⁶⁶这个相当激进的建议的主旨是将职工代表大会设立为国营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厂长要对其负责。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对这一建议的影响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全总培训工会干部的知识基地——工运学院的一位有影响力的教员事后评论说，这一建议的试点“是中国借鉴南斯拉夫企业自治经验，将职工代表大会提升为企业最高权力机构的结果”¹⁶⁷。

1980年末和1981年初，多位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人员公开提倡“让职代会负责”管理企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他在1980年10月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表了以下言论：

“我这里说的决策权，是国家赋予企业如何使用和分配生产资料的决策权，而不是国家层面的决策权。这个权力，似乎应该由职代会或其常委会来行使。工人要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就应该掌握重大问题的决策权。换言之，职代会不能仅仅被当作‘吸收’工人‘参与’管理的渠道，其权力仅限于日常的协商和监督。

¹⁶⁴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载于《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80-302页。Deng Xiaoping, “Reforming the Leadership System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ugust 18, 1980, in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1975-1982), pp.280-302, emphasis added. Interestingly, the part of the speech where Deng remarked on abolishing “the factory director responsibility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ommittee” was removed when the speech was published in the first edition of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1975-1982). This part was added back in subsequent editions. 邓力群《十二个春秋》；Deng Liqun, Twelve Years

¹⁶⁵ 张占斌《新中国企业领导制度》第162页。Zhang Zhanbin, The System of Enterprise Leadership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162. Emphasis added.

¹⁶⁶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0), pp.133-134. 武汉市档案馆, XX000091-WS02-134-19, 《顾大椿同志在全国财贸工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11月1日；The Municipal Archive of Wuhan (MAW), XX000091-WS02-134-19, “Gu Dachun’s Speech at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Union Work in Financial and Commercial Industries”. November 1, 1980.

¹⁶⁷ 崔义，《企业民主管理通论》，企业管理出版社，1990，第158页。Cui Yi, 1990, A General Theory of Democratic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Enterprise Management Press, p.158.

而应该从工人当家作主的前提出发，让职代会真正发挥权力机关的作用。”¹⁶⁸

在这几个月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¹⁶⁹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政策研究员王梦奎¹⁷⁰也发表了类似言论。¹⁷¹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评论是否是知识分子在前几个月就已提出“职代会领导”的建议，并最终影响了赵紫阳的思想，或者只是在赵紫阳下定决心后才给予智力支持。赵紫阳和这些经济学家之间互相影响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显而易见的是，在1980年的最后几个月，“职工代表大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政策圈和知识圈中势头强劲。

赵紫阳呼吁地方试行“职工代表大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多个机构认为他们必须参与其中。中华全国总工会就是其中之一。其领导干部特别坚持企业级工会分支机构应该在即将掌权的职代会内发挥重要作用¹⁷²。鉴于这一政策建议史无前例，没有一个政策参与者清楚地知道地方实验应该是什么样子。“职工代表大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应该如何设计仍然存在很多模糊之处。因此，不同的机构（与地方政府合作）争先恐后地选择工厂来试验他们自己版本的“职工代表大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并在实地进行了大量即兴创作。因此，1980年末和1981年初发生的是一系列以不同方式展开的工厂级实验。全国共有44家企业被选中进行这些实验¹⁷³。下一节记录了一些实验的进展情况。

职工代表大会负责（或不负责？）

1981年2月，全总派干部到京津五家企业（北京内燃机厂、北京皮革制品厂、北京光学仪器厂、天津第一毛纺厂、天津漆包线厂）调研“职工代表大会领导的厂长负责制”试点情况，并向党内领导层提交了报告¹⁷⁴。报告称，这五家企

¹⁶⁸ 马洪，《关于改革工业企业领导管理制度的探讨——1980年10月23日在北京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研究会举办的报告会上的讲话》，载于《企业领导制度研究》。Ma Hong, “Discussion on Reforming the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 A Speech Given at the Report Conference Hosted by the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n Technolog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Modernization, October 23, 1980,” in *Research on the Enterprise Leadership System*.

¹⁶⁹ 蒋一苇，《论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体制》，载于《红旗》，1980年第21期。Jiang Yiwei, 1980, “On the Leadership System of Socialist Enterprises”, *Red Flag*, Issue 21.

¹⁷⁰ 王梦奎，《企业领导制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载于《经济研究》，1981年第1期。Wang Mengkui, 1981,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Reform of Enterprise Leadership System”, *Economic Research*, Issue 1.

¹⁷¹ 有关这些言论的同期概述，请参阅 Martin Lockett 的 “Enterprise Management: Move towards Democracy?” pp.224-256 in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 Taylor and Francis, 1983.

¹⁷² MAW, XX000091-WS02-134-17。与我预期的相反，仔细研究原始资料后发现，全总在倡导“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方面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直到赵紫阳于1980年9月公开做出政策姿态后，全总才参与讨论这一改革举措。尽管全总确实表示支持这一政策举措，但支持似乎并不特别热情。相反，全总更关心工会在即将实施的“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中的作用。

¹⁷³ Martin Lockett, “Enterprise Management: Move towards Democracy?”

¹⁷⁴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北京、天津五个工厂改革领导制度试点的简况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1981年2月23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81）》第49-55页。“The ACFTU Party Committee’s Report to the Party’s Central Secretariat on the Experiments with Reforming the Leadership System in Five Factories in Beijing and Tianjin”, February 23, 1981.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1)*, pp.49-55.

业在试点的同时，都扩大了企业对上级党政机关的自主权。此外，他们还按照国务院经济委员会制定的蓝图进行改革。蓝图包括以下步骤：1) 向企业干部和工人宣传这项改革的必要性；2) 成立一个工作组，起草企业章程，划定职代会及厂长的权力和职责，并将起草的章程提交工人审议和修改；3) 选举职代会代表，并就职代会讨论的议题征求工人的意见；4) 召开新当选的职代会成立大会，职工代表在大会上制定和批准章程，建立职代会常设机构，评选或选举厂长和其他主要管理人员，审议厂长提出的 1980 年度工作报告和 1981 年生产计划。这些试验的进展并不均衡。北京内燃机厂、北京皮革制品厂和天津漆包线厂早在 1981 年就已召开了新成立的职代会成立大会。而 1981 年 2 月，天津第一毛纺厂仍在进行职工代表选举。

报告称，这些工厂的大多数工人“热情支持”改革。当然，这种说法是可疑的。但报告确实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一些企业的工人参与度很高。北京内燃机厂的职工代表就职代会是否应设立常委会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职工代表中有 9 个部门赞成，8 个部门反对，5 个部门内部出现分歧。在天津漆包线厂，职工代表就同一问题展开了类似的激烈辩论，最终以 42 票对 36 票的微弱优势投票赞成不设立常委会。看来这些工厂的职工代表确实认真对待这项改革，并关心建立一个能取得最佳效果的制度结构。此外，在北京内燃机厂，新职代会成立大会收集了 1081 条工人建议，而上届职代会召开时只有 277 条。这可能表明工人对职代会的兴奋和期望。

另一方面，报道也承认，一些工人对改革表示怀疑或漠不关心。一位工人说：“这些民主改革，假的多，真的少。”¹⁷⁵一些工人尤其是年轻工人表示，只要能拿到工资和更高的奖金，他们就不在乎这项改革。这种怀疑和冷漠表明，这些工人对这项改革在实现车间民主化和具体改善工人物质条件方面缺乏信心。他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全总的报告记录了这些企业中许多领导干部对这项改革的强烈抵制和敌意。一位厂长甚至向上级汇报说：“虽然我们厂名义上是‘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但实际上我们仍然坚持‘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¹⁷⁶

此外，这五家企业正是由企业党委负责指导试点的逐步实施。这似乎颇具讽刺意味，因为试点本来要剥夺这些党委的权力！事实上，在一些企业，这些党委及其领导干部公然干预，以阻止对职代会的赋权。例如，北京皮革制品厂最初计划由职工代表选举厂长。但企业领导在听到一些工人对现任厂长的抱怨后，担心选举会引起混乱，于是取消了选举¹⁷⁷。在内燃机厂，规定了职代会常委不由全体职代会委员选举，厂长选举只有一个候选人，副厂长不是投票选举，而是鼓掌选

¹⁷⁵ Ibid, p.50.

¹⁷⁶ Ibid, p.54.

¹⁷⁷ 马丁·洛克特 (Martin Lockett) 于 1981 年 9 月访问了这家工厂，他报告说，当时确实已经选举了厂长。他还报告说，那里的职代会成功推翻了厂长关于 1980 年留存利润分配的提议（该提议此前已得到企业级党委的批准），并要求更加重视工人的住房。经过几个月的审议，留存利润中用于福利的比例从 30% 增加到 44%，而用于生产的比例从 40% 减少到 30%。总之，他观察到“党委似乎仍然在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职工代表大会具有重大影响”（第 247 页）。Martin Lockett and Craig Littler, “Trends in Chinese Enterprise Management, 1978-1982”, p.72, in *China's Changed Road to Development*, edited by Neville Maxwell and Bruce McFarlane, Pergamon Press, 1984.

举。一些工人说，看到职代会会议的进展后，他们“心都凉了”¹⁷⁸。

1981年4月，全总领导向党的领导汇报了福建省厦门橡胶厂的最新情况。该厂也是全国44家被选定试行“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企业之一。根据全总的报告，

“去年12月¹⁷⁹，该厂在第三届职代会会议上民主选举了厂长、副厂长和工会支部主、副主席。厦门市委书记李振京亲临视察，确认选举结果，并表示将尊重工人的民主权利。”厦门日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此事，但福建省总工会近日通知我们，厦门市领导班子已于近日撤销选举结果，恢复所有干部原职，工会主席、副主席不服，准备集体辞职。（此事尚在核实中。）”¹⁸⁰

如果这一说法属实，那么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1980年12月，职工代表选举工厂领导，这次选举可能是真正的民主选举，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安排。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厦门市领导突然对选举结果感到不满并试图取消选举结果。其次，1980年12月的选举，以及总体的民主化改革，在厦门市得到了广泛宣传，并登上了市委机关报《厦门日报》的头版。第三，市委领导对工人民主的侵犯可能在工厂工人中引起了强烈反对。工会主席和副主席计划辞职，以及此事引起全国总工会领导层注意，后者又认为值得向党领导层报告，都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上海的试验，还有更详细的资料。邓小平8月18日的讲话在全国范围内宣布废除“党委负责”后，上海市经济委员会立即采取行动。它选择了拥有1200多名工人的中国最大的制笔厂之一英雄钢笔厂，进行“工厂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试验，这是邓小平讲话中提到的可能安排之一。然而，赵紫阳在9月发出由职代会负责的号召后，英雄钢笔厂试验的管理安排被改为“职代会领导的厂长负责制”。这一突然的转变让厂里的一些人感到困惑¹⁸¹。同时，上海市总工会也建议选择几家工厂进行“职代会领导的厂长负责制”的试验。它最初选择了两个工厂：拥有6720名工人的大型工厂——上海第十二棉纺厂，和上海柴油机厂。但后者很快就被上海市领导否决了，原因是“派系主义”问题尚未解决，“派系主义”是一个代名词，指的是残存的造反活动（柴油机厂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最激进、最持久、最难以控制的造反工人运动之一）。¹⁸²因此，1980年秋，

¹⁷⁸ “The ACFTU Party Committee’ s Report to the Party’ s Central Secretariat on the Experiments with Reforming the Leadership System in Five Factories in Beijing and Tianjin,” p.52.

¹⁷⁹ “去年12月”是指1980年12月。

¹⁸⁰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各地工会反映的一些问题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1981年4月29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81）》第81-86页。“The ACFTU Party Committee’ Report to the Party’ s Central Secretariat on Some Problems Communicated by Local Unions”，April 29, 1981,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1), pp.81-86.

¹⁸¹ 上海市档案馆，B246-5-204-33，《情况简报（二）》，1980年11月30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B246-5-204-33, “Brief on Situations (Issue 2)”, November 30, 1980.

¹⁸² 上海市档案馆，C1-4-223-45，《拟进行职代会制度试点的报告》，1980年11月4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C1-4-223-45, “Report on the Proposed Experiments with the SWC System”, November 4, 1980. 上海市档案馆，C1-4-223-44，《钟民、韩哲一批示》，1980年11月7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C1-4-223-44, “Instructions Given by Zhong Min and Han Zheyi”, November 7, 1980. 上海市档案馆，C1-4-223-47，《李家齐、周璧意见》，1980年11月13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C1-4-223-47, “Li Jiaqi’ s and Zhou Bi’ s Opinions”,

上海开始进行两项试验：英雄钢笔厂的试验由市经济委员会监督，而第十二棉纺厂的试验主要由上海市总工会监督。

在这两家企业中，试点的具体实施都是由企业党委主导的，这与我们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北京和天津试点的报告中看到的情况类似。在英雄钢笔厂，党委在市经济委员会的监督下，10月开始至11月初完成起草了新的企业章程来指导这项试验（这些章程后来于1980年12月7日正式获得职代会批准）¹⁸³。随后，企业在11月下旬举行了即将获得权力的职代会代表的车间选举，新当选的职代会成立大会于12月初举行。企业党委报告说，试验开始时，一些干部不情愿，一些工人持怀疑和冷漠态度，这当然并不奇怪。一位工人说：“从这个制度到那个制度，所有这些变化都没有给工人带来好处。”¹⁸⁴

11月22日，英雄钢笔厂举行了职代会代表选举。根据党委的报告，有87%的合格工人参加了投票¹⁸⁵。候选人由其工作队提名或通过匿名预选产生。过去，中层管理干部默认成为职代会代表，而这次每一位代表都必须通过秘密投票选举产生（尽管参加这次选举的所有主要管理干部最终都当选）。在184名最终候选人中，有140人当选：其中86人为一线工人，10人为管理人员，17人为工程技术人员，27人为企业领导和干部。当选代表中有27.5%是年轻工人或妇女。在全厂68个工作队中，只有4个工作队没有成员当选代表。党委特别报告说，有几位“应该当选”的候选人没有当选，这表明该厂未能让所有支持的候选人都当选。它还抱怨说，一些年轻工人对待选举很不重视，从一张有几十个名字的选票中只挑选了一两个他们认识的候选人¹⁸⁶。

在英雄钢笔厂新选出的职代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之前，党委召开了筹备会议，让职代会代表批准了它提出的会议议程。但出乎党委意料的是，职工代表对议程的某些方面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并没有批准。新当选的代表坚持要求，与党委制定的方案相反，工厂明年的年度计划和未来发展蓝图应该由职代会选举的新厂长和副厂长向职代会提出；厂长和“厂管会”（这个新选出的委员会将作为职代会的常设机构）成员的候选人应该从下往上提名；职代会成立大会应该持续更长时间，以便进行更充分的审议。党委最终向职工代表作出了让步，相应地修改了会议议程，并将会议时间从五天增加为九天。¹⁸⁷

1980年12月6日，新一届职代会成立大会召开。与会代表132人，分成11个小组，分别推选厂长候选人。会议已规定，如果各小组提名的候选人比较分散，则终选将有多名候选人，否则，终选将只有一名候选人。结果，在11个小组的

November 13, 1980. For rebel activity in the Diesel Engine Factor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ee 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pp.134-137.

¹⁸³ 上海市档案馆, B246-5-204-11, 《市经委组织处腾企明给王杰的信》, 1980年11月15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B246-5-204-11, "Letter by Teng Qiming from the Organization Office of the Municipal Economic Commission to Wang Jie", November 15, 1980.

¹⁸⁴ SMA, B246-5-204-33.

¹⁸⁵ 上海市档案馆, B246-5-204-31, 《情况简报(一)》, 1980年11月23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B246-5-204-31, "Brief on Situations (Issue 1)", November 23, 1980.

¹⁸⁶ Ibid.

¹⁸⁷ 上海市档案馆, B246-5-204-35, 《情况简报(三)》, 1980年12月6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B246-5-204-35, "Brief on Situations (Issue 3)", December 6, 1980.

97 名提名人中，现任厂长唐海龙获得了 9 个小组的提名。唐海龙以压倒性的优势，在终选时成为唯一候选人。12 月 9 日¹⁸⁸，在出席的 132 名代表中，有 113 人匿名投票支持唐海龙的任命。当选厂长后，唐海龙又提名了 4 名副厂长。职代会代表在对这些候选人进行讨论时（也是分成小组），有一个小组（共 11 个小组）明确反对其中一名候选人。职工代表拒绝了以鼓掌方式选举这四位候选人或一并投票确认的建议，而是要求对每位候选人分别进行确认投票。结果，两位候选人被一致确认为副厂长，一位候选人弃权，而一小部分人不赞成的候选人甚至获得了三张反对票（在 123 名投票者中）¹⁸⁹。根据党委的报告，尽管选举绝不是竞争性的，厂长和副厂长都是以压倒性优势当选的，但这些投票程序对他们产生了象征性的影响，使他们感到对工人更加负责。

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选举了其常设机构“厂管会”。在代表提名的 53 人中，14 人被选为最终候选人，其中 11 人当选为厂管会委员（其中 6 人是普通工人）。由于这个常委会是职代会闭会期间接受企业主要管理人员汇报的机构，所以厂长和副厂长不得进入该委员会¹⁹⁰。在为期 9 天的职代会会议结束后，工人们对新当选的工厂领导层既有怀疑，也有希望。党委的报告援引一名工人的话称：“现在厂长已经当选，我们需要看看他改革后是否会给工人带来好处。”工人们特别好奇，厂长是否能够兑现提高工人收入的承诺，他们认为这个承诺不够具体。英雄钢笔厂党委将此列为需要进一步做“思想工作”的领域。¹⁹¹

1981 年 4 月，英雄钢笔厂领导层发布了另一份报告，记录了进展情况，让我们可以一窥改革后的管理安排是如何运作的。根据报告，“厂管会”每周开会一次。自选举产生后的四个多月里，这个委员会开了十二次会议，听取了厂长介绍 1981 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工作计划。它还跟踪了工厂管理层处理工人提出的建议的情况。报告还提到，厂管会定期与职代会代表保持联系。尽管如此，报告声称职代会或厂管会根本不可能真正对厂长行使“领导”：

“但是，职代会、厂管会对于厂长的领导并没有真正实现。厂长不仅受职代会或厂管会的监督，更多是受党国机关上级的监督，不仅对职代会负责，而且对国家（上级）负责。在具体工作中，职代会、厂管会也不能直接领导厂长：政治上的领导一般由党委行使；职代会也不能发挥政策上的领导作用，因为职代会成员多为一线工人，接触不到党国的政策文件，对具体的经济政策也不熟悉；职代会更不能发挥管理上的领导作用，因为厂长有一整套专业知识（工人接触不到），这些知识由上级机关掌握，为厂长开培训班，指导他们；职代会也不能发挥生产任务上的领导作用，因为工厂的生产质量、品种指标是国家每年、每季度制定的。

¹⁸⁸ 上海市档案馆，B246-5-204-36，《情况简报（四）》，1980 年 12 月 10 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B246-5-204-36, "Brief on Situations (Issue 4)", December 10, 1980.

¹⁸⁹ 上海市档案馆，B246-5-204-37，《情况简报（五）》，1980 年 12 月 13 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B246-5-204-37, "Brief on Situations (Issue 5)", December 13, 1980.

¹⁹⁰ 上海市档案馆，B246-5-204-39，《情况简报（六）》，1980 年 12 月 16 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B246-5-204-39, "Brief on Situations (Issue 6)", December 16, 1980.

¹⁹¹ 上海市档案馆，B246-5-204-25，《揭开了领导体制改革的序幕——前阶段改革工作的情况汇报（初稿）》，1980 年 12 月 23 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B246-5-204-25, "The Outset of the Reform of the Leadership System – Report on the Reform Work over the Previous Phase (First Draft)", December 23, 1980.

因此，在实践中，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已被证明是一句空话。”¹⁹²

这份报告本质上表明，企业所处的整个制度安排网络——例如党国对企业的绝对控制、党国经济政策制定的秘密性（工人无法获得政策文件）、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工人无法获得“管理专长”）——使得职代会几乎不可能真正领导工厂管理。如果中国的经济和工业生活没有更彻底的转变，“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似乎难以维持。可以理解的是，报告并没有呼吁进行这种彻底的转变，而是建议放弃这项试验。此外，在这份报告和一份更早的报告¹⁹³中，英雄钢笔厂的领导层都抱怨说，企业在管理内部事务方面仍然缺乏自主权。这些企业领导人认为，这种自主权的缺乏进一步限制了职代会对工厂管理的领导。

至于上海第十二棉纺厂，1980年11月报纸报道了该厂即将开始“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试点的消息。厂里的干部和工人对此反应平淡¹⁹⁴。企业里的许多党员干部对这项改革反应强烈。有些人甚至认为这项试验等于“踢开党委闹革命”，这个词经常包含贬义，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反对党组织的造反活动。由于这种抵制，企业党委坚持要在新的企业章程中写入一条条款，即党委仍应行使“政治领导”¹⁹⁵。而厂长则担心职代会的领导会妨碍他的工作。他甚至建议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而不要有任何“领导”¹⁹⁶。在工人中，冷漠和怀疑是典型的情绪，类似于我们在英雄钢笔厂中看到的情况。一些人担心，权力突然扩大，职代会该如何应对。其他人则怀疑，鉴于企业的自主权有限，而且其大部分内部事务都必须服从党国监督机构的管理，职代会究竟能有多大的权力¹⁹⁷。一份报告承认，人们对这项改革普遍缺乏热情¹⁹⁸。

尽管如此，在上海市总工会的指导下，企业党委还是继续推进试点。正如我

¹⁹² 上海市档案馆，B246-4-211-4，《关于上报改革工业企业领导制度试点情况》中英雄金笔厂《领导体制改革的情况汇报》，1981年4月。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B246-4-211-4, The Hero Pen Factory "Report on Reforming the Leadership System" in the Municipal Economic Commission of Shanghai, "Reporting on the Experiments with Reforming the Leadership System in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pril 1981.

¹⁹³ 上海市档案馆，B246-5-204-7，《新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贯彻试行的初步打算》。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B246-5-204-7, "Preliminary Plan on Experimentally Implementing the New SWC System".

¹⁹⁴ 上海市档案馆，G28-1-518，《把企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职工代表大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情况汇报》，1980年12月。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G28-1-518, "Report on Changing the Factory Director Responsibility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Enterprise Party Committee into the Factory Director Responsibility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SWC", December 1980.

¹⁹⁵ 上海市档案馆，B246-4-211-4，《关于上报改革工业企业领导制度试点情况》中十二棉党委《改革企业内部的领导体制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B246-4-211-4, The Party Committee of the 12th Cotton Mill "Reforming the Internal Leadership System of the Enterprise and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n the Municipal Economic Commission of Shanghai, "Reporting on the Experiments with Reforming the Leadership System in Industrial Enterprises".

¹⁹⁶ SMA, G28-1-518.

¹⁹⁷ Ibid. 企业党委提交的另一份报告中明确要求赋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以提高工人对职工薪酬改革的关注度。SMA, B246-4-211-4.

¹⁹⁸ SMA, B246-4-211-4.

们通常看到的那样，第一步就是选举即将获得权力的职工代表。党委认为，为了使新职代会能够有效地行使权力，职工代表人数应该更少，而且“质量”更高。而上一届职代会有 667 名代表（在一个拥有 6700 多名工人的工厂里），新一届职代会代表人数减少到 314 人。起初，企业领导层中的一些人反对举行竞争性选举，而赞成继续使用以前的方法（即欢呼选举和自上而下的任命相结合）。但党委报告称，在工人对这些反民主的提议表示“不满”之后，它决定这次举行秘密投票的竞争性选举¹⁹⁹。选举首先由轮班小组根据党委（与群众协商后）预先确定的各种配额提名候选人。随后，企业各级当局对候选人名单进行了多次审查，据说在此过程中还采纳了基层的反馈意见。最终候选人名单比要选举的代表人数多出三分之一。许多工人确实认真对待选举，一些工厂车间的选举颇具争议性，这证明了这一点：在一个车间，获胜的候选人以 93 票对 92²⁰⁰票击败了对手。企业中没有一个领导干部能保证获得一席之地。至少有一名参加竞选的车间党支部书记和两名车间主任落选。总共 314 名当选代表中，60%为生产工人，30%为管理技术人员，10%为领导干部。半数以上为党员²⁰¹。

新一届职代会于 1980 年 12 月下旬在第十二棉纺厂举行成立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职工代表提议对党委起草的新企业章程作十项重大修改。新章程规定，厂长可以“停止”执行他们不同意的职代会决议。关于这一规定，职工代表尖锐地指出，厂长不应单方面中止职代会的决议；厂长应该动议让职代会重新考虑他们不同意的决议，如果分歧仍然存在，则要求党委或党国的监督机构进行干预。这些修改得到了批准²⁰²。职代会会议随后进行了厂长的选举。尽管据称进行了秘密投票选举，但这似乎并不重要，因为选举根本没有竞争性：现任厂长鲁国先在最后的选举中成为唯一候选人，并得到了出席的 297 名职工代表的一致投票²⁰³。职代会似乎在决定副厂长方面行使了更有意义的权力。在提名期间，许多职工代表提名企业工会支部副主席庄新家担任分管民生福利工作的副厂长。企业党委的一份报告坦言，党委以前没有考虑过这个计划，但决定尊重职代会的意愿²⁰⁴。

首次职代会会议除了修改企业章程、选举经营管理干部外，还审议了 1981 年度生产计划，决定了 1981 年度福利改善计划，并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了由 18 人组成的职代会主席团。²⁰⁵职代会主席团负责在职代会闭会期间监督工厂管理层执行职代会决议的情况。企业工会支部负责协调职代会的后勤工作，工会支部主席兼任职代会主席团副主席。职代会首次会议召开后，职代会主席团成员每月

¹⁹⁹ 上海市档案馆, B246-4-211-4, 《关于上报改革工业企业领导制度试点情况》中上棉十二厂《恢复和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让职工群众真正当家作主》, 1981 年 3 月。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B246-4-211-4, The 12th Cotton Mill “Restoring and Perfecting the SWC System, Letting the Staff and Workers Be the True Masters” in the Municipal Economic Commission of Shanghai, “Reporting on the Experiments with Reforming the Leadership System in Industrial Enterprises”, March 1981.

²⁰⁰ SMA, G28-1-518.

²⁰¹ SMA, B246-4-211-4.

²⁰² Ibid.

²⁰³ 上海市档案馆, G28-1-519-2, 《关于我厂职代会选举厂长的结果审批报告》, 1980 年 12 月 27 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G28-1-519-2, “Report on the Result of the SWC Election of the Factory Director in Our Enterprise”, December 27, 1980.

²⁰⁴ SMA, B246-4-211-4.

²⁰⁵ Ibid.

25日都主持召开“听证会”，听取工人的抱怨和要求。此外，新一届职代会还成立了生产技术、管理、工资奖金、民生福利和审议职代会建议等5个工作组，为企业管理层发挥参谋作用²⁰⁶。

1981年初，第十二棉纺厂的职代会应广大职工代表的要求，分别就技术创新、奖金分配、工厂食堂管理等问题，主持了三次“答疑会”，分管领导干部在答疑会上发言，回答职工代表的问题。企业党委报告说，厂里一些领导干部对即将召开的质询会感到焦虑，担心其像文革期间令人恐惧的“批斗会”一样。但据报道，质询会的实际进行既尖锐又文明，党委将此归功于事先成功的“思想工作”。在奖金分配质询会上，应职工代表林德华的要求，副厂长石定祥和财务、工资处处长向职工代表公开了奖金资金来源、奖金支付形式和年终奖金分配等细节。据报道，此举使工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度。在技术创新质询会上，职工代表尖锐批评一些“自主运输线”只是摆设²⁰⁷。

1981年4月，南斯拉夫总工会领导干部代表团来华访问了9天。代表团在上海的3天中，4月16日下午一直待在第十二棉纺厂。据上海市总工会报道：

“南斯拉夫夫人对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和职代会工作非常感兴趣。在参观棉纺十二厂时……他们详细询问了这种厂长受职代会领导的制度是什么，职代会有多少人，权力有多大，企业工会支部如何完成职代会交给的任务，领导干部的民主选举是怎样的，职代会委员会和工会委员会的关系与区别等问题。棉纺十二厂的同志们都作了详细的解答。”²⁰⁸

上海市总工会进一步报道说，南斯拉夫代表团对第十二棉纺厂正在进行的实验感到非常兴奋，并认识到它与南斯拉夫模式之间的联系：

“中国的职代会制度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欧的极大关注。南斯拉夫这次也给予了极大关注，他们认为中国现在的做法是继承了他们过去的做法；当南斯拉夫做这件事时，世界并没有太关注，而中国现在也在做这件事，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也让他们感到自豪。”²⁰⁹

尽管“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试点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南斯拉夫代表团还是兴奋地看到，中国的改革至少似乎正在向南斯拉夫模式靠拢。如果这份报告可信的话，南斯拉夫代表团甚至认为，南斯拉夫模式的国际声望是因为中国学习了它而提高的。至少在短时间内，中国和南斯拉夫似乎成为了同路人和相互支持的人，共同寻求一条既民主又社会主义的政治道路。这种跨国纽带体现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历史以及社会主义跨国历史上一个关键但短暂的时期。

²⁰⁶ Ibid and SMA, G28-1-518.

²⁰⁷ SMA, B246-4-211-4.

²⁰⁸ 上海市档案馆, C1-4-552-42, 《南斯拉夫工联代表团在沪活动简报(草稿)》。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C1-4-552-42, “Brief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Delegation of the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of Yugoslavia in Shanghai (Rough Draft)” .

²⁰⁹ 上海市档案馆, C1-4-552-30, 《上海接待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代表团简况》，1981年4月25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C1-4-552-30, “Brief on How Shanghai Received the Delegation of the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of Yugoslavia” , April 25, 1981.

章节结论

可以公允地说，1980年底和1981年初的“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试验，远远没有达到高层政治和知识分子的宏伟承诺。这些试验通常由企业党委管理，而这些试验本应剥夺这些机构的权力；许多党员和管理干部明确表示反对；厂长和副厂长的真正竞争性选举很少举行；职代会对工厂管理层具体和持续地行使“领导”权力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企业缺乏管理自主权，进一步限制了职代会可能的权力范围。难怪怀疑、冷漠和玩世不恭从一开始就是一些工人的普遍情绪。

与此同时，这些自上而下的努力至少在表面上创造了更多的车间民主，确实得到了许多寻求实现这种民主的工人的认真参与。这些工人积极参与了职工代表的竞选；坚持不懈地争取使职代会的程序和议程更加民主；利用领导干部的选举（往往只是作秀）来表达真正的不满和要求；并创造了新的制度渠道，使工厂管理层至少部分地对职代会负责。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自上而下的“让职代会负责”的试验为许多工人从下而上参与民主活动创造了机会。

如果高层的政治决心更加坚定和持久，可能会有政策努力不断深化这些实验，改革其他制度障碍（毕竟，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建立起来）。但这并没有发生，政策试验最终只是昙花一现（下一章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介绍）。这并不奇怪，因为正如本章所表明的那样，1978-1980年间人们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模式及其所引导的政策议程的迷恋取决于中国精英政治的微妙和不稳定格局。回想起来，也许很难想象这一时刻如何能够持续下去。然而，尽管这一时刻转瞬即逝，其影响却非常真实。尤其是，正如下一章将要展示的那样，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模式激发了一些中国工人要求在自己的工厂中实行更多的车间民主。广为人知的“让职工代表大会掌权”的试验鼓舞了非试点企业工人的斗志。这些影响，加上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振奋人心的消息，在1980年最后几个月和1981年初，引发了中国各地工人抗议的浪潮。这种工人抗议随后引发了党的高层领导的反应，其亦是不断演变且影响深远的。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第二章 1981 年的小型消极革命：应对全国性劳工骚乱浪潮的政策演变

上一章追溯了对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模式的迷恋如何导致了 1980 年具体的政策试验的启动，而本章则更全面地展现了南斯拉夫启发的基层表现。早在 1978 年和 1979 年，一些基层民主活动家和工人就借鉴南斯拉夫模式，表达了对工人阶级更彻底赋权的要求。1980 年秋，这些影响与波兰工人起义的激动人心的消息相结合，在中国工人中营造出一种无处不在的不安和不守规矩的氛围。1980 年最后几个月启动的南斯拉夫式“职代会负责制”的政策试验进一步鼓舞了许多工人。结果，在 1980 年底和 1981 年初，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劳工骚乱浪潮，其中包含的要素足以让党的领导层保持警惕：罢工和其他形式的抗议活动、对独立工会的要求、独立组织的具体事例、以创造性和微妙的方式在车间日常中大胆地表达不满，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积极评价。

在这波劳工抗议浪潮爆发后不久，中国官方工会系统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全国领导层概述了一项平息骚乱和先发制人的独立工会策略。该策略的核心是提高中华全国总工会自身的自治权和代表工人利益的能力，以及加强具体的职场民主机构，如职工代表大会和厂长选举。这一提议最初未能引起党领导层的足够重视，他们当时正忙于通过其他方式平息持续不断的骚乱。但骚乱的持续势头最终迫使党领导层在 1981 年中期倾向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策略。随后采取了一系列复杂的政策行动。一方面，党领导层做出了非凡的努力，强调加强职场民主，特别是建立功能性的职工代表大会，是一项高度优先的政策项目。他们甚至明确批准了厂长选举。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层也明确表示，所有这些都必须在继续维护企业党委最高权威的坚定前提下进行。更具颠覆性的“职代会负责”的倡议本身在鼓舞工人气势和造成所谓的“动乱”方面发挥了作用，但现在这一倡议已于 1981 年中期被悄然抛弃。

这套政策措施是葛兰西消极革命的微妙版本。为了制度化和平息劳资冲突，政府做出了重大但不全面的政策让步，而更具颠覆性的政策选择则被平淡无奇但果断地搁置一旁。本章不仅试图描述这种消极革命反应的组成，也试图挖掘产生这种反应的关键过程和参与者。在此过程中，我特别关注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作用。我认为，要理解它在这个历史时刻的行为，就需要分析它在社会整体权力领域中作为“被支配的支配”（dominated-dominant）行为者的地位——借用布迪厄的分析术语。因此，本章的一个理论贡献是将布迪厄的场域分析工具融入了葛兰西的消极革命研究中。本章的最后几段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

本章包含四个实证部分。第一部分“奠定了基础”，介绍上一章未重点关注的角色：中华全国总工会。它揭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历史经验如何在 1978 年重组后将自己定位为“被支配的支配”角色。接下来的三节以三幕的形式叙述了主要故事情节。在“第一幕”中，我们探讨了 1980 年底和 1981 年初全国范围内的劳工骚乱浪潮的程度、范围、实质和动态。本节特别关注导致骚乱的异见活动，以及南斯拉夫和波兰的影响如何煽风点火。在“第二幕”中，我们看到党的领导层对劳工骚乱的反应是如何演变的。尽管全总领导早在 1980 年 10 月就提出了消极革命战略，但党的领导层直到 1981 年中期，在劳工骚乱半年多未能平息之后，才果断地接受了这一战略。最后，在“第三幕”中，我们关注的是 1981 年

中期及之后出现的一系列政策行动。这一消极革命方案包括做出制度让步、强化底线、维持现状并悄悄地将被认为过于颠覆性的政策搁置一边。

重要角色介绍：中华全国总工会

1978年10月11日，全总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为期11天的会议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两千名代表参加，庆祝全总的全国性机构在文革十年后正式重建。这次会议的象征意义在于，党的全体高层领导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²¹⁰都出席了开幕式。作为党的领导，邓小平发表了主旨讲话。他的讲话稿是在他的指示下由他的一些最亲密的战友撰写的²¹¹。邓小平在讲话中赞扬全总及其各级地方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为全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展望未来，邓小平要求工会系统“教育全体会员拥护企业的高度集中的行政领导，拥护生产指挥体制的巨大权威”，同时“教育全体会员积极参与企业的管理”。他还呼吁工会系统“努力维护职工的福利”，“做民主的模范”。这篇讲话进一步明确指出，一些车间民主的制度机制应广泛恢复到文革前的形式。这些机制包括工人选举车间主任、工段长和班组长，以及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邓小平规定，企业级工会支部应成为职代会的“工作机构”。邓小平认为，由于这一新地位的确立，“工会将不再是有些人过去认为的那样是可有可无的组织。”²¹²

此次盛大的庆典宣告了全总十多年来模糊的政治地位的结束。1966年下半年，中国各大城市工人造反运动蓬勃发展，许多地方和企业的官方工会分支机构陷入瘫痪。1967年1月，全总总部共同签署了一份声明，支持一个由临时工和合同工组成的全国性造反组织提出的要求。不久之后，党的领导下令撤销该声明，冻结全总资金，并暂停全总党委签署和发布官方文件的权力²¹³。全总从此进入了瘫痪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毛泽东和党的领导层努力对付不守规矩的造反工人，建立了一套新的代表结构，但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些结构也基本失效了。1973年，官方工会系统开始在地方和企业层面重建。市级、地方和企业级工会分支机构的工作人员往往是1966年以前的老工会干部和1966-1968年参加叛乱的工人的组合²¹⁴。1975年，重建全国总工会总部的筹备工作开始了，但这项工作落到了激进的毛派手中。1976年后，后毛泽东领导层接管了这项工作，最终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重建了全总。倪志福被任命为全总主席，他是一位模范工人，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晋升为政治领袖，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没有工会经验。

²¹⁰ 这五位政治人物当时组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上一章的分类法中，华、汪属于“凡是派”，邓、叶、李属于“老革命派”。

²¹¹ Chronology of Deng Xiaoping (1975-1997), p.394; Deng Liqun, Twelve Years

²¹² 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辞》，1978年10月11日，载于工人出版社编《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文件》。Deng Xiaoping, “Speech at the ACFTU’ s Ninth National Delegate Convention”, October 11, 1978, in Major Documents from the ACFTU’ s Ninth National Delegate Convention, Workers’ Press.

²¹³ 何布峰，《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总工会停止工作的前前后后》，载于《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文集》，工人出版社，2000年。He Bufeng, “How the ACFTU Went Defunc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ollected Research Paper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Workers’ Press, 2000.

²¹⁴ Joel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p.145.

后毛泽东时代，党的领导层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支持官方工会系统的振兴，其重要动机是他们相信全总能够帮助安抚中国工人。他们认为，一个运转良好的全总就像一道防火墙，可以防止文革初期那种“混乱”的工人造反。李先念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全总重建一年后，李在 1979 年 10 月出席全总执行委员会会议时发表了以下讲话，以表达党领导层的支持：

“我们因为没有工会而受了很大苦！工会十几年没有运转，把舞台让给了那些打着‘造反有理’口号的组织，这让我们六神不安了十多年。所以我们恢复了全总、共青团、妇联。我们党为什么不利用这些组织联系群众呢？”²¹⁵

他在后来的讲话中重申了这种观点。李先念的希望似乎是，通过运用制度手段“联系群众”，全总可以化解和预防可能发展成无序冲突的劳资矛盾。正因为如此，党的领导层愿意让全总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明确给予它政治地位的支持。

在全总重建后相对友好的政治环境下，许多工会干部的优先事项与党的领导有些不一致。对这些工会干部来说，全总的历史麻烦并非始于文化大革命：全总及其各级干部在 20 世纪 50 年代遭受了两次毁灭性的打击。1951 年 12 月，全总事实上的领导人李立三²¹⁶受到党领导层的严厉批评，并被从全总清除出去。他被指控犯有“狭隘经济主义”的严重错误，即过分维护工人自私的物质利益和“工团主义”的严重错误，即无视党的权威，寻求工会的政治独立²¹⁷。党领导层随后任命赖若愚为全总主要领导人。赖若愚最初被视为忠诚派，但在担任全总领导多年后，他逐渐转向强调工会在维护工人利益方面的作用。这再次激怒了党的领导层。1958 年 5 月，赖若愚因癌症去世几天后，党又发起了一场严厉的运动，批评和制裁赖若愚和他的一些下属，罪名包括不服从党对工会的权威、以牺牲党和政府为代价夺取权力、篡改党对劳工运动的路线、赞赏工人自发斗争²¹⁸。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李立三和赖若愚的谴责运动是在一波又一波以物质需求为主要目标的激进劳工行动之后发生的。全总领导层对劳工行动表示同情，许多基层工会干部在促进这些行动中发挥了作用。²¹⁹1958 年以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很大程度上沦为政治上无足轻重、屈从于其他组织的机构，直至 1966-1967 年解体。

对于 1978 年重返工会工作的许多全总干部来说，1951 年和 1958 年的事件

²¹⁵ 《李先念在全总九届二次执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79 年 11 月 4 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78-1979）》第 64-71 页。“Li Xiannian’s Speech at the Second Enlarged Meeting of the Ninth ACFTU Executive Council (Summary)”, November 4, 1979,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78-1979), pp.64-71.

²¹⁶ 李立三当时是全总副主席。但由于主席一职（授予陈云）主要是礼仪性的，因此负责工会事务的是李立三。李立三也是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初共产党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但后来被边缘化（see Elizabeth J. Perry,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²¹⁷ Paul Harper, 1969, “The Party and the Unions in Commun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37: 84-119.

²¹⁸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复查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批示》，1979 年 6 月 18 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78-1979）》第 115-157 页。“The ACFTU Party Committee’s Report on the Re-investigation of the Third Enlarged Meeting of the ACFTU Party Committee, with Responses from the Party Center”, June 18, 1979.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78-1979), pp.115-157.

²¹⁹ Nara Dillion, *Radical Inequalities*.

是他们内心的创伤。一方面，两次批斗运动都是涉及整个工会系统的大规模迫害和清洗，针对那些被指控追随李和赖错误路线的人。另一方面，这些运动不仅仅是列举具体个人的错误行为。它们本质上是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党和工会关系的这一关键问题。工会在多大程度上应该独立于党之外行事？工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支持工人的物质要求，而党在车间和政府中的权威并不同情这些要求？工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支持工人，特别是国营企业工人反对管理层和政府的斗争和罢工行动？1951年和1958年的批斗运动明确指出，对所有这些问题，唯一政治上允许的答案都是“绝对没有”。这些活动进一步明确了党的领导层决心将工会系统缩小为党的一个附属物。因此，许多经历过1951年和1958年运动及其后果的工会干部痛苦地回忆起多年来个人遭受的迫害及政治上的屈辱和窒息感。因此，对于全总，尤其是那些工会干部来说，1970年代末的首要任务是寻求纠正1950年代发生的事情。

1978年，党的领导层还没有准备好“翻案”。邓小平在九大上的上述讲话，试图通过“建国以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我国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中占主导地位”、“第六、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工人运动的路线、方针、任务是正确的”等模糊的评价来掩盖历史争议。²²⁰讲话中没有提到或暗示李立三、赖若愚所犯的错误，也没有提及如何纠正。邓小平的讲话只是假装历史争议从未发生过，而全总主席倪志福在这次大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²²¹，则试图安抚与会的工会干部，声称全总作为一个整体，没有陷入“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的陷阱。但它仍然保留了历史的结论，即李、赖及其集团确实犯过这样的错误：

“我国解放以来，虽然在一段时期内，全总个别领导人犯过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和宣传‘工会消亡’²²²的错误，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是，由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及时发现，以及各级党委、工会组织的迅速反应，这些错误都很快地被纠正了。干部和工人群众抵制了他们。”²²³

在本篇演讲中，这些都被集中到了一起。这种半心半意地安抚工会干部的尝试未能让许多人满意，他们要求更严肃地反思历史“错误”。1979年1月，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三个月后，邓小平的助手、当时负责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的胡耀邦参加了全总干部的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的讲话表明了工会干部的强烈要求：

“工会体制中可能还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很多同志

²²⁰ Deng Xiaoping, “Speech at the ACFTU’s Ninth National Delegate Convention” .

²²¹ 全总干部在起草这份工作报告时几乎没有自主权，而主要必须遵循党领导的指示。有关党领导下达此类指示的情况，请参阅以下文件：《胡耀邦同志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工会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78年8月26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78-1979）》第1-10页。“Hu Yaobang’s Speech at the Nationwide Meeting of Provincial Union Leaders (Summary)”, August 26, 1978,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78-1979), pp.1-10.

²²² “工会消亡”似乎是指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并非源自全总本身，而是源自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一些党内理论家。这种倾向认为，工会应该完全废除，因为党和人民公社已经充分代表了工人。这与被批评为“工团主义”和“经济主义”的立场完全不同。有趣的是，这些性质截然不同的“错误”在这次讲话中被归为一类。

²²³ 倪志福《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78年10月12日，载于《中国工会四十年（1948-1988）资料选编》第917-943页。Ni Zhifu, “Work Report at the Ninth ACFTU National Delegate Convention”, October 12, 1978, in Compilation of Selected Documents over Forty Years of China’s Unions (1948-1988), pp.917-943.

提出要进一步解决一些问题，我不反对，请你们再考虑一下。剩下的一些历史问题，倪志福的报告²²⁴已经提到了，我们认为报告里说的应该足以解决所有问题²²⁵。现在你们中有些人说，有两个束缚的帽子没有摘掉，一个叫‘工团主义’，另一个叫‘福利主义’。²²⁶也许这两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不能对此发表意见，因为我没有做过任何研究。但是如果你坚持要花更多的精力去解决和重新考虑这些问题，我没意见。为什么不呢？我们追求实事求是。”²²⁷

不清楚全总干部在这次座谈会上对胡耀邦说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些工会干部对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工团主义”和“经济主义”问题的方式相当不满。显然，许多与会代表要求重新考虑并更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工会干部的要求表达得如此广泛和强烈，以至于胡耀邦必须作出具体回应。胡耀邦在这些讲话中的语气也表明他有些措手不及。尽管如此，他对“加大力度解决和重新考虑这些问题”的想法还是持接受态度的。

全总继续取得进展。1979年6月，全总领导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对赖若愚²²⁸及其同僚所犯的 error 和罪行进行了详尽的重新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对他们的所有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应该被驳回²²⁹。它不仅纠正了个人的历史记录，而且必然引发对工会政治角色等实质性问题的深刻反思。报告坚持认为赖若愚的观点“大部分正确”，并肯定党和工会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政治区别。报告还指出，国营企业工人的利益和资方的利益可能存在具体的分歧，需要工会代表工人进行干预。例如，报告认为，赖若愚的观点是正确的，当工人与党、政府和企业管理层发生冲突时，工会应该关心工人的痛苦和不满。报告还表示，赖若愚强调工会不能脱离群众，以免工人绕过工会进行抗争，这也是正确的。同样，报告进一步指出，赖若愚批评自上而下的工会工作模式忽视了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也忽视了基层积极分子的主动性，而这实际上符合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教导。²³⁰

全总为平反前任领导人而展开的运动也让许多工会干部了解到全总在这一历史时刻的更广泛政治任务。在这里，回顾一下皮埃尔·布迪厄对知识分子在社会整体权力领域中地位的分析是有益的。根据布迪厄的说法，知识分子作为文化资本的持有者属于社会的主导阶级，但在主导阶级中，他们相对于经济资本的持有者，却往往处于被主导的地位。知识分子在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地位，以及他们被统治的具体经历，有利于他们发展出一种与真正被统治阶级的团结感。用布迪厄的话来说，“被支配者的利益和被支配的支配者的利益”存在一种“对应关

²²⁴ 指前述倪志福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

²²⁵ 胡此言进一步证实，倪志福报告的起草，是受到包括胡本人在内的党内领导班子领导的。

²²⁶ 在党的论述中，“福利主义”一词经常与“经济主义”互换使用。

²²⁷ 《胡耀邦同志在全总干校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1979年1月17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78-1979）》第53-62页。“Hu Yaobang’s Speech at the Symposium with the Students of the ACFTU Cadre School (Summary)”, January 17, 1979.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78-1979), pp.53-62, emphases added.

²²⁸ 优先重新调查赖若愚案是因为李立三案更为复杂，涉及1949年共产党掌权前李立三在党内所卷入的一些争议。

²²⁹ 《全总党委关于全总党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再调查报告及中央批复》

²³⁰ 同上。

系”，尽管这种对应关系并不完美²³¹。对布迪厄来说，这种结构上的对应关系使知识分子倾向于在更广泛的解放项目中充当被统治阶级的倡导者和代言人。就中华全国总工会而言，其全国领导人和地方干部无疑是相应政府层级政治权力圈的一部分。但在这些权力圈内，工会干部受到党国官员的支配。因此，党国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关系与党国同一般工人的关系之间存在着结构上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使许多工会干部将自己视为工人权益的捍卫者²³²。换句话说，寻求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毛泽东时代所受迫害进行补救也导致许多人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如何辜负了工人进行了更广泛的批评，并要求补救。

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对企业提出此类批评的一个例子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委员郭英在1979年7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的一次关于职场民主的大型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论点：

“在一定时期内，工人通过自己的代表，即国家任命的干部，对企业实行‘一元化领导’，同时又自下而上地参与民主管理，监督本单位干部。这种做法在特定历史时期是必要的……但为了防止干部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工人只有监督权而没有**选举和罢免权**是不够的。”²³³

郭英的措辞有些含糊，其实是对毛泽东时代（即“特定历史时期”）职场民主的构想和实践的批判：毛泽东时代的职场民主框架只赋予工人“监督”企业领导人的权力，但没有赋予工人决定谁成为企业领导人的权力，因此无法有效防止领导人滥用权力。郭英认为，以监督为中心的框架过于局限，无法作为后毛泽东时代职场民主的模板。

上海市总工会1980年发表的一本小册子提出另一个相关的批评是，毛泽东的工作场所民主框架如何将民主仅限于监督：

“如果工人只被允许发言、建议和抱怨，而不允许他们实际管理自己的企业，实际上无权决定企业面临的最重要问题，那么如何确保工人作为企业主人翁的地位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这种‘民主管理’往往也被其他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者所接受。”²³⁴

因此，根据这本小册子，以监督为中心的框架与资本主义所能提供的那种工作场所民主并无太大区别。然而，社会主义的真正问题是如何让工人行使决策权。工会主义者在这方面的批评可能也部分地受到了南斯拉夫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那样，全总及其上海工作人员在促进1979年的“南斯拉夫热”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因此，官方工会系统在寻求历史受害者补偿的同时，也努力推进职场民主化，

²³¹ Pierre Bourdieu, *Pascalian Medit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88

²³² 历史学家王政对毛泽东时代中国妇女联合会政治作用的分析表明了一些类似的趋势，尽管她没有采用布迪厄的分析框架。参见王政，《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²³³ 上海市档案馆，C1-3-168，郭英《在全总召开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结束时的发言》，1979年7月31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C1-3-168, Guo Ying “Speech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ACFTU Symposium on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 July 31, 1979, emphasis added.

²³⁴ 上海市档案馆，C1-4-233-1，上海市总工会《关于企业民主管理问题的讲话提纲》。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C1-4-233-1,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Speech Outlines on Issues of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 .

但其行动方式是谨慎且零敲碎打的：它以党领导已经认可的为基础，并努力逐步充实和扩大。

1978年末至1980年中，全总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根据党的领导关于在国营工业企业普遍恢复职工代表大会的号召（企业级工会分支机构应作为职工代表大会的协调机构），全总努力确保建立尽可能多的能实际运作的职工代表大会（官方的政策声明，即使是来自最高领导层的政策声明，也不会自动转化为现实）。例如，1978年11月，北京市总工会起草的一份文件概述了未来几个月的主要工作领域，其中包括“总结和推广如何办好职工代表大会并使其发挥作用的经验”²³⁵。1979年初，全总总部忙于起草并下发关于如何建立或恢复职工代表大会的规定²³⁶。1979年7月关于职场民主的会议上，郭英在会上发表了上述讲话，也是为了大力推动改善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

第二，在党的领导层呼吁恢复车间主任、工段长和班组组长的车间选举中，全总干部看到了推动更激进改革的机会：通过职代会选举厂长。这种做法在毛泽东时代只是偶尔试行过。换句话说，全总试图说服党的领导层同意扩大车间选举，包括选举厂长。全总的理由是，通过职代会选举厂长不仅可以给工人赋权——郭英前述言论暗示了这一点，这些选举还有望让负责协调职代会事务的企业级工会分支机构在国有企业的管理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1979年2月，全总公开表态，提出厂长由工人选举是一系列战略性和逐步明确举措中的第一步。《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建立和完善职代会的意见》草案主张职代会应有权“就厂长和副厂长的任免提出建议”²³⁷。这一措辞虽然谨慎，但仍然表明了选举的可能性。同年10月，全总明确主张选举厂长。在为全总理事会准备的工作报告中，全总表示，虽然选举“下级”企业领导——指车间主任、工段长和班组长，要在两三年内普遍推行，建议各省“挑选一两个企业，试行选举厂长”。²³⁸这份报告随后经党的领导批准，下发给全国各省领导。全总在这几个月的倡导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国务院经济委员会在“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后，

²³⁵ 北京市档案馆，201-3-171-119，北京市总工会《今冬明春工作重点》，1978年11月23日。Beijing Municipal Archive (BMA), 201-3-171-119, The Beijing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Key Areas of Work for This Winter and Next Spring”, November 23, 1978.

²³⁶ 《跟上伟大转变，做好工会工作——全总书记处向九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的汇报提纲》，1979年2月20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78-1979）》第101-107页。“Keeping up with Great Transformations and Doing Good Union Work – Outline of the Report by the ACFTU Secretariat to the Second (Enlarged) Meeting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inth ACFTU Congress”, February 20, 1979,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78-1979), pp.101-107. 《全总关于九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报告》，1979年3月3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78-1979）》第100页。“The ACFTU’s Report on the Second (Enlarged) Meeting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inth ACFTU Congress”, March 3, 1979,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78-1979), p.100.

²³⁷ 上海市档案馆，C1-3-168-43，《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建立和健全职代会制度的意见（征求意见稿）》。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C1-3-168-43, “The ACFTU’s Suggestions on 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SWCs (Draft for Soliciting Opinions)” .

²³⁸ 《全总常委会向九届二次执委扩大会议的工作报告（摘要）》，1979年10月31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78-1979）》第173-182页。“The Work Report Prepared by the ACFTU Standing Committee to the Second Enlarged Meeting of the Ninth ACFTU Executive Council (Summary)”, October 31, 1979,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78-1979), pp.173-182.

于 1979 年 10 月提出了《国营工业企业管理条例》的修改稿，其中有一条规定：“职工代表大会的职责是……在条件成熟时，选举企业的领导干部，经党和国家的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条件不成熟或不宜选举的企业，可以试行每年公开投票核准企业领导干部的做法”²³⁹。

20 世纪 70 年代末，邓小平至少部分接受了让选举在国营企业管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想法。我们在上一章已经看到，当邓小平于 1978 年 9 月公开评论南斯拉夫模式时，他认为车间选举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选举有助于把那些有能力、能够创造良好经济效益的干部推上领导岗位。一年后，在 1979 年 11 月的另一次公开讲话中，邓小平再次评论了车间选举的经济效益：

“我讲一个新的情况，我们推行的车间主任、班组长选举试点，在有些企业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把工人的个人利益和企业效益结合起来，工人选举出来的干部都是他们认为能把企业管理好的人，因为效益好，工人就有奖金，对国家的经济贡献就大。现在只解决了车间主任、班组长选举的问题，以后如何选厂长、经理，值得研究。”²⁴⁰

邓小平的逻辑很清楚：作为一种选拔机制，基层选举选出了更有能力的领导干部，这些领导干部又能带来更好的经济成绩。在这段话的结尾，邓小平特别提到“厂长、经理怎么选，是今后值得研究的”，这意味着选举产生厂长的可能性。

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是：邓小平怎么知道车间主任和班组长的选举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绩”？邓小平的印象很可能是基于全总提交的报告。现有证据表明，1979 年，全总向党的领导层提交了至少两份详细讨论车间选举问题的报告，一份是在 6 月²⁴¹，另一份是在 9 月/10 月²⁴²。我无法查阅这两份报告，但我见过提到这些报告的文件。这些文件明确表明，这两份报告是为了捍卫和促进车间选举而编写和提交的。尽管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本人是否读过这些报告，但这些报告确实得到了当时亲近邓小平的其他党内领导人的评论，如胡耀邦和李先念。因此，有理由推测，邓小平的评估是基于全总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表明车间选举试验如何改善了经济表现。

此外，近一年后，邓小平于 1980 年 8 月 18 日发表了高调讲话，他提出了一项全面的政治改革议程，以根除党国残余的“封建主义”遗产（我们在上一章已

²³⁹ 湖北省档案馆，SZ026-5-49-1，国家经委办公厅《对〈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征求意见》，1979 年 10 月 22 日。Hubei Provincial Archive (HPA), SZ026-5-49-1,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mmission, “Soliciting Opinions on the Regulations on the Management of State-Manag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raft)”, October 22, 1979.

²⁴⁰ 邓小平《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1979 年 11 月 2 日，载于《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 187-202 页。Deng Xiaoping, “Senior Cadres Should Lead the Way in Promoting Our Party’s Good Traditions”, November 2, 1979, in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1975-1982), pp.187-202, emphasis added.

²⁴¹ 武汉市档案馆，XX000091-WS02-122-4，《胡耀邦同志对全国总工会关于〈企业的民主选举搞得怎么样？〉一文的批语》，1979 年 7 月 11 日。Wuhan Municipal Archive (WMA), XX000091-WS02-122-4, “Hu Yaobang’s Comments on the Article Submitted by the ACFTU, ‘How Did Democratic Elections in Enterprises Go?’”, July 11, 1979.

²⁴² “Li Xiannian’s Speech at the Second Enlarged Meeting of the Ninth ACFTU Executive Council (Summary)” .

经讨论过这篇讲话的一部分)，其中包括这样一句话：“赋予职工代表大会权力……逐步实行适当规模和级别的企业领导人员的基层选举”²⁴³。这里的措辞非常模糊（可能是故意的）：比如，谁算作“适当规模和级别的企业领导人员”？一方面，除车间主任、工段长和班组长外，厂长和其他领导人员的基层选举尚未得到党的领导层的明确认可。另一方面，邓小平的模糊表述也可以做包容性的解读：也许他真的指向一条道路，即适合选举的“适当规模和级别的企业领导人”的范围可以逐渐扩大到厂长。总而言之，到1980年8月，全总倡导厂长选举的努力取得了一定但并非完全的成功：党的领导层似乎表现出一些接受态度，但仍然看不到明确的批准。要批准后者，需要比全总的倡导更有力的东西。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这个关键因素。

第一幕：南斯拉夫的启示、波兰团结工会和中国的劳工动乱

当中华全国总工会努力扭转历史判决、推动渐进式改革、实现工厂车间民主化的同时，中国工人心中却开始滋生不安。当然，在20世纪70年代末，不仅仅是工人（再次）变得焦躁不安。1978年，中国几个大城市出现了街头大字报和地下杂志，批判性地审视政治现状，提出民主化要求²⁴⁴。但这些渠道所表达的民主观念却非常多样化，有时甚至令人困惑。这些草根民主讨论最重要的场所之一是北京最繁忙地区之一：西单一个建筑工地附近的一面墙。这面墙变成了张贴大字报的活跃论坛。参与者包括学生、工人、知识分子、艺术家、前造反派、资深政治活动家等。这一系列遍布中国的多样化草根活动被统称为“民主墙运动”，1978年底，邓小平和其他“老革命家”及其年轻同僚首次欢迎这一运动（可能是因为它有助于打击“两个凡是”路线）。然而，1979年初，这些党的领导人似乎认为这场运动走得太远了，例如，直接批评邓小平本人的大字报开始出现。党的领导层很快就转向了镇压手段，掀起了一波逮捕主要活动人士的浪潮，并禁止了许多大字报论坛。与此同时，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地将党的领导置于不可置疑的位置²⁴⁵。然而，1979年的镇压未能扑灭整个运动，一些地下杂志又坚持了几年。

民主墙活动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批评和民主愿景²⁴⁶。他们中的一些人明确地借鉴了南斯拉夫模式，要求实行类似于工人自治的制度。王希哲就是其中之一，他在70年代初中期就因参与异见民主活动而闻名，并在70年代末再次活跃起来²⁴⁷。1979年4月1日，广东省的民主活动家组织了一次有150多人参加的集会。王希哲在会上发表了题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演讲，随后于9月在《人民之声》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王希哲提出了共产党专

²⁴³ Deng Xiaoping, “Reforming the Leadership System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²⁴⁴ Kjeld Erik Brodsgaard, 1981, “The Democracy Movement in China, 1978-1979: Opposition Movements, Wall Poster Campaigns, and Underground Journals,” *Asian Survey* 21(7): 747-774.

²⁴⁵ Zhang Xianyang, “The Origins of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Yang Jisheng, *Political Struggle in China’s Era of Reform*.

²⁴⁶ Lauri Paltmaa, 2007, “The Democracy Wall Movement, Marxist Revisionism, and the Variations on Socialist Democra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6(53): 601-625.

²⁴⁷ 王希哲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批评、这些批评在过去几十年的演变以及他因异见活动而多次被监禁的经历值得进行严肃的传记研究。

政必须转变为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论点。接下来是几个问题：

“但是，从党的专政到组织起来的整个无产阶级专政，这条路是怎样走的呢？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的特点是什么呢？于光远同志讲得很好：‘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也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²⁴⁸

王的文章接下来用了整整一节来论述“南斯拉夫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南斯拉夫人“已经认识到，为了彻底消除党和国家成为社会主人和人民统治者的危险，必须系统地、坚定地遵循马克思和列宁的指导，把工人团体直接与生产资料结合起来”²⁴⁹。该部分以一段带有挑衅意味的话结束：

“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引用一下苏绍智同志访问南斯拉夫后所作的一个报告。他说，他访问南斯拉夫以后，和李一氓同志有同样的感想：‘三十年前，南斯拉夫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争论。但是，单从文字上是很难知道真相的，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实践。我们到南斯拉夫去看看，那里生机勃勃，繁荣昌盛，看来前途是光明的。’因此，在解放思想、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形式和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我们难道不应该向南斯拉夫同志学习吗？”²⁵⁰

换言之，王希哲将南斯拉夫模式视为中国走向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有益指南。这也明确表明，于光远和苏绍智的著作确实进入了基层民主人士的视野，他们都是1978年3月南斯拉夫代表团成员，回国后积极推广南斯拉夫模式(见上一章)。

民主墙运动的一些参与者也与王希哲一样，对南斯拉夫模式表示钦佩。一篇题为《经济管理中的民主与政治中的民主》的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经济管理缺乏民主，政治上也就缺乏民主。所以，如果我们要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就必须坚持经济管理上的人民民主制度。南斯拉夫在试行这种制度方面已经取得了优异的成绩。”²⁵¹

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1979年1月的《北京之春》杂志上，作者韩志雄据说是市第二房屋修缮公司工人。同一期杂志上还有一篇文章，题为《取消基层党组织和厂矿企业的行政领导权》。文章认为：

“南斯拉夫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们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及时地取消了基层党组织的行政和生产领导权，而代之以‘工人委员会’……我们应该从基层厂矿企业做起。取消基层党组织的行政领导权，就是党的萎缩。让工人民主选举的‘工人委员会’，代替基层党组织的行政领导权，就等于党的萎缩。”人在管理和生产中发挥领导作用，优秀的工人和有能力的技术人员可以担任领导职

²⁴⁸ Wang Xizhe, “Strive for the Class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ranslated by Ai Ping and Stanley Rosen, in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 edited by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M.E. Sharpe, 1985.

²⁴⁹ Ibid, emphasis added.

²⁵⁰ Ibid.

²⁵¹ Han Zhixiong, “Democracy in Economic Management” (Document 38), in *The Fifth Modernization: China’s Human Rights Movement 1978-1979*, edited by James D. Seymour, New York: Human Rights Publishing Group, 1980.

务，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²⁵²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说整个民主墙运动都迷恋南斯拉夫模式。正如前面提到的，民主活动家所宣扬的民主愿景非常多样化，有时甚至不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南斯拉夫模式确实对一些运动参与者产生了鼓舞人心的影响，并塑造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民主愿景的表达。

就在民主墙运动在 1970 年代末期蓬勃发展并在政治镇压中勉强生存下来的同时，学生、下乡青年、退伍军人、工人以及过去几十年中被错误起诉的人在中国各地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包括请愿、游行、静坐和其他形式的“动乱”，以表达各种各样的不满。其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之一是 1979 年 1 月，一些人在上海一栋高层建筑的九楼悬挂了一面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罪恶的根源”²⁵³。一些工人参加了这些抗议活动，有时是出于非常具体的物质不满。洛阳轴承厂党委回忆说，1979 年，“工人思想活跃，有些人很困惑。西单民主墙、‘老和尚大字报’（一些工人在大字报上抱怨夫妻不能同居）等活动也传到了我们厂里。”²⁵⁴浙江省航运公司杭州分公司工会也报告说，1979 年初，“少数工人不能正确认识社会形势，张贴大字报、搞联谊活动，对休假、劳动保护、福利等难以解决的问题提出过高要求，散布错误言论，对建国以来航运业的发展大加批判”。²⁵⁵民主墙运动和一些零星的抗议活动发展出了一种互惠关系。一方面，抗议活动中表达的具体不满为民主墙活动者的政治批评提供了素材。另一方面，民主墙运动也为抗议者提供了有益的话语和行动模式。一些民主活动者甚至试图与一些抗议活动联动起来，以引导它们走向更有组织、更有政治意识的方向。²⁵⁶

虽然 1978-1979 年的民主墙运动和零星抗议活动也有工人的参与，但直到 1980 年 8 月以后，中国草根运动的重心才果断地转移到劳工身上。这时，波兰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发生大罢工并迅速发展成为大规模独立工会运动的消息传到了中国。1980 年最后几个月和 1981 年上半年，一股爆炸性的劳工骚乱浪潮席卷了整个中国。波兰团结工会的发展和要求被各种民主墙地下刊物广泛报道，甚至被包括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国官方新闻媒体报道。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几乎立即就鼓舞了中国工人。全总副主席顾大椿在 1980 年 10 月初报告说：“波兰事件爆发后，在工人中引起了反响。一位最近去上海的同志回来后告诉我，一些工人对当地工会干部说：‘你们不要自满，警惕波兰事件！’我们多次听到类

²⁵² Lu Min, “How to Run a Factory” (Document 39), in *The Fifth Modernization: China’s Human Rights Movement 1978- 1979*, edited by James D. Seymour, New York: Human Rights Publishing Group, 1980.

²⁵³ Zhang Xianyang, “The Origins of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

²⁵⁴ 《洛阳轴承厂党委报告》，载于《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有关文件汇编》第 213-223 页。“Report by the Party Committee of the Luoyang Bearing Factory” , in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Relevant to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 pp.213-223.

²⁵⁵ 《中国海员工会浙江省航运公司杭州分公司委员会报告》，载于《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有关文件汇编》第 326-331 页。“Report by the Union Committee of the Hangzhou Branch of the Zhejiang Provincial Shipping Company” , in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Relevant to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 pp.326-331.

²⁵⁶ Jackie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chapter 6.

似的话。一些地方出现少数工人绝食，少数单位工人罢工停工”。²⁵⁷ 劳工骚乱浪潮发展的迹象如此明显，以至于 10 月 27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领导层要求各级工会工作人员“密切关注和正确处理少数工人骚乱。个别地方出现了少数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并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从目前的情况看，这次少数工人骚乱主要是由于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严重”。²⁵⁸

各种形式的劳工抗议活动持续升温，一些工人明确表示以波兰工人为榜样。10 月 30 日，哈尔滨市第二工具厂约 20 名工人向市政府递交了一份关于住房问题的请愿书。当被告知他们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时，工人们的回答是“你知道自从波兰事件以来我们工人在想什么吗？除非你满足我们的要求，否则我们不会回家”²⁵⁹。12 月，据报道，上海的一些年轻工人说：“波兰工人的罢工真是太鼓舞人心了，因为独立工会实际上可以为工人说话，满足他们的需求，并敢于与那些不关心工人苦难的当权者斗争”²⁶⁰。在抗议不受欢迎的工资政策时，上海一家工厂的工人威胁要成立一个独立的工会，有工人说“如果再不满足我们的要求，就要闹波兰事件，我们就要炸锅炉房”。²⁶¹ 1981 年 1 月初，全总主持召开地方工会基层工作会议，会议纪要中再次承认“目前，在少数工人中出现了罢工、请愿等活动”。²⁶² 虽然全总干部和他们制作的文件一再声称只有“少数工人”在搞颠覆活动，但如果全总需要如此严密地监视他们，那么这些工人的数量一定不会很少。

据报道，在 1980 年最后几个月和 1981 年初，罢工、请愿、游行、独立组织甚至绝食等形式的劳工骚乱席卷了中国大部分省份，在上海、武汉、沈阳、鞍山、哈尔滨、北京、成都和太原等主要工业中心尤为明显。与波兰的情况相比（以及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工人造反运动相比），其范围和影响仍然有限。但这一时期的劳工骚乱确实特别令人担忧，因为它形成了类似全国性的浪潮，并且其中对独立工会的要求非常突出。正如政治学家珍妮·威尔逊（Jeanne Wilson）所记录的那样，“国内外地方媒体都报道了武汉和太原等工业城市的劳工骚乱具体案例，工人的不满最终导致要求建立自由工会……据报道，煤矿工人、工具和模具制造

²⁵⁷ MAW, XX000091-WS02-134-17

²⁵⁸ 《深入下去调查研究，切实解决工会工作和职工中存在的问题，密切工会同群众的联系》，1980 年 10 月 27 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80）》第 82-88 页。“Deepening Research, Concretely Address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with Union Work and among Workers, and Solidify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Union and the Masses”, October 27, 1980,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0), pp.82-88, emphasis added.

²⁵⁹ 《内部参考》第 97 期，《波兰事件后在哈尔滨等市出现的一些新动向》，引自蒋华杰，2021，《制度镜像——波兰团结工会事件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奏》，《二十一世纪》第 185 期第 91-110 页。“New Developments in Cities including Harbin since the Polish Incident”, Internal References Issue 97, cited in Jiang Huajie, 2021, “Institutional Mirror: The Reverberation between the Polish Solidarity Incident and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185: 91-110.

²⁶⁰ 《内部参考》第 101 期，《上海一些工厂商店的职工对领导不关心群众疾苦不满爆发罢工事件》，引自蒋华杰《制度镜像》。“Workers in Some Factories and Stores in Shanghai Staged Strikes Due to Leaders’ Inattention to the Masses’ Sufferings”, Internal References Issue 101, cited in Jiang Huajie, “Institutional Mirror” .

²⁶¹ Ibid.

²⁶² 武汉市档案馆, XX000091-WS04-18-2,《全国工会基层工作座谈会纪要》，1981 年 1 月 8 日；The Municipal Archive of Wuhan (MAW), XX000091-WS04-18-2 “Minutes of the ACFTU Symposium on Unions’ Grassroots Work” . January 8, 1981.

业和化学工业工人要求工会独立于国家和党的控制”²⁶³。陈昌江 (Chen-Chang Chiang) 记录了一些上海工人如何要求建立团结工会式的独立工会²⁶⁴。中共中央宣传部在 1980 年 12 月也报告称, “一些工人甚至工会干部公开提议放弃现行工会制度, 转而建立独立工会”²⁶⁵。

此外, 1981 年 4 月, 全总全国领导班子向党领导层提交了一份报告, 详细介绍了工会系统在履行使命时遇到的各种困难。工会领导人在报告中写道: “我们认为, 在全社会和工人队伍中, 特别是在青年工人中, 极少数人确实形成了试图摆脱党的权威、主张独立工会和资产阶级自由化, 值得我们高度警惕”²⁶⁶。全总再次将这种颠覆性倾向归咎于“极少数人”。但这些不安定的工人的数量至少应该足够多, 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此外, 这一证据进一步表明, 正是工人激进主义的明确政治性质, 特别是成立不受党控制的独立工会的要求, 使得劳工骚乱所带来的威胁尤其令人担忧。这种威胁远远超过了以参与者人数衡量的劳工骚乱的实际规模。

根据原始档案材料, 我在此提供几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波劳工骚乱的动力。首先, 上海新丰染纱厂是一家名义上为集体所有制企业²⁶⁷, 其中很大一部分工人是由刚回到城市的下乡青年组成的。1980 年底, 这些新工人对自己的工资等级深感不满, 开始组织自己的代表大会来制定要求和策略。五百多名工人选出了 34 名代表, 作为与企业领导集体谈判的准备步骤。在自发组织的代表大会上, 一些工人宣称“工厂领导就像蜡烛一样; 如果我们不制造麻烦, 他们就不会满足我们的要求”²⁶⁸。在一次代表大会结束后, 工人们变得非常愤怒和不安, 他们拆下了工厂的招牌, 并提议将请愿书一直带到市政府。工人的自发组织努力持续了一个多月仍未被平息²⁶⁹。在这次事件中, 为了解决具体的物质不满, 工人们认识到需要建立某种组织机制, 进行集体审议和制定战略。这种认识导致了建立工人自己的独立实体和选举代表的初步努力。独立自组织的过程进一步巩固了工人的集体决心, 并使他们所倾向的行动方针激进化。这起事件在上海并非个例。上海市总工会 1981 年 2 月的工作报告显示, “最近, 少数集体单位发生罢工和怠工, 主要原因是工人对工资、工作条件和奖金的不满, 并因干部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些问

²⁶³ Jeanne Wilson, 1990, “ ‘The Polish Lesson’ : China and Poland 1980-1990,”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23(3/4): 259-279, p.263.

²⁶⁴ Chen-Chang Chiang, 1990, “The Role of Trade Unions in Mainland China,” *Issues and Studies* 26(2): 94-96.

²⁶⁵ 河北省档案馆, 1057-8-39, 《正确对待少数人闹事的问题》, 1980 年 12 月 5 日, 引自蒋华杰《制度镜像》。Hebei Provincial Archive, 1057-8-39, “Correctly Addressing the Unrest by a Minority of People”, December 5, 1980, cited in Jiang Huajie, “Institutional Mirror” .

²⁶⁶ “The ACFTU Party Committee’ Report to the Party’ s Central Secretariat on Some Problems Communicated by Local Unions” .

²⁶⁷ 有关中国两类公有企业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的简要概述, 请参阅上一章

²⁶⁸ 蜡烛的隐喻似乎是指, 如果不真正吹灭蜡烛, 蜡烛就不会自行熄灭。

²⁶⁹ 上海市档案馆, C1-3-337-56, 《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党委书记王子明发言》, 1981 年 11 月。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C1-3-337-5, “Speech by Wang Ziming, Party Secretary of the Shanghai Bureau of Textile Industry”, November 1981. 上海市档案馆, C1-4-438-5, 《工会简报》第 70 期, 1981 年 8 月 26 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C1-4-438-5, Union Bulletin Issue 70, August 26, 1981.

题、不圆滑和处理不当而加剧”²⁷⁰。

第二，武汉市总工会的一份调查报告详细阐述了1981年6月20日，武汉毛巾厂停工两小时。在那一天之前，武汉市连日酷热，气温一度超过华氏104度。但工厂管理层对车间降温工作重视不够，通风不良，没有安装电风扇，冬天用来保暖的棉窗帘至今未取下，工人的饮用水也供不应求。6月20日，织布车间夜班时，情况愈演愈烈。104名工人上班，却只拿到了50块左右的冰块。工人们才知道，工厂有1700名工人，当天共购买了2000块冰块，足够每人一块，但由于管理不善、分配不当，导致夜班工人拿不到所需。更糟糕的是，负责烧开水的工人也请了病假，管理层没有安排替换人员，导致饮用水全部供应不足。由于当时没有工厂或车间领导值班，夜班工人认为表达不满的唯一方法就是停止工作。生产停工近两小时。企业领导层虽然在事后努力解决工人的不满，但他们也急于找出谁是罢工的主导者并给予处罚。工人们再次感到愤慨，向武汉市委写了一封请愿信，这随后引发了武汉市总工会的调查²⁷¹。

另一篇报道详细描述了1981年8月7日上海第一标准件材料厂发生的停工事件，当时全国性的劳工骚乱浪潮已经逐渐平息。在停工前的几个月里，工厂多次发生工人殴打领导干部的事件：厂党委书记和副书记以及厂长和副厂长都曾被打过。然而，工厂当局却无法惩戒这些违规者。我认为，这些殴打事件表明了工人在车间日常不守规矩的普遍现象。导致这种殴打行为的潜在怨恨是根深蒂固的：工厂工人长期以来一直抱怨极其恶劣的工作条件，他们把这种条件比作囚犯劳工，但工厂领导和上级党政当局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这种条件。可能正是这种普遍的挫败感让工人认为殴打是发泄愤怒的正当方式，并使惩戒变得不可行。8月7日，一工段工人听到传言，他们的超额奖金要被扣，工段领导不敢跟厂领导对峙，于是一工段57名工人罢工。厂领导动员工段领导让工人复工，工段领导说没办法，工人不愿意复工，班组长也不愿意复工，班组长说：“我要是第一个复工，工人会骂死我的。”随后，领导试图在工厂门口阻止工人离开，但被工人们一边高唱“我们工人有力量”一边冲出来压制住了。²⁷²

1980-1981年的劳工骚乱浪潮不仅包括罢工、请愿、游行、殴打、独立组织和绝食等公开的争议性活动。普遍的工人不满情绪使更多工人有足够的勇气以更有创意和更微妙的方式在车间表达不满和要求。武汉市委书记辛甫在1981年9月的湖北省工业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辛甫回忆说，那

²⁷⁰ 上海市档案馆, C1-3-328-1, 《在上总六届六次委员(扩大)会议上的工作报告(讨论稿)》, 1981年2月。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C1-3-328-1, “Work Report at the Sixth (Enlarged) Council Meeting of the Sixth Congress of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Draft for Discussion)”, February 1981.

²⁷¹ 武汉市档案馆, XX000091-WS04-1-5, 武汉市总工会党组《关于武汉毛巾厂织造车间甲班6.20日停工问题的调查报告》, 1981年11月16日; The Municipal Archive of Wuhan (MAW), XX000091-WS04-1-5, The Party Committee of the Wuhan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Investigative Report on the Work Stoppage by the First Team of the Weaving Workshop in the Wuhan Towel Factory on June 20,” November 16, 1981.

²⁷² 上海市档案馆, C1-4-438-144, 《工会简报》第58期, 1981年10月14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C1-4-438-144, “Union Bulletin, Issue 58”, October 14, 1981. “We Workers Have the Power” (zanmen gongren you liliang) is a famous Chinese song celebrating the working class.

年早些时候，

“武汉锅炉厂在讨论职工代表候选人时，有的工人公开宣布要发表‘竞选演讲’，有的工人在选票上写上‘列赫·瓦文萨’，还有的工人主张‘工人自治’，主张以‘厂管会’代替党委。”²⁷³

他接着赞扬市委及时介入，帮助企业党委平息这些不守规矩的声音。这个例子完美地说明了南斯拉夫和波兰的灵感来源如何结合起来，鼓励工人自己的工作场所要求更多的民主。如这些证据表明的，到1981年初，许多基层工人已经相当熟悉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模式的基本轮廓以及波兰的最新发展。这些工人以这些东欧榜样为参考框架，评估他们当前的状况，并据此发展他们自己的工作场所民主愿景。党和国家的官员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威胁行为的政治意义，以至于武汉的一位高层政治领导人在一次省级会议上详细阐述了这一事件。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1980年的最后几个月，赵紫阳的南斯拉夫式政策试验，即“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同样促使工人越来越有信心提出要求并采取行动。尽管当时只有44家企业在进行试验，但其影响却更加普遍。这些试验在大众媒体上广为宣传，受到许多工人的密切关注，被视为未来企业改革的总体方向。它们激励了一些非试验企业的工人为自己要求更多的权力。第一汽车厂是中国最具象征意义和战略意义的旗舰工业工厂之一，它所发生的事情很有启发性。正如工厂党委报告的那样，

“去年（1980年），报纸上报道了一些企业在试行‘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当时，干部和许多工人思想上很焦躁，提出了‘我们厂怎么办？’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在扩大党委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把干部的思想统一到：一方面，我们厂要根据实际，继续维护党委的权威；另一方面，逐步扩大职代会的职权，开辟职工代表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渠道。这样，不但有利于完善现有的体制，而且有利于党委、管理人员和职工代表积累更多的经验，提高适应能力，**为将来实行新的企业管理体制创造条件。**”²⁷⁴

尽管该工厂没有发生罢工、请愿等抗议活动，但工人们在报纸上读到有关南斯拉夫式实验的报道后，也变得“焦躁不安”。他们以如此强烈的方式表达了对工作场所民主的关注，使得党委觉得有必要解决这些问题。与南斯拉夫模式鼓舞武汉锅炉厂工人一样，正在进行的“由职代会负责”的政策试验也激励了第一汽车厂的工人更加坚定和大胆。

这种鼓舞人心的效果，在第一汽车厂所在地吉林省的省委书记王大任的一次讲话中也有所暗示，他说：

²⁷³ 湖北省档案馆，SZ001-8-579-1，辛甫《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职代会作用》（省委工业工作会议发言材料之一），1981年9月3日。Hubei Provincial Archive (HPA), SZ001-8-579-1, Xin Fu,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Making the SWCs Fully Play Their Role” (Speech Material #1 for the Provincial Industrial Work Conference), September 3, 1981.

²⁷⁴ 《一汽党委报告》，载于《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有关文件汇编》第168-180页。“Report by the Party Committee of the First Automobile Factory,” in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Relevant to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 pp.168-180, emphases added

“自去年九月以来的三四个月里（1980年9月²⁷⁵），有一些波折。人们的思想有些动荡，大家意见不一，因为提出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几个‘等待’：党委书记等着被撤职，厂长等着被选举，政治干部等着被调动。”²⁷⁶

三个“等待”指的是对“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普遍理解，尽管这种理解并不完整，也不完全准确：企业党委不再具有任何实质性职能（因此导致党委书记被“撤职”），厂长由职代会选举产生，并对职代会负责。王大任认为，目前正在试行的这项政策“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动荡”。尽管他没有具体指明所谓的“动乱”，很可能是指一汽工厂工人闹事的事件，王的讲话似乎暗示这种动乱在全省范围内蔓延，各级干部难以应对，因此产生了“众说纷纭”。

更让党的领导感到威胁的是，据报道，这波劳工骚乱表达了一些工人对文化大革命某些方面的好评。这些言论显然与党领导层将整个文化大革命描绘成灾难性混乱的持续努力相矛盾²⁷⁷。正如中央书记处负责全总事务的宋任穷在1981年10月所叙述的那样：

“少数年轻人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并非完全错误，只是一次失败的革命。他们承认这是一场革命，失败的革命，因此认为在第一次失败之后，还可能出现第二次、第三次革命。这反映出青年和年轻工人的思想混乱。”²⁷⁸

宋在后来的讲话中还承认，“今年（1981年）上半年，许多地方都发生了骚乱”，²⁷⁹这进一步证明劳工骚乱浪潮在1981年初仍保持了势头。

²⁷⁵ 记得1980年9月，赵紫阳提出了推行“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严肃政策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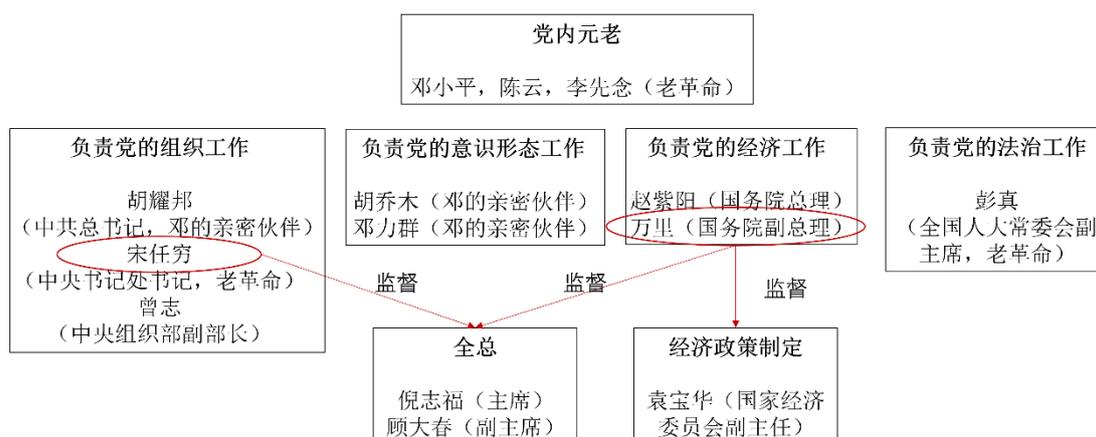
²⁷⁶ 《王大任在吉林省工业系统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81年6月17日，载于《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有关文件汇编》第88-93页。“Wang Daren’s 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on Political and Thought Work of Jilin Province’s Industrial Sector (Summary),” June 17, 1981, in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Relevant to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 pp.88-93.

²⁷⁷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对文化大革命及1949年后其他历史问题的正式结论，于1981年中期获得批准。

²⁷⁸ 《宋任穷在全总九届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1年10月7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81）》第35-40页。“Song Renqiong’s Speech at the Third Enlarged Meeting of the Ninth ACFTU Executive Council”, October 7, 1981,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1)*, pp.35-40.

²⁷⁹ *Ibid.*

图 2：精英政治领域的启发式可视化（1980 年中至 1981 年中）



第二幕：劳工骚乱应对策略的不断演变

由于本节和下一节将追踪中国共产党高层人员之间的许多复杂互动，我首先对 1980 年中期至 1981 年中期期间政治领域中各种行为主体的地位进行了可视化（上图 2）。需要注意两点。首先，此图仅包括将在本章后续章节的叙述中出现的那些行为主体；它并不打算涵盖所有担任相关领导职务的行为主体。其次，此图所示的关系只是简化的近似。在当时中国的精英政治中，官职、个人纠葛和事实上的工作职责以多种微妙的方式相互交叉和复杂化；对这些关系的准确描述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因此，此图应仅被解读为一种启发式工具，旨在帮助读者跟踪他们将在接下来的叙述中遇到的行为主体。

现有证据表明，1980 年 9 月 24 日，一些党的领导人开始认真考虑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是否可能在中国国内引起反响²⁸⁰。当天，党的首席理论家胡乔木给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胡乔木在信中提出了波兰事态发展可能激发中国“少数持不同政见者和一些愤慨的工人和群众”汇聚成“一股巨大力量”的可能性。他建议党和国家准备对那些煽动动乱的团体采取教育和镇压措施。他还建议党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联席会议，专门讨论和准备应对波兰运动在中国的影响²⁸¹。胡耀邦决定通过党中央和国家的内部公报散发这封信。党中央和国家的许多部门在 9 月底和 10 月初开会讨论“波兰问题”。胡耀邦还决定听取胡乔木的建议，于 1980 年 10 月 13 日和 16 日召开两次党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席会议²⁸²。

中华全国总工会在联席会议前夕对现状的评估是什么样的？10 月 10 日，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顾大椿在轻工业工会工作内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这非常具

²⁸⁰ 当然，党的领导人自 8 月以来一直在关注波兰的事态发展。但在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波兰工人起义的地缘政治影响，而不是其对中国社会的潜在影响。参见 Jiang Huajie, “Institutional Mirror” .

²⁸¹ 胡乔木《致胡耀邦》，1980 年 9 月 24 日，载于《胡乔木书信集》第 287-289 页，人民出版社，2002 年。Hu Qiaomu, “To Hu Yaobang”, September 24, 1980, in *Collected Letters by Hu Qiaomu* pp.287-289, Beijing: People’s Press, 2002.

²⁸² Jiang Huajie, “Institutional Mirror” .

有启发性。顾大椿在这次讲话中首次提到了中国工人已经将目光投向波兰并参与到有争议的活动的例子，正如上文所述。他对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可能蔓延到中国的程度给出了明确的评估，既谨慎乐观又发人深省：

“波兰事件爆发后，（我们评估）首先，它可能会在中国产生一些影响，二是这种影响不会像波兰工人那样引起全国性的行动，因为中国工人身上还残留着党的精神；三是我们应该意识到，如果不妥善处理这种情况，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哪怕有一万个工人中有一个想学波兰，搞动乱，也会有问题。中国工人一亿，一万个也不少。再加上一些异见分子的煽动，青年工人、知识分子中也有异见分子。其中不是有西单墙的人吗？”²⁸³

顾评估称，中国不太可能出现全国性组织起来的独立工会运动，但“如果处理不当”，工人中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动乱”和异议活动。

如何才能“妥善”处理当前局势并预防这种“动荡”？顾认为，官方工会体系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代表工人的利益，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加强工人在职代会的民主权力：

“如果工会不能在民主管理中发挥作用，群众就会说工会不能代表工人，就会把工会抛在一边，成立独立工会。这也不是不可能……我们应该、也能够深入群众，成为工人和群众的代表，这样群众就不会把我们抛在一边，成立独立工会。如果工会不代表群众，不发挥作用，如果职工代表大会不真正民主化，就很有可能工人和群众要成立独立工会。独立工会的出现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不愿意看到工人和群众不顾党的权威，成立独立工会。这是全总的立场。”²⁸⁴

据顾大椿介绍，在即将于10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波兰问题”的联席会议上，全总领导将提出一项重要的政策建议：除了正在试点的“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外，在绝大多数非实验性企业中普遍加强职代会的力量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顾认为，全总领导层更关注的正是这种普遍加强，而不是南斯拉夫式的试点。

总而言之，顾大椿认为，如果全总能够充分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给工人带来民生和民主利益，那么中国各地发生独立工会运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如果所有这些工作都认真做好，那么即使有异见者来煽风点火，告诉工人‘波兰工人在制造麻烦，你们为什么不跟着’，工人自己会回应说，‘我们的领导人的作风和习惯已经改变了，尽管我们的不满无法完全解决，但他们正在得到处理。我们应该理解政府的困难。你们为什么在胡闹？我们不会和你们做任何事情。’这种反应是可能的。但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当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来告诉工人‘波兰工人在罢工，我们也去罢工吧’时，也许有些工人会说‘好的，我们会和你们一起去’。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发生。”²⁸⁵

10月13日和16日的联席会议得出结论，波兰工人起义有三个结构性原因：波兰党国屈服于苏联的统治，采用苏联模式的过度集中、高积累经济发展，以及

²⁸³ MAW, XX000091-WS02-134-17.

²⁸⁴ Ibid.

²⁸⁵ Ibid.

官僚腐败。虽然第一个原因在中国没有相似之处，但第二个和第三个原因也指出了困扰中国的类似问题。因此，两次联席会议的与会者一致认为，经济再平衡和根除腐败对于中国避免出现波兰式的劳工起义至关重要²⁸⁶。参加会议的党的领导人确实指示包括全总在内的“群众组织”更好地代表群众的利益，积极帮助解决群众的民生需求。但全总关注的问题——官方工会系统的权力和政治自主权以及深化车间民主的重要性，似乎并没有得到重视，其尚未被党的领导视为高度优先事项。

两次联席会议后，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层继续坚持认为，官方工会制度脱离群众将是导致中国独立工会运动崛起的致命因素。10月27日，全总书记处宣布：

“当前，各级工会组织，特别是工会领导，要有改善工会与群众关系的紧迫感。脱离群众已经成为我们工会组织面临的主要危险，我们要勇于面对这一现实。如果不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一旦出事，我们就会处于不堪一击的境地……工会组织的职责就是坚决捍卫工人的民主权利和物质利益，维护工人的主人翁地位。”²⁸⁷

顾大椿在11月1日同样警告说，“必须承认，由于历史的和主客观的原因，工会脱离群众的倾向还比较严重。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工人会把我们看成黄色工会，会把我们排挤在一边。”他进一步指出，“有些企业党群关系处理不好，如果工会代表群众说话，就会被指责脱离党。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风吹草动，动乱易爆发”²⁸⁸。他还重申了全总要求普遍加强和改善试点企业之外的职代会的权力。全总在1980年10月底和11月初的危言耸听态度无疑是受到当地劳工动乱浪潮的影响。在工会领导人看来，这种动乱表明，必须立即实施变革，使官方工会更有能力站在工人一边，并加强车间民主的制度化渠道。

1980年最后两个月，全总的紧急警告仍未引起党领导层的足够重视，因为他们正忙于以其他方式应对波兰运动及其在中国的反响。一项大规模的经济调整和紧缩计划正在推行。该计划由赵紫阳监督，但由陈云全权负责，陈云是一位“老革命家”，他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力当时是不可逾越的。政治紧缩也在酝酿之中。12月中旬，邓小平在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他的语气与四个月前的讲话截然不同。人们不再觉得即将出台一项全面的政治改革议程²⁸⁹。特别是，他敦促对正在进行的动乱采取严厉立场，将其比作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造反活动。他建议加强党国的镇压机构，制定法律法规，使罢工和抗议更加困难，禁止地下组织和出版物，如果动乱严重，则实施戒严²⁹⁰。邓小平的讲话立即传遍了下级党国机关。这表明，在1980年底，镇压方法主导了党的领导层关于如何应对持续的动乱的思想。在这种更加冷峻的政治环境下，“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前景变得更加暗淡。应该记得，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本身就加剧了许多企

²⁸⁶ Jiang Huajie, “Institutional Mirror” ; MAW, XX000091-WS02-134-19.

²⁸⁷ “Deepening Research, Concretely Address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with Union Work and among Workers, and Solidify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Union and the Masses” .

²⁸⁸ MAW, XX000091-WS02-134-19.

²⁸⁹ 当然，这一大转变也与1980年12月中旬华国锋被废黜有关。

²⁹⁰ 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载于《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13-333页。Deng Xiaoping, “Implementing Readjustment and Ensuring Stability and Solidarity” , December 25, 1980, in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1975-1982), pp. 313-333.

业工人的不满。在 12 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赵紫阳承认，这个南斯拉夫式的改革方案，俗称“三个等待”，动摇了许多干部的思想，使他们灰心丧气²⁹¹。赵紫阳似乎对是否应该继续进行试验失去了信心。1980 年 12 月 29 日，在讨论起草《工厂法》的初步努力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负责立法事务的“老革命家”彭真特别要求，即使是在草案中——其作用仅为促进进一步讨论，也不要提及“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²⁹²。

邓小平在 1980 年 12 月提出的镇压和恐吓策略未能遏制不断升级的劳工骚乱，进入 1981 年，骚乱势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然而，在 1981 年的头几个月里，全总全国领导层不得不面对一个新问题：尽管在 1980 年底，他们曾多次敦促地方工会干部更好地代表工人的利益，为工人发声，但地方工会干部在这方面的行动却招致了地方和企业领导干部和党委的指责，他们指责地方工会效仿波兰团结工会，成为独立工会。在一个未具名的单位，当企业工会支部拒绝党委随意提出的用工会基金支付一些无关费用的请求时，党委指责它“鼓动独立”和“成为波兰工会”。在另一家未具名的企业，党委废除了职代会批准的住房分配指导方针。当企业工会分会主席为职代会的决定辩护时，却遭到了党委的质问：“你们是受波兰独立工会的影响，还是听从工会上级的领导？”四川省的一些工会干部抱怨说：“‘工团主义’的旧帽子还没有完全摘掉，现在又给我们扣上‘独立工会主义’的新帽子。”²⁹³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地方工会干部试图更积极地捍卫和促进工人的利益，以避免独立工会的出现时，他们自己却被指控为独立工会主义者。这种讽刺再次让人想起布迪厄关于被支配者利益与被支配的支配者利益之间的结构对应关系的论点。这些令人沮丧的地方事件导致全总全国领导层于 1981 年 3 月向党领导层请愿，要求开展教育工作，以纠正某些干部的“偏见”。²⁹⁴4 月，全总向宋任穷和其他党内领导人提交了一份措辞更为激烈的报告，详细阐述了上述抱怨²⁹⁵。其中隐含的信息很明确：如果不集中精力推动官方工会系统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和权力来代表和争取工人的利益，基层对独立工会的要求只会进一步增长。

全总与基层工人在社会整体权力场域中的地位结构对应，也意味着劳工抗议浪潮越是难以遏制，党的领导就越有可能开始转变立场。党的领导开始越来越关注全总的提议。换句话说，基层劳工活动的持续发展可以转化为全总政治影响力的增强。由于其他措施未能平息劳工骚乱，党的领导层开始越来越重视全总关于安抚工人的建议。一些党的领导人正在改变他们的想法，这一点在 1981 年 4 月

²⁹¹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0), p.224.

²⁹² 《彭真年谱 (1979-1997)》第 85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 年。Chronology of Peng Zhen (1979-1997), p.85, Beijing: Central Literature Press, 2012. 《袁宝华回忆录》第 393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The Memoir of Yuan Baohua, p.393, Th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18.

²⁹³ “The ACFTU Party Committee’ Report to the Party’ s Central Secretariat on Some Problems Communicated by Local Unions” .

²⁹⁴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学习中央一号、二号文件向中央的报告》，1981 年 3 月 25 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 (1981)》第 70-75 页。“Report by the ACFTU Party Committee to the Party’ s Center on Studying Central Documents No.1 and No.2” , March 25, 1981,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1), pp.70-75.

²⁹⁵ “The ACFTU Party Committee’ Report to the Party’ s Central Secretariat on Some Problems Communicated by Local Unions” .

29 日宋任穷在全总组织的表彰模范工人的仪式上（邓小平也出席了仪式）的讲话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宋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两个具体问题：第一，对于年轻工人的不安分和“无政府主义”——显然是指仍在进行的劳工骚乱，模范工人应该通过为年轻同事树立好榜样和教育他们来帮助缓解这种情况；第二，加强企业的民主管理，特别是通过职代会²⁹⁶。针对第一个问题，宋任穷特别举了一个例子：上海大明羊毛衫厂二百多名工人，在七十多名工人罢工后，有关部门通过有效的“思想工作”，使这些工人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²⁹⁷。

宋的讲话同时讨论了这两个问题，这非常耐人寻味，尤其是考虑到第二个问题，即企业的民主管理，与表彰劳动模范的场合没有明显的关系。宋的讲话同时提到这两个问题，很可能表明，像宋这样的一些党的高层领导终于开始将这两个问题视为相互关联的：加强车间民主制度有助于平息不安的工人，全总领导人至少从1980年10月开始就一直在争论这一点。宋在这次讲话中还宣布，在全总的倡议下，党的组织部和国务院经济委员会共同主办，将于5月底召开一次专门讨论企业民主管理和加强职代会问题的高调会议²⁹⁸。全总早在1980年7月就已提议组织这样的会议，当时还没有1980-1981年的劳工骚乱浪潮爆发²⁹⁹。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全总的请求终于得到了党的领导层的批准，这表明持续的劳工抗议活动产生了强大的压力，最终迫使党的领导层向全总寻求解决方案。这场备受期待的会议反过来又标志着一种消极革命政治策略的形成。

第三幕：小型消极革命的发生

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大会从1981年5月29日开幕，一直持续到6月8日。全总主席倪志福后来评论说，从来没有一个专门讨论职场民主主题的政策活动获得如此政治关注和地位³⁰⁰。宋任穷出席了开幕式，并宣布中共中央书记处“非常支持”召开这次会议³⁰¹。与宋一起分管工会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6月6日的

²⁹⁶ 《宋任穷在首都庆祝五一劳动模范座谈会上的讲话》，1981年4月29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81）》第1-6页。“Song Renqiong’s Speech at the Symposium with Model Workers in Celebration of the May Day in Beijing”，April 29, 1981,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1), pp.1-6.

²⁹⁷ 同上。这个例子给宋任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五个月后他在另一次讲话中又提到了这个例子。《宋任穷在全总九届三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²⁹⁸ “Song Renqiong’s Speech at the Symposium with Model Workers in Celebration of the May Day in Beijing”。

²⁹⁹ 《全总党组关于当前工会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汇报提纲》，1980年7月26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80）》第52-62页。“Outline of the ACFTU Party Committee’s Report on Several Issues in Current Union Work”，July 26, 1980,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0), pp.52-62.

³⁰⁰ 《倪志福在全总九届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上的工作报告》，1981年10月8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81）》第339-360页。“Ni Zhifu’s Work Report at the Third Enlarged Meeting of the Ninth ACFTU Executive Council”，October 8, 1981,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1), pp.339-360.

³⁰¹ 《宋任穷在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上的讲话》，1981年5月29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81）》第12-18页。“Song Renqiong’s Speech at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May 29, 1981,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1), pp.12-18.

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授予企业的权力必须交给工人”³⁰²。万里的讲话呼吁所有官员和干部积极支持职工代表大会。中共中央组织部代表曾志、国务院经委代表袁宝华也分别作了发言（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经委均为本次会议的共同主办方）。在为期 11 天的会议上，来自各省、市工会、党委、经委、国务院直属机构的 120 名代表就如何推进和加强企业职工代表大会³⁰³进行了经验交流。会议最终形成了《国有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规定》，旨在为如何建立和运行职工代表大会³⁰⁴奠定基础。

然而，和中国许多其他官方活动一样，公开的表演很少是真正制定政策方向的场所。整个会议最重要的一幕其实发生在幕后：6 月 4 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并讨论了顾大椿关于会议进展以及推进企业民主管理的几个关键问题的报告。这次会议的讨论非常有启发性。宋任穷不仅建议将推动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列为全总“重点工作”之一，而且毫不含糊地发表了以下评论：“只要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就不会发生波兰那样的事件。不能保证绝对避免所有的动乱和罢工，但会少得多。”万里立即表示赞同，说：“如果这些决定是由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决定的，你们（工人）会抗议谁？”³⁰⁵这些领导人明确表示，加强工作场所民主制度，特别是职代会，可以帮助平息劳工骚乱，这与全总长期以来的主张如出一辙。宋任穷关于职代会如何有助于避免波兰式劳工起义的评论意义重大，省市领导在向同事传达讨论要点时广泛引用了宋的言论³⁰⁶。此外，正是在这次讨论中，车间选举厂长——自 1979 年以来，全总一直在模棱两可中推动——得到了党领导人无可争议的支持。万里表示：“我建议今后选举厂长”，其他与会者没有反对。胡耀邦同意这些选举将“有助于整顿党的行为和作风”，甚至抱怨《暂行条例》草案所附的备忘录对何时允许选举施加了太多限制³⁰⁷。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次会议最终确定的《暂行规定》草案中，党的领导

³⁰² 《万里在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上的讲话》，1981 年 6 月 6 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81）》第 12-18 页。Wan Li' s Speech at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June 6, 1981,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1), pp.7-11.

³⁰³ 新华社《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强调进一步推行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1981 年 6 月 9 日，载于《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有关文件汇编》第 103-105 页。Xinhua News Agency,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 Emphasized Further Advancing and Perfecting the SWC System”，June 9, 1981, in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Relevant to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 pp.103-105.

³⁰⁴ Ibid.

³⁰⁵ 湖北省档案馆，SZ001-8-423-2，《中央书记处听取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领导小组汇报讲话记录（根据记录整理）》，1981 年 6 月 13 日。Hubei Provincial Archive (HPA), SZ001-8-423-2, “Records of the Deliberations by the Party’ s Central Secretariat upon Hearing the Report by the Leadership Group of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 (Compiled Based on Minutes)”，June 13, 1981. 该文件被标记为“机密”，但我毫无困难就从档案库中找到了它。

³⁰⁶ 上海市档案馆，C1-3-337-17，《陆铁夫同志传达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精神的讲话》，1981 年 11 月 6 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C1-3-337-17, “Lu Tiefu’ s Speech Conveying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November 6, 1981. 湖北省档案馆，SZ001-8-577-3，《江长源在省委工业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81 年 9 月 8 日。Hubei Provincial Archive (HPA), SZ001-8-577-3, “Jiang Changyuan’ s Speech at the Provincial Industrial Work Conference”，September 8, 1981.

³⁰⁷ HPA, SZ001-8-423-2.

班子甚至作出了几项修改以进一步扩大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范围：将职工代表大会的性质由“工人参与管理、监督干部的权力机关”改为“工人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干部的权力机关”。³⁰⁸提交的草案规定职工代表大会具有五项职权：1) 审议、批准厂长的工作报告、生产计划、年度预算、技术改造计划和其他重大管理问题；2) 决定劳动保护基金、福利基金、奖励基金的使用和奖惩、住房分配等涉及工人切身利益的问题；3) 审议批准企业改革方案、工资等级调整方案、培训方案和企业规章制度；4) 监督企业领导和干部；5) 在党和国家主管机关的安排下，**在条件成熟的企业，在企业党委的领导下，选举适当级别的工厂管理领导人员**³⁰⁹。在监督权方面，党的领导增加了一句话，允许职代会“对不履行职责的干部，建议党和国家主管机关予以批评、处分或者撤职”。更重要的是，在选举权问题上，他们删除了上面所有斜体的副词短语，并取消了备忘录，这与胡耀邦在6月4日的讨论中抱怨的对何时允许选举施加了太多限制是一致的³¹⁰。

经过这些最后的修改后，《暂行规定》于1981年7月13日由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签署通知正式颁布。令人惊讶的是，《职代会工作暂行规定》的正式颁布早于有关工厂厂长和企业党委工作的类似文件的颁布，后两项文件都要等到1982年。这个奇怪的时间表明，在当时，党的领导层将工作场所民主视为一个紧迫且高度优先的政策问题。Jackie Sheehan³¹¹和Jeanne Wilson³¹²之前的学术研究认为，《暂行条例》实际上是一份保守的文件，赋予职代会的权力有限，沿袭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模式³¹³。这种说法很有道理。最值得注意的是，全国企业管理会议和《暂行条例》都维护了企业级党委对职代会的权力，这意味着职代会不会成为国有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然而，Sheehan和Wilson的观察也忽略了一个更广泛的观点，即这次会议和《暂行规定》都表明了相当多的政策关注和强调。这些政策姿态证明了党的领导层在多大程度上强烈感受到压力，要求他们表现出积极强调和支持推进基层民主。

事实上，1981年7月《暂行规定》颁布后，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协调努力，让地方官员和干部参与建立和加强职工代表大会。7月22日，党的最权威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企业党委要维护工人主人翁地位》的社论，强调了《暂行规定》³¹⁴的重要性。1981年下半年，全总全国领导层连续向党的领导层提交了四次报告，分别于7月3日、7月21日、9月14日和11月26日。这些报告记录了不同地方和行业在执行全国企业民主管理会议确定的政策路

³⁰⁸ HPA, SZ001-8-577-3, emphasis added.

³⁰⁹ Ibid, emphasis added. 所附备忘录对“成熟条件”作出如下定义：a. “派性”已经克服；b. 企业管理完善；c. 企业拥有完善的领导班子。

³¹⁰ Ibid.

³¹¹ Jackie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pp.176-177.

³¹² Jeanne Wilson, “‘The Polish Lesson’”, p.266.

³¹³ For an opposite interpretation, see Martin Lockett, “Enterprise Management: Move towards Democracy?”

³¹⁴ 人民日报《企业党委要支持职工当家作主》，1981年7月22日，载于《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有关文件汇编》第110-112页。People’s Daily, “Enterprise-Level Party Committees Shall Uphold Workers’ Masterly Status”, July 22, 1981, in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Relevant to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 pp.110-112.

线方面取得的进展³¹⁵。9月14日的报告记录了过去三个月中，十九个省、省级直辖市、自治区召开联席工作会议，发布全国两会的主要政策结论。至少有7个省份计划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企业民主管理问题；国务院下属的17个部门已开会讨论或发布正式指示，说明如何在其负责的行业中推进民主管理³¹⁶。

1981年下半年，许多省市党政机关确实表示要重视职代会工作。例如，在上海市，市委于9月19日开会讨论如何开展职代会工作，并于11月6日召开了一次更大规模的会议。³¹⁷在湖北省，省委于9月初召开了一次工业工作会议，省委书记陈丕显出席了会议，以安排推进民主管理和实施《暂行规定》。³¹⁸这种自上而下的关注和重视的迹象给地方官员和企业领导人带来了一些压力，迫使他们真正将更多的权力移交给职代会。这些迹象无疑为要求职代会拥有更多权力的基层工人和工会活动家提供了额外的合法性和言论资源。中华全国总工会11月26日的报告甚至声称，《暂行规定》颁布后，辽宁省最近有1,360家企业（重新）成立了职工代表大会，职工代表大会覆盖率提高了19.3个百分点。报告还称，黑龙江省当时有64%的工业企业（重新）成立了职工代表大会，而6月底这一比例为46%³¹⁹。

推行厂长的现场选举似乎也正在获得动力。全总11月26日的报告还提到，

³¹⁵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精神的初步贯彻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81年7月3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81）》第99-102页。“Report by the ACFTU Party Committee to the Party Center on the Preliminary Progress Made to Carry Out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July 3, 1981,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1), pp.99-102.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精神的初步贯彻情况的通报》，1981年7月21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81）》第290-294页。

“ACFTU’ s Notice on the Preliminary Progress Made to Carry Out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July 21, 1981,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1), pp.290-294.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全国企业民主管理会议的情况向宋任穷同志的报告》，1981年9月14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81）》第129-132页。“Report by the ACFTU Party Committee to Song Renqiong on the Situation Regarding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September 14, 1981,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1), pp.129-132.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贯彻中央、国务院（1981）24号文件和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情况向仲勋同志的报告》，1981年11月26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81）》第154-158页。“Report by the ACFTU Party Committee to Xi Zhongxun on Carrying out the Provisional Regulations and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November 26, 1981,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1), pp.154-158.

³¹⁶ “Report by the ACFTU Party Committee to Song Renqiong on the Situation Regarding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 .

³¹⁷ 上海市档案馆，B134-7-1364-52，《钟民同志在市委召开的贯彻中央二十四号文件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81年11月6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B134-7-1364-52, “Zhong Min’ s Speech at the Cadres’ Conference on Carrying out the Party’ s Central Document No.24, Convened by the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November 6, 1981.

³¹⁸ 湖北省档案馆，SZ001-8-574-1，《陈丕显在省委工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1年9月4日。Hubei Provincial Archive (HPA), SZ001-8-574-1, “Chen Pixian’ s Speech at the Provincial Industrial Work Conference”，September 4, 1981.

³¹⁹ “Report by the ACFTU Party Committee to Xi Zhongxun on Carrying out the Provisional Regulations and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 .

全国企业民主管理会议结束后，北京市委决定 1981 年底前在 100 个企业进行厂长选举，1982 年再选举 200 个企业，占全市工业企业的三分之一。³²⁰1982 年 1 月 2 日，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全面整顿国有工业企业各方面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规定“在落实经济责任制和整顿企业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行厂长的民主选举，除非必须自上而下任命”。³²¹这个规定的措辞几乎给人一种印象，即今后厂长的选举将成为常态，而自上而下的任命将只是例外。1982 年 1 月 2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布了《国营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暂行规定》³²²也使用了几乎相同的措辞。因此，在 1982 年初，扩大厂长现场选举实际上已成为官方政策。马丁·洛克特(Martin Lockett)和克雷格·利特尔(Craig Littler)报告称，截至 1982 年 6 月，全国有 8900 家企业进行了厂长选举，而 1981 年这一数字只有 1000 家（当然，这些选举中有多少真正具有民主内容值得怀疑）³²³。

在这种加强职代会建设、推行厂长现场选举的协同狂热中，引人注目的是，没有提到进一步深化或扩大“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³²⁴的试验。正如我们所见，这些南斯拉夫式的试验在 1980 年末造成了一种普遍的劳工不安气氛，到 1980 年 12 月，一些政客包括赵紫阳本人已经对这些试验的可行性或可取性表示怀疑。尽管在 1980 年最后几个月，全国 44 家企业开展了试验，但 1981 年，这些试验并没有进一步扩大。国务院经济委员会主任、负责企业事务的重要决策者袁宝华甚至在 1981 年 6 月 4 日（在上述中央书记处内部会议上）报告说，仍在进行这些试验的企业数量已从 44 家减少到 30³²⁵ 家。

正是在这次关键的会议上，“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命运悄然注定。袁宝华在会上询问与会的党内领导人，这些试验是否应该继续、如何继续。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人直接回答袁的问题。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在袁之后发言的四位政治家宋任穷、胡耀邦、邓力群和万里都表示支持坚持这种制度。他们在讨论中都承认企业党委领导的基本原则，尽管他们对确切的措辞有一些分歧。万里说得最好：“党的领导不能动摇”³²⁶。尽管没有人明确反对“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但沉默和随后讨论转向强调党的领导，这非常具有说明意义。对于这些党的领导人来说，职代会的权力可以加强，厂长选举可以推行，但所有这些都必须

³²⁰ Ibid.

³²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1982 年 1 月 2 日，载于《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下册）》第 1358-1368 页。“Decision by the Party’s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on Comprehensively Rectifying State-Manag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January 2, 1982, in Selected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about the Workers’ Movement Issued by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Second Volume), pp.1358-1368.

³²² 《国营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暂行条例（已废止）》，1982 年 1 月 2 日，获取网址：fgcx.bjcourt.gov.cn:4601/law?fn=chl520s307.txt，2021 年 3 月 19 日获取。“Provisional Regulations on Factory Directors’ Work in State-Manag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nullified)”, January 2, 1982, accessed at fgcx.bjcourt.gov.cn:4601/law?fn=chl520s307.txt on March 19, 2021.

³²³ Martin Lockett and Craig Littler, “Trends in Chinese Enterprise Management, 1978-1982” .

³²⁴ Martin Lockett 指出，到 1981 年，这些实验已引发重大争议，党内可能也出现了一些强烈的批评。参见 “Enterprise Management: Move towards Democracy?”

³²⁵ HPA, SZ001-8-423-2.

³²⁶ Ibid.

在企业党委无可置疑的最高权威下进行。

换言之，领导人实际上反对继续南斯拉夫式“职代会负责”的试点，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当然，从来没有一项政策声明说应该终止“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试点。相反，颁布《国有工业企业职代会暂行规定》的官方通知以及其他一些政策文件确实承认了这些试点的存在。但真正重要的是，深化和推动这些试点的积极努力已经不复存在，让它们悄然被抛在一边。在1980年最后几个月引起如此多关注和造成“混乱”的这项改革举措，其在新闻中的广泛报道和讨论也消失了。马丁·洛克特(Martin Lockett)和克雷格·利特勒(Craig Littler)于1982年前往中国实地考察企业管理，他们报告说，当年“几乎没有关于”由职代会领导的提议的辩论，而且“现在的总体舆论氛围不利于”他们³²⁷。

因此，可以说，1980-1981年劳工骚乱浪潮之后的这些政策策略构成了“消极革命”的微妙版本。正如葛兰西所言，消极革命是面对基层叛乱动员的“复辟革命时期”，其中自下而上的革命要求“以小剂量、合法、改革的方式得到满足”，这样就有可能保留旧“统治精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尤其是避免人民群众经历一段“进一步激进化”的时期³²⁸。1980-1981年，一股令人震惊的劳工斗争浪潮，受到波兰和南斯拉夫影响的启发，突出表现为对独立劳工组织的要求，使党的领导层面临挑战。统治阶层最终听从了全总的建议，以“小剂量”和“改良主义”的方式满足基层的要求：工业企业的民主管理突然成为一个高度优先的政策问题，现在重点放在加强车间民主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和厂长选举）上。这些政策措施旨在防止工人以更具破坏性和激进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和要求，正如宋任穷在评论中所说的那样：“只要职工代表大会正常运作，这里就不会发生像波兰那样的事件。”

将基层诉求纳入制度化渠道是为了维护政治现状的整体稳定³²⁹。党的领导层坚持赋予职代会权力和选举厂长不得挑战党委在企业中的权威，这一基本前提证明了这一点。相反，真正具有颠覆性的“职代会掌权”政策建议被悄悄地削弱了，该建议的推出本身就加剧了1980年底工人的不安情绪。总而言之，1981年的结果是，在僵化的界限内努力实现工作场所的部分民主化，以容纳和引导工人的反抗能量进入制度化、政治上威胁性小得多的领域，同时边缘化可能产生重大破坏性影响的政策选择。

这种消极革命逻辑在1982年中国宪法修改时再次得到体现。一方面，工人的罢工权利被从宪法中删除³³⁰。在整个修改过程中，负责中国立法事务的彭真多次表示，这是不容商榷的³³¹。取消这一规定显然是为了应对1980-1981年的工人抗议浪潮。另一方面，职代会作为企业民主管理的主要制度渠道的地位也载入了

³²⁷ Martin Lockett and Craig Littler, "Trends in Chinese Enterprise Management, 1978-1982", p.75.

³²⁸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119.

³²⁹ 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经典著作《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耶鲁大学出版社, 1968年)中提出了这一点。我感谢 Laura Enriquez 的这一观察。

³³⁰ 当然，从宪法中删除罢工权并不意味着工人实际上不能罢工。

自1982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多起罢工事件。这次删除更多地揭示了党国是否愿意象征性地承认工人的罢工权。

³³¹ Chronology of Peng Zhen (1979-1997), p.124 and p.151.

修改后的《宪法》。尽管没有详细的证据，似乎全总在 1982 年 8 月和 9 月的倡导在确保这一变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推翻了彭真明确承认的不同政策参与者在问题上的“不一致意见”³³²。1982 年对宪法的两处修改表明了同样的关注，即通过部分制度化的让步来阻挡工人运动的怒涛。

章节结论

葛兰西的“消极革命”概念使我们能够分析政权对草根起义的反应，超越传统的投降-镇压二元论。它捕捉到了那些微妙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中，事情会发生变化以保持不变：政权领导层做出部分让步，以吸收某些草根元素并确保现状的整体稳定。然而，这个概念本身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如何制造一个消极的革命事件。首先，消极的革命反应总是需要具体的政治行为者来促成。在葛兰西对意大利复兴运动的分析中，关键的政治中间人是马志尼的行动党。在 Tugal 对土耳其新自由主义转型的分析中，消极革命策略的中间人是伊斯兰运动的一个分支，该运动最终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整合为正义与发展党³³³。在我对 1980-1981 年中国劳工骚乱后发生的事情的分析中，中华全国总工会扮演了这一中间人的角色。因此，对关注具体参与者和过程的消极革命形成的分析需要解释为什么某些中间人会提出消极革命策略。它还必须解释这些中间人如何能够对政权的行为产生具体影响。

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将布迪厄的场域分析工具融入葛兰西式的消极革命研究中将会大有裨益。对于我的分析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认识到全总在社会权力场域中占据着布迪厄所定义的“被支配的支配者”地位。这一特殊地位有两层含义。首先，被支配阶级的利益与被支配的支配者利益之间存在着“结构上的对应性”，这使得后者倾向于将自己视为前者的代表。其次，被支配的支配者仍然是支配阶级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在确保整个支配结构方面有利益。这两种相互交叉的逻辑决定了，当中国劳工抗议开始增长，独立工会的诉求出现时，全总倾向于提出一种特殊的策略，即在独立工会出现前平息动乱。这一策略的核心是加强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代表和促进工人利益及其民主要求方面的作用。同样重要的是，由于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基层工人在社会权力领域的地位在结构上是一致的，工人持续的反抗很可能转化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相对于党的领导层的政治影响力的增强。这解释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如何在全国性劳工骚乱爆发半年多后，成功地让党的领导层支持其消极革命策略。

正是因为这是消极革命反应的产物，1981 年这种新出现的（也是暂时的）强调加强基层民主（当然，同时维护党的最高权威）的政策性质是模糊的。对于党的领导层来说，这是他们无奈采取的行动方针，目的是换取工业和平，同时将更具颠覆性的政策选择搁置一旁。对于全总来说，这证明了工会领导人如何能够利用难得的机会战略性地维护他们的政治权力。对于工人来说，这确实似乎是他们通过直接行动无意中取得的一个小胜利。然而，这种暂时和部分民主开放的实际后果与塑造它的政治逻辑一样重要。在 1980 年代初期的中国，车间民主的扩

³³² 《全总党组关于全总九届四次执委会议情况的报告》，1982 年 8 月 21 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82）》第 101-103 页。“Report by the ACFTU Party Committee on the Fourth Meeting of the Ninth ACFTU Executive Council”，August 21, 1982,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2), pp.101-103. Also see Chronology of Peng Zhen (1979- 1997), p.157.

³³³ Cihan Tugal, *Passive Revolution*.

大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当在更为友好的政治环境中（重新）建立和加强职工代表大会时，它们究竟为工人做了什么？这些问题将激发下一章的叙述分析。

第三章 生产和生活的政治：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车间动态和工作场所民主困境

前两章追溯了思想潮流、政治争论和官僚操纵，这些都促成了 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初促进工作场所民主（部分和不均衡的）发展的政策进程。本章将叙述和分析重点从政策进程转移到工厂内部的车间动态，并聚焦于以下问题：当 1980 年代初在更具权力的政治环境中（重新）建立职代会时，它们究竟做了什么？换句话说，工人通过他们的职代会解决了哪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本章的前两节试图通过仔细整理和分析各种档案资料，详细描述工人如何利用他们的职代会来完成工作。为了实现一名优秀社会历史学家应有的期望，在这两节中，我努力呈现一幅丰富、细致入微和多方面的基层动态图景。结果有两个主要收获。首先，工人与职代会的接触主要集中在分配正义问题上，其次，工人还在福利设施、工作条件、干部特权和企业经济生存等更广泛的议题上行使权力。第二，很多企业领导之所以愿意让职工代表大会在分配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主要原因并不是企业领导的仁慈，而是来自基层工人的巨大压力。

遵循类似于迈克尔·布洛维在其“扩展案例法”³³⁴中提出的分析逻辑，本章的第三部分探讨是什么宏观结构变化使职代会能够以前两节中描述的方式运作。职代会扩大和充实企业层面决策作用，无疑依赖于这样的政策环境：在这种政策环境中，推动职场民主和部分加强职代会的作用暂时被提升为政治优先事项（这是第一章和第二章详述的政治过程的结果）。然而，除此之外，职代会的实际运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中国政治经济的两次变化：国有企业从党国手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权，以及一系列调整积累与消费关系的政策尝试。第三部分详细分析了这两个变化。最后，本章第四部分指出了职工代表大会运作中的一个关键张力：尽管职工代表大会现在可以处理“民生福祉”问题，即与工人个人和民生利益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但许多党国干部和企业领导人仍然表现出生产主义的偏见。这种偏见认为工人对“民生福祉”问题的关注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不如对“生产相关”问题的关注，需要自上而下的政治教育、说服和引导。因此，限制了工人通过职代会实际行使权力的程度。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工作场所民主实践：分配正义

工人们最关心的欲通过职代会解决的问题集中在分配正义上：如何在工人之间分配稀缺资源和物质福利。我分析的档案材料与安舟³³⁵在其口述历史访谈中发现的情况相呼应，表明住房分配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由于企业被允许保留更多资金，并将这些资金的更大一部分用于满足工人的生计需求，许多企业优先考虑建造新住房。这种住房的分配占据了企业工人关注的中心³³⁶。许多来源，包括关于特定工厂（或特定工业部门）的当地报告以及政治领导人和干部的总结陈述，都声称公平分配住房是工人的优先事项。因此，毫不奇怪，许多人认为，职代会应该而且能够在住房分配中发挥关键作用。

³³⁴ Michael Burawoy, 1998,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Sociological Theory* 16(1): 4-33.

³³⁵ Joel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pp.173-178.

³³⁶ 本章第三部分将深入探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企业如何以及为何被允许保留更多资金，并将更大一部分资金用于解决工人的生计需求。

武汉第一砖厂就是一个例子。根据该厂厂长的一份报告，

“去年六月³³⁷，我们厂第二栋新公寓楼还未建成，厂里每天就接到几十名工人的住房申请。情况越来越严重，厂里担心这次分配住房出现一点偏颇，会引发暴力冲突，甚至死亡。于是，我们决定把分配新住房的权力下放给职代会。结果，事情进展得很顺利，领导和群众都很满意。后来，在分配腾出的旧住房时，厂里认为没有必要再去找职代会，只咨询了车间主任。结果一片混乱，工人们每天都向主管民生的副厂长诉苦，使他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不得安宁。”³³⁸

正如本报告所指出的，住房分配可能成为企业中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任何被认为不公正的行为都可能导致潜在的爆炸性或创伤性后果（报告称“暴力冲突甚至死亡”）。另一方面，让职代会负责住房分配似乎更有可能实现工人认为公平透明的结果。

虽然上述报告没有具体说明武汉第一砖厂职工代表大会的具体职责，但其他工厂的报告则详细介绍了职工代表大会在住房分配中的具体作用。例如，

“在上海第一试剂厂，职代会民主选举了住房分配委员会。委员会在经过广泛的研究和调查后，选定了新住房的接收者，为了收集工人的反馈，在一份声明中公布了预定接收者名单和选择标准。墙上张贴大字报，规定如果三天内没有收到任何投诉，分配方案即为最终方案。1982年，共计635.8平方米的住房以这种方式分配，安置了44户住房条件特别差的³³⁹家庭。其中没有一户收到任何投诉。”³⁴⁰

1982年上海第一试剂厂新住房分配方式代表了许多地区和工业部门的普遍趋势。上海市总工会1981年9月报告称：“过去企业住房分配问题很矛盾。去年³⁴⁰，绝大多数企业（负责分配住房的上海企业）的职代会选举或提名了由群众信任、公正的人士组成的住房分配委员会，事情总体上处理得不错。”³⁴¹

虽然在许多工厂里，职代会选举了一个委员会来实际进行分配，但其他工厂要求职代会制定指导方针，工厂管理层将根据这些指导方针来分配住房。武昌造船厂就是后一种做法的典型：

“1979年以前，武昌造船厂断断续续修建了一些住房，但每次分房都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影响了生产和团结。1979年又修建了1万平方米的宿舍。”随

³³⁷ 这里的“去年六月”是指1980年6月。

³³⁸ 湖北省档案馆，SZ001-8-579-3，王家才《真心依靠群众 民主管理企业》——省委工业工作会议发言材料之十，1981年9月。Hubei Provincial Archive (HPA), SZ001-8-579-3, Wang Jiakai “Truly Relying on the Masses to Democratically Manage the Enterprise” ——Speech Material No.10 for the Provincial Industrial Work Conference, September 1981.

³³⁹ 上海市档案馆，B76-5-677-1，上海市化工局工会《上海化工企业贯彻暂行条例的情况报告》，1983年3月23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B76-5-677-1, The Union Committee of Shanghai's Bureau of Chemical Industry, “Report on the Enforcement of the Provisional Regulations among Shanghai's Chemical Enterprises”, March 23, 1983.

³⁴⁰ 这里的“去年”是指1980年。

³⁴¹ 上海市档案馆，C1-4-397-71，《上海市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汇报（草稿）》，1981年9月18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C1-4-397-71, “Report on the Promo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WC System in Shanghai and Future Plans (Draft)”, September 18, 1981.

后，工厂把住房分配权交给了厂职代会，由厂职代会讨论确定分配标准和原则，并责成工厂住房办按照原则制定分配方案，经市住建委民生福利监督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再由住房办具体分配。”³⁴²

讨论和叙述这一时期职代会在住房分配中的作用的资料有很多。我对这些资料中的相关摘录集中阅读（这与基于访谈的研究者对所有属于同一类型的数据摘录进行集中阅读的方式类似），得出的印象是，上述材料中描述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此外，住房分配作为职代会行使权力的中心问题被讨论的频率和强度超过了任何其他问题。

职代会在住房分配中的重要性也可以通过其权力被规避时发生的事情来证明。1982年，武汉总工会报道了一起颇具戏剧性的事件：

“目前，特别是在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如住房分配）上，厂领导绕过职代会或无视职代会决议，时有发生纠纷、停产、半停产。以武汉机床电器厂为例，今年分配了84套新建住房，1月份，该厂党支部推选18人成立住房分配工作小组，制定分配方案，不仅没有经过职代会，而且在厂党委副书记王务权和厂长刘祥涛的直接干涉下，实际分配甚至绕过了住房分配工作小组，偏离了分配方案。经初步核实，在已分配的新旧住房168套中，有34户不应分配到住房，其中半数户主是中层管理人员或一般干部。而住房分配工作组经过多轮商议同意分配住房的住户中，有19户没有分到房。第一轮分配房开始三天，工人就发生了打架事件。极不合理的住房分配让工人十分恼火，导致停产一周、半停一个月……这个厂的情况绝非个例。据我们了解，包括四六一厂、武汉油毡厂、武汉明胶厂、第二半导体厂、长江纸箱厂、建设机器修配厂等工厂，都发生过抢房、停产、半停产的纠纷。因为工人对于住房分配没有权力，从而引发干部腐败和裙带关系。”

³⁴³

因此，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工人对无力纠正不公平的住房分配的不满情绪可能会强烈到促使工人放弃生产岗位并罢工的程度。考虑到这些情况，难怪一些省份的党的高层领导一再敦促企业将住房分配权下放给职代会。例如，河南省委书记刘杰在1981年2月发表了以下声明：

“住房分配是任何单位最难的事情……把最难的事情交给群众，一定会处理好。事实证明，任何依靠群众协商的单位，分配住房都是好的。现在群众的要求不高，只是关心不公平。”³⁴⁴

³⁴² 武汉市档案馆，XX000091-WS04-4-2，《普遍推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情况》，1981年5月25日。Municipal Archive of Wuhan (MAW), XX000091-WS04-4-2, “Report on the Universal Promo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WC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ommittee”, May 25, 1981.

³⁴³ 武汉市档案馆，XX000091-WS04-41-8，武汉市总工会办公室编《工运情况》增刊第八期《当前职代会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1982年6月29日。Municipal Archive of Wuhan (MAW), XX000091-WS04-41-8, “Some Noteworthy Problems in Current SWC Work”, Briefs on the Workers’ Movement Special Additional Issue No.8, compiled by the Office of the Wuhan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June 29, 1982.

³⁴⁴ 《刘杰在河南省工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81年2月27日，载于《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有关文件汇编》第71-72页。“Liu Jie’s Speech at Henan’s Provincial Conference on Union

除了住房分配，雇佣也是工人对分配公平关注的另一个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青年失业率尤其是过去十年从农村回来的年轻人失业问题十分严重。据官方和非官方估计，有数千万年轻人在等待就业。四五十岁的工人通常希望他们所在的企业也能雇用他们失业的子女。一般来说，国有企业确实更愿意雇用现有工人的子女。然而，企业在任何一轮招聘中开放的新职位数量几乎总是远远少于需要工作的工人子女数量。因此，就业机会的分配即雇用谁的孩子成为工人极为重视的分配问题。因此，在许多企业中，工人依靠他们的职代会来确保过程和结果的公平性。

再次以武昌造船厂为例：

“到1979年底，该厂有1600多名知青待就业，但‘全民’招收名额只有103名，集体招收名额尚未确定³⁴⁵。全厂高度重视这批知青的安置工作，先由职代会的“知青安置督导委员会”研究确定用人原则，责成厂里的知青安置处和劳务管理处制定具体方案，经厂里的督导委员会讨论通过后贴出大字报，规定新招收的知青名单要经过职代会的督导委员会审核后才能招收。厂里有一位干部家里有个下乡的孩子，不符合招收条件，但还是通过关系把孩子招了进来，督导委员会在审核新招收的知青名单时，发现了违反原则的行为，就把这次招收拦了下来。”

³⁴⁶

武汉第一砖厂同样将招聘决定权交给了职代会。该厂厂长写道：

“去年10月³⁴⁷，我们工厂被分配了两个招聘名额，专门用于招聘目前在国营农场工作的工人的十三名亲属。我们将决策权交给了职工代表，他们在决定之后，经过讨论，决定优先安排两名资历高、工作条件艰苦、工作成绩好的工人。这个决定公布后，得到了厂里工人的普遍支持。”³⁴⁸

1982年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委员、专职负责工会事务的郝建秀也证实，职代会在确保住房和就业机会分配相对公平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83年6月，郝建秀在完成对中国西北四个省区进行考察后，给全总主席倪志福写了一封信。郝建秀在信中总结道：“目前，群众对招工、住房分配中的腐败和裙带关系反应强烈。但在建立了职代会的企业，情况要好得多。”³⁴⁹

在一些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在分配正义方面的决策范围还涵盖了工资和奖金。为了解决1976年之前十年的工资几乎完全冻结的问题，后毛泽东时代的党领导

Work (Summary)”, February 27, 1981, in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Relevant to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 pp.71-72.

³⁴⁵ 武昌造船厂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又称“国营”企业。许多这种所有制企业除了自己招收员工外，还成立了“集体所有制”的子公司，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同一企业内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招工的区别。

³⁴⁶ MAW, XX000091-WS04-4-2.

³⁴⁷ 这里的“去年十月”是指1980年10月。

³⁴⁸ HPA, SZ001-8-579-3.

³⁴⁹ 《郝建秀同志关于工会工作的几个问题给倪志福同志并全总党组的信》，1983年6月2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83）》第3-8页。“Letter by Hao Jianxiu to Ni Zhifu alongside the ACFTU Party Committee on Several Issues in Union Work”, June 2, 1983,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3)*, pp.3-8.

层在1977年和1979-1980年实施了一系列工资上调措施(如第一章中简要提到)³⁵⁰。企业内部要弄清楚的问题是,哪些工人有资格上调到哪个工资等级。有报告显示,一些企业授权职工代表大会在这方面做出决定。例如,武汉化工原料厂党委报告说:

“1980年的工资调整,我们没有按照1977年的调整方式,而是先由职代会讨论通过工资调整方案,然后由职代会代表民主选举全厂工资调整评估委员会和各车间的类似委员会(负责实际调整)。虽然这次的工资调整比1977年困难,但进展得更顺利,评估委员会推荐的升级工人名单也准确无误。”³⁵¹

1980年的工资调整被认为比1977年的调整更“困难”,可能是因为影响的工人更多,涉及的工资等级也更多。因此更容易引发工人的不满和冲突。鉴于此,工厂领导倾向于让职代会而不是他们自己来处理潜在的地雷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提高工资,1977年,在“物质激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受到毛派激进分子的强烈批评后,党的领导层还决定恢复工业部门的奖金(第一章中简要提到)³⁵²,虽然工人们普遍欢迎恢复奖金制度,但企业内部的奖金分配在政治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经常成为职代会审议的主题。武汉第一砖厂厂长的报告中讲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今年5月份³⁵³,水泥车间超额完成月生产计划75.86%。按照厂里的超计件奖金政策,水泥车间工人5月份平均奖金为39元,是砖厂工人平均奖金的两倍多。在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奖金问题时,水泥车间职工代表叶茂山指出,我们厂生产砖头是主业,生产历史长,劳动强度大,已经饱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比较困难;水泥只是辅业,生产历史短,潜力还很大。如果我们几个工人奖金过高,其他工人奖金过低,会影响工人团结,影响生产整体发展;不管我们能拿到多少钱,如果以牺牲大局为代价,我们都不愿意接受。叶又提出要减少水泥车间的五月份奖金,并说如果车间群众不高兴,我们代表会说服他们。这样,这场涉及工人个人利益的尖锐冲突就得到了妥善解决。”³⁵⁴

这份报告的真实性的无法确定。不清楚职代会代表叶是否真的是一名普通工人。也不清楚叶是否真的出于公平和团结其他工人的精神主动要求减少分配给他所在车间的奖金(当然,如果这一切确实如此,那将令人印象深刻)。另一方面,毫无疑问的是,这家工厂的领导人认为,将一项可能不受欢迎且引发冲突的奖金决定作为职代会审议的结果非常重要。这一事实本身证明了职代会在处理与分配

³⁵⁰ Susan L Shirk, 1981, "Recent Chinese Labour Polic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88: 575-593.

³⁵¹ 湖北省档案馆, SZ001-8-579-2, 中共武汉化工原料厂委员会《加强党的领导, 发扬企业民主, 不断完善职代会制度》——省委工业工作会议发言材料之四, 1981年9月。Hubei Provincial Archive (HPA), SZ001-8-579-2, The Party Committee of the Wuhan Chemical Raw Material Factory,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Promoting Enterprise Democracy, and Continuing to Perfect the SWC System" —— Speech Material No.4 for the Provincial Industrial Work Conference, September 1981.

³⁵² Susan L Shirk, "Recent Chinese Labour Polic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³⁵³ 这里的“今年五月”,指的是1981年5月。

³⁵⁴ HPA, SZ001-8-579-3.

正义有关的问题方面的重要性。

在某些情况下，奖金纠纷确实会引发职代会内部的冲突。武汉轻工业一局党委报告了木制容器厂发生的一起事件：

“去年³⁵⁵，厂领导提出一个方案，把工人的奖金和各车间的利润挂钩。职工代表认为这个方案不可行，拒绝通过。经过多轮反复讨论，这个方案才被批准试行。两个月后，该计划对生产不利，奖金制度恢复为小额积分制。这表明，职工代表的主人翁责任感增强了，他们敢于抵制他们认为不正确的东西。”³⁵⁶

这一事件的意义有三点。首先，该厂职工代表并非仅仅充当企业领导层的橡皮图章，而是认真履行职责，抵制了他们认为存在缺陷的奖金方案。其次，报告含蓄地承认，企业领导层不顾职代会的反对，而这种做法在官方报告中很少见。第三，报告承认，企业领导层提出的奖金方案确实存在错误，这在官方报告中更是少见。报告用短短几句话，讲述了职代会与企业领导层围绕奖金分配展开的一场引人入胜、紧张刺激的冲突。

上述许多报道都声称，企业领导层（党委和/或厂长）愿意将分配问题的决策权移交给职代会。然而，必须指出，这种权力转移主要不是领导层仁慈的结果，而是工人们大声或悄无声息地对领导层施加巨大压力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工人的分配要求超出了工厂领导处理能力的案例，“让他们连吃饭睡觉都不得安宁”（如武汉第一砖厂）。我们也看到工人罢工的案例，因为他们认为领导在处理分配问题时存在腐败行为（如武汉机床电器厂）。

此外，工人表现出坚定的决心捍卫职代会的决定并不罕见。武汉机械工业局在1982年承认，“工厂厂长任意否决或改变职代会通过的决议的事件在几个工作单位都发生过；其中一些甚至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和**停产**”³⁵⁷。换句话说，企业对分配问题的处理不当会带来真正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领导个人生活的严重滋扰以及影响生产的罢工和其他形式的抗议活动。因此，在很多企业中，工人对领导层施加的强大影响力，促使领导层在分配问题上采取民主化处理，企业领导层认为这种民主更有利于确保产业和平，也更有利于减轻自己的个人责任。

这一逻辑在吉林省长春市第一汽车厂党委的一份报告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正如前一章所述，这家工厂是中国最具象征意义和战略意义的旗舰工厂之一：

“我们企业领导在工作中，经常会碰到一些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关系到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特别是由于民生问题积压多年，党群关系失衡，经常会出现一些容易引发职工**情绪冲动**、职工认为迫切的问题，比如住房问题、职工

³⁵⁵ 这里的“去年”是指1980年。

³⁵⁶ 武汉市档案馆，XX000091-WS04-6-3，武汉市一轻局党委《采取具体措施 积极推行职代会制度》，载于《武汉工运》第三期。Municipal Archive of Wuhan (MAW), XX000091-WS04-6-3, The Party Committee of Wuhan's First Bureau of Light Industry, "Actively Promoting the SWC System through Concrete Measures", Workers' Movement in Wuhan Issue No.3.

³⁵⁷ 武汉市档案馆，XX000053-WS03-24-3，武汉市机械工业局办公室《情况反映》第八期《关于全局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情况分析》，1982年4月21日。Municipal Archive of Wuhan (MAW), XX000053-WS03-24-3, "Analysis of the Promotion of the SWC System in Factories across the Bureau", in Briefs on Latest Situations Issue 8, compiled by the Office of Wuhan's Bureau of Mechanic Industry, April 21, 1982, emphasis added.

子女就业问题等。过去我们在商量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时，常常感到矛盾多、难度大，相关部门也很为难，往往是虽然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实际处理起来还是会有**很多怨言**。职工代表大会正式运行后，党委和企业领导……把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交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让他们集体制定规则和行动计划，并监督他们按照官方政策处理……例如，我们把传统上容易引发工人抱怨的问题，如住房分配交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决定和处理。尽管要分配的住房数量保持不变，但群众对结果更满意。”³⁵⁸

1981年，河南省委书记于一川在一次讲话中也明确提出了工作场所民主是防止工人对分配问题不满的有效方法。于一川认为：“工人之间的问题，比如分配问题，更应该由职代会讨论……没有职代会，这些问题就不容易处理。”如果分配问题处理不当，会有什么后果？于一川特别提到了按章办事，这是一种特殊的怠工形式：“如果民主管理不力……你的企业可能会出现怠工现象，工人上岗却不努力，车床空转。”³⁵⁹

总之，职代会被赋予了广泛的权力来处理分配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问题往往受到工人的重视，而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工人的抱怨、不满、骚乱和罢工。在一些企业，领导层甚至只允许职代会在处理那些容易引发冲突的棘手分配问题上发挥作用。上海大型旗舰钢厂宝钢的工会干部石瑞林抱怨道：“据广泛报道，职代会的真正权力仅限于领导层无法妥善处理的问题，例如住房分配和义务劳动运动，这些都交给了我们”³⁶⁰。

20世纪80年代初的工作场所民主实践：其他问题

虽然与分配正义有关的问题往往占据着职代会关注的焦点，但职代会行使权力有时超出了这些问题。除了分配问题之外，工人还试图通过职代会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大致可以分为四类：1) 福利待遇；2) 工作条件；3) 干部待遇和人事问题；4) 国家下达的生产订单减少后企业的经济生存问题。本节将逐一说明这些类型的问题是如何体现在职代会审议和决策过程中的。

由于中国的国营企业往往拥有大量对工人工作和生活至关重要的福利设施，工人有时会利用职代会作为推动这些设施得到更好维护和改造的渠道。上海第十二棉纺厂（该厂是1980年被选中试行“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工厂之一，在第一章中讨论过）的一份报告生动详细地描述了该厂职代会如何向工厂管理层施压，要求扩建女工浴室：

“我们厂的女澡堂人满为患，高峰期五六个工人挤在一个淋浴间里，而且通风不好，工人经常在澡堂里晕倒。厂党委书记和厂长早就知道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解决。主要原因是澡堂一边是科研精炼办公室，另一边是电子检修办公室，

³⁵⁸ “Report by the Party Committee of the First Automobile Factory,” emphasis added.

³⁵⁹ 《于一川在河南省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上的讲话》，1981年7月，载于《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有关文件汇编》第72-84页。“Yu Yichuan’s Speech at Henan’s Provincial Symposium on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 July 1981, in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Relevant to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 pp.72-84.

³⁶⁰ 上海市档案馆，C1-3-329-55，《情况摘编》第83期《上总六届十次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的一些反映》，1981年6月19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C1-3-329-55, *Compilation of Situations Issue 83*, “Some Opinions Aired in the Discussion During the Tenth (Enlarged) Meeting of the Sixth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June 19, 1981.

两个办公室都不愿意搬迁。企业领导层尊重‘先生产，后生活’的惯例，无能为力。后来，职代会专门针对这个问题提出建议并通过了决议，两个办公室的负责人都被叫上台来表明态度。最后，两个办公室占用的空间被腾出来，女澡堂也扩大了，这受到了工厂女工的一致好评。”³⁶¹

据报道，职代会经常解决的其他福利设施问题包括食堂（特别是食堂的翻新或所提供菜肴的质量和种类）、托儿所和体育设施。

职工代表还提出了一些看似微不足道但对工人工作条件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工人人身安全、健康和舒适。吴淞煤气厂党委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工厂的选煤车间地面很湿。由于工人每人只有一双工作鞋，当他们唯一的一双鞋子被清洗和烘干时，他们没有鞋子可以换。职工代表建议改变工人每半年交旧工鞋换新鞋的旧政策，新政策是每半年换一双新鞋，工人旧鞋可以保留三个月，这样既节省劳动保护费用，又可以多换一双鞋。职工代表商议后一致同意这个建议，经监理公司同意，该建议被定为职代会决议。”³⁶²

上海建设局的一名工会干部也报告称，那里的职代会收到大量有关劳动保护和安全设备的建议³⁶³。武汉薄板厂的职工代表提出了设备缺陷可能导致工人受伤的问题，并建议改变轮班组织方式³⁶⁴。

第三，工人往往有强烈的动机通过职代会提出有关干部特权的问题。在武汉第一面粉厂，工人们特别要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以解决他们认为企业领导享有的不公平特权：

“厂长在书记的建议下，亲自选址、设计了一百多平方米的住宅，准备建成后入住（后因群众强烈反对，甚至上访，计划流产）。加之企业领导还享有其他特权，如书记、副厂长星期天坐厂里的车去钓鱼，群众十分愤慨，多次要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但厂长拒绝召开。”³⁶⁵

在本案中，是否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本身就是基层工人和企业领导层争论的焦

³⁶¹ SMA, G28-1-518.

³⁶² 上海市档案馆, C1-3-337-63, 《吴淞煤气厂党委报告》。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C1-3-337-63, “Report by the Party Committee of the Wusong Coal Gas Factory” .

³⁶³ 上海市档案馆, C1-3-329-58, 《情况摘编》第 86 期《对工会的组织体制、经费使用等方面的一些意见》，1981 年 6 月 25 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C1-3-329-58, Compilation of Situations Issue 86, “Some Opinions Regarding the Union’s Organization and Usage of Funds” , June 25, 1981.

³⁶⁴ 武汉市档案馆, XX000091-WS04-67-16, 武汉市总工会办公室编《工运情况》第 64 期《武汉薄板厂是怎样处理职工代表提案的》，1983 年 12 月 21 日。Municipal Archive of Wuhan (MAW), XX000091-WS04-67-16, “How the Wuhan Sheet Metal Factory Handled Proposals from the SWC Representatives” , Briefs on the Workers’ Movement Issue 64, compiled by the Office of the Wuhan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December 21, 1983.

³⁶⁵ 武汉市档案馆, XX000091-WS02-124-2, 武汉市总工会陈玉玺《关于普遍推行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的几点意见》，1980 年 11 月 11 日。Municipal Archive of Wuhan (MAW), XX000091-WS02-124-2, Chen Yuxi from the Wuhan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Several Suggestions on the Universal Promotion and Perfection of SWCs” , November 11, 1980.

点。正是因为工人们将职代会视为一个可以向领导问责的平台。

在那些确实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工厂，干部特权有时成为职工代表大会代表关注的一个问题。在上海电化工厂：

“职代会在审议全厂奖惩条例时，原稿规定严重违反厂规的工人要降级、降工资，职工代表指出，该规定不能只针对工人，坚持严重违反厂规的干部也要降级、降工资。原稿规定，对作弊造成生产损失的工人要给予处罚。职工代表指出，对工作不专心、工作失误的干部也要给予处罚……诸如此类的修改建议共计三十余条，均被采纳。”³⁶⁶

在这里，职工代表非常坚定地坚持工人和干部平等的原则。同样，1982年4月，职工代表在武汉汽车电器厂对厂方提出的住房分配方案提出了强烈反对，该方案中有一些条款偏向企业领导和中层管理人员，职工代表的抵制导致这些条款被废止³⁶⁷。

最后，在面临严重经济生存危机的企业中，职代会经常召开会议，讨论迫在眉睫的经济困难。正如第二章简要提到的，党的领导层在1980年12月采取了一项严厉的经济紧缩计划。该计划大幅削减了党和国家资助的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量在建项目因此被放弃、暂停或缩减规模。其附带后果是，许多生产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材料和设备的企业（主要是重工业部门）现在不得不面临订单大幅减少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企业从国家那里接到生产订单。这些企业已经习惯于严格按照国家指令生产产品种类和数量，国家负责安排原材料的采购方式和产品交货地点。而现在，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指示这些企业只使用其生产能力的一小部分进行生产，而大部分工业产能则闲置。因此，这些企业往往只能靠自己想办法维持经济生存。

谢淑丽 (Susan Shirk) 曾提出一个著名论点，即这一时期的经济紧缩无意中许多企业推向市场：弥补被削减的国家生产订单，企业必须通过定位市场需求和建立不通过国家中介的交易关系来确定还要生产什么。³⁶⁸与谢淑丽的观点一致，我发现，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经济紧缩也无意中促使许多企业的领导更愿意召集职代会。一方面，工厂领导认为有必要对工人更加透明地告知企业的经济困难，以便集体同意紧缩开支和内部紧缩政策。另一方面，他们也觉得有必要就如何振兴企业和制定替代生产计划征求工人的意见，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完全没有主意了。在企业领导层看来，职代会在这两个方面都很有用。

例如，湖北仪表紧固件厂厂长报告称，1980年国家停止下达生产订单，最终导致工厂大部分车间停工，工厂濒临倒闭。企业领导层感到走投无路，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讨论工厂的困难成为理所当然的做法³⁶⁹。同样在1980年，由于国家下达给武昌造船厂的生产订单仅覆盖了企业70%的生

³⁶⁶ SMA, B76-5-677-1.

³⁶⁷ MAW, XX000053-WS03-24-3.

³⁶⁸ Susan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Chapter 10.

³⁶⁹ 湖北省档案馆, SZ001-8-578-3, 潘选鹤《我尝到了职工代表大会的甜头》——省委工业工作会议发言材料之六, 1981年9月。Hubei Provincial Archive (HPA), SZ001-8-578-3, Pan Xuanhe, "I've Enjoyed the Benefits of the SWC" —— Speech Material #6 for the Provincial Industrial Work Conference, September 1981.

产能力，企业党委决定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如何让闲置的生产能力恢复生产³⁷⁰。同样有报道称，上海一些经济困难的企业依靠职工代表大会收集工人的意见，制定替代生产和营销计划³⁷¹。一些报道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图景，工人的坚强决心和创造性主动性有效地挽救了他们的企业。虽然这些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职代会一定在帮助企业走上经济复苏之路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或者至少让工人更愿意忍受紧缩政策。否则，我们不会听到政治高层包括云南省委副书记赵增益等省级领导明确敦促企业“依靠群众”解决裁员政策造成的经济困难³⁷²。

中国政治经济的有利变化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工业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并不均衡。有大量的报道指出，一些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只是起到装饰性的作用，没有发挥任何实际作用，还有一些企业甚至没有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尽管如此，正如上文两节所表明的，在全国相当一部分企业中，职工代表大会确实为工人提供了一个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有意义地解决和处理一系列关系到工人利益的问题。1981 年 6 月，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强调加强职代会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之前，全总副主席顾大椿报告称，就职代会的运作而言，中国 25%的企业表现良好，60%的企业表现一般，15%的企业表现不佳³⁷³。本章前两节的核心发现之一是，许多职代会在管理企业住房等分配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社会学家安舟³⁷⁴和历史学家李怀印³⁷⁵在对工人进行口述历史访谈时发现的情况相呼应。马丁·洛克特根据对 1980 年代初中国工人的同期访谈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式³⁷⁶。不同研究人员和不同类型的数据（档案资料、回顾性口述历史访谈和同期实地考察）之间的一致性有助于人们确信研究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广泛范围内的历史模式。

本节探讨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中国政治经济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为职代会有意义地（尽管仍然不均衡且受到限制）行使权力提供了有利条件。显然，职代会作用的扩大与自上而下的压力有很大关系，这种压力是因新出现的政治重点——加强企业管理中的工作场所民主——产生的。这种政治重点是第一章和第二章记录的多层次复杂政策过程的结果。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与工人自己产生的巨大政治和车间压力共同发挥作用。但与此同时，企业从定义上讲是

³⁷⁰ 武汉市档案馆，XX000091-WS04-4-1，《李梅芳在市工交会议上的讲话》，1981 年 5 月 6 日。Municipal Archive of Wuhan (MAW), XX000091-WS04-4-1, "Li Meifang's Speech at the Municip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and Transportation Work", May 6, 1981.

³⁷¹ SMA, C1-4-397-71.

³⁷² 《赵增益在云南省职工代表大会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摘要）》，1981 年 4 月 11 日，载于《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有关文件汇编》第 84-87 页。"Zhao Zengyi's Speech at Yunnan's Provincial Symposium for Exchange of SWC Experiences (Summary)", April 11, 1981, in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Relevant to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 pp.84-87.

³⁷³ 《顾大椿代表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领导小组向中央书记处汇报的提纲》，1981 年 6 月 4 日，载于《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有关文件汇编》第 42-49 页。"Outline of Gu Dachun's Report to the Party's Central Secretariat on Behalf of the Leadership Group of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 June 4, 1981, in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Relevant to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 pp.42-49.

³⁷⁴ Joel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pp.173-178.

³⁷⁵ Li Huaiyin, *The Master in Bondage*, chapter 2.

³⁷⁶ Martin Lockett, "Enterprise Management: Move towards Democracy?"

整体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企业层面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经济结构性条件。本节认为，职工代表大会有意义地行使权力（如前两节所述）的可能性条件包括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中国政治经济的两次深刻变化：公有企业从党和国家手中日益获得管理自主权，以及一系列旨在重新调整积累和消费之间平衡的政策尝试。

首先，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中国开始了一场改革运动，旨在使公营企业更加独立于党国监督机构³⁷⁷。正如第一章所讨论的，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社会主义中国管理公营企业的方式基本上是将这些企业视为党国的延伸。企业必须遵守党和国家主管部门就生产和投资计划等重大问题下达的命令和指示。此外，即使是企业内部相对微不足道的政策变化也需要党的国家机关的审查和批准。举个戏剧性的例子，1981 年，上海的工会干部仍然抱怨说，“即使一些企业试图在炎热的夏天给每个工人 0.05 元的小额补贴来购买冷饮，他们也做不到，因为财政局和劳动局阻止了这些提议”³⁷⁸。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这种僵硬的国家管理体制成为改革的对象。首先是 1978 年年底在四川省（主持这次改革的不是其他政治家，正是赵紫阳，当时的省委书记），随后，1979 年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一些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验。这些试验企业被允许保留一部分利润（此前这些利润必须全部上交给党国家），并自主决定如何使用这些留存资金。这些企业还被赋予了一些决策权，例如生产计划、产品营销、新产品试验、内部组织管理和人事管理。到 1980 年 9 月，据报道，进行“扩大自主权”试验的企业总数已超过 6,600 家，其利润总额占中国所有公有工业企业利润的 70% 以上（这意味着，被选中进行这些试验的企业往往是规模较大、经济实力较强的企业）；国务院经济委员会要求进一步扩大试点，赋予试点企业更多权力³⁷⁹。同时，没有被选中进行试点的企业也被赋予了略大一些的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力，比如，在决定如何分配集体福利和奖金基金方面被赋予了更大的自由度，同时放宽了获得国家批准的要求。

职代会权力的行使，取决于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原因很简单，只有当企业有事情需要决定时，职代会才能做出有意义的决定。当企业严格按照国家指令进行管理时，职代会在逻辑上不可能行使管理权或决策权。例如，只有在企业被允许独立决定将留存利润和福利基金用于住房和福利设施的建设和翻修，而不必经过层层官僚审查之后，职代会才有机会对住房分配和福利设施的改善做出决定。同样，如果企业仍然别无选择，只能雇用监督党国机关指派给他们的人，职代会在雇用方面也不可能拥有发言权³⁸⁰。

³⁷⁷ Susan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chapter 10; Barry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pp.98-108.

³⁷⁸ SMA, C1-3-329-55.

³⁷⁹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 and 今后意见的报告》，1980 年 9 月 2 日，载于《国务院公报》1980 年第十四号。“The Economic Commission’ s Report on the Experiments with Enlarging Enterprise Autonomy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Work, Approved by the State Council”, September 2, 1980, in *The State Council’ s Public Pronouncements, 1980 Issue 14*.

³⁸⁰ 湖北省档案馆, SZ026-5-49-8, 省工交调查组《武汉市部分企业反映经济管理体制上存在的若干问题》，1979 年 9 月 20 日。Hubei Provincial Archive (HPA), SZ026-5-49-8, the Provincial Investigative

事实上，甚至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有时仍有报道称，由于党和国家上级机关的反对，职代会制度无法实施。例如，上海解放塑料厂的一名工会干部抱怨说，该厂职代会作出的一项决议，为在生产过程中遭受有毒气体侵害的工人提供津贴，由于主管公司和国家劳动局都不予批准，该决议无法实施³⁸¹。吴淞煤气厂也在 1981 年报告说，该厂职代会作出的一项奖励节能的奖金计划的决定，被主管公司否决了³⁸²。这些例子表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工作场所的民主和党和国家的严格控制是相冲突的。换句话说，一定程度的企业自治是职代会有效行使权力的必要条件。

四川第一棉纺厂的一份报告将职代会的活力与扩大的企业自主权直接联系起来。1978 年第一次召开职代会时，只是走了个流程，没有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果。报告称，原因是“企业没有任何权力，工人要求解决的问题那么多，企业没有一个能够解决，所以职代会不过是过节的聚会。”而 1979 年职代会再次召开时，其作用就显得更加实质性了。“由于企业开始扩大自主权，保留了利润，获得了一些经济上的自由，所以，从生产任务的完成到工人的福利、生活等很多问题，都要集体决定。”报告说，在 1980 年企业自主权进一步扩大后的职代会会议上，工人表现出了更强的“主人翁精神”。³⁸³

本报告描述的前后对比可能有些夸张。但企业自治对职代会权力和影响力的关键制约作用也得到了那些抱怨扩大企业自治的改革运动不够深入并主张继续扩大企业自治的人的证实。这些评论最常听到的是基层工会干部，他们在内部讨论中相当坦率地评估职代会的表现。上海的一位干部万志良说，

“重要的是进一步改革管理体制。如果不改革体制，许多问题就无法解决……职代会必须能够解决具体问题；否则，群众就会对他们失去信心。在某些问题上，职代会作出的决议被上级‘党和国家机关’否决，这一制度必须改革。”³⁸⁴

上海工会干部付爱珍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她指出，“即使在被赋予更大自主权的企业，他们的权力仍然十分有限。工人对职代会不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职代会无法解决问题”³⁸⁵。在 1981 年 9 月的一次全省会议上，湖北省基层管理干部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赵胜和和白云峰认为：“由于企业目前享有的权力仍然有限，无法有效解决职代会提出的许多问题，导致群众失望”³⁸⁶。参加这次会

Group on Industrial and Transportation Work, “Some Problems Reported by Certain Enterprises in Wuhan Regarding the System of Economic Management”, September 20, 1979.

³⁸¹ 上海市档案馆, C1-3-329-60, 《工会简报》第 45 期《上总六届十次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的一些反映》, 1981 年 6 月 22 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C1-3-329-60, “Some Opinions Aired in the Discussion During the Tenth (Enlarged) Meeting of the Sixth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Union Bulletins Issue 45, June 22, 1981.

³⁸² SMA, C1-3-337-63.

³⁸³ 《川棉一厂情况介绍文章》, 载于《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讲话》, 第 76-81 页。“Report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Sichuan No.1 Cotton Mill”, in Speeches on the Provisional Regulations on SWCs in State-Manag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pp.76-81.

³⁸⁴ SMA, C1-3-329-55, emphasis added.

³⁸⁵ Ibid.

³⁸⁶ 湖北省档案馆, SZ001-8-583-13, 湖北省委工业工作会议简报第十三期, 1981 年 9 月 8 日。Hubei Provincial Archive (HPA), SZ001-8-583-13, Bulletins of Hubei's Provincial Industrial Work

议同一小组讨论的其他人也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为了使职代会发挥良好作用，必须赋予企业更多实质性权力，而不仅仅是利润留存³⁸⁷。

第二，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几年（1977-1980年），出现了一系列旨在重新调整积累和消费之间平衡的政策尝试。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经济被广泛地描述为高积累、低消费：令人印象深刻的资本积累，特别是在重工业部门，是以消费需求被大大抑制为代价实现的³⁸⁸。官方意识形态将积累优先于消费视为一种革命道德，大力宣传“先生产，后生活”等口号。随着激进的毛泽东主义者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掌管意识形态事务，为工人提供“物质激励”被进一步谴责为“经济主义”和政治反动。随之而来的是一段革命性的紧缩时期，中国城市工人的工资在十年内被冻结，生活水平也几乎没有改善，唯一的例外是20世纪70年代初数百万临时工获得了正式工身份³⁸⁹。

1976年激进的毛派被赶下台后，中国后毛泽东领导层几乎立即决定改变政策，投入更多资源来满足民众的消费需求。在农村，党和国家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有效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³⁹⁰。在城市，随着1977年和1979-1980年推出一系列大规模的工资升级，工人的净工资也增加了，奖金制度在1978年恢复（如本章前面所述）。这可能至少部分是因为后毛泽东领导层试图巩固其权力并收买群众（见第一章）。尽管如此，工资调整和奖金恢复确实（无意中）为许多职代会行使权力提供了支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工资调整和奖金分配是激发工人参与企业民主热情的关键分配问题之一。

此外，这一时期的国营企业被允许在“民生福利”方面投入更多资金。1978年恢复“企业基金制”后，企业有专门的、制度化的资金池，专门用于集体福利。这些资金不能挪作他用，也不会枯竭³⁹¹。尽管这些集体福利基金的使用有时仍受到党和国家上级部门的严格审查³⁹²，但这笔资金为企业改善“民生福利”提供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此外，对于那些进行扩大自主权和允许保留利润的试点企业，它们可以自主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资金。这些留存资金。他们经常被鼓励或者至少没有被阻止将这些资金用于住房和集体福利。企业投资“民生福利”的自由度增加，为职代会行使权力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企业本来没有物质资源去解决的福利相关问题和工人们仍然深感担忧的问题，其解决现在都已经变为可能了。

在积累与消费平衡的政策调整中，官方话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官方话语不再强调“先生产，后生活”和抵制“物质激励”。

Conference Issue 13, September 8, 1981, emphasis added. This document is labeled “priority secret”（机密）。

³⁸⁷ Ibid.

³⁸⁸ See, for example, Ho-fung Hung, *The China Boom*.

³⁸⁹ Joel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pp.147-148.

³⁹⁰ 值得注意的是，农产品收购价格的上调，并没有带来城市农产品售价的大幅上涨，这意味着党和国家实际上对城市人口提供了一笔可观的补贴。See 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 *Paradoxes of Post-Mao Rural Reform: Initial Steps Toward a New Chinese Countryside, 1976-1981*, Routledge, 2015.

³⁹¹ “企业基金制”为每个国营企业设立了三个基金池：生产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和奖金基金。基金之间不能相互转移。每年拨给每个基金的资金数额按企业总收入或总工资的固定百分比计算。如果企业被置于“扩大自主权”的试验中并被允许保留利润，那么它就不再有权使用这些基金。

³⁹² SMA, C1-3-329-58.

相反，这一时期的官方话语——从党国多个层面的大量官方讲话和政策文件中可以看出——承认大量未解决的生活水平问题已经积累到严重程度。官方话语也承认，工人对这些问题不满大多是合理的，尽管人们经常（不准确地）将责任归咎于文化大革命。新的官方话语坚持要求现在就努力满足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与此相关的是，1979年和1980年出现了一场更偏抽象的辩论，形式是官方报纸上的书面交流和由著名知识分子于光远³⁹³组织的官方批准的公开会议。这场辩论集中在以下问题上：经济发展最终应该服务于什么目的——是为了生产本身，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场辩论——现在被人们铭记为生产生活大辩论——清楚地表明，支持优先考虑消费需求的论点不再是政治禁忌，而是现在被允许在公共领域大声宣扬³⁹⁴。

官方话语的这些变化意味着，企业领导人或其党和国家监督当局不再有强有力的话语基础来公然压制工人的物质需求。现在，工人更容易利用他们的职代会作为渠道来表达这些需求。上文提到的上海十二棉纺厂女工澡堂改造事件就是一个例子。过去，“先生产，后生活”的意识形态为回避澡堂拥挤不堪、通风不良的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借口。但在1979年，当刚刚恢复的职工代表大会要求解决这一问题时，话语屏障不再那么牢固，这迫使工厂领导层和中层管理人员屈服。正是由于职工代表大会在解决这些“民生福利”问题上发挥了实质性作用，许多工人发现这种车间民主实践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因为“民生福利”问题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正如湖北省一位基层干部在1981年上述省级会议的内部讨论中报告的那样：

“有些企业开职工代表大会的时候，工人在讨论福利生活、奖金、住房分配等问题时，还挺有干劲，但对于全厂生产计划、干部腐败等问题，就没那么感兴趣了，觉得后面这些问题，他们的意见没有意义。”有工人说，‘你们想腐败到什么程度都可以，我还是偷懒吧。’”³⁹⁵

上海泰康食品厂一位工会干部分享了一段从相反角度阐述同样观点的观察：

“（我们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召开方式是，把大量注意力放在解决与生产有关的问题上，而很少分配给解决必要的‘民生和福利’问题。在以这种方式召开了几次职工代表大会之后，群众对职工代表大会不再有热情。这表明职工代表大会的运作与企业自治权的扩大密不可分。”³⁹⁶

在这个工厂，工人们没有发现职代会是一个有意义的民主领域，也失去了参与其中的兴趣。这恰恰是因为职代会在解决“民生福利”问题方面没有起到作用，而这些问题是与工人个人生活最直接相关的实质性问题。这位工会干部进一步声称，在这个工厂里，职工代表大会在“民生福利”问题上的无能，与该厂管理自

³⁹³ 冯兰瑞，《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载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4年1月31日。Feng Lanrui, “The Discussions on the Purpose of Socialist Produc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nline Version, January 31, 2004.

³⁹⁴ Hou Li, *Building for Oil: Daq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Stat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20, pp.197-198.

³⁹⁵ 湖北省档案馆，SZ001-8-583-11，湖北省委工业工作会议简报第十一期，1981年9月7日。Hubei Provincial Archive (HPA), SZ001-8-583-11, *Bulletins of Hubei's Provincial Industrial Work Conference Issue 11*, September 7, 1981. This document is labeled “priority secret” (机密) .

³⁹⁶ SMA, C1-3-329-60.

主权的落后有很大关系。因此，该企业在“民生福利”问题上没有太大的自主权，只能由职工代表大会审议“生产相关问题”。这个“反面案例”表明，企业自主权的提高（与积累与消费关系的政治调整相结合）是职工代表大会实际解决工人物质需求的“不可分割”的前提。而职工代表大会在这方面的能力又决定了工人对职工代表大会的重视程度和参与积极程度，换句话说，就是工人民主的活力。

“民生福祉”问题成为“干扰”？

尽管在毛时代结束后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开始努力纠正长期以来对人口消费需求的忽视，官方话语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总体上的生产主义偏见依然存在。投入资源提高生活水平被认为是必要的，但优先级仍然低于生产增长和资本积累。政策制定者、地方干部和企业领导人容忍对工人物质需求的一定程度的满足，但不希望让这种满足走得太远。在他们看来，对“民生福利”问题的关注绝不应凌驾于或分散对始终更重要的事情的注意力：动员群众提高生产绩效和实现经济发展。因此，关于职代会工作的报道经常抱怨他们过于关注“民生福利”。这是通常被视为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自上而下的强力干预和指导。

例如，望亭发电厂党委 1981 年报告称：

“第六届职代会³⁹⁷第一次会议召开时，职工代表每次讨论的都是民生福利问题。非职工代表的基层工人的诉求和建议也同样集中在民生福利方面，职工代表提出的 305 项建议中，有 180 项是关于工人民生的。虽然职代会也进行干部考核，但大多数代表对此并不感兴趣。这是因为涉及工人生活的问题太多，严重打击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尊重群众的意愿，先把工人的生活福利问题放在首位……这样我们才能逐步引导职代会更加关注与生产经营管理有关的问题。”³⁹⁸

该党委称，职代会过分关注民生福利问题，这是不幸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更好地领导，党委认为职代会应该直面群众，因为“实践表明，群众更关心、更重视那些与工人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他们会更认真地考虑这些问题”³⁹⁹。然而，很明显，党委的最终目标是逐步将职代会的注意力转移到与生产相关的问题上，而民生福利问题则被视为次要问题。

武汉化工原料厂党委编写的一份报告中，对以民生问题为重点的职代会的负面描述也很明显：

“企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由于十几年的动乱，民生问题积重难返，工人的怨气也越来越重。因此每次开职代会，都会有关于民生福利问题的提案。而且，一些职工代表没有正确认识生产和改善生活的关系，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第一位。当民生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时，这些代表就把职代会变成了一个发牢骚、发泄愤怒的场所。如果我们不及时介入，职代会的积极作用就会丧失。”⁴⁰⁰

³⁹⁷ 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该企业恢复职代会后第一次召开，前五次职代会均在文革前召开。

³⁹⁸ 《望亭发电厂党委报告》，载于《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有关文件汇编》，pp.233-246。“Report by the Party Committee of the Wangting Power Plant”，in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Relevant to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 pp.233-246, emphasis added.

³⁹⁹ Ibid.

⁴⁰⁰ HPA, SZ001-8-579-2, emphasis added.

引人注目的是，当一个职代会将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并对未能解决这些问题感到沮丧时，该党委却认为这是一个需要紧急干预的危机。对于该党委来说，职代会的实际工作与其所谓的“积极作用”相矛盾。

甚至在工会干部起草的一些文件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思维方式。在武汉钣金厂，第一次职代会上收集到的工人提案，绝大多数都是民生福利问题。据该厂工会的报告，这反映出职工代表对职代会的性质和宗旨“认识不清”，需要工会进行政治教育⁴⁰¹！为此，一些干部甚至质疑工厂民主是否可取。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书记王子明称：

“一些干部认为，工人的觉悟还不够高，不能把企业的命运放在第一位，不能把生产中遇到的紧急问题放在第一位。还有一些干部甚至认为，工人民主的条件还不成熟，需要经过一段‘训政’⁴⁰²时期。”⁴⁰³

不过，也有不少报道指出，职代会能够超越对民生福利问题的狭隘关注。武汉市轻工业一局党委报告称，在最近在木制容器厂召开的两次职代会会议上，“有关生产问题的建议多于有关民生问题的建议，表明职工代表正确理解了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⁴⁰⁴。湖北省基本建设委员会报告称，“（工人）仍然主要关心企业的生产和大局问题。在我们调查的企业中，职代会关于改善企业管理和发展生产的建议约占全部提案的50%，有关民生福利的建议约占20%”⁴⁰⁵。湖北省总工会副主席姜长元告诉我们，“1978年底至1979年初，全省681家企业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提出建议2.2万余件，其中有关完成生产计划、进一步发挥生产潜力、技术改造、改善管理的建议占60%，有关生活福利的建议仅占19%。”……这表明工人觉悟较高，能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⁴⁰⁶

这些材料中叙述的内容可能是准确的，也可能不是。在某些企业、某些地方和某些工业部门，职代会确实主要关注与进一步发展生产有关的问题，也可能不是。然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些官方报告所采用的规范框架，它对职代会和工人作出了政治判断：关注生产相关问题的工人和职工代表是“正确的”，有远见的（能够思考“大局”），具有“先进的意识”；相反，那些关注民生和福利问题的人要么自私，要么政治上糊涂落后。这些报告虽然挑战了工人只能关注民生问

⁴⁰¹ MAW, XX000091-WS04-67-16.

⁴⁰² 在中文中，“训政”一词与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的独裁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国民党宣传的政治话语中，党应该为人民提供政治训政，以培养人民在未来行使民主权力的能力。

⁴⁰³ 上海市档案馆，C1-3-337-56，《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党委书记王子明发言》。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C1-3-337-56, “Speech by Wang Ziming, the Party Secretary of Shanghai’s Bureau of Textile Industry” .

⁴⁰⁴ MAW, XX000091-WS04-6-3, emphasis added.

⁴⁰⁵ 湖北省档案馆，SZ001-8-577-4，湖北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坚定不移地实行职代会制度》——省委工业工作会议发言材料之十四，1981年9月5日。Hubei Provincial Archive (HPA), SZ001-8-577-4, The Infrastructural Construction Commission of Hubei Province, “Firmly and Decidedly Implementing the SWC System” ——Speech Material No.14 for the Provincial Industrial Work Conference, September 5, 1981, emphasis added.

⁴⁰⁶ 湖北省档案馆，SZ001-8-577-3，《湖北省总工会副主席江长源在省委工业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81年9月8日。Hubei Provincial Archive (HPA), SZ001-8-577-3, “Speech by Jiang Changyuan, Vice President of the Hubei Provinci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at the Provincial Industrial Work Conference” , September 8, 1981, emphasis added.

题的印象,但强化了一种居高临下的观念,即民生和福利问题不如生产相关问题,那些倾向于主要关心前者的工人需要政治教育来提高他们的意识水平。

事实上,有报道称,一些企业领导人强行干预,把职代会的议程从所谓的“生活福利问题”转向真正的“生产相关问题”。一份关于大连市副食品公司职代会运作情况的报告揭示了以下情况:1979年职代会第一次召开时,职工代表的大部分提案都集中在与工人工作和生活条件直接相关的问题上,如住房、长时间工作、通勤和工人子女的就业机会等;然而,企业领导设定的职代会第一次会议的议程并不是工人强烈关注的任何这些问题;相反,强加的议程优先考虑了如何通过提高绩效和节俭来实现公司的营销计划的问题⁴⁰⁷。北京特种钢厂党委报告称,1981年7月召开的职代会会议最初计划重点讨论住房问题。但是,由于党委认为完成利润配额是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因此,它说服职工代表将住房问题放在一边,将会议的重点放在利润配额的分解和分配上⁴⁰⁸。

有趣的是,上述报道将这些事件描述为积极的成就,表明党委领导有方,工人自觉性高。但实际上,这种不民主的强加似乎更有可能严重损害工人与职代会的互动。例如,上海针织工业公司党委承认,企业领导层认为职工代表们只能抱怨民生问题,并指责职工代表“只为更多的福利而战,不关心生产”。因此,党委规定,职工代表的分组讨论应首先深入生产,只有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才涉及民生问题。这严重制约了职工代表的讨论内容。正如党委所观察到的,结果就是许多职工代表对职代会程序失去了兴趣,很少做出有意义的干预⁴⁰⁹。

这种动态揭示了这一时期工作场所民主实践交织在一起的结构性紧张局势。一方面,如上所分析的,中国政治经济的变化确实为职工代表大会解决工人所关心的议题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无论在物质资源上还是在话语论证上。另一方面,许多党和国家干部和企业领导人所表现出的根深蒂固的生产主义偏见制约了这种基层民主的发挥。这些基层干部和领导人将职工代表大会的权力运作理解为“生产”问题与“民生福利”问题的鲜明二元对立:关注前者体现了工人的先进意识和正确认识,而关注后者是不可避免的,但却是他们短视和落后意识的表现,

⁴⁰⁷ 《大连市副食品公司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的调查》,载于《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有关文件汇编》,pp.316-325。“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WC System in Dalian City’s Non-Staple Food Company”, in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Relevant to the Nationwid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 pp.316-325.

⁴⁰⁸ 《全总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报送北京建材局〈民主选举厂长中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和北京特殊钢厂〈真心实意地支持职工当家作主〉的两篇材料》,1982年1月20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82)》第47-58页。“Submission of Two Materials – ‘Several Issues to be Handled with Care in the Democratic Elections of Factory Directors’ by Beijing’s Bureau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 and ‘Truly Supporting Workers to Be Masters’ by the Beijing Special Steel Factory – by the ACFTU Party Committee to the Party’s Central Secretariat”, January 20, 1982,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2)*, pp.47-58.

⁴⁰⁹ 上海市档案馆, B200-4-466-26,《在整顿企业中加强企业的民主管理、进一步发挥职代会作用——中共上海市针织工业公司委员会在行业整顿企业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1981年11月。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B200-4-466-26, “Strengthening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Further Promoting the SWC’s Role Amidst the Enterprise Rectification – Speech by the Party Committee of the Shanghai Company of Knitting Industry at the Symposium to Exchange Experiences with Enterprise Rectification within the Industry”, November 1981.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换言之，虽然职代会确实被赋予了一些自由，以解决工人对“生计和福利”问题的担忧，但这往往被视为一种必要但并非最佳的做法，需要暂时忍受并逐步克服。对于这些干部领导来说，更重要的是，工人对“民生福祉”问题的关心，需要自上而下的政治教育、说服和引导。这种监护本应帮助工人最终发展出先进的意识，并学会如何根据他们所谓的长期、根本利益“正确地”行使民主。简而言之，生产主义偏见实际上具有反民主的含义。这种偏见在结构上等同于一种理解（1983年开始在中国最高决策层获得支持），这种理解将工人的物质需求——以及对工人需求和工厂民主缺乏约束——确定为党国持续财政危机的关键因素。这种认识的兴起，以及它如何有力地促使 1984 年的政策转向反对推进工作场所民主，是下一章要讲述的故事。

第四章 1984 年的反民主转折：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危机和剥夺工人权力的霸权主义策略

1981 年“小规模消极革命”之后，部分民主开放仅持续了三年。1984 年，党的领导层宣布了一项政策，用“厂长负责制”取代此前在国有企业中坚持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度”，不附加任何条款。换句话说，从现在开始，厂长将能够在没有其他企业级实体的领导下行使管理权。这种以牺牲企业党委和职工代表大会权力为代价的“厂长负责”改革举措导致了管理层专制，大大削弱了工作场所民主。这是现有文献已经广泛记录的。本章的史学介入重点是推出厂长负责制背后的反民主意图。它记录了政策制定者如何将推出厂长负责制的必要性与在内部讨论如何设计和实施厂长负责制时对工作场所民主施加明确限制的渴望联系起来。

更有趣和更令人费解的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 1981 年认为部分民主化中国国有企业是防止波兰式劳工起义的必要让步（见第二章），而三年后突然变得无法容忍？本章追溯了 1984 年反民主的转变，以及困扰党国的持续财政危机。当财政危机在 1970 年代末首次出现时，党国试图通过缩减生产和基础设施投资支出来平衡预算。但这些支出方面的措施未能缓解财政危机。1983 年，问题的核心已经从过度支出转向收入不足。寻找财政危机收入方面的解决方案的迫切性促使主要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优先考虑限制工人的“消费基金”（工资、奖金和集体福利基金）。这需要限制工人的物质需求和车间民主权力。政策制定者在推出厂长负责制之前，这些论点占据了突出地位。在 1984 年中期推出厂长负责制之后，一波意想不到的奖金上涨潮让负责管理经济的中国总理赵紫阳加倍指责工作场所民主。赵强调必须让厂长免受工人的影响。这些政策行动和声明都受到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看到的“生产主义偏见”的支撑。我将这些发现与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 Connor）的经典著作《国家财政危机》⁴¹⁰进行了对比，以阐明中国社会主义政体的几个结构特征。

这一政策事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工厂厂长的现场选举在厂长负责制推出的同时获得了一些继续进行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主流政策制定者明确表达了反对这些选举的负面情绪，但情况仍然如此。本章表明，全总的倡导在“挽救”工厂厂长的现场选举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它这样做是将这些选举重新定义为服务于厂长负责制推出的霸权工具：全总领导人动员起来的话语强调工厂厂长的现场选举如何有助于选出真正有能力的人员成为厂长，并赢得工人的支持，巩固他们手中的管理权。一方面，这种论述掏空了这些选举的民主实质，并使作为一项政策关注点的职场民主本身进一步边缘化。另一方面，这种话语策略以某种方式成功地打动了更占主导地位的政策制定者，这一事实表明，中国党国仍然倾向于采用霸权方式进行企业改革，而不是专制方式。即使在试图剥夺工人权力时，政策制定者也发现，争取工人同意剥夺自身的权力是有价值的。

本章分为五节。第一节概述厂长负责制的产生和推行的时间线。它还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来证明这一政策转变背后党的领导层和决策者的反民主意图。第二节随后记录了中国持续的财政危机性质的变化如何导致决策者在 1983 年强调限制

⁴¹⁰ James O’ Connor,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Routledge, 1974.

工人的消费基金。这种考虑对那些负责研究如何设计和实施厂长负责制的政策制定者产生了具体的影响。此节进一步分析了政策制定者将财政危机归咎于工人收入和影响的原因：中国公有制的特殊性质提供了客观可能性；长期存在的生产主义偏见导致政策制定者不再优先考虑解决人口的长期消费需求；积累和合法性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了一种结构性困境，必须做出权衡。第三部分则揭示了 1984 年中期实行厂长负责制后的企业突然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奖金发放混乱，这让赵紫阳深感担忧。赵紫阳再次将负面经济后果归咎于职场民主。

第四部分随后将注意力转向全总如何在强大的政治反对下倡导“挽救”了工厂厂长的选举，使其免于被禁止。它使用的话语策略使这些选举成为霸权方法的核心组成部分，以使厂长负责制合法化并动员工人同意剥夺自身的权力。此类选举继续作为企业向厂长负责制过渡的准备步骤举行，但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向厂长负责制的过渡后失去了意义。第五部分讲述了武汉工厂厂长的选举故事。选举程序自上而下被精心操纵，营造出民主和民意的假象，然而，它却鼓舞了一些工人，使他们后来抵制厂长的专制权力。换句话说，剥夺工人权力的霸权方法适得其反。此类事件暴露了市场社会主义时代中国党国与城市产业工人关系的困境。

厂长负责制的反民主转变

1983 年 12 月，党的领导层果断地倾向于采用厂长负责制作为企业管理的理想模式。国务院经济委员会的袁宝华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一决定性的时刻：“1983 年 12 月，彭真向我们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要解决‘厂长负责制’的问题。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彭还告诉我们）“邓小平曾与胡耀邦、万里等高层领导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都同意这一点”⁴¹¹。尽管该资料没有列出赵紫阳也参与了与邓小平的讨论，但赵紫阳作为中国经济政策实际问题的主要监督者，很可能也参与了邓小平的讨论并认同其结论。

彭真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主管中国的立法事务，这一点已在第二章⁴¹²中提到过。他集中参与了厂长负责制的审议和随后的设计，因为他当时的核心任务之一是监督起草一部关于中国国有企业管理的立法，俗称“企业法”或“工厂法”。在了解到党的领导层对厂长负责制的共识后，彭真提议组织一个由核心经济和立法政策制定者组成的代表团前往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行调研，收集有关如何设计厂长负责制的意见。代表团由彭真率团出访，袁宝华和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主任顾明负责具体安排。代表团于 1984 年 2 月出发，历时 19 天，2 月 7 日至 18 日在杭州，19 日至 25 日转赴上海。其主要调研活动是一系列“公开座谈会”，邀请地方官员、厂长、企业党委书记和地方工会支部主席发表意见。总共有 12 名地方官员和 56 名厂长、企业党委书记和地方工会支部主席接受了咨询⁴¹³。

考察结束后，彭真向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党内其他领导人提交了一份报告。彭真在报告中总结了公开座谈会上与会人员的意

⁴¹¹ The Memoir of Yuan Baohua, p.394. Also see Chronology of Peng Zhen, p.228.

⁴¹² 1983 年 6 月，彭真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升任委员长。这一头衔的改变对他的实际职权影响不大，因为前任委员长叶剑英主要扮演的是礼仪性的角色。

⁴¹³ 王梦奎，《回忆随彭真同志对国企的一次调研》，载于《北京日报》，2012 年 7 月 9 日。Wang Mengkui, “Remembrance of a Research Experience Led by Peng Zhen on State-Managed Enterprises”, Beijing Daily, July 9, 2012.

见，以及他在公开座谈会和代表团内部讨论中表达的意见。邓小平对此予以肯定⁴¹⁴。中央书记处也在3月底召开会议，听取袁宝华关于代表团活动的报告和关于如何推行厂长负责制的建议。根据这些报告，党中央和国务院于1984年5月18日联合发布正式通知，要求改革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管理制度。该通知规定在大连、常州所有国有工业企业⁴¹⁵以及北京、天津、上海和沈阳的部分企业试行厂长负责制。彭真代表团起草的《工厂法》草案附在通知中，旨在作为这些试点的蓝图⁴¹⁶。事实上，试点的实际范围比中央领导规定的范围要大得多，因为中央领导将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作为一项普遍政策的决心已经非常明确。1984年中期，中国几乎所有主要工业城市都在大量企业中推行了厂长负责制。到1985年底，全国范围内向厂长负责制的过渡已基本完成，绝大多数中国公有工业企业都转入了该制度。

向厂长负责制的过渡标志着中国国营企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终结，而这正是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的著名讲话中所呼吁的。回想一下，邓小平1980年提出的以什么来取代党委在企业中的最高权力的提法是模棱两可的，这让赵紫阳得以启动“让职代会负责”的试验（见第一章）。1981年中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劳工骚乱浪潮之后，党的领导层坚定地重申了“党委负责”的模式，并搁置了任何重大的企业管理改革（见第二章）。三年后的今天，厂长负责制方案的出台彻底结束了党委对工业企业的统治，将管理权集中在厂长手中⁴¹⁷。管理安排的这种转变改变了中国公有企业的性质，使它们“优先考虑生产和利润，而不是党委负责的政治和社会问题”⁴¹⁸。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遏制党在经济领域的无所不包的干预权力的方式，邓小平在1980年8月的讲话中誓言要根除这种“封建主义遗产”。

从理论上讲，向厂长负责制的过渡似乎只是调整了厂长（以及他们所掌握的行政指挥链）和企业党委之间的权力。然而，学者们已经详细记录了这一政策转变如何最终严重损害了工人在车间的民主和权力。例如，杰基·希恩（Jackie Sheehan）引用了全总官方喉舌《工人日报》在1989年的哀叹，在厂长负责制推出后，“在实践中，厂长的全能作用被过分强调，而民主管理却被允许萎缩”⁴¹⁹。陈佩华（Anita Chan）认为，厂长负责制既促使厂长采取“加强劳动纪律、施加重罚、提高生产标准和重组奖励制度”等专制措施，也迫使他们采取这些措施来提高生产率⁴²⁰。根据口述历史访谈，安舟（Joel Andreas）亦得出结论：“许多曾经被剥夺自由的工人和干部把改革初期描绘成职代会的鼎盛时期，并将其随后的衰落归咎于厂长负责制方案的实施”⁴²¹。厂长的管理权力不仅对党委，而且对工

⁴¹⁴ Chronology of Peng Zhen, pp.244-245.

⁴¹⁵ 回想一下，“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国有企业”这两个词组在官方政策话语和口语中可以互换使用。

⁴¹⁶ Wang Mengkui, “Remembrance of a Research Experience Led by Peng Zhen on State-Managed Enterprises.”

⁴¹⁷ Heath B. Chamberlain, 1987, “Party-Management Relations in Chinese Industries: Some Political Dimensions of Economic Reform,” *The China Quarterly* 112: 631-61.

⁴¹⁸ Joel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p.185.

⁴¹⁹ Jackie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p.201.

⁴²⁰ Anita Chan, 1993, “Revolution or Corporatism? Workers and Trade Unions in Post-Mao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9:31-61.

⁴²¹ Joel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p.187.

人和职代会都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一些学者甚至将向厂长负责制方案的过渡描述为回归一人管理⁴²²。

我还将在下一章中记录厂长负责制对车间的反民主效果（以及意想不到的宏观经济后果）。但在本章中，我认为 1984 年向厂长负责制的过渡不仅由于其效果而且由于其政策意图而构成了反民主的转变。换句话说，我在这里表明，转向厂长负责制的部分动机是政策制定者希望对工作场所民主施加明确的限制。在 1984 年 5 月正式宣布厂长负责制之前，他们的内部审议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一论证是对厂长负责制史学的干预，劳工学者普遍认为厂长负责制是 1980 年代中国在劳资关系领域最重要的政策改革之一。

最早表明转向厂长负责制背后有反民主意图的言论之一是彭真在 1984 年 1 月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说的。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彭真提议召集前述调研代表团。他说：

“有人提出‘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但这个建议又引出一个问题：职代会对谁负责？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不同。集体企业中，职代会选举厂长是可以的。但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不是工人所有制，因此厂长只能由国家任命并对国家负责。”（彭进一步说）他最近与北京一些工厂的厂长进行了交谈，这些工厂已经用民主选举取代了自上而下的任命，这些厂长抱怨说，他们必须听取工人和国家部委的意见，他们谁都惹不起。如果他们惹恼了工人，他们就得担心选票。他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⁴²³

彭的讲话中有两点引人注目。首先，彭明确质疑“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观点，指出党和国家机构能够或应该对职代会问责的模糊性。其次，彭还明确反对工人选举厂长。这与 1981 年党的领导人热情支持这些选举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见第二章）。彭反对选举的论点是基于对名义上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全民所有制”（即国有企业）企业之间的区分。他认为，由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不属于工人所有，工人选举厂长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逻辑依据。因此，国家应该拥有全部权力。有趣的是，这一论点与赵紫阳在 1980 年所主张的截然相反：全民所有制不应该变成事实上的国有制，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否具有高度的工人民主（见第一章）。彭真进一步指出，对于民选厂长来说，“既要听工人的意见，又要听国家部委的意见”是一个难题。他认为，“工人”和“国家部委”对工厂管理层的压力往往是相反的，厂长必须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的体制是不可行的。

1984 年 2 月代表团考察时，彭真更加明确地反对“由职代会负责”的模式。他的讲话摘要如下：

“近年来，一些企业（多为中小企业）试行了‘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对探索工人参与民主管理、监督企业领导有好处，但也有问题。国有企业需要监督机关，如果职代会负责工厂的重大决策，那又由什么机关来监督？如果职代会负责监督，又怎么制定和下达生产计划、分配资金和物资，决定企业的重大经

⁴²² Jeanne Wils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rade Unions in Communist States*, edited by Alex Pravda and Blair Ruble, Allen and Unwin, 1986, p.233.

⁴²³ The Memoir of Yuan Baohua, pp.394-395.

营决策？如果国务院作为监督机关，那么各级职代会不是就变成国务院的下属机构，把有关政府部门的职责搞乱了吗？所以，实践证明，这种体制行不通。”⁴²⁴

尽管“职代会负责”模式早在1981年中期就被悄悄抛弃，但直到现在，反对的声音才变得如此清晰和强烈。与一个月前他私下说的一致，彭的反对理由是职代会负责制在组织上与党国的计划机构不相容。他认为，让任何党国机构监督职代会作为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在组织上是没有意义的。换句话说，没有办法将权力大幅增长的职代会纳入党国的行政指挥链。

不出所料，彭真的观点成为了代表团的多数意见。袁宝华向中央书记处作了上述关于代表团活动和建议的报告，其中就反映了彭真的看法。报告指出：

“同志们绝大多数反对‘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这种制度）既违背了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又难以对生产经营中的重大问题作出正确决策。”⁴²⁵

换句话说，根据这份报告，这些“同志们”不仅加倍强调工人自治与全民所有制原则相抵触，而且还质疑职工代表大会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关于厂长的选举，报告继续说道：

“大多数同志不赞成选举国营企业厂长，主要原因是国营企业厂长是代表国家，由上级国家机关任命，对上级国家机关负责。而选举产生的厂长，往往片面强调企业的部分利益，只对工人负责。过分好（老好人）的人容易当选。”此外，在大型企业中，工人太多，彼此不认识，这让他们很难以知情的方式进行投票。”⁴²⁶

所有这些反民主论点的支撑点是应该把“全民所有制”理解为国有制，而这种所有制下的厂长只能作为国家的代表。这与赵紫阳四年前的论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论述也对党国与工人的关系持一种相当对立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代表“全民”普遍利益的国家与工人“部分”利益存在结构性冲突。因此，必须使厂长摆脱“既要听工人的，又要听国家的”“进退维谷”的困境。只有这样，厂长才能有效地发挥国家代表的作用，避免“片面强调企业部分利益，只对工人负责”的压力。这种推理的逻辑结论是，必须限制工人在车间的权力。1984年，赵紫阳本人也接受了这种推理。例如，赵紫阳在5月4日听取企业改革汇报时，就断言“（南斯拉夫）强调工人自我管理，这是我们不能采取的”，⁴²⁷这与以前的他截然相反。

这种反民主情绪反映在彭真所率代表团起草的《工厂法》草案中，该草案随后由党和国家领导层散发，以指导1984年5月的民主改革。与1981年中期颁布

⁴²⁴ 《关于草拟国营工厂法的问题》，见于《彭真文选》第498页。“On Drafting the State-Managed Factory Law”，in Selected Writings of Peng Zhen, p.498.

⁴²⁵ 《关于国营工业企业法调查情况的汇报提纲》，1984年3月15日，见于《袁宝华文集第二卷》第438-439页。“Outline of the Report on the Research for the State-Managed Industrial Enterprise Law”，March 15, 1984,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Yuan Baohua Volume 2, pp.438-439.

⁴²⁶ Ibid.

⁴²⁷ 赵紫阳，《深化改革 搞活企业》，《赵紫阳文集》第二卷，第376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Zhao Ziyang, “Deepening Reform and Invigorating Enterprises”，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Zhao Ziyang Volume 2, p.376,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的《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规定》（见第二章）相比，该《工厂法》草案中定义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和权限的条款不再包含“职工代表大会是工人参与决策和监督的权力机关”的表述。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职代会的权力从五项减少到四项，选举权被从法律草案中剔除⁴²⁸。这些变化与彭真及其代表团已经提出的反对扩大职代会权力和反对厂长选举的论点一致。

尽管决策者在私下内部讨论中明确表达了反民主情绪，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在公开场合如此蔑视工作场所民主。例如，彭真公开将他提出的厂长负责制方案框架总结为企业管理中的“三个加强”：加强厂长的作用、加强党委的作用、加强职代会和工会支部的作用⁴²⁹。这肯定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提法，因为很难想象这三个机构的作用如何能够同时得到加强。起草的《工厂法》根本没有加强职代会的作用。赵紫阳也公开强调在实施厂长负责制的同时保障一定程度的工作场所民主的重要性。在上述5月4日的场合，他表示：

“毕竟，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否则，把所有权力集中在厂长一个人身上会产生问题……（民主管理）应该与厂长负责制一起考虑。”⁴³⁰

6月，赵对袁宝华提交的企业改革报告作出如下评论：“我最关心的是厂长负责制以及怎么解决工人的主人翁地位问题。所以，做研究要重视这个问题。全总要多多参与这方面的研究。”⁴³¹

总而言之，一方面是私下讨论中表达的反民主情绪和政策设计的实质，另一方面是强调需要为工作场所民主开辟一些空间的公开声明，二者之间存在割裂。这一割裂表明，党国仍然受到它声称维护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制约。公开全盘否定企业民主在意识形态上是禁区。同时，这一割裂也可能表明，一些政客真的希望在企业改革中采取霸权主义的做法：“霸权主义”的意思是，在企业改革中，这些政策制定者通过公开支持工作场所民主的持续相关性，试图说服城市工人接受这一巩固管理权力的改革计划，并动员工人同意剥夺自身的权力。正如我们将在本章稍后看到的那样，这种对霸权战略的偏好影响了1984年和1985年关于厂长负责制政策框架的持续争论。特别是，它使全总能够在面对更强大的政治参与者的明确反对时捍卫厂长的车间选举。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随着政策制定者开始考虑如何启动厂长负责制，

⁴²⁸ 《国营工业企业法（草稿）》，1984年4月18日，载于《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下）》第1520-1530页。“The State-Managed Industrial Enterprise Law (Draft)”，April 18, 1984, in Selected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about the Workers' Movement Issued by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Second Volume), pp. 1520-1530. 该资料称该法律草案的正式颁布日期为1984年4月18日。这似乎是一个错误。正确的日期应为1984年5月18日。

⁴²⁹ 有林，《〈国企改革指导意见〉抛弃了赵紫阳的错误主张》，2015年9月29日，载于“红色文化网”。You Lin, “Suggestions on the Reform of State Enterprises Abandoned Zhao Ziyang's Wrong Platform”, September 29, 2015, published on Red Culture Website.

⁴³⁰ Zhao Ziyang, “Deepening Reform and Invigorating Enterprises”.

⁴³¹ 《尉健行在全总十届三次主席团会议结束时的讲话》，1984年6月28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84）》第160-176页。“Wei Jianxing's Speech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Third Meeting of the Presidium of the Tenth ACFTU Congress”，June 28, 1984,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4), pp.160-176.

他们的审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工作场所民主的冲动的影 响。然而，“为什么”这个问题令人费解。为什么这些政策制定者在这个时候开始强烈表达反对工作场所民主？为什么几年前党的领导层公开支持的（如厂长现场选举）或悄悄搁置的（如南斯拉夫式的“由职代会负责”的建议）推进企业管理中工人民主的政策建议，突然遭到相当猛烈的攻击？1984年初，中国核心决策圈中出现了这些明显而又直言不讳的反民主情绪，这令人震惊。是什么导致主流政策情绪发生如此迅速和截然相反的转变？

归咎于工人的社会主义国家财政危机

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一系列因素，中国遭遇了严重的财政危机。1977年和1979-1980年，工业部门重新引入工人奖金，大规模提高工资（见第三章），这意味着企业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本可以落入国家腰包，但却被国家放弃了。自1977年以来，中国政府还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以提高农民收入），但没有相应提高城市地区的农产品销售价格。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方法是将国家预算的很大一部分用于价格补贴。改革努力使国营企业从党和国家手中获得更多自主权，从而使这些企业能够保留部分利润（另见第三章）。这也构成了将本来属于国家的收入有意“转移”到企业手中⁴³²。所有这些政策措施都减少了党和国家的收入或增加了支出。但最致命的打击是1977年和1978年从资本主义西方进口外国技术和设备的随意、过度狂热和考虑不周的浪潮。1977年7月，国务院计划委员会提出了一项计划，将此类进口的目标设定为65亿美元。在党的最高领导人雄心勃勃的热情（尤其是邓小平的热情）的压力下，目标在11月提高到150亿美元，1978年3月提高到180亿美元，最终提高到800亿美元⁴³³。这些不计后果的进口大部分未能产生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也没有大幅增加中国的石油产量，而这本是党和国家所希望的。出口来支付进口费用，结果却是无法实现。

到1979年，党国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境。1977年，中国财政盈余为31亿元人民币，1978年，盈余降至7亿元人民币，预计1979年中国政府将面临170亿元的财政赤字⁴³⁴。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再加上对中国经济决策拥有巨大权力的“老革命”陈云的压力，党和国家于1979年开始实施调整政策，力图遏制国家对基础设施项目、技术升级和生产能力扩张的过度投资。然而，这些政策遭到了中央政府部门以及省级和地方政府的抵制⁴³⁵。对财政赤字和波兰政治危机愈发忧虑，陈云在1980年底坚决有力地推行了一项更为全面和严格的经济紧缩计划，这在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成为中国的官方政策（第二章简要提到过）⁴³⁶。这项紧缩计划通过缩减国家对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的投资，加倍削减财政支出。在1980年12月的会议上，赵紫阳宣布，预计明年整体财政支

⁴³² Susan Shirk, *The Politic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Chapter 10.

⁴³³ 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 "China's New Economic Policy under Hua Guofeng."

⁴³⁴ 河北省档案馆, 940-13-301, 国家计委《1979年国家预算收支指标》, 1979年5月15日, 引自蒋华杰《制度镜像》。 Hebei Provincial Archive, 940-13-301, The State Council's Planning Commission, "State Budgetary Revenue and Spending Targets of 1979", May 15, 1979, cited in Jiang Huajie, "Institutional Mirror".

⁴³⁵ 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 "China's New Economic Policy under Hua Guofeng."

⁴³⁶ 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 2013, "China's Economic Reorientation After the Third Plenum: Conflict Surrounding 'Chen Yun's' Readjustment Program, 1979-80," *The China Journal* 70(1): 163-187.

出将减少 140 亿元人民币，其中约一半将通过缩减基础设施投资来实现⁴³⁷。

然而，到了 1983 年，中国的经济决策者意识到，两年的严厉紧缩政策未能治愈党国财政弊病。更令人震惊的是，尽管迄今为止的调整努力都集中在抑制支出，但现在看来，收入的持续下降才是党国持续赤字的根源。尽管实施了严厉的紧缩政策，财政赤字依然存在，问题从支出方面转移到了收入方面，这让经济决策者们产生了一种危机感和绝望感。1983 年 3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会上，赵紫阳指出了两大严重问题，即财政收入严重不足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前些年，财政收入通常占国民总收入的 30% 以上，现在只占 25% 左右⁴³⁸。第二，“在财政收入总量中，中央和地方的平衡要改变。现在中央的收入太少”⁴³⁹。赵紫阳警告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国家的政治团结就会受到影响，就像南斯拉夫发生的情况一样”⁴⁴⁰。这些言论传达了增加党国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的——的强烈愿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几年前，在赵紫阳和其他许多人看来，南斯拉夫是民主社会主义、经济活力和真正公有制的鼓舞人心的典范，而现在，在 1983 年，赵紫阳援引南斯拉夫的例子主要是为了说明财政恶化导致国家走向政治崩溃边缘的惨痛教训。

1983 年全年，党的高层领导人和经济政策制定者继续表现出对财政收入不足问题的担忧。在高层的经济政策会议上，这个问题被反复、疯狂地讨论。大量的统计数据被用来描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1983 年 3 月 30 日，赵紫阳与七省的政治领导人分享了“去年，农业和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7% 以上，而财政收入只增长了 1% 多”⁴⁴¹。同年 5 月，赵紫阳在中共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计划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了以下数字：“1979 年至 1982 年，国民总收入增长了 1200 多亿……但国家的财政收入却减少了 80 亿元。财政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率由 1978 年的 37.5% 下降到 1982 年的 25.5%”⁴⁴²。会议的结论是，这一比率应该提高到 28% 到 30% 之间。1983 年 9 月，在党的财政和经济领导小组的另一次会议上，计划委员会预计 1983 年财政赤字将达到 60-80 亿元，这主要是由于收入方面的问题⁴⁴³。在整个审议过程中，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来解决党国预算赤字成为当务之急。正如赵紫阳在 3 月 15 日所说的那样，“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陈云和李先念等政界重量级人物对此表示赞同⁴⁴⁴。

在决策者的诊断中，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关键步骤是控制他们所谓的“消费基金”，特别是工人的工资、奖金和用于集体福利的资金。毕竟，国营企业的利润留作这些用途（而不是上交国家）构成了国家的收入损失。早在 3 月 15 日，赵紫阳就抱怨说：“企业的管理和绩效没有太大改善，奖金等东西却迅速增加，

⁴³⁷ 赵紫阳，《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几个问题》，《赵紫阳文集》第一卷，第 132 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Zhao Ziyang, "Several Issues on the Readjust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Zhao Ziyang Volume 1*, p.132,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⁴³⁸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3), p.61.

⁴³⁹ *Ibid.*

⁴⁴⁰ *Ibid.*

⁴⁴¹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3), p.69.

⁴⁴²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3), p.89.

⁴⁴³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3), p.116.

⁴⁴⁴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3), p.61.

而财政收入几乎没有增长”⁴⁴⁵。赵紫阳担心国营企业没有创造更多的总利润，却被允许保留更大比例的利润来支付工人的奖金。半个月后，赵紫阳再次警告说：“1月和2月的财政状况不好，工资和奖金增长了。国家从经济蛋糕中分得的份额很小，企业获得的份额中等，个体劳动者获得的份额最大，怎么能这样呢！……工资奖金增加了几十亿，财政收入却没有增加，这样能行吗？”⁴⁴⁶

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是，赵紫阳在后来的讲话中明确讨论了约束工人的难度与财政危机的严重性有关。正如他所说，

“与农业不同，工业企业要在大锅饭的背景下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大锅饭不可能完全取消。在我们国家，奖励勤劳很容易（勤劳可以伪装），惩罚懒惰则要困难得多。毕竟，我们不能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把工人逼到绝望的地步，让他们想自杀。纪律的难度与奖励的难度（奖惩反抗）相比，是一个问题。我们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表现不好的人继续吃大锅饭，而表现好的人则吃一个单独的、更好的小锅饭。这将是难以处理的。目前，企业总储蓄为700亿元，但国家的财政状况仍然困难。”⁴⁴⁷

赵在这里提出的“大锅饭”形象指的是国营企业的一种分配安排，即工人无论生产绩效如何，都能享受有保障的收入水平。这至少部分是由于工人在行使民主决策时表现出强烈的平等主义精神。正如第三章以及谢淑丽同期的采访⁴⁴⁸所记录的那样，当工人被赋予决定如何分配奖金的权力时，他们表现出明显的平等主义倾向，将收入与绩效指标脱钩。

根据赵紫阳的这些言论，虽然用额外奖金奖励勤奋的工人相对容易（尽管赵紫阳哀叹“勤奋是可以伪装的”），从而形成一个单独的、优越的“小锅”，但通过减少他们的保障收入来惩罚表现不佳的工人却很难甚至不可能。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把工人逼到绝望的状态，让他们想要自杀”。在这里，赵紫阳发现了某种结构性力量——工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享有的权利，并认为这在经济上是有害的。这种结构性权力来自多种因素的结合：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剥夺工人的基本生活水平（无论工人的生产绩效如何）的规范期望、工人对平等主义文化的坚持以及他们的车间民主权力。从赵在1983年的角度来看，这种权力不仅难以从经济上激励努力工作，而且还给企业将奖金总额（以及留存利润总额）保持在较低水平带来了巨大挑战。工人的权力削弱了国家的财政能力。事实上，赵的结论是“上述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公共财政和企业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无论我们进行什么改革，都必须增加财政收入；否则，改革就不可持续”⁴⁴⁹。

几个月后，在1983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赵紫阳再次以国家财政危机为中心，给出了如下的诊断和药方：

“要坚决制止和纠正奖金补贴乱发放现象。今年前五个月，国有民用工业产值增长6%，实现利润下降2.2%，上缴国家的利润下降9.9%，而工人奖金支出却

⁴⁴⁵ Ibid.

⁴⁴⁶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3), p.69.

⁴⁴⁷ Ibid.

⁴⁴⁸ Susan Shirk, “Recent Chinese Labour Polic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

⁴⁴⁹ Ibid.

增长 17.2%! 如果这种局面得不到扭转, 不仅今年财政收入目标无法完成, 而且消费基金增长也将失控, 给市场供应和物价稳定带来挑战。”⁴⁵⁰

几句话之后, 赵再次提到南斯拉夫——没有直接提到该国——警告与会者消费基金失控的危险。反复提到南斯拉夫作为负面参照点, 意义重大。虽然赵紫阳从未明确指出南斯拉夫经济困境的根源在于工人民主过度, 但毕竟南斯拉夫模式在中国被广泛理解为工人自治的典范 (赵紫阳本人对此非常熟悉)。以南斯拉夫为特征的反复警告肯定导致了人们对工人权力的隐含恐惧, 认为这是一个主要威胁, 会使消费基金膨胀, 损害党国的财政健康。

随后, 在上述 9 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 计委除了令人震惊地预测 1983 年财政赤字将达到 60-80 亿元外, 还做出了如下诊断: “财政赤字的形成有多种原因, 但主要原因是对消费资金的增长缺乏有效的控制, 因为工人奖金补贴和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⁴⁵¹ 尽管这份报告指出工人和农民的收入都在蚕食财政收入, 但赵紫阳在其他地方坚持认为必须对农民收入增长采取 “谨慎” 的态度⁴⁵²。因此, 工人成为约束的主要对象, 以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 1983 年中国的经济决策者认为, 党国和工人在如何分配国民收入方面进行了一场零和博弈: 工人的收入增长是以牺牲财政收入为代价的。换句话说, 由于党国的财政状况未能改善, 决策者最终表达了一种理解, 即党国和城市工人代表着直接参与分配冲突的对立利益。尽管上述对决策者的看法和情绪的分析主要借鉴了赵紫阳的言论, 但这种理解绝不局限于他本人。在党的高层决策圈内, 这种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1983 年, 邓小平和陈云等重量级政治人物也阐述了党国与工人 (其次是农民) 之间的分配冲突, 以及迫切需要限制工人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⁴⁵³。赵的发言之所以被选为分析的典范, 正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共同认识的最好的版本。

这种抑制工人收入增长以恢复党国财政健康的冲动, 在那些专门负责为厂长负责制立法的政策制定者的脑海中显得非常强烈。这里有一个宝贵的证据, 即 1984 年 2 月代表团成员王梦奎⁴⁵⁴ 于 2012 年撰写的一篇文章。据王梦奎说, 代表团在杭州逗留期间, 彭真召集主要成员到他的办公室进行了半天的内部讨论。王梦奎回忆说, 这次会议上有两个讨论项目特别令人难忘。第一个是关于南斯拉夫的:

“首先, 在讨论企业改革和所有制问题时, 我们谈到了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和社会所有制体制。尤林⁴⁵⁵介绍了南斯拉夫体制的由来, 我作了补充。接着, 讨论从企业管理转到财政体制, 吴波⁴⁵⁶谈到了国家的财政状况, 财政收入中中央占

⁴⁵⁰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3), p.104.

⁴⁵¹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3), p.116.

⁴⁵²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3), p.96.

⁴⁵³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3), p.94 and p.118.

⁴⁵⁴ 1984 年, 王梦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副组长。早在 1980-1981 年, 他就撰写文章, 倡导 “职代会负责” 的企业管理模式 (第一章曾简要提及)。

⁴⁵⁵ 尤林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是彭真领导下的立法部门的重要决策参与者。

⁴⁵⁶ 吴波曾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具体负责经济立法。作为前财政部部长, 吴波对财政问题尤为敏感。

比下降的问题。彭真说，这个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都要加强积极性，不能出现中央财政能力太弱的情况，南斯拉夫体制太分散，中央财政能力太小，政治权威太小，这是不可持续的。”⁴⁵⁷

当这次谈话中提到南斯拉夫时，有意思的是，讨论的焦点很快就从企业管理问题本身转移到了财政危机上。当时，南斯拉夫“权力下放”体制遭到否定，正是因为人们认为这种体制削弱了党国的财政能力（尤其是在中央层面）。赵紫阳在1983年已经多次阐述了这一论调。现在彭真也附和了这一论调，这表明持续的财政问题导致许多高层政治家对整个南斯拉夫模式产生了怀疑。

王梦奎回忆起的第二个令人难忘的议题甚至更加引人注目：

“另一项是，我们谈到，随着企业经营自主权的逐渐放开，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导致奖金无节制发放，从而造成消费基金的膨胀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彭真回忆了这样一个事件：共产党刚刚占领北京⁴⁵⁸，北京工人自发组织斗争，提出过高的加薪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资本家不了解党的政策，无条件地答应工人的要求，给经济复苏造成了困难。党的领导派我到北京去处理这个问题，我问毛主席该怎么办。毛指示不能轻易答应工人的工资要求。彭真解释说，当时官方的政策是‘劳资两利’，经济还在恢复期，工资福利不能涨太多。”⁴⁵⁹

王惊讶地发现，这则轶事给他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后来多次向别人讲述。当这些政策制定者对工人货币收入（特别是奖金）不受限制的增长表示担忧时，彭真引用了历史上的类比来传达抑制工人物质需求的重要性，这确实令人惊叹！彭真的类比有一个不合时宜的层面。早在1949年，党的官方政策路线是“新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它必须关注私人资本家的需求。但现在到了1984年，工人为国有企业而不是私人资本家工作。尽管两个时代的中国政治经济性质存在巨大差异，但抑制工人收入的共同要求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彭真可以做此类比，亦给王梦奎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两个特别“令人难忘”的讨论项目合在一起表明了两点。首先，党国财政薄弱和工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过大这两个紧密交织的问题，1983年就被赵紫阳等政策制定者密切关注，亦在1984年2月引起了代表团成员的热烈讨论。其次，这些政策问题被表达为一种意识，即工人的要求和权力应该受到制约。这可以从对南斯拉夫模式的负面评价和彭真的历史类比中得到证明。王梦奎的回忆让我们看到，将工人的物质利益视为与党国利益对立（因此需要加以约束）的理解，正在塑造企业管理和工作场所民主的政策方针。

党国政客将财政危机归咎于工人的这一事件值得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它为我们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及其阶级政治提供了一个窗口。在正统的“苏联式”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公共企业被视为国有财产。因此，公营企业在财政上相当于国家机关：其所有收入都上交国家，其支出也由国家提供。这是社会

⁴⁵⁷ Wang Mengkui, “Remembrance of a Research Experience Led by Peng Zhen on State-Managed Enterprises” .

⁴⁵⁸ 1949年共产党占领北京时，这座城市实际上被称为“Peking”。此处我的翻译保留了原文中的技术性错误。

⁴⁵⁹ Wang, “Remembrance of a Research Experience Led by Peng Zhen on State-Managed Enterprises” .

主义国家作为盈余占有者和分配者的经典模式⁴⁶⁰。在这种模式下，工人的工资和其他消费资金在财务会计中要么作为国家支出，要么作为国家放弃的收入。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国营企业的实际所有者）与公共部门工人之间的关系，从国家财政的角度看具有重要意义。工人的物质需求直接影响国家可以占有多少盈余。

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70 年代末的二十年中，这一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全民所有”企业（又称“国营企业”）的管理⁴⁶¹。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让国营企业更加独立于党国的政策驱动力主要集中在利润保留上。企业被允许保留部分利润用于独立支出，通常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工人的奖金和福利需求（如第三章所述）。严格来说，在这项改革方案中，国家不再是唯一的盈余分配者。企业被授权分配部分盈余，通常是在工人的参与和影响下。然而，国有企业可以保留多少利润（即可以独立分配多少盈余）总是必须由企业和党国协商，通常是逐案协商⁴⁶²。企业所保留的任何利润都可以看作甚至被算作国家放弃的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并不是所有剩余的唯一直接分配者，但它仍然是最终的分配者。正是这种特殊的公有制性质及其相关的财务会计模式，使得政治家们客观上能够将党国和工人视为处于一种零和博弈的状态。

然而，客观可能性无法解释为什么在 1983-1984 年，政策制定者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党和国家开始如此坚持抑制工人的消费基金。这里明显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当财政危机在 1979-1981 年首次变得严重时，党和国家继续发放工资和补贴，并扩大企业的利润留存以用于奖金和集体福利。它反而试图通过削减生产和基础设施支出来实现财政平衡。但在 1983-1984 年，重点转向控制工人的消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转变似乎只是“自然而然”的：以前的支出方面的措施未能有效缓解财政赤字，现在的问题似乎更多地是由收入方面驱动的。但与此同时，这种转变还揭示出一种更为根本的“生产主义偏见”，我在上一章重点讨论了这一概念，它被政策制定者内化了。在这种认识下，满足人口的消费和生活需求有时可能是必要的，并暂时被列为优先事项，但这种优先事项不应持续很长时间，因为从长远来看，国民经济的重点最终应放在发展生产上。

赵紫阳在上述 1983 年 3 月 30 日会议讲话中雄辩地阐述了这一认识：

“过去几年，提高工资、发奖金、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改善民生福利，都是必要的，纠正了我们这些方面长期积累的赤字。没有这些，工农联盟就不可能巩固，群众的积极性就不可能调动起来。但也要有个限度。我们国家底子薄，现在还不是讲福利的时候，经济还很落后，很多基础设施要建设。如果不集中资金搞重点基础设施和生产性项目，农民能不能继续致富？企业发了一阵子财，能不能维持下去？当然也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人民的生活水平要逐步提高。但是，如果过分强调这一点，就不适合我们的国情。我认为这是目前的一个突出问题。”

⁴⁶⁰ Stephen Resnick and Richard Wolff, 1994, "Between State and Private Capitalism: What was Soviet 'Socialism'?" *Rethinking Marxism* 7(1): 9-30.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我认为 Resnick 和 Wolff 关于国家作为剩余攫取者的分析很有价值，但我并不认同他们对“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使用。我在引言（第 11-12 页）中简要解释了原因。

⁴⁶¹ 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与中国党政体制之间的财政关系更加复杂多样。其中许多企业类似于国有企业，但也有一些企业则被置于各种混合的财务责任制和自主权制之下。

⁴⁶² 有关这种复杂而临时的谈判是如何进行的，请参阅 Susan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Chapters 10-12.

在同一演讲的后面，他进一步更有力地重申了这些观点：

“要进行重大基础设施和生产性项目建设，在一定时期内，居民消费不能不受影响。当然，也不能总是勒紧裤腰带、拼命捞钱。”但是，不能只讲富民，而忽视重点建设；不能只讲短期，而忽视长远……人民生活要逐步提高，但是不搞建设，生活达到一定水平就不能继续提高，因为他们就像无源之水、无根之树。”⁴⁶⁴

一方面，赵承认，鉴于过去几十年来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我们在这些领域长期积累的赤字”），有必要暂时将政策重点放在提高生活水平上。但另一方面，他认为，几年后政策重点必须重新转向生产和基础设施，因为发展生产能力是国家的最终长期优先事项。这一观点与许多下级官员和企业领导人表现出的其他形式的生产主义偏见在结构上是一致的，如第三章所述。

我不同意这样一种愤世嫉俗的理解，即认为这些论点仅仅是官僚阶层剩余价值攫取者为其自我致富动机所作的正当化解释。更有可能的是，许多政策制定者确实内化了生产主义偏见，并认为他们有能力调和各个大众阶层的部分物质利益与国家的整体根本利益。毕竟，生产能力的发展是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这一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上一章中，我们看到，为解决工人的生计和福利需求提供一定合法性的政策环境是使职代会充满活力的关键宏观经济条件之一。现在，收入方面的持续财政危机导致政策制定者重新转向生产而不是消费。因此，国家经济的重新定位意味着压制工人的物质需求和赋予他们权力推动这些需求的民主制度，这并不奇怪。

正如第一章和第三章所述，1977年至1980年期间，更认真地解决人民消费需求的政策努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后毛时代党领导层在清除毛的激进追随者后，需要获得民众支持和合法化。这一短暂的事件以及随后从1983年开始的重新转向生产揭示了积累与合法化之间的紧张关系，与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在《国家的财政危机》中所讨论的不同。在奥康纳的分析中，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参与促进私人资本积累。但为了保持合法性的外表，国家必须同时隐瞒其参与资本积累的情况。社会消费和福利方面的公共支出既补贴了资本积累（通过允许资本家保持低工资和扩大国内市场），又掩盖了这种补贴。因此，对奥康纳来说，强调满足消费需求使得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同时实现两个目的，从而缓解积累和合法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这可能引发财政危机。

然而，在一个后发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在资本流动过程中的积累作用是无法掩盖的。它作为剩余价值占有者和分配者的明显角色必须通过国家经济发展得到合法化，而这种合法化最终必须为民众带来具体的物质利益。因此，大规模的公共支出用于大众消费（有时在财政上表现为国家放弃的收入）必须在某个时候部署，以达到合法化的目的。但这种支出并不直接帮助资本积累，而且往往似乎在转移资源。因此，与奥康纳分析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社会主义国家无法轻易解决积累与合法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消费支出只能帮助后者，而不能同时帮助两者。

⁴⁶³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3), p.69, emphasis added.

⁴⁶⁴ *Ibid.*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与大众消费之间更为棘手的关系揭示了积累与合法化之间比资本主义下更具爆炸性的紧张关系。

这一政策事件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尽管政策制定者认为工人和农民的消费资金都在过度增长，但赵紫阳等政治家却坚持对农民采取更“谨慎”的态度。这需要对党国与工人的关系以及党国与农民的关系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这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要求对农民更加谨慎，似乎不是出于对他们政治颠覆性的担忧——毕竟，在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上，城市工人一直占据着反抗活动的中心舞台。相反，这种谨慎可能更多地与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关——既是由于国家采购价格的提供，又是由于农民可以在统购配额以上灵活销售农产品——这在后毛泽东时代初期帮助刺激了农业生产力的显著增长，这在官方叙事中被描述为改革时代的一个伟大成功故事。政策制定者不愿意破坏这个成功故事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解释只是推测性的，需要用更可靠的经验证据来检验。

谁来代表国家？

1984年中旬，厂长负责制开始全面推行。然而，与决策者的意图相反，厂长负责制并没有完全阻止工人货币收入的增长。事实上，它的影响似乎恰恰相反。1984年最后几个月，许多刚刚实行职工分红制度的工厂，向工人发放奖金和其他实物福利的混乱现象达到了新的高度。袁宝华在1986年回顾性地总结道：“一些地方试行厂长负责制，经历了一些曲折。”在这些“曲折”中，第一个提到的就是“1984年最后一个季度，一些企业发放奖金和其他实物福利过多且混乱”⁴⁶⁵。这一现象非常突出，甚至在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中都可以发现，下一章将会讨论这一点。

下一章还将介绍我自己对为何在实行厂长负责制后工人收入出现疯狂且无规律增长的原因的解释。在本章中，我将重点介绍政策制定者，尤其是赵紫阳，是如何理解这一看似令人费解的发展。本质上，他们加倍指责工人在工厂内部拥有过大的权力和影响力。1985年1月23日，邓小平、赵紫阳和其他主要经济政策制定者举行了一次内部会议，讨论经济状况。工人奖金快速且不受控制的生长是讨论的一个关键问题。特别是，与会者抱怨一些工厂如何不当使用生产资金向工人支付额外奖金，然后借贷来弥补赤字⁴⁶⁶。赵紫阳给出了以下诊断：

“现在国营企业自负盈亏，资产归国家所有，但厂长是选举产生的，任期固定。扩大企业自主权后，谁代表国家利益，谁首先关心长远生产建设，这个问题还需要研究。工人选举的厂长，在奖金问题上，往往站在工人的立场上。我们还没有解决好企业内部矛盾，没有解决谁代表国家的问题。”⁴⁶⁷

因此，赵认为，奖金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工人能够对厂长施加如此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选举机制，以至于厂长不再代表国家利益。这一诊断的背后，依然是党国利益与工人利益之间的明显冲突。政策制定者担心工人民主会把厂长拖向一极而不是另一极。邓小平等人同意赵的分析，赵甚至提出了派一些未指明的

⁴⁶⁵ 《关于厂长负责制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1986年7月，见于《袁宝华文集第三卷》第279-282页。

“Report on the Trials of the FDRS”，July 1986, in *Collected Works of Yuan Baohua Volume 3*, pp.279-282.

⁴⁶⁶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5), p.12.

⁴⁶⁷ *Ibid*, emphasis added.

“公方代表”代表党国监督国有企业的想法⁴⁶⁸。

事实上，赵紫阳在两周前的一次会议上就已表达了类似的担忧。这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厂长负责制的未来。正如赵在会上所说：

“我最搞不清楚的一个问题是，厂长该怎么定位……很多地方，厂长是雇来的，或者选举来的，他们对雇来的人、选举的人负责。”⁴⁶⁹那么，这些工厂的权力机关是谁呢？……企业自主权扩大之后，我们还是要加以制约，必须要搞清楚谁代表国家利益的问题。国家代表不一定是企业的管理者。有些经营不善的企业给工人发了过多的奖金，甚至把生产资金花在奖金上，谁来监督？这里就有一个如何制约的问题。厂长理应代表国家，但他们到底代表国家，还是代表本企业？他们更符合国家利益，还是本企业的利益，还是介于两者之间？如何解决厂长代表双重利益的问题，我们能不能想出其他的制约方法，比如派国家代表来？⁴⁷⁰

在这些言论中，赵再次强调了厂长们对国家利益和自己企业利益的模糊代表。鉴于赵对工人奖金问题的关注，这里的“企业利益”应该理解为“工人利益”。赵对厂长代表工人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因为他们“对雇用或选举他们的人负责”）的担忧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赵重申了“派遣国家代表”进驻工厂的想法。

如果派遣政府人员专门监督公共企业的管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目的将落空，而扩大企业自主权是赵紫阳自 1978 年以来一直积极倡导的一项改革举措。这一颇为异想天开的提议不应被理解为党和国家试图加强对公有企业的全面控制，而应被理解为一种绝望的计划，以平衡工人对厂长的强大影响力。在上述关于厂长负责制的会议上，赵紫阳总结道：“厂长和国家的关系是一个大问题，还有待专门研究。”因此，他建议工厂法的最终确定时间应比之前预想的要长⁴⁷¹。赵紫阳对这个“问题”如此困扰，以至于他在 1985 年 4 月底再次讨论它：“谁应该代表资产所有者的利益⁴⁷²？过去，这种代表是通过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计划和财务控制来实现的，但在企业自主权扩大的时代，谁应该是代表？否则，工人的利益将占据主导地位，工厂经理很难抗拒”⁴⁷³。最终，赵紫阳没有继续实施派“国家代表”监督工厂的想法。相反，他在另一套创新安排中找到了解决厂长和国家之间关系这一“大问题”的方法。在这些安排下，国家基本上将公共企业承包给个别厂长。这种企业承包在 1986 年零星推出，在 1987 年更加系统化（下一章将对此进行详细介绍）。

通过将车间选举重新定义为霸权工具来拯救车间选举

在 1984 年以后的官方规定中，职代会在国有企业中从未被重新授予“权力

⁴⁶⁸ Ibid.

⁴⁶⁹ 赵紫阳这里指的是工人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厂长，或者集体决定聘任厂长的案例。

⁴⁷⁰ 天津市档案馆，X044-C-000885-003，《胡耀邦、赵紫阳同志在书记处会议上听取国营工业企业法调查组汇报时的讲话要点（根据记录整理）》，1985 年 1 月 10 日。Tianjin Municipal Archive (TMA), X044-C-000885-003, “Key Points of Hu Yaobang’s and Zhao Ziyang’s Speeches at the Meeting of the Party Secretariat upon Hearing the Report by the Research Group on the State-Managed Industrial Enterprise Law (Compiled based on Minutes)”, January 10, 1985.

⁴⁷¹ Ibid.

⁴⁷² 此处“资产所有者”一词指的是国家，因为赵紫阳在这篇文章中讨论的是国有企业。使用这个颇具资本主义色彩的表述，体现了赵紫阳对公有制性质的理解的不断演变。我感谢 Cihan Tugal 的这一观察。

⁴⁷³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5), p.119, emphasis added.

机关”的地位。然而，厂长的车间选举重新出现在这些官方规定中，尽管界定其适用范围的语言变得更加谨慎。回想一下，1985年初，赵紫阳曾担心厂长的选举会给工人争取更高奖金的巨大权力。但在8月，他承认“任命和选举都是选择厂长的有效方式”⁴⁷⁴。1988年批准的《工厂法》最终版本还规定，如果党国的监督机构允许，厂长可以由职代会选举产生⁴⁷⁵。考虑到这一点，这一结果是了不起的。赵紫阳、彭真以及彭真考察团的决策者都明确反对厂长选举。这一政策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现有证据表明，在关于厂长负责制的政策讨论中，全总领导和干部是支持厂长车间选举的唯一声音，他们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袁宝华关于1984年2月代表团活动的上述报告记载，代表团中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对绝大多数反对工人选举厂长的意见表示了唯一的异议⁴⁷⁶。虽然1984年5月颁布的指导厂长负责制方案的《工厂法》初稿根本没有提到厂长的选举，但随后在夏季修订的草案规定，小型企业可以（注意：不是“必须”）通过其职代会选举厂长⁴⁷⁷。但这一变化并没有让全总满意，它在1984年底继续坚持立场，即国有企业举行厂长选举的资格不应取决于其规模⁴⁷⁸。这种反对声音如此顽固，以至于与袁宝华一起负责厂长负责制工作具体事宜的顾明在1984年11月的全国厂长负责制座谈会上承认，“对《工厂法》中关于厂长选举的规定，仍然存在两种不同意见”⁴⁷⁹。如果没有全总的坚持，赵紫阳在1985年8月作出果断让步，并在《工厂法》的最终草案中纳入厂长选举（没有专门规定“小企业”的条款）是不可想象的。

换言之，在更有权势的决策者一再公开表示对这种民主机制的厌恶的同时，

⁴⁷⁴ 《在〈国营工业企业法（草案）〉和三个条例修改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1985年8月7日，见于《袁宝华文集第三卷》第118-128页。“Summary Speech at the Symposium to Discuss the Revisions of the Draft of the State-Managed Industrial Enterprise Law and the Three Regulations”，August 7, 1985, in *Collected Works of Yuan Baohua Volume 3*, pp.118-128. 上海市档案馆，C1-3-756-9，《袁张度在市总七届五次委员（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85年8月23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C1-3-756-9, “Yuan Zhangdu’s Report at the Fifth (Enlarged) Meeting of the Seventh Council of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August 23, 1985.

⁴⁷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1988年4月13日，载于《中国工会四十年（1948-1988）资料选编》第1207-1218页。“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Law on Industrial Enterprises Owned by the Entire People”，April 13, 1988, in *Compilation of Selected Documents over Forty Years of China’s Unions (1948-1988)*, pp.1207-1218.

⁴⁷⁶ Yuan Baohua, “Outline of the Report on the Research for the State-Managed Industrial Enterprise Law”.

⁴⁷⁷ 《袁宝华谈有关企业改革问题》，1984年7月，见于《袁宝华文集第八卷》第16-18页。“Yuan Baohua on Enterprise Reform”，July 1984, in *Collected Works of Yuan Baohua Volume 8*, pp.16-18. 天津市档案馆，X044-C-000808-003，陈秉权《厂长负责制与职工民主管理》。Tianjin Municipal Archive (TMA), X044-C-000808-003, “The FDRS and Workers’ Democratic Management” (a speech by Chen Bingquan in July 1984).

⁴⁷⁸ 《全总十届二次执委会议决议》，1984年12月27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84）》第77-94页。“Resolution at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of the Tenth ACFTU Congress”，December 27, 1984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4)*, pp.77-94.

⁴⁷⁹ 天津市档案馆，X044-C-000808-005，天津市总工会民主管理部《全国厂长负责制试点座谈会汇报提纲》，1984年12月1日。Tianjin Municipal Archive (TMA), X044-C-000808-005, The Department of Democratic Management of the Tianjin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Outline of the Report Regarding the Nationwide Symposium on the FDRS Trials,” December 1, 1984.

支持厂长现场选举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这本身就证明了 1980 年代中国政策制定的动态具有一定程度的多元化和开放性。然而，这种开放性也是有限的。那些主张继续推行厂长现场选举的人必须重新定义这种选举的意义，使它们看起来与推进厂长负责制的主导政策议程相兼容且有价值。换句话说，工会领导人必须通过将这些选举描述为厂长负责制的一个有用支柱或附属物来捍卫这些选举。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言论中，对工作场所民主本身的任何承诺已然淡出。

例如，全总的论点之一是，工人选举如何能够确保选拔真正有能力、有文化、有技能的管理人员担任厂长。这可以说是民主管理取得经济效益的必要条件。在 1984 年 11 月的一次会议上，在总结全总推进企业民主管理的成就时，全总书记处张富有说：

强调工人选举厂长的优势，声称“工人尊重知识和人才，选拔真正有能力的人，选出了一大批符合‘四个现代化’要求的先锋干部”⁴⁸⁰。1985 年，全总副主席顾大椿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以如下理由作为反驳批评工人选举厂长的论点：“事实证明，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推荐、评价对干部的选拔和监督同自上而下的组织审查、选拔、任用和监督紧密结合起来，对于**准确选拔合适的人担任企业领导职务**特别有利”⁴⁸¹。

这些论点不再将工人选举厂长视为工人行使反权力和控制厂长的一种方式，而是强调这种选举（与其他选拔机制，如纯粹自上而下的任命相比）在选出真正有能力的领导人方面的功能优势。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论点与马克斯·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⁴⁸²中阐述的对议会民主效用的理解相似：不是作为赋予群众政治权力，而是作为培养和选拔忠诚、负责任的政治领袖的舞台。这些争论所带来的效果是，职场民主在更具工具性的方向上被重新定义。

另一种将厂长选举视为巩固厂长负责制的工具的说法是，这种选举有可能获得工人对厂长权力集中的支持。其基本思想是，如果工人认为厂长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他们可能更倾向于接受或者至少默许随后管理权集中在这些厂长的手中。这一论点早在 1984 年初就出现在全总的言论中。袁宝华在前述关于 1984 年 2 月代表团活动的报告中不仅记录了全总代表第一次逆“潮流”而行，为厂长选举进行辩护，但他们也给出了自己的理由：“一些工会干部认为，在有条件的工厂，由工人选举厂长，不仅可以发挥工人当家作主的积极性，**而且可以为厂长行使权力提供民意基础**”⁴⁸³。引人注目的是，工人选举在这里并没有被描述为对厂长权

⁴⁸⁰ 张富有《在整顿工会基层组织、建设职工之家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1984 年 11 月 17 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 1984 年文件选编》，第 368-380 页。Zhang Fuyou, “Speech at the Report Conference on Rectifying Grassroots Union Organizations and Building ‘Workers’ Homes’ ”, November 17, 1984,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4), pp. 368-380. “四化”的要求，多指年龄和学历，重点提拔那些年轻的、受过一定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管理干部。

⁴⁸¹ 顾大椿《切实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载于《企业民主管理的理论、历史和实践》，第 48-62 页。Gu Dachun, “Effectively Guaranteeing the Laborers’ Masterly Status in Enterprises”, in The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Enterprise Democratic Management, pp.48-62, emphasis added.

⁴⁸² Max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9]1958.

⁴⁸³ Yuan Baohua, “Outline of the Report on the Research for the State-Managed Industrial Enterprise Law,” emphasis added.

力的制衡，而是一个促进工人同意厂长在厂长负责制下更广泛行使权力的过程！

这一论点延续到了 1984 年 7 月全总领导层向党的领导层提交的关于如何加强工会在城市经济改革中的作用的报告中。为了向党的领导层展示厂长现场选举的优势，该报告大量引用了武汉的例子。武汉市工人选举厂长规模很大，据称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报告特别指出，“在工人选举厂长之后，一些工厂组织了运动，动员工人向他们选出的厂长提供建议和意见，口号是‘给厂长出主意，不要找麻烦’，以帮助厂长进行改革”⁴⁸⁴。在这里，厂长的现场选举基本上被当做厂长争取民众支持的过程的一部分。报告强调选举的这一方面是特别积极的，大概是因为全总领导层认为这种框架可以使选举具有吸引力（对党的领导层来说，党的领导层是该报告的受众）。

“给厂长提建议，不给厂长添麻烦”的口号尤为引人注目。它清楚地表明，选举后运动的目的是向工人传达一种期望，即在厂长当选后，不要做出任何可能挑战厂长权威的行为（即“制造麻烦”）。换句话说，选举应该为组织工人的同意提供基础。这些运动是否真的在武汉组织，工人是否真的参与其中，都无关紧要。事实上，很难想象工人会热情地参与这些旨在阻止他们“闹事”的运动。但真正重要的是全总以这种方式呈现武汉事件的话语策略。这一策略再次表明那些支持厂长选举的人最终如何重新定义这种选举的实质意义。“给厂长出主意，不给厂长添麻烦”的运动后来成为工会干部最喜欢的例子之一。1984 年 7 月报告提交给党的领导层后仅一周，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刘石在一次城市经济改革大型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到了这个例子⁴⁸⁵。

全总的话语策略显示出一种两难境地。当主流政策情绪已经转向反对厂长选举时，为了捍卫厂长选举，全总领导人肯定了厂长负责制的前提。他们强调工人选举对于准确选出真正有能力的管理人员具有工具性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强调工人选举如何有助于争取民众支持，选举后围绕民选厂长的权力集中。从本质上讲，这种话语策略使工人选举厂长成了一条实现霸权的方法，为厂长负责制下的管理专制提供了便利——经典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即动员人们接受剥夺自己的权力和压迫。一方面，这似乎确实是全总捍卫更强大的政策制定者所厌恶的东西的最实际策略。毕竟，全总在政治权力领域是一个边缘化或者用布迪厄的话来说，是一个“被支配的支配者”的行为体（见第二章）。它的政治回旋余地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倡导很可能意味着诉诸而不是反抗占主导地位的政策议程。另一方面，全总的话语策略确实掏空了车间选举的民主实质。结果是，对工人民主本身的关注在政策审议中被进一步边缘化。

尽管如此，全总在这一问题上的倡导确实取得了成果，值得注意的是，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市场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政治。应该记住，尽管赵紫阳对车间选举

⁴⁸⁴ 《全总党组关于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加强工会工作的情况报告》，1984 年 7 月 19 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 1984 年文件选编》，第 69-74 页。“The ACFTU Party Committee’s Report on Strengthening Union Work in Urban Economic Reform,” July 19, 1984,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4), pp. 69-74.

⁴⁸⁵ 《四位领导同志在全国城市经济改革思想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刘实》，1984 年 7 月 25-31 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 1984 年文件选编》，第 466 页。“Speeches by Four Leading Comrades at the Nationwide Symposium on Educational Thought Work during Urban Economic Reform – Liu Shi”, July 25-31, 1984,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4), p.466.

如何将厂长从党和国家的利益中拉出来感到极度焦虑，但他确实在 1985 年 8 月公开承认选举是允许的。尽管 1984 年 2 月的代表团几乎一致反对这些车间选举（唯一的例外是全总代表），但这些选举还是被写入了最终的《工厂法》。鉴于全总（在没有像 1980–1981 年那样的基层骚乱的情况下）在政治上无足轻重，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政策制定者没有明显的理由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更有可能的是，这些政策制定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全总的工具主义论点，并认为在中国工厂内部集中管理权力的霸权方法有一定的价值。尽管 1980 年代中国企业改革的总体轨迹最终逐渐剥夺了工人的权力，但政策制定者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关心为这些剥夺权力的过程建立民众同意的基础。出于各种原因——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等——1980 年代的社会主义党国仍然试图在城市工人阶级中保持一定的同意。这与 1990 年代中国的企业改革方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中国决心强行压制城市工人阶级，根本不关心是否赢得他们的同意。

将厂长的车间选举重新定义为帮助实现厂长负责制的霸权工具，这对此类选举的举行时间和方式具有重要影响。1984 年及之后，这些选举通常在企业过渡到厂长负责制之前进行。它们应该既有助于用被认为更“有能力”（通常意味着“更年轻、更高受教育程度”）的管理人员顺利替换现有的工厂领导层，又能培养工人支持的基础，使得这些新管理者能够随后集中权力。相应地，监督企业的党国机关倾向于严格控制选举过程。由于这些选举被视为成功推行厂长负责制的先决条件，因此在 1986 年全国范围内厂长负责制改革基本完成之后，它们就失去了意义。从 1987 年起，无论是政策文件还是地方报告，对厂长车间选举的提及都越来越少⁴⁸⁶。安舟（Joel Andreas）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虽然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值得怀疑，但仍然很有说服力），报告称“1985 年至 1988 年间，全国范围内报告选举行政领导的工厂数量从 79,941 家下降到 57,300 家”⁴⁸⁷。

然而，在厂长负责制推出的背景下，工人选举厂长所体现的霸权战略偶尔会适得其反。正如葛兰西本人所观察到的，为了动员民众阶级积极同意政治经济体制，霸权战略必须为这些民众留出一些空间来行使他们的能动性。这样的空间可能变成反霸权项目发展的缝隙⁴⁸⁸。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党和国家当局主要想把厂长的选举当作一种表演，以培养和展示民众对党国所青睐的候选人的支持。然而，这些选举的过程有时为工人提供了信心、话语权和合法性基础，使他们后来能够抵制厂长的专制权力。下一节将提供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霸权战略所固有的紧张关系。

案例研究：霸权企图的适得其反⁴⁸⁹

1984 年 4 月下旬，武汉橡胶厂，一家拥有 1,234 名员工的国有中型企业原

⁴⁸⁶ 例如《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工作会议文件汇编》，1987 年 8 月。See, for example,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at the Work Conference on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ing the FDRS, August 1987*.

⁴⁸⁷ Joel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p.186.

⁴⁸⁸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间隙空间通常位于“公民社会”之中。关于“公民社会”既是霸权构建的舞台，也是反霸权斗争的酝酿空间，参见 Michael Burawoy, 2003, “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y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anyi,” *Politics and Society* 31(2): 193-261.

⁴⁸⁹ 本节中介绍的材料取自我起草的一份独立的、文章长度的手稿。Yueran Zhang, “Accidentally Emboldened: Wuhan Workers between Democracy and Tyranny on the Shop Floor, 1984-1985,” working paper. 该文根据武汉市档案资料，探讨了几起工厂厂长车间选举的案例。

计划举行厂长选举。提名过程受到严格管理。企业党委不仅制定了严格的资格要求和审查候选人，还在两轮全厂提名投票中积极为其青睐的候选人（最终赢得选举）拉票。尽管如此，为了体现仪式化民主，企业党委在职代会代表们投票前，安排了与候选人的“竞选演讲和问答”环节⁴⁹⁰。“竞选演讲和问答”大会会有很多工人参加，但这只是一场赋予选举结果民主合法性的节日和仪式活动。然而，结果却让一些工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他们而不是厂长，应该是企业的主人，而企业管理者应该对工人负责。选举程序为选举后意想不到的工人激进主义铺平了道路。

选举结束后，武汉橡胶厂于1984年6月初立即实行了厂长负责制。管理权集中在当选的厂长王庭泉手中。据王庭泉自己说，厂长负责制使他的管理和决策方式更加专制：

“当时我狭隘地把民主改革理解为‘厂长决定一切’……我认为，如果还要通过那些没完没了的讨论来征求工人的意见，那就违背了改革的精神和民主改革。我认为改革的重点是大胆和迅速，没有时间和必要征求群众的意见。因此，我强行在工厂内推进了一系列改革，这是出于我的自愿，在只征求了副厂长和党委书记的意见后。”⁴⁹¹

王庭泉实施的激进、不民主的改革措施，针对的是工人的医疗福利、病假政策和工人职业教育补贴。这些措施引发了工人的普遍不满。

1984年8月，工人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当时，一项刚刚颁布的、存在缺陷的承包计划导致内胎车间工人的工资下降。工资下降的原因是产品质量下降，但车间工人认为这不是他们的错。据王的叙述，工人们随后强烈反抗：

“（降薪）引起了内胎车间工人的强烈不满，他们抱怨说‘大锅饭’变成了‘大锅乱粥’。再加上此前在劳动保护、福利和待遇方面的改革措施，导致一些工人公开主张‘不信任投票’，罢免我的厂长。工人们还要求我带录音机，让我重新回顾我在竞选演讲中做出的承诺。情况演变成一场轩然大波。”⁴⁹²

鉴于厂长的这种工作报告通常会淡化工人的不满和骚乱，这份报告具体揭露的内容非常引人注目。王的报告承认情况是“轩然大波”，并提到工人挑战王权威的大胆行动。工人们不仅试图让王对选举前的竞选演讲负责，而且还明确提出了罢免投票的想法。这两种行动路线必然受到工人选举本身经验的启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选举，工人会对厂长背叛竞选承诺感到如此愤怒，并觉得有理由推动罢免投票。

⁴⁹⁰ 武汉市档案馆，XX000056-WS05-98-2，罗延龄《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用改革的精神，认真抓好民主选举厂长过程中的思想政治工作》，1984年6月28日。The Municipal Archive of Wuhan (MAW), XX000056-WS05-98-2, Luo Yanling, “Grasp the Thought and Political Work during the Democratic Election of the Factory Director with an Open Mind, Bold Initiative to Explore, and the Spirit of Reform,” June 28, 1984.

⁴⁹¹ 武汉市档案馆，XX000091-WS03-99-5，王庭泉《真心实意依靠群众 正确行使厂长职权》，载于《武汉工运》第五期，1984年11月20日。The Municipal Archive of Wuhan (MAW), XX000091-WS03-99-5, Wang Tingquan, “Sincerely Rely on the Masses and Correctly Exercise the Powers of the Factory Director,” in Wuhan’s Labor Movement Issue 5, November 20, 1984.

⁴⁹² Ibid.

一份由企业工会撰写的报告（与王的报告不同）描绘了一幅更加令人担忧的画面。报告称，工人的不满情绪如此强烈，“确实有可能停产”⁴⁹³换句话说，罢工迫在眉睫。面对这种可能一触即发的局面，王庭泉迅速撤回了承包计划和减薪，以及一些最令人反感的工人福利改革措施，从而使紧张局势得以缓和。1984年夏天，武汉橡胶厂工人以发动弹劾和威胁罢工的形式发起了激进主义运动，击退了厂长提出的一些改革举措，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民主集中管理权力运动中有效地遏制了厂长的权力。无论这家工厂的选举是如何管理的，对民主假象的仪式性维护使一些工人自己产生了一种信心和对民主的真情投入。这种民主的假象也为工人提供了修辞和程序上的理由，以挑战当选的厂长，阻止其广泛行使权力。换句话说，至少在某些情况下，选举过程激发了工人积极反对随后的权力集中，而不是顺从它。

章节结论

本章所述的反民主转变表明了中国社会主义政体的矛盾性。一方面，对中国工业工作场所部分民主化的容忍和鼓励时期被证明是短暂的。党的领导层一旦意识到工人的要求和权力正在威胁他们认为更为根本的某些目标，就会阻止这一事件的发生。这一事件重复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已经显现出来的模式。1966年底，毛泽东及其同僚允许并培育了工作场所内外工人独立造反组织的出现。但他们很快就在1967年初匆忙平息和控制这种独立组织，首先呼吁“夺权”，然后实施军事控制⁴⁹⁴。对于这些政治领导人来说，工人“无序”的组织正在使经济陷入瘫痪，他们的“经济主义”要求正在破坏捍卫社会主义项目不受走资本主义道路者的侵害的崇高目标。1966-1967年和1983-1985年发生的事件的共同之处在于，高层政治领导人深感忧虑，担心工人局部和混乱的权力行使正在酝酿“经济主义”，并造成宏观经济和政治损害。

另一方面，尽管高层决策者明显有反民主情绪，全总仍然设法为厂长的现场选举争取到了一些空间。全总干部通过强调这种选举如何有助于动员工人同意厂长巩固权力来实现这一目标。政策制定者对全总的论点表示认同，这一事实表明，他们仍然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采取霸权主义的企业改革方法。但霸权主义方法可能会产生足够的适得其反的机会。制造同意的动员过程和所使用的话语为工人提出反诉奠定了基础。这再次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发展相似。毛泽东在1967年最初试图制止工人独立组织时，尝试为群众造反组织提供一些象征性的认可，以及在即将重建的政治结构中谈判其地位的权力。但正是这种象征性的认可和权力使许多造反组织能够继续他们的造反活动，并违背了党领导层恢复政治稳定的愿望。因此，党的领导层于1968年转而采取了更为血腥的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一切造反活动⁴⁹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党和国家对企业改革的态度也发生了

⁴⁹³ 武汉市档案馆，XX000091-WS03-99-5，武汉市化学工业局工会《关于武汉橡胶厂工会在改革中创建“职工之家”的情况汇报》，载于《武汉工运》第五期，1984年11月20日。The Municipal Archive of Wuhan (MAW), XX000091-WS03-99-5, The Union Committee of Wuhan's Bureau of Chemical Industry, "Report on the Efforts by the Union Committee in the Wuhan Rubber Factory to Create a 'Workers' Home' amidst Reform," in Wuhan's Labor Movement Issue 5, November 20, 1984.

⁴⁹⁴ 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apter 4.

⁴⁹⁵ Andrew Walder, *Agents of Disorder and Civil War in Guangxi*.

类似的转变，从充满紧张气氛的霸权主义转变为赤裸裸的专制主义。

最后，除了霸权主义方法剥夺工人权力所固有的紧张局势之外，剥夺工人工作场所民主的努力本身就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工厂厂长在管理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虽然决策者希望通过赋予厂长相对于工人的权力来控制工人消费基金（尤其是奖金）的增长，但厂长负责制的推出几乎立即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在大量工人仍然基本免受解雇风险、公共企业获得更大财务自主权的环境下，不断发放全面的加薪和其他福利成为厂长处理或预防工人对管理层专制不满的最便捷方式。工人收入的迅猛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这对1989年民主运动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下一章将详细介绍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第五章 用金钱收买民主：管理层专制与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脱轨，

1984-1989

在厂长负责制的时代，中国城市公共企业中的管理专制变得更加明显。车间紧张局势大大加剧。然而，本章讲述的不是一个“所有事情都变得更糟”的简单故事，而是一个更复杂而且有些违反直觉的故事。1984年后工作场所民主的衰落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并在1989年前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管理层的专制引起了工人的普遍不满，这种不满表现为零星的罢工、多种形式的不服从以及日常的微小反抗行为。由于无法自由地雇用和解雇工人，工厂厂长被迫寻找某种方法来缓解车间紧张局势，并培养工人对管理专制的同意或至少默许。企业管理的重新民主化或更公平、更透明地处理分配问题都是不受欢迎的选择，因为工厂厂长不愿牺牲自己的权力和特权。相反，随着公共企业继续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财务管理权——尤其是对留存利润自主处理的权力——厂长不得不不断地向工人发放全额加薪，作为一种政治上方便的方式来维持基本的工业和平，并掩盖关于分配不公的棘手问题。结果，在厂长负责制推出之后，工人的总收入连续几年大幅增长，高层决策者试图补救，但未能成功。

依靠无休止的加薪来换取产业和平的管理策略导致了通货膨胀的严重后果。厂长将企业留存资金用于支付工人的现金和非现金支出。他们不得不借入大量银行贷款来满足投资需求。在企业对贷款的迫切需求的压力下，银行系统发放的贷款总额大大超过了存款总额，从而向经济注入了过剩的现金。企业管理者还利用部分价格自由化提供的机会进行价格操纵，以寻求更高的盈利能力和更多的留存利润用于奖金支付。与此同时，工人将大部分加薪存入银行，积累的储蓄使恐慌性购买成为可能。通过这些机制，工人收入在80年代后半期的迅猛增长导致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普遍认为这种通货膨胀是80年代末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也是1989年爆发民主运动的主要诱因之一。

换句话说，本章提出了一个双管齐下的因果论证。首先，在厂长无法自由雇用和解雇工人、企业扩大财务自主权等条件下，工作场所民主的衰落导致了一种管理策略，即不断随意地提高工人的净工资。其次，在银行体系倾向于迎合企业对贷款的渴求和部分价格自由化等条件下，这种管理策略是推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通货膨胀的关键因素之一。综合起来，我的两个论点建立了工作场所民主的衰落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这里，我必须承认，这一论点得益于老田，他是中国的一位毛派学者，不隶属于任何学术机构。他的著作记载了他观察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缺乏工作场所民主，厂长更依赖加薪来管理工人⁴⁹⁶——他跟我交流的时候同样也提到了这一点。我将从两个重要方面完善和扩展这一论点。首先，我要澄清，提高收入的管理策略并不是整个80年代的特色，而只是在厂长负责制时代才变得明显。我用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作为证据来支持这一论点。其次，我将这一论点与经济学家对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工人快速增长的收入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大量现有研究联系起来。因此，我建立了一个总体因果关系，将微观层面的车间动态（工作场所民主削弱和管理层与工人紧张关系加剧）

⁴⁹⁶ 老田的公开作品集，可见中国网站“乌有之乡”上的他的个人主页：<http://www.wywxwk.com/author/c3/110.html>

与宏观经济现象（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以及 1989 年的爆炸性政治运动联系起来。因此，我的论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们能够理解工作场所民主的衰落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经济的整体轨迹产生了怎样的决定性影响。

我认为工作场所民主的衰落导致了通货膨胀，这可能看起来与关于工人政治和制度权力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传统观点相矛盾。这种传统理解认为，这两件事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孔诰烽和丹尼尔·汤普森（Daniel Thompson）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在工业化的西方，“20 世纪 70 年代的通货膨胀源于强大的工人阶级”，而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新自由主义控制通货膨胀的手段本质上是为了控制劳动力⁴⁹⁷。在社会主义的背景下，研究南斯拉夫工人自我管理的学者，如艾伦·科米索（Ellen Comisso），认为工人委员会产生了一种“消费偏见”，推高了企业在工人收入和福利上的支出，从而产生了通货膨胀的影响⁴⁹⁸。鉴于这些发现，我的论点似乎有些反常。但应该指出的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工作场所民主的衰落导致了特殊条件下的通货膨胀。其中一个最关键的条件是，中国国营企业中相当一部分工人仍然基本免于被解雇的风险⁴⁹⁹。工人不能仅仅通过劳动力市场的鞭策就被强迫服从管理层，厂长必须找到某种方法来获得同意。换句话说，这些工人就是安舟所说的“工业公民”⁵⁰⁰。他们仍然拥有一些权力，这些权力植根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即使在工作场所民主退化之后，也是如此。正是厂长负责制时代工人权力的这种特殊配置决定了管理者的策略（也见引言中的表 1）。另一个关键条件是扩大公共企业的财务自主权，这使得提高收入的管理策略成为可能。我的论点所阐明的一般教训应该是，工作场所民主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是基于特定环境的产物。

此外，本章还揭示了这些年收入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动荡产生了深远的副作用。在试图弄清为什么国营企业不断给工人加薪以及如何遏制这种“短视”行为的同时，赵紫阳等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逐渐厘清其政策理念，越来越将国有企业视为私有财产。在主张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辩护话语下，他们于 1986 年发起了一项改革，将国有企业承包给经理个人。1987 年，赵紫阳进一步提出要将企业经理的权利激进化和实体化，以至于承包工厂的厂长应该享有明确和持久的权力，可以像对待自己的财产一样使用、保留和处置公有财产。这些将公有财产部分私有化的举动为接下来十年的大规模实际私有化铺平了道路。

本章分为四节。第一节记录了厂长负责制的推出确实导致了工作场所民主的削弱、公然的管理专制、车间紧张局势的加剧，需要采取新的管理策略来缓解或预防这种紧张局势。第二部分阐述了我的观点，即在厂长承包制时代，厂长主要依靠不断发放全面加薪（尤其是奖金）来安抚车间。本节展示了这一论点如何得到定性档案证据和总收入统计数据的支持。第三部分揭示了通过加薪来购买工业

⁴⁹⁷ Ho-fung Hung and Daniel Thompson, 2016, “Money Supply, Class Power, and Inflation: Monetarism Reassess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1(3): 447-466.

⁴⁹⁸ Ellen Comisso, *Workers’ Control Under Plan and Market*.

⁴⁹⁹ 1986 年，随着新劳动合同制度的引入，国有企业的就业保障常态开始受到冲击。然而，这项新制度的覆盖范围有限（据称只有新入职的员工才适用），其实际实施也面临重重障碍。因此，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大量产业工人面临的就业不安全感仍然很轻微。Gordon White, 1987,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ese Industr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Labour Contract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111: 365-389.

⁵⁰⁰ Joel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pp.10-13.

和平的管理策略如何导致宏观经济通胀。它完成了将工作场所民主的衰落与1980年代后半期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联系起来的核心分析。第四部分追溯了政策制定者在试图纠正企业不断提高工人收入的“短视”行为的同时，最终如何导致其采取部分的、过渡性的举措来实现公共财产的私有化。

厂长负责制时代车间紧张局势加剧

正如上一章所提到的，现有的学术研究已经广泛记录并阐述了厂长负责制的推出确实导致了管理层的专制和工人在车间的无权化⁵⁰¹。我自己的档案分析不仅证实了这一点，而且还揭示了厂长负责制的反民主效应立竿见影地显现出来。在上一章介绍的武汉橡胶厂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了厂长在企业过渡到厂长负责制后的短短几个月内如何垄断决策权并实施了非常不受欢迎的改革。尽管这家工厂的工人成功动员起来迫使厂长撤销一些最令人不满的政策，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在大多数工厂，厂长设法建立了专制权力，而工场民主机构（如职工代表大会）则被放任不管，任其衰败。

1984年底，天津市总工会对30家最近过渡到厂长负责制企业的车间民主情况进行了调研。该报告总结了研究结果，认为厂长负责制导致“工厂行政管理明显加强，民主管理弱化”⁵⁰²。据报道，天津港⁵⁰³某工段的管理干部规定，职代会现在没有关于集体福利的决定权，而只有“批准”资方提出的集体福利议案的权力。在天津焊机厂，转为实行职工再就业制度后，厂长起草了一项计划，向领导和中层管理人员发放“补充津贴”。厂长在没有充分征求民意的情况下，匆忙召开职代会，正式批准了该计划。这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天津计算机厂的新章程故意模糊了职代会的职责，削弱了职代会的权力。章程规定职代会只有权监督“厂长超越职权范围的问题”⁵⁰⁴。

各地的报告显示，国内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1984年12月，上海市总工会召开会议，向基层工会干部汇报了厂长负责制推出后的几个月内发生的一些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根据这些内部讨论的记录：

“据一些同志反映，民主改革推行后，‘厂长得权，工人失权’成为普遍现象……还有一些同志说，厂长中很少有民主精神的，少数企业厂长一掌权就专制，甚至造成工人自杀、停工。”⁵⁰⁵

1985年，全总派出考察团到湖南、湖北、安徽三省考察，考察团的报告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有些同志把厂长负责制理解为厂长个人决策，过分强

⁵⁰¹ Also see Li Huaiyin, *The Master in Bondage*, chapter 6.

⁵⁰² 天津市档案馆, X044-C-000809-002, 天津市总工会民主管理部《关于三十个试点企业民主管理工作的调查报告》, 1984年12月。Tianjin Municipal Archive (TMA), X044-C-000809-002, The Department of Democratic Management of the Tianjin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Report on the Research on Democratic Management in Thirty Enterprises with Ongoing Experiments”, December 1984. 奇怪的是，这种措辞只出现在报告的初稿中，而没有出现在最终的正式版本中。

⁵⁰³ 天津港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海港之一。

⁵⁰⁴ TMA, X044-C-000809-002.

⁵⁰⁵ 上海市档案馆, C1-2-606-204, 《工会简报》第116期《市总七届四次委员(扩大)会议情况》, 1984年12月28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C1-2-606-204, “Report on the Fourth (Enlarged) Council Meeting of the Seventh Congress of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Union Bulletins Issue 116, December 28, 1984.

调厂长个人决策的作用，结果就有人把所有事情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搞得一团糟。”大大小小的问题上都存在着这种现象，并养成了专制的习惯”⁵⁰⁶。尽管该报告将厂长负责制的反民主影响归咎于地方执行者的误解，但这种影响实际上与政策背后的动机和设计一致。

1986年，天津市总工会进行的另一项全市范围的调查发现，厂长负责制鼓励厂长更肆无忌惮地大规模推翻职代会的决定：

“有些（企业领导）认为，厂长负责制是厂长一人独大；另一些人则说：如果职代会继续讨论这、监督那，厂长还有什么权力？这些意见影响了职代会行使权力的方式。例如，一些职工代表在职代会上质问厂长后被降职、扣奖金。在其他一些企业，职代会住房分配委员会与厂长表达了不同意见后，厂长提出解散委员会。”⁵⁰⁷

即便厂长们胆大包天，专制独裁，监督企业的党国当局也不愿干预，因为这种干预可能被视为违反了厂长负责制的政策方针。因此，面对管理层不断升级的侵犯工人民主权力的行为，工人唯一剩下的制度救济就是企业基层工会干部。然而，厂长负责制对这些工会干部的影响最令人胆寒。上海的工会干部报告说，在厂长负责制推出后，那些敢于为工人说话、挑战厂长决定的工会干部随后被调职的情况很常见⁵⁰⁸。武汉的工会干部在厂长负责制推出后也发现自己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一些工会干部……认为厂长负责制的颁布实际上带来了厂长一人统治和党委书记边缘化，企业工会支部失去了地位，工人只需要服从。他们认为，对于工会工作来说，短暂的暖春过后，寒流又回来了，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胆怯地等待形势好转。”⁵⁰⁹

基层工会干部对厂长负责制的悲观情绪如此普遍，以致全总副主席陈秉权认为有必要消除这种悲观情绪，鼓励工会干部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他在1985年发表的一系列演讲中都表达了这种观点⁵¹⁰。当然，基层工会干部不太可能仅仅因为

⁵⁰⁶ 《全总赴湘鄂皖调查报告》，载于《企业民主管理的理论、历史和实践》，第160-173页。“Report on the ACFTU’s Research Trip to Hunan, Hubei and Anhui Provinces”，in *The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 pp.160-173.

⁵⁰⁷ 天津市档案馆，X044-C-000984-001，《关于全市开展职代会工作检查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86年5月3日。Tianjin Municipal Archive (TMA), X044-C-000984-001, “Report on the Citywide Survey on the SWCs’ Functioning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Work”，May 3, 1986.

⁵⁰⁸ SMA, C1-2-606-204.

⁵⁰⁹ 武汉市档案馆，XX000091-WS04-104-5，武汉市总工会《在改革中努力开创企业民主管理的新局面》，1985年7月19日。The Municipal Archive of Wuhan (MAW), XX000091-WS04-104-5, The Wuhan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Creating a New Landscape for Democratic Enterprise Management amidst Reform”，July 19, 1985.

⁵¹⁰ 天津市档案馆，X044-C-000886-004，陈秉权《企业领导制度改革探讨：谈厂长负责制与职工民主管理》，1985年3月11日。Tianjin Municipal Archive (TMA), X044-C-000886-004, Chen Bingquan, “Reflections on the Reform of the Enterprise Leadership System: On the FDRS and Workers’ Democratic Management”，March 11, 1985.《陈秉权在中国工运学院第一次工会领导干部进修班和师资班学员会上的讲话（摘要）》，1985年6月15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85）》第322-340页。“Chen Bingquan’s Speech at the First Training Camp for Union Leaders and Cadres Held at the Workers’ Movement College (Summary)”，June 15, 1985,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国家领导层给予口头鼓励和保证就采取更乐观的态度。他们的悲观情绪根植于他们在厂长负责制时代车间权力状态变化的具体经历。

除了鼓舞厂长和恐吓工会干部之外，厂长负责制的设置本身也为工人行使车间民主设置了新的制度障碍。一个重要的例证是，企业中层管理人员（车间主任、工段长和班组长）的车间选举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党的领导在 1978 年呼吁恢复这些选举，作为工人民主权利的一部分（见第二章），但厂长负责制实际上终止了这些选举。相反，它赋予了厂长可以自由任命中层管理人员（据称这是通过民主方式实现的）的权力。尽管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关于车间中层管理人员选举的当地报道很多，但 1984 年以后，此类报道变得稀少。尽管在一些企业，工人继续通过评分或投票来评估中层管理人员，但这种程序没有多大意义，现在只是为了“告知”厂长的任命决定。此外，在改用厂长负责制后，许多厂长独自制定了工资和奖金计划，将每个工人的收入与他们的个人生产绩效或各自车间的总产量挂钩。这些计划很少考虑如何补偿工人在职代会活动上所花费的时间。因此，工人越来越多地将参与职代会视为一种负担，这阻碍了他们的生产绩效和收入。那些身为普通工人的职工代表越来越不愿意认真参加职代会。天津总工会在 1984 年底的上述报告中以华北氧气厂为例说明了这种情况。报告哀叹，管理改革“变相剥夺了工人参与民主管理的权利”⁵¹¹。

1986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对中国工人阶级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调查（包括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结果证实了职场民主削弱——尤其职代会的衰落——的总体趋势。在接受调查的 647,112 名工人、职员和企业干部中，24% 的人认为职代会只是偶尔发挥作用，45% 的人认为职代会根本没有发挥作用，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工具”。与这些调查结果相比，对 10,000 多名工人进行的深度访谈得出了对职代会运作的更负面的评价。总体而言，全总研究人员发现，这些负面情绪比 1982 年类似的全国性调查结果“更为尖锐”。研究报告的作者承认，如此强烈的负面情绪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为什么这么多工人认为职代会的运作不令人满意？研究报告毫不含糊地得出结论：

“主要原因是**企业领导**对职代会和工人行使民主权力缺乏正确认识，认为既然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厂长就应该拥有决定一切的全面权力，如果继续强调民主管理，厂长的行政指挥权就会削弱，束缚厂长的作风，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一些厂长和管理人员在未征求职代会意见的情况下擅自作出重大决定，甚至随意废止职代会的提案和决议。”⁵¹²

毫不奇怪，管理专制导致管理层和车间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严重。这种冲突加剧的最直接迹象之一是劳工斗争精神的复苏。尽管在 1980-1981 年骚乱之后的几年里，中国工人运动或多或少得到了平息，但罢工和劳工抗议在 1984 年

the ACFTU (1985), pp.322-340. 《陈秉权在全总十届六次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5 年 7 月 11 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85）》第 318-328 页。“Chen Bingquan’s Speech at the Sixth Enlarged Presidium Meeting of the Tenth ACFTU Congress”，July 11, 1985,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5), pp.318-328.

⁵¹¹ TMA, X044-C-000809-002.

⁵¹²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 1986》，第 17 页，工人出版社，1987 年 1 月。The ACFTU, The 1986 Survey on Chinese Workers’ Circumstances, p.17, Beijing; Workers’ Press, January 1987, emphasis added.

底以及 1980 年代后半期再次变得司空见惯⁵¹³。应该澄清的是，1984 年后（即直到 1989 年民主运动爆发）的劳工骚乱对党的领导层的政治威胁远小于 1980-1981 年的浪潮。1984 年后劳工骚乱的频率和强度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像浪潮一样激增，没有突出的政治要求或独立组织，也没有与海外重大的劳工起义产生共鸣。尽管如此，全总干部还是一再指出，厂长负责制时代的劳工骚乱值得关注。例如，全总副主席罗干在 1985 年 7 月承认，“最近，（企业）领导行为不当，侵犯工人权利，导致工作进度缓慢甚至停工”⁵¹⁴。尽管罗干声称这次劳工骚乱只发生在“少数企业”——我们在 1980-1981 年罢工浪潮期间的官方话语中已经看到过类似的说法——但这个“少数”至少足以引起全总领导层的关注。

1986 年 1 月，全总副主席陈秉权提供了一些关于当前劳工骚乱的统计数据。在上述全国性大规模调查项目的启动座谈会上，陈暗示说，

“据 18 个省市工会统计，去年第四季度⁵¹⁵共发生罢工、停工、集体上访事件 120 起，参与人数达 9000 人⁵¹⁶，其中七八成因工资纠纷……今年春节前后，有些地方就很不稳定，工人消极怠工、停工现象更加普遍。”⁵¹⁷

尽管这些持续的发展没有像 1980-1981 年的动乱那样引发那么多的政治焦虑，但党的领导层确实注意到了这些发展。例如，1986 年 2 月，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布了关于企业工资和奖金相关问题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导方针。该声明特别提到了劳工动乱是发布这份政策文件的动机⁵¹⁸。

尽管如此，罢工和其他抗议活动仍然经常发生。罗干在 1986 年 8 月再次报告说：

“今年 1-4 月间，各地发生的百余起停工、集体上访、游行事件，其诱因有三类：第一类是政策本身存在缺陷或执行失误；第二类是厂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

⁵¹³ 当然，这并不是说 1981 年至 1984 年间没有发生过罢工或劳工抗议。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看到的，在这期间确实发生了罢工和劳工抗议。但根据我对现有档案证据的评估，这些事件的总体范围、频率和强度似乎比 1980-1981 年以及 80 年代后半期的情况要小得多。

⁵¹⁴ 《罗干在全总十届六次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5 年 7 月 14 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85）》第 299-317 页。“Luo Gan’ s Speech at the Sixth Enlarged Presidium Meeting of the Tenth ACFTU Congress”，July 14, 1985,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5), pp.299-317.

⁵¹⁵ 这里的“去年第四季度”是指 1985 年 10 月至 12 月。

⁵¹⁶ 陈在其他地方指出，这肯定是低估了。《陈秉权在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986 年 3 月 12 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86）》第 174-180 页。“Chen Bingquan’ s Speech at the Meeting of Union Office Directors”，March 12, 1986,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6), pp.174-180.

⁵¹⁷ 《陈秉权在职工队伍状况调查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6 年 1 月 18 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86）》第 62-70 页。“Chen Bingquan’ s Speech at the Symposium on Surveying Workers’ Circumstances”，January 18, 1986,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6), pp.62-70.

⁵¹⁸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企业工资、奖励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1986 年 2 月 3 日，载于《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下册）》第 1533-1538 页。“Notice on Strengthening Political Thought Work in Enterprises’ Wage and Bonus Work, by the Office of the Party’ s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February 3, 1986, in Selected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about the Workers’ Movement Issued by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Second Volume), pp.1533-1538.

无视工人民主权利,侵犯工人利益(如不经过民主协商就草率制定工资改革方案,对工人罚款处罚过重),或对那些关系到工人切身利益、早该解决的问题不予解决(如改善劳动条件、食堂、单人宿舍等);第三类是工人不能正确理解改革政策,不能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工人个人利益的关系,导致工人要求过高。但这些事件通常是由于工厂领导缺乏民主、享有特权或滥用职权谋取私利而引发的。”

519

全总领导层传达的信息使人们对劳工骚乱的发展有了一个总体的了解,而上海市总工会主席袁张度在讲话中更加生动地讲述了上海发生的一些具体事件。袁在1985年8月的讲话中提到,“在一家企业,尽管职工代表提出了一些问题和不同意见,但领导们还是召开了职代会走了个形式,批准了内部经济承包计划。职代会被迫批准该计划的第二天,就发生了集体停工事件。”⁵²⁰袁在后来的讲话中进一步透露:

“今年以来,一些工厂领导贪污腐败、工资奖金分配不合理,导致工人怨声载道、怠工停工,工人指责工厂领导层享受升职、加薪、奖金、岗位津贴等福利,贪得无厌。一些企业对工人的罚款过于频繁,导致工人抱怨“干部”收入不合理。各种形式的工资增长,工人的收入却因为罚款和处罚而不断减少。虽然在上海怠工、集体停工的企业还只是少数,但消极怠工、变相怠工却相当普遍。”⁵²¹

1987年和1988年,劳工骚乱的爆发并未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平息。珍妮·威尔逊(Jeanne Wilson)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说:“到1987年,中国罢工和工业停工现象有所增加。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提供的数据,1987年中国发生了97起罢工,1988年发生了100多次罢工,其中最大的一次是浙江省一家纺织厂,涉及1,500名工人,最长的一次是中国西北部一家医疗器械厂,罢工持续了三个月,涉及1,100名工人”⁵²²。威尔逊的叙述中有一点需要注意:她声称1987年罢工“有所增加”,这可能反映了她没有注意到1985年和1986年的类似事件。事实上,她引用的统计数据似乎并没有显示从1985-1986年到1987-1988年的罢工和劳工抗议明显增加。更准确的结论是,很明显劳工骚乱在1989年之前的四年多时间内一直存在——虽然远未达到爆炸性水平。1988年,工会研究员常凯专门研究了罢工和劳工抗议事件。他发现,许多罢工和劳工抗议事件都是由管理层的专制和不当行为引起的:在一家工厂,工人走上街头抗议工厂领导层不公平地分配工资涨幅;在另一家工厂,厂长随意将迟到罚款从1元提高到2元。工人的工资提高到30元,给每个车间主任秘密发放800元奖金,并罢免了合法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厂长无视工人对这些问题的询问,工人只得罢工;在另一家工厂,

519 《罗干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8月3日，载于《中国工会十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404-413页。“Luo Gan’s 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on Political Thought Work for Workers”，August 3, 1986, in Selected Compilation of Important Documents of Chinese Unions since the Tenth ACFTU Congress, pp.404-413, emphasis added.

520 上海市档案馆, C1-3-756-9, 《袁张度在市总七届五次委员(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85年8月23日。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 (SMA), C1-3-756-9, “Yuan Zhangdu’s Report at the Fifth (Enlarged) Council Meeting of the Seventh Congress of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August 23, 1985.

521 Ibid.

522 Jeanne Wilson, “‘The Polish Lesson’”，p.270.

厂长在住房分配上偏向他们自己，之后工人罢工了两天。⁵²³

与我们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看到的一样，中国 1980 年代的劳工骚乱不仅包括罢工和抗议等公开的反抗行为，还包括许多日常和微妙的反抗形式，例如偷懒、旷工、迟到、工作中过度粗心、浪费材料以及对工厂管理人员的言语和身体骚扰。陈秉权和袁张度的上述讲话都声称，频繁的“消极和隐蔽的怠工”和“偷懒”，即工人拒绝在工作中尽最大努力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规模无法准确确定，但显然是巨大的。1986 年，社会学家安德鲁·沃尔德(Andrew Walder) 采访了一位工厂经理，他承认，由于工人对他们所认为的住房分配不公感到不满，“他避免去食堂，因为害怕遇到经常上访的人，一位心怀不满的工人甚至把家人的家具堆放在办公室门口，以戏剧化地展示他们的困境”⁵²⁴。杰基·希恩 (Jackie Sheehan) 记录道，20 世纪 80 年代末，被工人骚扰或攻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导致“高层管理人员倾向于为自己雇佣保镖，这显然不是出于对城市暴力犯罪增加的普遍恐惧，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愤怒工人的暴力报复”⁵²⁵。

因此，在工人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如何维持劳动纪律并确保工人付出合理的努力，就成了厂长负责制时代大多数厂长必须应对的持续挑战。一种流行的解决方案是施加各种处罚和罚款，以迫使工人屈服。上面的几段引文已经提到了这一点。除了罚款之外，厂长还利用他们新获得的对工作分配的专制权力，“通过将不履行职责或挑战其权威的人调到厂内甚至厂外的低薪工作⁵²⁶”，安德鲁·沃尔德⁵²⁷说道。事实上，“以罚治厂”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成为常用词组，用来描述厂长采用的一种常见管理风格。

然而，惩罚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它不仅在确保劳动纪律方面毫无用处，而且成为工人怨恨的新目标。上文提到的全总 1986 年全国调查项目的报告以生动的细节传达了工人对过度惩罚的怨恨所带来的后果：

“1985 年 5 月 7 日，郑州某企业一名青年工人喝了敌敌畏，试图用自杀来表达对干部处罚的反抗（经及时抢救，该工人获救）。有的工人在车间办公室里大小便，以示抗议。”⁵²⁸

报告继续说道：

“有的工人说：‘你们想罚我们多少就罚多少，尽管我们没有其他权利，但我们还有怠工、停工、浪费的权利。’‘你们罚我们五块钱，我要你们十倍、百倍

⁵²³ 常凯《工潮问题的调查与分析》，《当代工会》第 1 辑，第 51-59 页，1988 年 9 月。Chang Kai,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Labor Unrest,” *Contemporary Unions Volume 1*, pp.51-59, September 1988.

⁵²⁴ Andrew G. Walder, 1989, “Factory and Manager in an Era of Reform,” *The China Quarterly* 118: 242-264, p.251.

⁵²⁵ Jackie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p.209.

⁵²⁶ 这句话中的“工人外调”不应理解为解雇工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工厂厂长通常仍然很难解雇已获得正式工身份的员工。“工人外调”通常是通过将工人重新分配到工厂运营的较低级别的附属服务或销售机构来实现的。

⁵²⁷ Andrew G. Walder, 1991, “Workers, Managers and the State: The Reform Era and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1989,” *The China Quarterly* 127: 467-492, p.473.

⁵²⁸ *The 1986 Survey on Chinese Workers’ Circumstances*, p.167.

地赔。’ ‘你们来监督，我干得认真，你们不在，我就不管了。’结果，只有领导在，他们才干得认真，领导不在，他们就无所事事……山西阳泉的矿井，出勤率和生产率本来很高，但自从罚得太重，出勤率就下降，事故增多，产量下降。1985年上半年，机器事故使矿井停产 4242 小时，产量减少 16.5 吨。”⁵²⁹

这一证据不仅表明管理层的惩罚措施如何大大增强了工人不满情绪。更重要的是，它还表明工人能够通过多种方式表达这种不满情绪，并给企业领导带来麻烦，有时是通过日常的细微行为。上面提出的其他几项证据也表明，管理层的惩罚措施经常成为促使工人罢工和举行抗议的主要因素。安德鲁·沃尔德同样证实了这一模式，他关注的是工作调动的惩罚性使用，他指出“工作任期和惩罚问题已成为紧张局势的新根源。在这样的氛围下，劳资双方的对抗在过去十年中愈演愈烈，使许多工厂陷入无休止的怠工、让步和挥之不去的敌意之中”⁵³⁰。因此，工厂主管迟早会意识到，单靠强制手段无法带来劳动纪律；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培养工人的同意。在普遍的管理专制背景下，如何培养共识并缓解车间紧张局势，成为厂长负责制时代中国工业界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它将继续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购买工业和平

如上文所述，车间矛盾的加剧是由于权力集中、管理层专制以及许多工人认为的厂长在处理分配问题时滥用权力造成的。然而，厂长们并不愿意解决这一根本原因以维持工人的同意。恢复企业管理中的工人民主，让工人真正感受到被倾听和被赋予权力，或许可以缓解车间紧张局势，但厂长们通常不愿意放弃他们新近集中起来的权力。毕竟，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以来，管理层对工作场所民主的抵制一直很强烈⁵³¹。现在，在厂长负责制时代，政策不再强调工作场所民主，可以合理地预期这种抵制会变得更加不受约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基层工人自下而上施加的压力和自上而下的肯定工作场所民主重要性的政策压力共同作用，克服了管理层的阻力，使职代会的权力行使具有真正的影响力（见第三章）。1984 年之后，自上而下的压力不再存在，仅靠工人自下而上的压力不足以迫使厂长放权力。毕竟，厂长负责制被视为建立管理专制的强大政治授权。当然，有些厂长强行采取了一些令人反感措施，后来工人的愤怒爆发后，又撤销了这些措施（武汉橡胶厂就是一个例子，如第四章所示）。但是，这些事后撤销措施，无论它们在暂时平息工人的愤怒和解决罢工方面有多有效，都不太可能有助于获得工人的持续同意和努力。

或者，工厂领导层本可以以更透明、更公平的方式解决工人最为焦虑的分配问题。但这同样不现实。毕竟，工厂经理个人从不透明和排他的方式处理分配问题所带来的偏袒、裙带关系和特权中获利⁵³²。除了为个人和家庭致富创造机会

⁵²⁹ Ibid.

⁵³⁰ Andrew Walder, "Workers, Managers and the State," p.473.

⁵³¹ 基于同期的田野调查，Martin Lockett 令人信服地记录了此类干部抵制。参见 Martin Lockett, "Enterprise Management: Move towards Democracy?"。十五年后，历史学家杰基·希恩 (Jackie Sheehan) 基于新闻报道的研究证实了洛克特的发现。参见 Jackie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chapter 6.

⁵³² 有关 20 世纪 80 年代末工厂管理者如何不顾工人的强烈不满，在分配中寻求个人特权的论述，请参阅 Andrew Walder, "Workers, Managers and the State."

外，在分配问题上的不透明交易也帮助工厂主管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个人权力。这种交易使他们能够在中层管理人员和一些一线工人中建立庇护网络。例如，安德鲁·沃尔德在 1987 年记录道：“腐败的经理……通过非法支付建立小帝国，利用这些钱为员工和工人提供非官方福利”⁵³³。这很可能就是为什么在厂长负责制实施后，秘密向车间负责人提供额外现金津贴成为工厂主管中的一种流行做法。因此，更透明的分配可能会危及整个庇护利益网络，并激怒中层管理人员，而工厂主管也非常依赖他们的同意。

出于这些原因，不断向工人发放全面加薪，尤其是奖金，几乎是厂长保持基本同意的唯一有吸引力的选择。这种物质诱惑在政治上很方便。它们不需要厂长牺牲自己的权力和特权；也不需要他们做出艰难的决定来调整工厂内部的权力和分配安排。通过“水涨船高”，厂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人的容忍度和默许专制的权力行使、管理不当和特殊津贴及特权的分配。工人们觉得他们的权力和主人地位被放弃以换取一些东西。换句话说，厂长被激励诉诸于“购买”工人的同意和工业和平。这里的潜在动态在许多不同的环境中都有相似之处。例如，李静君和张永宏将 21 世纪初中国的政治体制概念化为“讨价还价的威权主义”。在这种政体下，民众抗议被非政治化并得到平息，因为地方政府通过现金让步来回应抗议者提出的所有要求⁵³⁴。格雷塔·克里普纳(Greta Krippner)发现，战后美国政客通过增加信贷总供应量以及维持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来避免在分配冲突上做出艰难决定。这些都是满足民众需求和让分配冲突各方都满意的便捷方式⁵³⁵。厂长负责制时代的中国厂长、21 世纪初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和战后美国政客的共同点是，他们渴望通过发放容易获得的短期经济红利来规避直接面对紧迫的政治和分配问题的需要。从这个特定意义上讲，这些都可以概念化为“非政治化”的案例。

厂长能够通过加薪和奖金换取产业和平的一个关键条件是，20 世纪 80 年代国营企业管理自身财务的自主权越来越大。毕竟，如果工资等级和奖金支付必须由党国制定，企业的每一分钱支出都必须由监督其的党国当局批准和监督，那么厂长就不可能单方面提高工人的收入。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作为不断努力使国营企业更加独立于党国的一部分，企业被允许保留越来越多的利润。企业可以独立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资金。1979 年，国有企业保留的利润总额为 96 亿元人民币，占全部实现利润的 12.3%。1980 年至 1985 年间，保留年利润分别增长到 140 亿、160 亿、210 亿、290 亿、350 亿和 462 亿（占 1985 年全部实现利润的 39%）⁵³⁶。

20 世纪 80 年代初，许多职代会积极参与了这些留存利润用途的决策，如第三章所示。在过渡到厂长负责制后，这些决策权集中在厂长手中。这些留存资金

⁵³³ Andrew G. Walder, 1987, "Wage Reform and the Web of Factory Interests," *The China Quarterly* 109: 22-41, p.37.

⁵³⁴ Ching Kwan Lee and Yonghong Zhang, 2013,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6): 1475-1508.

⁵³⁵ Greta Krippner, *Capitalizing on Crisi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Rise of Fina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⁵³⁶ 项怀诚,《在改革中前进的中国财政》,载于《财政研究》1987 年第 2 期,第 1-9 页。Xiang Huaicheng, 1987, "China's Public Finance: Progress amidst Reform," *Research on Public Finance Issue 2*: 1-9.

使厂长能够任意向所有工人全面加薪，此外，还可以有选择地秘密发放补充津贴，用以获取支持。因此，厂长们既有理由与党国讨价还价，达成利润分享方案，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利润，又有理由将保留利润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加薪。1988年，两位经济学家发表的一篇研究文章报告称，前几年，企业平均80%的留存利润都用来发放奖金、补贴等福利。⁵³⁷

1984年底，厂长首次利用加薪来征得工人的同意。如前一章所述，1984年最后一个季度，许多新近实施了厂长负责制的工厂出现了“过度 and 混乱的奖金和其他实物福利支付”浪潮。决策者将这一现象归咎于工人拥有过多的民主权力（见第四章），而我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则指向相反的方向：工资上涨的猖獗实际上是由于工作场所民主的急剧下降造成的。一些市级党政官员在1985年初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武汉市委经济工作部部长孙文英在1985年3月评论说：“现在必须纠正一些厂长的错误倾向，他们为了赢得一部分工人的支持，过度升级设备⁵³⁸，肆意发放现金或实物，直到耗尽工厂的财政储备⁵³⁹。”到同年8月，这种现象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以至于有人专门创造了一个对联来描述它。武汉总工会主席李梅芳在全总会议上引用的一句话是“领导靠钱管，工人靠钱干”⁵⁴⁰。四年后，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刘仲藜在河南、河北、湖南三省调研，发现大幅度提高工资仍然是厂长逼迫工人干活的主要手段。刘仲藜的报告称，一些厂长直言“管理工人的唯一办法就是‘上班就发工资，干活就给奖金’”⁵⁴¹。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赵紫阳——还有其他政策制定者、中国的经济学家以及类似安德鲁·瓦尔德的外国研究人员——反复抱怨工厂内部存在提高工人工资的“压力”。他们认为这种压力源于工人“攀比”的愿望，这个词的意思与美国成语“跟上琼斯一家”（keep up with the Joneses）大致相同。按照他们的理解，工人倾向于关注各自行业和地区收入最高的企业（以及私营企业中蓬勃发展的部门）。据称，工人们随后推动自己的国有企业将工资提高到同等水平，从而引发了一场工资竞相上涨的竞争。1984年以后，越来越常见的是国有企业给工人的工资涨幅超过了企业所能承受的水平。然而，这些观察结果未能解释的一个谜团是，是什么让厂长如此容易受到这种加薪“压力”的影响。毕竟，收入增长的压力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实际收入增长，特别是因为中国还没有一个由供求关系决定的适当的“劳动力市场”。赵这样的政策制定者忽略了一个联系：在职场民主减弱、管理专制日益盛行的背景下，绝大多数厂长开始依赖加薪来缓

⁵³⁷ 戴园晨、黎汉明，《工资侵蚀利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潜在危险》，载于《经济研究》1988年第6期，第3-11页。Dai Yuanchen and Hon-ming Li, 1988, "Wages Eating into Profits: A Potential Danger in China's Economic System Reform," *Economic Research Issue* 6: 3-11.

⁵³⁸ 过度升级设备实际上是提高工人收入的另一种方式，因为它人为地提高了生产率，从而提高了与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和奖金支付。

⁵³⁹ 武汉市档案馆，XX000005-WS01-29-5，孙文英《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3月25日。Municipal Archive of Wuhan (MAW), XX000005-WS01-29-5, Sun Wenying, "Speech at the Municipal Economic Work Conference," March 25, 1985, emphasis added.

⁵⁴⁰ 武汉市档案馆，XX000091-WS03-124-4，李梅芳《围绕城市改革 主动参政议政》，全总十届三次执委会议材料，《武汉工运》第四期，1985年10月。Municipal Archive of Wuhan (MAW), XX000091-WS03-124-4, Li Meifang,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al Consultation with a Focus on Urban Reform", speech material for the Third Executive Council Meeting of the Tenth ACFTU Congress, reprinted in Wuhan's Workers' Movement Issue 4, October 1985.

⁵⁴¹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9), p.114.

解车间紧张局势并维持工人的同意。不管工人自己是否主动要求加薪，情况都是如此。

让我对我的论点做两点澄清。首先，我并不是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段，工人们一直在向工厂经理施压，要求他们加薪。我的观点是，厂长不断发布全面加薪政策，以缓解工人的各种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的根源在于管理层的专制，否则可以通过更民主的管理和更透明的分配来解决。换句话说，在劳资关系恶化造成潜在怨恨的背景下，厂长诉诸加薪来表面上巩固自己的权威。一些厂长预计到管理层专制完全建立后车间紧张局势可能会加剧，因此在劳资关系真正恶化之前，先发制人地采取了加薪措施。在许多情况下，加薪成为一种取悦工人的手段，以便让工人更容易忍受向管理专制的过渡。这也是为什么 1984 年厂长负责制推出后，奖金发放猖獗且混乱（其规模令赵紫阳等高层决策者深感不安）的部分原因。总之，我在这一节中的论点是以管理策略为中心，而不是工人的要求。在 80 年代的最后几年，随着工人清楚地认识到加薪是管理层唯一愿意让步的事情，并且通货膨胀率上升到难以忍受的水平，许多企业的工人可能明确要求进一步加薪。但这种要求是工厂主管已经部署的管理策略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其次，我的分析既谈到又挑战了现有学术中的一个论点，最著名的是与安德鲁·瓦尔德(Andrew Walder)有关的论点。该论点认为，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工厂的管理人员和工人形成了一种“默契联盟”，力求为整个工作场所社区⁵⁴²实现全面加薪。根据瓦尔德的说法，由于中国国营企业的工人不能轻易被解雇，工厂主管依赖于他们的努力和合作，“管理层试图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人的工资来鼓励工人合作”⁵⁴³。但瓦尔德的论点忽略了两个事实：首先，工人不合作的可能性并不是恒定的；其次，收入增长并不是确保工人合作的唯一可能途径。相对活跃的职场民主制度既可以提高工人合作的总体水平（通过让工人感觉自己在工作场所的真正“主人”），也可以解决引发不合作的各种不满尤其是那些对棘手的分配问题的不满。这并不是说，有了活跃的职场民主制度，工厂管理层就完全不会表现出通过提高工资来换取劳动纪律的倾向。我的观点是，这种倾向的突出程度，以及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默契联盟”的程度，与工作场所民主的活跃成反比。

现有证据更符合我的论证，而不是瓦尔德的论证。仔细研究瓦尔德的三篇论文中提出的“默契联盟”论证所用到的资料（主要是第一手采访、新闻报道和中国社会学家的文章），可以发现绝大多数资料描述的是 1981 年中期之前或 1984 年之后的情况。换句话说，很少有证据表明 1981 年至 1984 年间，劳资双方默契地联合施压加薪的情况普遍存在。这正是职场民主制度在党的政治议程中获得最大重视并在后毛泽东时代达到最高功能水平的时期。事实上，瓦尔德在 1987 年的论文中已经在脚注中承认，到 1982 年，“问题（企业发放过多奖金）的顶峰显

⁵⁴² 这一论点已在 Andrew Walder 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阐述，包括 “Wage Reform and the Web of Factory Interests”，“Factory and Manager in an Era of Reform” 以及 “Workers, Managers and the State”。该论点在当前学术界仍在流传。例如，参见 Hao Qi, 2018,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A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Incentive System in China’s State-Owned Sector,”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50(2): 409-426.

⁵⁴³ Andrew Walder, “Wage Reform and the Web of Factory Interests”, p.32.

然已经过去”⁵⁴⁴。但他没有探究其中的原因，从而错失了发现工作场所民主的制约效应的机会。

更能支持我的观点的有力证据是总收入统计，见下表 2。我们的分析重点应放在国有企业的人均年收入（即工人年均收入）（A 栏和 B 栏）。这是未经通货膨胀调整的名义收入，反映的是工人从企业获得的现金支付总额。其年增长率在 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末随时间发生显著变化。工人收入在 1978 年至 1980 年间加速增长，但在 1981 年至 1983 年间放缓至相当温和的水平。然而在 1984 年，工人收入增长再次大幅上升。在 1984 年至 1989 年的六年间，有四年的增长率远高于 1978 年至 1980 年的水平。1987 年和 1989 年的增长率略有下降，但仍与 1978 年至 1980 年的水平相当。总体来看，这一时期职工平均收入增长可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0 年的中高增长、1981-1983 年的低增长、1984-1989 年的持续高增长。表 2 列出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供比较。这一数据与国有企业人均年收入存在差异，是因为城镇居民除国有企业职工外，还包括了其他类别：集体企业职工、小企业主、党政干部、国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如教师）、无收入家属等。不出所料，该统计数字的绝对值总是明显小于国有企业人均年收入。但增长率显示出相同的总体趋势：1978-1980 年为中高增长，1981-1983 年为低增长，1984-1989 年为持续且过高的增长。

表 2：1978-1989 年中国城镇居民总收入统计⁵⁴⁵

	国有企业人均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A	B	C	D	E
	名义年收入 (元)	名义增长率	名义利率收入 (元)	名义增长率	实际增长率(根 据通胀调整)
1977	602	/	/	/	/
1978	644	7.0%	343.4	/	/
1979	705	9.5%	387.0	12.7%	12.7%
1980	803	13.9%	477.6	23.4%	12.7%
1981	812	1.1%	491.9	2.9%	0.5%
1982	836	3.0%	526.6	7.1%	4.9%
1983	865	3.5%	564.0	7.1%	5.0%
1984	1,034	19.5%	651.2	15.4%	12.4%
1985	1,213	17.3%	739.1	13.5%	1.5%
1986	1,414	16.6%	899.6	21.7%	13.8%
1987	1,546	9.3%	1,002.2	11.4%	2.4%
1988	1,853	19.9%	1,181.4	17.9%	-2.4%
1989	2,055	10.9%	1,375.7	16.4%	0.2%

我们如何理解这三个阶段的变化？1978-1980 年的高增长部分归因于 1977 年和 1979 年全国范围内上调工人工资等级的政策（见第三章的简要讨论）。此外，在恢复奖金制度和许多企业被允许保留利润后的最初几年里，一些厂长确实采取

⁵⁴⁴ Andrew Walder, “Wage Reform and the Web of Factory Interests,” pp.34-35, footnote 49.

⁵⁴⁵ 国有企业人均收入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来自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9), p.251.

了全面加薪的措施来争取工人的合作。这是安德鲁·瓦尔德（Andrew Walder）记录的管理行为，这无疑也有助于这一时期的高收入增长。但这种增长在 1981 年很快便有所减弱。经济放缓与一系列强调职场民主作为高度优先的政治议题的政策态度相吻合（见第二章）。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许多工人通过他们的职代会有意义地行使民主权力（见第三章），推动他们收入快速增长的力量受到抑制。

然而，1984 年，工人的收入增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为什么呢？1983 年至 1984 年的另一轮全国性工资调整与此有关，但只能为 169 元的增长提供部分解释。按照官方规定，企业发放的工资上调总额不得超过每名工人 84 元乘以 1978 年底的在岗工人总数⁵⁴⁶。因此，工人实际得到的平均工资调整应该远远低于每人 84 元，因为从 1978 年到 1983 年，所有国营企业的在岗工人总数增长了 17.7%⁵⁴⁷。即使有些企业发放的工资调整超过了官方规定的数额，这些工资调整也不太可能解释 1984 年工人人均收入 169 元跃升的一半以上。这是因为工资调整是在 1983-1984 年的两年时间内逐步实施的。因此，可以合理地得出这样的结论：1984 年工资突然上涨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厂长发放的加薪（尤其是奖金），超过了官方工资调整幅度。在企业向厂长负责制过渡时，厂长利用这些加薪来缓解或预防车间紧张局势。同样，应该回想一下，1984 年最后一个季度出现了一波“过度 and 混乱的奖金和其他实物福利支付”。

表 3：1978-1989 年职场民主与工人收入增长

	1978-1980	1981-1983	1984-1989
职场民主的活力	不均匀	高	低
职工收入增长	过低	低	过高

1984 年以后，党国再也没有规定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新一轮的工资调整。相反，它鼓励建立机制，将企业为奖金支付而保留的利润金额与企业的经济绩效挂钩。少数企业，约占国有企业员工总数的 15%，被要求将其工资总额与经济表现挂钩⁵⁴⁸。随着厂长继续感到有必要通过加薪来管理车间紧张局势，他们倾向于与监督的党国机构讨价还价，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工资和奖金支出的资金数额。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安德鲁·瓦尔德观察到的“默契联盟”确实很普遍，在这种联盟中，厂长以加薪换取工人合作。事实上，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普遍。总之，收入统计的时间趋势支持了一种解释，即工作场所民主和加薪是维护工业和平的两种相互竞争的替代机制。该分析见表 3。

事实上，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中国政策制定者引用了许多统计数据来警告工人的消费基金——尤其是奖金——正在失控。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在 1987 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透露：“1、2 月份，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职

⁵⁴⁶ 劳动人事部《关于一九八三年企业调整工资和改革工资制度问题的报告》，1983 年 4 月 4 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83）》第 218-222 页。Ministry of Labor and Personnel Affairs, "Report on the Enterprises' Wage Adjustments and Wage Reform in 1983", April 4, 1983,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ACFTU (1983), pp.218-222.

⁵⁴⁷ China Statistics Yearbook, various volumes.

⁵⁴⁸ Dai Yuanchen and Hon-ming Li, "Wages Eating into Profits."

工工资、奖金、银行补贴⁵⁴⁹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0%，而去年和前年已经连续出现大幅增长；其中奖金总额增长了 36.4%。特别是春节期间，从中央到地方到企业，发放实物福利的趋势非常明显”⁵⁵⁰。这一趋势在全年都没有减弱。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987 年底的研究报告，“到 10 月底，全国收入支付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12.5%；其中，奖金支出增长了 40%”⁵⁵¹。

1988 年，情况并没有好转。《人民日报》报道说：“今年以来，各单位单独提高奖金、津贴，超额发放现金、实物现象在全国相当普遍。到三季度末，全国职工工资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20.1%，其中奖金增长 46.6%。进一步推算，职工除工资、奖金外的货币收入⁵⁵²比去年同期增长 27.5%。”⁵⁵³总之，在 1984 年底第一波收入大幅增长之后，1985 年至 1988 年，城镇职工工资持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李鹏总理甚至在 1989 年就承认，当年总消费基金预计增长 20%⁵⁵⁴。这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经济政策制定的最大讽刺之一。厂长负责制开创的反民主转向表达了一种通过限制工人的货币收入来补救党国财政危机的冲动（见上一章）。但正是在厂长负责制时代，工人的净收入飙升到以前难以想象的水平。厂长负责制的实际效果与其背后的政策意图截然相反。

购买工业和平的通货膨胀效应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中国遭受了通货膨胀的困扰。衡量通货膨胀程度的方法之一是比较表 2 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名义增长率（D 列）和实际增长率（E 列）。1979 年至 1984 年间，通货膨胀总体上比较温和，只有 1980 年例外。但 1985 年至 1989 年间，每年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八十年代末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下降。通货膨胀也可以通过各种价格指数来评估，如下表 4 所示。表 4 中显示的趋势与我们通过比较表 2 中的 D 列和 E 列所观察到的趋势一致。1979 年至 1984 年间，通货膨胀问题并不严重，除了 1980 年工人生活成本和零售总价格指数出现短暂飙升⁵⁵⁵。相比之下，以 1985 年为关键转折点的 80 年代后半期，通货膨胀持续猖獗，并在 1988 年达到了顶峰，出现了众所周知的现象：在经历了几年的严重通货膨胀之后，1988 年夏天，党的领导层宣布将进行价格改革，引发了大规模的抢购，导致物价上涨到天文数字。⁵⁵⁶

⁵⁴⁹ 城镇企业通常从银行账户中提取资金支付员工工资。银行（当时基本上都是国有银行）负责登记，有时甚至监控企业用于支付员工工资、奖金和其他款项的金额。姚依林在这里说的是银行支付员工工资，指的即是这个。

⁵⁵⁰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7), p.134, emphasis added.

⁵⁵¹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7), p.361.

⁵⁵² 工人的税后工资除了工资、奖金外，还包括企业发放的各种补贴、补助等。

⁵⁵³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8), p.225.

⁵⁵⁴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9), p.127.

⁵⁵⁵ 巧合的是，1980 年也是中国爆发重大劳工骚乱的一年（参见第二章）。那一年物价和生活成本的飙升，或许在酝酿工人的不满情绪并促使他们采取行动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⁵⁵⁶ 有关这一戏剧性事件的最新复述，请参阅 Isabella Weber, *How China Escaped Shock Therapy*, chapter 8.

表 4: 1979-1988 年价格指数⁵⁵⁷

	工人生活成本指数	消费品市场交易价格指数	总零售价格指数
1979	1.9	-4.5	2.0
1980	7.5	1.9	6.0
1981	2.5	5.8	2.4
1982	2.0	3.3	1.9
1983	2.0	4.2	1.5
1984	2.7	-0.04	2.8
1985	11.9	17.2	8.8
1986	7.0	8.1	6.0
1987	8.8	16.3	7.3
1988 (1-9 月)	17.7	33.2	16.0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最后几年，通货膨胀超过了许多工人的收入增长，导致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987 年发表的上述报告警告说：“根据有关机构的研究，城镇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比例将大大超过去年的 20%”⁵⁵⁸。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份报告警告的还要糟糕。刘国光在党中央一次会议上指出，一些省份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尤其明显：

“（1987 年）我们听到了过去几年从未听到过的坏消息。据新华社内部通报，黑龙江省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自 1979 年至 1986 年平均每年提高 7.3% 以来，1987 年首次下降，全省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比率为 49.9%。江苏省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也出现 9 年来首次下降，半数以上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物价上涨。”⁵⁵⁹

刘国光提供的信息尤其令人担忧，因为这里提到的两个省份黑龙江和江苏处于截然不同的地理区域，经济状况也大不相同。这表明问题的规模比特定的地理或产业集群更广泛。安德鲁·瓦尔德（Andrew Walder）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购买力大幅增加，但这些增加主要发生在 1986 年之前。在那一年之后，实际工资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开始下降，工人们发现维持他们在 1980 年代中期享受的消费模式越来越困难。”⁵⁶⁰

通货膨胀也导致政治焦虑的积累。1987 年和 1988 年，党和国家领导层多次指出，失控的通货膨胀可能酿成严重的政治麻烦。这些焦虑导致赵紫阳在 1988 年发表了引人注目的评论，称应准备采取类似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后宣布的戒严令的紧急措施来应对任何潜在的动乱。1988 年 5 月，在与中共政治局常委成员的内部会议上，赵紫阳就如何规划价格和工资改革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说：

“我们需要为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我们必须防止任何异常情况并保持局势稳定。我们需要制定一部紧急安全法，以保证改革的稳定秩序，并在必要时

⁵⁵⁷ 刘鸿儒，《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载于《金融科学》1989 年第 1 期，第 21-29 页。Liu Hongru, 1989,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China’s Inflation,” Financial Science Issue 1: 21-29.

⁵⁵⁸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7), p.361.

⁵⁵⁹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8), p.111.

⁵⁶⁰ Andrew Walder, “Workers, Managers and the State,” pp.472-473

赋予国务院特殊权力。回想一下，波兰曾宣布半年内不允许发生罢工或街头抗议。现在紧张局势如此严重，不可能没有抗议。”⁵⁶¹

从一年后发生的事来看，赵紫阳真是有先见之明！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如此失控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几乎总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可能找出单一因素作为根本原因。不过，我认为工人名义收入的快速增长，或者更准确地说，管理层依靠不断加薪来换取工业和平的策略是推动通货膨胀的关键因素之一。当时的经济学家们自己也意识到工人的收入增长是问题的一部分。政策话语中经常援引的分析思路将通货膨胀归因于“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两者之间的差距推高了货币供应量。在这种宏观经济分析中，“总需求”是指 1) “投资需求”，即用于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总额，和 2) “消费需求”，即消费基金的总规模，其中工人的收入是消费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1986 年 12 月，党的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副总理姚依林指导）准备的一份报告是这种分析的众多例子之一。该报告认为：

“但（今年）社会总需求还是大于总供给，主要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的增速还是大大超过国民总收入的增速（7%）。所以货币发行量还是比较多，这也是物价比较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⁵⁶²

随后几页，报告重申，“过去几年，无论是生产性建设需求，还是生活性消费需求，总体上都大大超过了现有生产能力的供给能力”。⁵⁶³

同样，国务院计划委员会大约在同一时间编写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表现为与国民总收入增长相比，固定资产投资量过大、投资结构不合理、工人报酬增长速度过快。”⁵⁶⁴这一分析由此得出了通货膨胀至少有三个主要原因：1) 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过大；2) 消费基金增长过快，最明显的表现是职工净工资增长过快；3) 生产能力停滞不前。换言之，职工收入增长被列为通货膨胀诸多原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这种对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宏观经济分析仍然处于过高的抽象水平。让我们无法看到过度加薪究竟是如何导致通货膨胀的。基于经济学家在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同期研究，我在此阐明了工人工资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几个具体联系机制。首先，由于厂长将企业留存利润的绝大部分用于奖金和额外福利（估计这部分平均占到留存利润的 80%），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企业的投资需求。对于投资相关的支出如新增产能建设、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依赖银行贷款⁵⁶⁵。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银行还不是自负盈亏的独立金融机构，因此它们没有动力对企业的贷款申请进行过于严格的审查。尤其是当地方政府向银行施压，要求其更加宽松时，情况尤其如此。

于是，厂长们为了涨工资，动用了企业留存资金，导致银行贷款急剧膨胀，

⁵⁶¹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8), p.151.

⁵⁶²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6), p.169.

⁵⁶³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6), pp.171-172.

⁵⁶⁴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6), p.189.

⁵⁶⁵ Dai Yuanchen and Hon-ming Li, "Wages Eating into Profits."

1985年，全国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银行贷款占20.1%，当年银行贷款总额比上年增长97.4%（上一年的增幅只有34.5%）。⁵⁶⁶由于增长如此迅速，银行体系发放的贷款总额很快就超过了银行存款总额，两者之间的差距迅速扩大。事实上，仅1986年，银行贷款总额就超过存款总额483亿元（相比之下，在1981年至1985年的五年间，这一差额累计达到642亿元人民币）；据进一步估计，1986年积累的缺口中有68%是由为固定资产投资进行融资而发放的贷款造成的。⁵⁶⁷作为货币创造机构，当银行发放的贷款多于存款时，它们就会人为地增加银行系统外流通的现金量。货币供应量过剩带来了严重的通胀压力。

其次，为了增加企业内部留存的利润（然后主要用于加薪），厂长们试图通过操纵部分自由化的价格体系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经济学家戴园晨和黎汉明记录了厂长们如何通过多种方式提高企业产品价格：

“在实行价格双轨制⁵⁶⁸的企业中……企业把国家计划体制下按指令性价格采购的产品，变成按市场价格销售的产品；由于新产品有不同定价档次，企业把旧产品稍加改动，就宣称是新产品，大幅度提高价格；甚至企业向国家请愿，要求提高旧产品的价格。”⁵⁶⁹

经济学家宋运肇补充道，为了提高利润留存和奖金支付，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产品被纳入“双轨制”定价体系。在这一体系下，配额是根据企业必须向国家计划机构供应的产品数量来分配的，而国家计划机构则根据国家规定的价格采购和分配这些产品。企业生产的任何超过配额的产品都可以按照浮动的市场价格自由出售。配额通常由企业和监督的党国当局协商确定，市场价格往往明显高于国家对同一产品的规定价格。因此，试图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有动机将配额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以便其产品有更大的份额可以在市场上销售。许多企业滥用新近获得的定价权，其行为可能被视为价格操纵⁵⁷⁰。毫不奇怪，即使是少数企业疯狂涨价也会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大幅提高总体价格水平。

第三，尽管城镇工人的支出一般低于收入，但积累的储蓄使得恐慌性购买成为可能。20世纪80年代，中国居民将不断增长的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存入银行。1949年至1979年间，居民储蓄总额为281亿元，而1980年至1987年间，居民储蓄总额每年分别增加118亿元、124亿元、151亿元、217亿元、322亿元、408亿元、614亿元和838亿元。⁵⁷¹1986年，城镇工人的工资总额增加了181亿元，而城镇居民的银行储蓄每年增加135亿元。粗略计算，当年工人将工资增长的

⁵⁶⁶ 宋运肇，《中国通货膨胀成因的分析》，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二期，第1-6页。Song Yunzhao, 1989,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China's Inflation," *Journal of Fud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Issue 2: 1-6.

⁵⁶⁷ Ibid.

⁵⁶⁸ 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产品被纳入“双轨制”价格体系。在该体系下，企业根据必须向国家计划机构供应的产品数量获得配额，而国家计划机构则根据国家规定的价格采购和分配这些产品。企业生产的任何超出配额的产品都可以按浮动的市场价格自由出售。配额通常由企业负责监督的党政机关协商确定，而市场价格往往明显高于国家对同类产品的定价。因此，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有动机将配额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以便在市场上销售更多份额的产品。

⁵⁶⁹ Dai Yuanchen and Hon-ming Li, "Wages Eating into Profits," p.10.

⁵⁷⁰ Song Yunzhao,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China's Inflation."

⁵⁷¹ Dai Yuanchen and Hon-ming Li, "Wages Eating into Profits."

70%以上存入银行。高储蓄率抑制了城镇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并使通货膨胀比本来应该的要温和，但也意味着可以突然提取大量资金来为恐慌性购买提供资金。1988 年中期，在几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引起普遍焦虑之后，官方宣布即将进行价格改革，这被中国民众（无论正确与否）视为即将出现更剧烈价格上涨的预兆。焦虑立刻变成了恐慌。人们匆忙地拿出积蓄去购买他们能买到的任何东西。结果，本来大幅上涨的价格现在成倍飙升，使 1988 年成为通货膨胀最严重的一年（见表 4）。1988 年也是后毛泽东时代家庭储蓄总额首次减少的一年⁵⁷²。

总而言之，前一节和本节共同提供了双重因果论证。首先，民主改革运动带来的职场民主的衰落导致了厂长采取一种管理策略，主要依靠全面加薪来维持工业和平。其次，这种管理策略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通货膨胀猖獗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1989 年民主运动前夕困扰中国政治经济的最大挑战可以部分归因于职场民主的衰落。尽管从计量经济学角度来看，似乎不可能准确地找出 1985-1988 年通货膨胀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职场民主的衰落，但密切的时间关联（见表 2 和 4）表明该论点非常有说服力，即 1985-1988 年通货膨胀与职场民主的衰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工人的收入在 1984 年（即厂长负责制推出的同一年）开始大幅增加，而第二年很快又出现了猖獗的通货膨胀。如此高度的时间对应性与因果解释相吻合。

应该承认，这种时间关联的因果解释因混杂因素而变得复杂，因为厂长负责制并不是 1984-1985 年唯一发生的重大政策变化。1985 年初，国务院扩大了双轨制定价体系⁵⁷³，将钢铁、木材和水泥等基本工业原材料纳入其中。这项政策实际上允许双轨制在整个工业经济中运作⁵⁷⁴。市场价格往往远高于国家规定的价格。这种价格差异创造了充足的操纵机会，从而推高了整体价格水平。无法从数量上区分这种定价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与厂长负责制的影响。原因是，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工作场所民主的衰落导致通货膨胀的机制之一正是通过定价。许多企业热切地利用扩大的双轨制提供的新价格操纵机会，正是因为他们试图增加留存利润，以便不断加薪。从统计上讲，扩大的双轨制与职场民主的衰落之间存在“互动”效应。如果没有厂长负责制，仅由扩大的双轨制引起的通货膨胀可能会温和得多。

最后，我应该澄清的是，我的因果论证的两个方面都依赖于关键的促成因素和前置条件。只有在特定条件下，职场民主的衰落才会导致工资不断上涨，而以这种工资上涨为中心的管理策略又会加剧通货膨胀。第一个因果关系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国营企业的工厂经理不能自由地雇佣和解雇工人，因此需要采取一些手段来争取工人的同意；第二，国营企业管理自身财务的自主权的扩大使得不断和任意地全面加薪成为可能。第二个因果关系同样取决于几个条件，包括 1) 看似奇怪的银行系统，银行可以发放超过其存款总额的贷款，但对自己的盈亏不承担责任，以及 2) 双轨制体现的部分价格自由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将

⁵⁷² 殷孟波、冯用富，《对〈中国转型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和货币控制〉一文中某些观点的讨论》，载于《金融研究》1995 年第 5 期，第 57-62 页。Yin Mengbo and Feng Yongfu, 1995, "Comments on 'Inflation and Monetary Control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Financial Research Issue* 5: 57-62.

⁵⁷³ 有关双轨价格制的简要解释，请参阅脚注 568。

⁵⁷⁴ Isabella Weber, *How China Escaped Shock Therapy*, p.182.

职场民主的衰落与通货膨胀联系起来的论点有助于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一些最奇特的特征。因此，这一论点不应被理解为对工作场所民主与通货膨胀之间一般关系的陈述。

寻找政策解决方案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中国政策制定者试图遏制工人收入的快速增长，但毫无成效。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从未正确诊断出这种疯狂增长的真正原因。他们的一些分析甚至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看到，1984年厂长负责制推出后，赵紫阳等人分析认为工人对厂长行使过多民主权力导致奖金发放混乱。对于这些政客来说，关键挑战是如何确保厂长对“国家利益”负责，而不是“工人的利益”，赵紫阳在1985年初一度考虑派“国家代表”进厂监督企业管理者，这当然违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初衷，最终没有实行。

到1986年，中国决策者确定了另一项改革举措，人们认为这项举措既能深化企业自主权，又能加强厂长对国家的责任感：企业承包制（这项改革政策的正式名称是“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顾名思义，这是一种将公共企业承包一段时间（通常是三年）并可续签的制度。承包企业应当与国家签订承包租约。租约会规定企业每年应上交国家利润和税收的数额或比例，以及企业必须满足的一系列其他要求（例如工作场所安全和技术升级）。在租约期间，承包商担任厂长。只要满足租约规定的要求，他们就有权对上述企业进行广泛的管理决策。任何超过上交配额的利润都应留在企业内部；相应地，承包商在向国家支付预先规定的利润和税收后，须承担任何损失。

一方面，很容易看出这种承包制如何进一步扩大了国营企业相对于党和国家的自主权。这种制度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党和国家对企业日常运营和商业决策的干预和监督。管理权现在完全掌握在工厂承包商厂长手中。这种制度建立在1980年代初零星尝试过的各种承包安排的基础上，并加以推广。另一方面，这种制度被认为增加了厂长对国家利益的责任感。企业对党和国家的经济义务现在以正式的、不可重新谈判的定期合同形式规定。党和国家不再负责承担企业的损失。

伴随这种企业承包制而来的，是一种新的辩护话语，即那些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本质应该如何被重新思考。这种话语通常被称为“两权分离”。它提出，这些企业的名义所有者“全民”和作为“全民”代表的党和国家应该靠边站，不干涉那些实际行使这些企业管理权的人。换句话说，所有权应该与经营权分离。社会主义公有制背景下的“两权分离”话语与垄断资本主义背景下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理论有着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⁵⁷⁵。1986年11月，赵紫阳主持的国务院会议讨论了一份内部备忘录，其中概述了企业签约的理由，并于当年12月最终确定为公开声明：

“……在企业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必须放开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权，使**经营者（经理人）**享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使相应的权利、责任和经济效益真正匹配。在经营责任制下，税收、产品、利润分配等都可以在合同中规定，国家不再

⁵⁷⁵ Adolf Berle and Gardiner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Routledge, 1932.

干涉企业内部事务。”⁵⁷⁶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两权分离”的论述特别关注公有企业所有者（本质上可以理解为国家）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工人是否可以或应该拥有任何管理权的问题现在被搁置一边。这种论述与赵紫阳在1980年（现在感觉可能像是一个世纪之前）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概念大不相同。当时，赵紫阳有力地论证说，全民所有制不应理解为国家所有制，工人民主构成了两者之间的质的差异（见第一章）。这两种观点之间的惊人对比揭示了1980年代中国经济政策制定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1986年和1987年企业承包经营制的推出未能抑制城镇职工的收入增长。尽管1987年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1988年工人工资的增长势头却全面恢复（见表2）。从本章的分析角度来看，这并不令人费解。企业承包并没有解决工人工资快速上涨的根本原因，即职场民主的衰落。工厂的承包者兼厂长们继续依靠加薪来换取工人的默许。尽管与国家签订了承包合同，但厂长们仍然能够通过操纵价格提高企业盈利能力、超支留存利润以及通过会计手段“隐瞒”利润等方法来提高工人的工资。安德鲁·瓦尔德（Andrew Walder）所描述的追求不断增长的工资的“默契联盟”在1980年代最后几年依然强烈存在。

然而，这些发展确实让决策者感到困惑，他们仍然不知道工人消费基金扩张的实际动力是什么。为了弄清这个“谜题”，决策者不得不更新他们的分析。赵紫阳最终认为，工厂承包者的“短视”行为——即他们的追求工人短期收入增长而牺牲企业长期经济活力的做法，是“两权分离”不够的结果。1987年11月，在一次关于企业改革的内部讨论中，赵紫阳对当时关于企业“短视”行为的争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赵紫阳在那里说的话很有启发性，值得引用：

“有人提出一种理论，认为企业在外包后倾向于采取短视行为。这种理论是错误的。它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即在外包之前没有短视行为，短视行为只是在外包之后才出现的。其实，企业经营权越充分，短视行为越少；企业经营权越有限，工人越不把企业当成自己的企业，短视行为越严重。现在实行的企业承包并不能完全解决企业不注重长远行为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完善企业承包制度。企业行为是短视还是长远，关键看承包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如果政策是长期的，企业就会为长远打算；如果承包只是一种临时措施，政策经常变化，企业必然会短视。解决企业如何处理长远与短视行为的问题，需要我们明确，企业承包作为一项政策，需要长期肯定，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没有企业承包制，就不会出现企业家。只有进一步完善企业承包制度，才有可能产生一大批企业家，企业的行为才会好起来。”⁵⁷⁷

这段长引文值得仔细解读。赵紫阳首先驳斥了另一种流行的观点——企业之所以短视，是因为承包使得国家难以行使所有者的监督权。赵紫阳的分析则持相反观点：问题在于管理权没有得到充分加强，而不是所有权被削弱。具体来说，赵紫阳认为，企业之所以短视，是因为1）在现行承包安排下，企业独立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利仍然“不够充分”，2）承包安排无法确保稳定和持久。相反，赵紫阳的理论认为，如果长期安排赋予公营企业真正自主的权力，那么短视行为将在

⁵⁷⁶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6), pp.142-143, emphasis added

⁵⁷⁷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7), pp.339-340, emphasis added.

很大程度上被根除，工人的消费基金最终将得到控制。这些实体将被允许对其生产资料的使用和分配行使充分的、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就像它们是自己的一样。

尽管赵在这里所说的并没有明确质疑公有企业的所有权安排，但他的理论提供了一种与新古典产权理论惊人相似的逻辑。后者认为，经济行为者将被激励明智而有效地利用财产，只要他们对财产的权利是明确界定的、排他性的、稳定的和有保障的。赵的理论本质上呼应了这一点：企业短视行为的最终解决办法只能是更“充分”的承包安排，赋予企业尽可能接近产权的东西。在 1980 年代后期，大规模私有化公有企业尚未被视为具有政治可行性。在上述 1987 年 11 月演讲的另一部分中，赵本人拒绝了大规模私有化，认为其可能带来灾难性的贫富不均和社会紧张，因此，不赞成中国大规模私有化。⁵⁷⁸一位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的政策研究员证实了这一点。该研究所是一个与赵紫阳关系密切的半官方智库。据他所说，赵紫阳和他的副手明确拒绝了智库提出的将所有权问题推到聚光灯下的建议。⁵⁷⁹尽管如此，考虑到遏制企业“短视行为”的实际需要，赵紫阳还是发表了一项分析，暗示承包安排应尽可能类似于私有财产。

赵紫阳的上述讲话也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承包企业中，谁应该被赋予“足够”的经营权？一方面，赵紫阳在引文的中间部分指出：“企业的经营权越是受到限制，工人就越不把企业当成自己的企业，短视行为就越严重。”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强化后的经营权应该由工人来行使。另一方面，赵紫阳在引文的结尾部分明确指出，企业承包是为了培养“企业家”，一批有能力、有远见的管理者来担任承包者的职务。后一种对承包者作用的重视，与赵紫阳在其他场合反复强调的一致，也与企业承包的实际做法相一致。

从技术上讲，企业全体职工可以充当企业的集体承包人（这叫“集体承包”或全民承包）。但赵紫阳在 1987 年的另一次讲话中明确表示，在集体承包中，厂长应该签署承包合同，代表“集体承包人”行使管理权⁵⁸⁰。在更常见的情况是，企业被承包给一个经理个人，这个工厂的承包人厂长要对企业拥有全面的管理权力和责任（全权负责）。赵紫阳在 1987 年初召集所有省级领导开会时澄清说，企业承包制度首先是为了激励承包人厂长，将管理权力、责任和经济回报更充分地集中在他们手中⁵⁸¹。同年晚些时候，赵紫阳在另一场演讲中声称，企业承包制的推出带来的一个重大积极变化是，“现在，厂长说什么，工人们都照做。”他接着断言，要让企业承包制真正发挥作用，需要做的是“转变经理与员工紧密相连的观念”，而是“树立经理在企业中的权威”⁵⁸²。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工人的形象在赵紫阳 1987 年 11 月的讲话中仍然令人不安地隐现，维护工人主人翁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尚不能被公开否定。与此同时，一种准新古典主义财产权框架现在开始以模棱两可和偷偷摸摸的方式进入政策领域。

1987 年 12 月，赵紫阳又借此机会进一步阐述了他对“两权分离”思想的发展。在赵紫阳设想的“完善”版企业承包经营中，承包者的经营权与私有财产权

⁵⁷⁸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7), p.337.

⁵⁷⁹ 对话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进行。

⁵⁸⁰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7), p.172.

⁵⁸¹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7), pp.47-48.

⁵⁸²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7), p.172.

更为接近：

“全民所有制企业，企业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企业代表即厂长的经营管理权包括对该财产的使用权、占有权、支配权和处分权。”⁵⁸³

赵在这里所概括的赋予承包者厂长的一揽子公有财产的经营权，仍然不等同于私有财产权。这里忽略了几个实质性的方面，比如财产继承权和在市场上出售财产的权利⁵⁸⁴。众所周知，中国公共企业的实际大规模私有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经历了更为动荡的过程。相反，我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看到的是思想和政治种子的播撒。

虽然像赵紫阳这样的政策制定者并没有足够的勇气将私有化提上议程，他们阐述的政策理念越来越类似于公有财产的私有化，并将这些理念推向政治审议的中心。换句话说，20 世纪 80 年代末发生的事情是中国最终开始大规模私有化公有企业的历史中一个重要的“助产”事件。作为控制工人收入增长和纠正厂长“短视”行为的政策项目的一部分，“两权分离”的论述和赵紫阳随后的激进化预示并奠定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最终发生的事情的基础。

章节结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论文是 1989 年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的前史。本章明确阐述了这种联系。厂长负责制明确开启了一个管理专制、车间紧张和依赖全面加薪来换取工业和平的时代。这导致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循环。失控的通货膨胀是导致各城市部门普遍和强烈不满的关键因素之一（与干部腐败和官员牟取暴利一起）——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基层党政工作人员、小企业主等——并最终激发了他们热情地参与 1989 年的运动。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职场民主被边缘化，这像回旋镖一样困扰着党的领导层。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帮助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具爆炸性和悲剧性的民主运动。也就是说，民主的幽灵，曾经被逐出中国工厂的抗议者几年后又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出现在街头、公共广场以及众多工作场所内。

本章讲述的故事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工人历史能动性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中国工人不仅通过一波波的斗争性政治活动（如 1956-1957 年、1966-1967 年、1980-1981 年和 1989 年的戏剧性事件），还通过在车间日常和细微行动产生的宏观经济后果来行使权利，并对党国提出了深刻挑战。更重要的是，工人能动性的表现形式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之间流畅地转换。在厂长负责制时代，尽管工人在工作场所表达意见的制度渠道受到限制，但工人仍然通过偶尔罢工、偷懒、懈怠、浪费、闲言碎语、在厂长门口堆放家具以及在车间办公室大小便，对管理层施加巨大压力。他们没有赢回民主或更平等和公平的工作场所，但他们“赢得”了不断增加的工资作为安慰奖。从这个角度看，1980-1981 年的劳工抗议浪潮和 80 年代后半期的通货膨胀失控都证明了工人的巨大能动性，尽管它们看起来是性质非常不同的现象。1989 年，工人能动性的宏观经济表现引发了另一次更为激烈的政治表现。

最后，本章指出了在 1984 年之后的几年里工人收入快速增长的一个“副作

⁵⁸³ *Marching through the Storms* (1987), p.356.

⁵⁸⁴ 我感谢 Cihan Tugal 提出这一点。

用”。这种影响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后来却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后果。为了弄清厂长为何会做出“短视”的行为，赵紫阳等政策制定者对国有企业性质提出了新的理解，这种理解类似于新古典产权理论。他们首先提出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两权分离”。后来，他们对“经营权”的理解更加激进，强调工厂经理拥有明确而持久的权力，可以像对待自己的财产一样使用、保留和处置公有财产。尽管大规模私有化在当时仍是政治禁忌，但这似乎只是赵紫阳等人在 80 年代末所推进的行动的一个逻辑延伸，而接下来十年大规模私有化浪潮的政治和思想基础，大部分都是在这几年中建立起来的。

结论：现实社会主义下“真正的乌托邦”

前几章已经展示了关于工作场所民主问题的政治争论和政策措施是如何以多米诺骨牌般的方式“传递”20世纪70年代末的危机，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的。1970年代末的深刻政治危机迫使人们寻找替代性的意识形态话语来为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秩序辩护。其中一些话语和相关的政策试验很快在1980年底和1981年初引发了一场爆炸性的劳工骚乱浪潮，这带来了更紧迫的政治危机。这导致了消极革命式的政策让步，以部分加强车间民主制度。但在刚刚起步的市场改革背景下，这些制度使工人的“经济主义”滋长，面对持续的财政危机，党的领导层很快就无法容忍这些做法。结果就是1984年的反民主转折，而车间民主的明显弱化意外地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形式是1980年代后半期不断加剧的周期性通货膨胀。伴随着对这种失控通货膨胀日渐高涨的不满情绪，中国步入了动荡的1989年。

这一结论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它为前面几章中呈现的历史叙事提供了最后一个缺失的“尾声”。具体来说，它仔细考察了1989年民主运动及其对中国政治经济轨迹的影响。然后，第二部分讨论了这篇论文对社会主义比较研究的更广泛影响。最后，第三部分探讨了这篇论文对21世纪及以后反资本主义战略的影响。

尾声：1989年及其后

学术界和大众普遍认为，猖獗的通货膨胀是不满情绪的主要来源之一，为1989年民主运动提供了动力。在上一章中，我们看到，赵紫阳早在1988年就已警告称，通货膨胀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并需要采取类似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1981年在波兰采取的紧急措施。事实上，在抗议爆发前的一年里，决策圈普遍认为中国正处于政治动荡的边缘，而通货膨胀是主要的不稳定因素。时任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的吴伟曾讲述过这一故事⁵⁸⁵。自1989年以来，通货膨胀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观察家们试图弄清这些爆炸性运动的社会经济根源。例如，安德鲁·瓦尔德（Andrew Walder）在1991年评论说，在解释为什么工人大规模参与运动时，“1986年以后的通货膨胀通常被单独列出，这肯定是工人在运动期间首先提到和最常提到的不满之一。这种通货膨胀通常被认为是工人不满水平迅速上升的原因，或者更普遍地说，是十年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所激发的物质期望落空的原因”⁵⁸⁶。经济学家迈克尔·马丁（Michael Martin）在1992年的分析中指出，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和实际收入下降或停滞是影响1989年运动中所有最活跃参与者的共同因素⁵⁸⁷。三十年后，历史学家杰里米·布朗（Jeremy Brown）在最近发表的一篇关于1989年运动的报道中，在讨论运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时，同样强调“1988年和1989年初猖獗的通

⁵⁸⁵ 吴伟，《“社会突发事件研究”预警 89 学潮》，载于纽约时报中文网，2014年11月10日。Wu Wei, “‘Research on Sudden Incidents in Society’ Forecast the Student Protests of 1989,” *New York Times (the Chinese Site)*, November 10, 2014. Accessed at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1110/cc10wuwei36>.

⁵⁸⁶ Andrew Walder, “Workers, Managers and the State,” p.467.

⁵⁸⁷ Michael Martin, 1992, “Urban Incomes, Workers’ Democracy and the Spring Uprising,”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4(3/4): 136-165.

货膨胀加剧了公民的不满”⁵⁸⁸。至于面向公众的媒体账户，总部位于香港⁵⁸⁹的有影响力的独立中文媒体平台端传媒（Initium Media）于2019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纪念运动三十周年。其中一篇文章专门讨论了失控的通货膨胀是关键的动力因素⁵⁹⁰。

基于现有的学术研究⁵⁹¹、已发表的资料以及我进行的采访，我之前的通俗和学术著作⁵⁹²对工人参与1989年民主运动的方式提供了修正主义的理解，这些运动通常被称为“学生主导的运动”。1989年4月中旬，中国各地的精英大学生发起了第一波示威活动，纪念刚刚去世的、备受爱戴的前党总书记胡耀邦。学生们随后在4月底将他们的行动升级为大规模抗议，要求进行更全面的政治改革。5月中旬，北京的一些激进学生发起了绝食抗议，以重新激发停滞不前的运动。当时，出于对绝食学生的同情，北京和中国其他主要城市的工人和工薪阶层居民开始大规模参与运动，人数达数十万。从五月下半月开始，工人们很快就发展出了超出学生运动范围的行动模式和言论。

工人率先反抗5月19日实施的戒严令，自发走上北京郊区的街头，与军车对峙，并说服士兵停止进城。他们不仅参加游行示威，还在工作场所发起罢工和怠工，建立跨工作场所联系，呼吁总罢工，并组织“纠察队”和“旅”来维持社区的公共秩序，并监视军队的行踪。随着公共服务在这几周内崩溃，工人和城市居民的自我组织填补了空白。他们还开始组建独立组织，制作传单，提出自己的民主愿景。这些愿景通常首先集中在车间和生产过程的民主上，与学生运动领袖所表达的更“自由”的民主愿景截然不同。6月初，工人运动变得越来越有组织、越来越激进，而学生运动则变得越来越混乱、越来越迷失方向，甚至可以等待它的自行消亡。可以合理地推测——我承认没有证据支持这种猜测——党领导层对工人日益增长的斗争热情的恐惧，可能在其最终决定用一切必要的血腥手段强力镇压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说通货膨胀的猖獗只对工人产生影响，促使其积极参与1989年运动。相反，更准确的说法是按照迈克尔·马丁的观点，通货膨胀在中国人口的各个阶层——工人、大学生、知识分子、党国的低级干部、个体小

⁵⁸⁸ Jeremy Brown, *June Fourth: The Tiananmen Protests and Beijing Massacre of 198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27.

⁵⁸⁹ 随着《国家安全法》的颁布以及香港媒体业遭受严厉打压，端传媒的总部于2021年迁至新加坡。

⁵⁹⁰ 杨路，《通胀中的六四：失败的改革如何引爆革命》，载于端传媒，2019年5月31日。Yang Lu, “The June Fourth in Inflation: How the Failed Reform Inflamed a Revolution,” *The Initium Media*, May 31, 2019. Accessed at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article/20190531-opinion-economyproblem-june4>

⁵⁹¹ 两篇文章特别重要：Andrew G. Walder and Gong Xiaoxia, 1993, “Workers in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Politics of the Beijing Workers’ Autonomous Federati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9:1-29; Shaoguang Wang, 1992, “Deng Xiaoping’s Reform and the Chinese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test Movement of 1989,”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13: 163-197.

⁵⁹² Yueran Zhang, “The Forgotten Socialists of Tiananmen Square,” *Jacobin*, June 4, 2019, accessed at <https://jacobin.com/2019/06/tiananmen-square-worker-organization-socialist-democracy>; “1989: Workers on Tiananmen Square,” pp. 496-504 in *Proletarian China: A Century of Chinese Labour*, edited by Ivan Franceschini and Christian Sorace, Verso, 2022.

商人和一般城市居民——中造成了广泛的不满。这些不满为全社会运动的浪潮铺平了道路，工人的行动在其中占据了特别强大的部分。通过通货膨胀介导的机制，党领导层在车间规范和解散工人民主的努力适得其反。工作场所民主的衰落导致了更加动荡和危险的民主运动浪潮，各个社会阶层混杂在一起，表达了各种颠覆性的民主要求。就这样，工人民主的幽灵在整个 1980 年代困扰着中国的统治精英。

许多学者认为，1989 年是中国后毛泽东时代历史⁵⁹³的一个分水岭。这篇论文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于中国的统治精英来说，1989 年发生的事情突显了市场社会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初生的和不断深化的市场改革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相关的工业公民权形式）之间持续存在的紧张关系被证明是无法解决的，而且很容易引发爆炸性危机。尽管党的领导层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基本上一无所知（相比之下，这篇论文自始至终都认为，中国市场社会主义崩溃的关键原因在于城市工人阶级与党国之间的特殊互动方式和模式），但 1989 年确实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社会主义似乎不再可行，无论有没有工作场所民主。他们现在面临的选择是严峻的：要么继续市场改革，废除社会主义公有制（实际上是开创资本主义），要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扭转市场改革（实际上回归到更正统的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必须选择一条道路，没有中间道路。

1989 年运动后的三年里，人们普遍认为⁵⁹⁴，党领导层中“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相当激烈的政治斗争，本质上都是围绕这一选择展开的。起初，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似乎占了上风。他们对市场改革方案发动了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攻击，取消了其中的许多内容，并强调维护正统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性。被逼入绝境的“改革派”拥护者邓小平于 1992 年初开始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南方之行。在这次南方之行中，邓小平动用了自己所能动用的所有政治资本，坚决推行推进市场改革的政策方案。邓小平“一生最大的赌注”⁵⁹⁵成功了，相对年轻的新一代党内领导人也迅速跟上改革的步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市场改革变得激进起来。私人资本积累蓬勃发展，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 1980 年代中国所经历的水平。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正在形成。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公有制城市产业工人阶级的解体是威权资本主义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看到，在“漫长的 80 年代”，工人的历史能动性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之间不断转换，这种动态取决于一个关键的制度条件：工人的工业公民身份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模式紧密相关。直到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中国相当一部分产业工人仍然是其工作场所的工业公民：他们几乎不会被解雇，有望享受企业提供的各种福利服务，他们更多地被视为工作场所社区的合法成员，而不仅仅是

⁵⁹³ 有关的最新阐述，请参阅 Julian Gewirtz, *Never Turn Back*.

⁵⁹⁴ Yang Su, *Deadly Decision in Beijing: Succession Politics, Protest Repression, and the 1989 Tiananmen Massac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pp.233-236. Also see Yang Jisheng, *Political Struggle in China's Era of Reform*, chapter 7; and Julian Girwitz, *Never Turn Back*, chapter 15. The Chinese-language volume *Witnessing Significant Reform Decision-Making: Oral Histories of Reform Participants* also contains many relevant recollections by the policymakers themselves about these political battles.

⁵⁹⁵ Yang Su, *Deadly Decision in Beijing*, p.239.

雇佣工人。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掀起了大规模的公有制企业重组和私有化浪潮，导致大量工人下岗、工作保障终止以及福利待遇大幅削减。工业公民时代已经结束。许多继续在公共企业工作的产业工人被安排在各种不稳定的就业岗位，这些岗位越来越像马克思所描绘的撒旦磨坊。在“漫长的 1980 年代”的中国，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一直难以应对的工人民主的幽灵，最终因为社会主义工人的生存条件被摧毁而被消灭。

对比较社会主义研究的启示

本论文的核心难题源于布洛维和卢卡奇在《光辉的过去》中提出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激励作用的经典观点，该观点已在本文的引言中提及。问题在于：如果布洛维和卢卡奇的观点是正确的，即国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结构属性使工人的基层行动具有可行性并激励工人要求社会主义民主化，那么为什么所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人普遍未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理想？在许多情况下，工人的行动甚至最终促成了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准自由主义、非自由主义或独裁资本主义的转变。布洛维和卢卡奇的论点是通过东欧的考察而形成的——特别是匈牙利的社会主义经验。本文以中国为例，探讨这一难题，力图推进比较社会主义研究的议程。

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之一是直接指出布洛维和卢卡奇的论点是错误的：国家社会主义下的工人实际上并不想要民主社会主义，或者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事实上，在与我共进晚餐的一次谈话中，迈克尔·布洛维认为他的论点可能是错误的，他对国家社会主义下工人的乐观态度是天真的。他回想起，到 1989 年，他所研究的绝大多数匈牙利工人已经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大卫·奥斯特 (David Ost) 对波兰工人也做出了类似的观察：波兰社会主义下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经历使许多工人（至少在 20 世纪 80 年代）渴望复辟资本主义，尽管他们对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⁵⁹⁶这些观察可能反映了东欧社会主义的一些历史经验，但很难说中国的经验推翻了布洛维和卢卡奇的原始论点。在中国的“漫长的 80 年代”，城市产业工人一再要求在车间得到更多的民主和权力。这些民主要求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本前提（被工人颠覆性地重新解读）的轨道上提出的。如第二章所示，1980-1981 年的中国工人从南斯拉夫和波兰工人那里获得了灵感，他们表达了工人阶级在民主运动中积极地重建文化大革命，并试图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名义上赋予他们的主人翁地位。直到 1989 年，仍然没有证据表明参加民主运动的工人更喜欢自由资本主义的民主愿景。当少数工人组织确实进行了自己的民主话语表达时，这些话语通常伴随着对深化市场改革的拒绝和对“官僚资本家”的强烈批评⁵⁹⁷。

我的论文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工人的偏好转移开来。相对地，它强调工人与党国之间的互动模式和方式。这篇论文提出的三个分析论点至关重要。首先，我强调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特征如何构建工人倾向于提出的民主要求。具体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使工人作为党国的雇员，要求工作场所民主和独立组织。但这些工人不太可能将自己视为大量公共财产的集体所有者并要求民主参与整个经济规划。第二，我已经表明，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确实经常对工人的民主要求作出让步，但这些让步往往只集中在工作场所的民主

⁵⁹⁶ David Ost, *The Defeat of Solidarity*, chapter 5.

⁵⁹⁷ Andrew Walder and Gong Xiaoxia, "Workers in the Tiananmen Protests," pp.18-21.

上。工人对车间民主的要求对国家社会主义政权来说相对容易吸收和制度化。同样重要的是，车间民主化的政策措施有时与初期的市场化齐头并进，特别是以扩大公有企业脱离党国管理自主权的形式。这种结合通常有助于工人有意义地行使车间民主。这里的逻辑很简单：为了让工人在企业事务的决策中拥有一些有意义的发言权，他们的企业必须在不受党国干预的情况下拥有一些管理自身事务的自主权。如果没有整个经济规划中的民主，扩大企业自主权必然需要扩大市场机制来协调这些更自主的企业之间的各种关系。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模式就是如此，企业内部高度民主，企业间运行着相当强大的市场机制。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表 1 中的“市场社会主义第一阶段”）也同样如此，当时部分加强企业民主制度的政策努力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措施相伴而生⁵⁹⁸。

然而，这种工作场所民主化、萌芽状态的市场改革和整个经济规划中民主的缺失是有问题的，并且具有潜在的危险。这是我对上述难题的答案的三个分析论点中的第三个。如果没有宏观层面的经济规划民主，车间的微观民主本质上是脆弱的。⁵⁹⁹ 缺乏全社会的民主规划使工人无法形成与整体经济和社会主义项目的具体联系感。相反，工人倾向于利用企业内部的民主权力来解决与生计最直接相关的物质需求。这往往导致工人追求企业的短期和特殊利益。这些做法在官方社会主义话语中通常被谴责为“经济主义”。此外，由于经济规划缺乏民主，工人通常不知道他们的微观车间行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扩大的市场机制加剧了这些问题的经济表现，将众多企业内部的短期和特殊决策聚集在一起，导致整体经济混乱。

可以确定两种策略，通过这两种策略，国家社会主义政权试图来管理这种危险的工作场所民主化、萌芽中的市场改革和整个经济规划中民主的缺失。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领导人通过进一步加强和巩固这种结构来应对这种结构的不利经济影响。几十年来，他们逐渐引入了越来越多的工作场所民主、企业自治和市场机制。南斯拉夫的结构能够持续相对较长的时间，但它倾向于在自主管理的企业内部酝酿特殊决策，长期而言这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失衡：失业、某些部门投资过度而其他部门投资不足，以及企业、部门和地区之间经济不平等的扩大（地区不平等尤其具有破坏性，因为它们与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原则相矛盾，并反映在南斯拉夫的种族分裂中）⁶⁰⁰。这些结构性弊病本身不足以使经济陷入困境，但它们使南斯拉夫极易受到 20 世纪 80 年代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国家因此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计划普遍感到怀疑和失望。

相比之下，中国领导人表现出了惊人的警觉。他们在做出让步后短短几年内就将工作场所民主化搁置一旁。当时，该结构的经济脆弱性尚未完全显现出来。促使党的领导层和政策制定者如此迅速采取行动的是他们正在努力寻找解决方

⁵⁹⁸ 请注意，我并非主张中国在此期间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措施旨在促进工作场所民主。相反，我只是认为，公共企业的部分民主化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市场化改革浪潮之间的时间巧合，使得许多工人能够以他们认为更有意义的方式行使车间民主，正如第三章所记录的那样。

⁵⁹⁹ 在此，回顾迈克尔·布洛维 (Michael Burawoy) 在《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中的表述颇有裨益：“集体自我管理需要在生产层面和国家层面引发集体参与，这需要在这两套机制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变革。” Michael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Verso, 1985, p.112.

⁶⁰⁰ Susan L. Woodward, *Socialist Unemployment*; Pat Devine, *Democracy and Economic Planning*.

案的持续财政危机，以及他们对工人“经济主义”的根深蒂固的蔑视。此外，南斯拉夫正在发生的经济危机亦发出了严重警告，中国领导人在1984年反民主转向之前曾多次提到这一点（见第四章）。然而，这种反民主转向产生了更加成问题的格局，即工作场所民主的退化、深化的市场改革和工人剩余的制度权力（表1中的“市场社会主义第二阶段”）。在这种新格局下，管理层专制立即引发了车间紧张局势，违反直觉地导致了混乱的工资增长和失控的通货膨胀。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是1989年政治运动的重要推动力，而党国对运动的无情镇压扼杀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任何希望，为独裁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总之，南斯拉夫和中国的战略都未能缓解潜在的紧张局势。相反，它们为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埋下了种子⁶⁰¹。

最终，本论文为从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提供了一个基于阶级的社会学解释。“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传统从阶级动态的角度解释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斗争⁶⁰²，相似地，我对从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解释突出了阶级关系动态的因果意义。特别是，它以城市产业工人与党国之间的互动模式和方式为中心。与现有的从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观点相反，这些观点强调精英内部斗争的关键作用⁶⁰³，我的解释提请人们注意城市产业工人与党国之间的互动如何引发了一系列危机。开创资本主义最终成为这些危机最可行或最理想的解决方案。我的分析逻辑的大致轮廓可以推广到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其他案例。我并不是说所有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都遵循相同的路径；相反，这些转型走过了截然不同的路径⁶⁰⁴。然而，我认为以工人和党国之间的互动模式和方式为中心的分析有可能对这些不同的转型路径做出更深刻、更有说服力的因果解释⁶⁰⁵。这一论点是本论文对比较社会主义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

⁶⁰¹ 适逢重读莫妮卡·普拉萨德 (Monica Prasad) 的《The Land of Too Much: American Abundance and the Paradox of Pover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之际，我受其启发，将南斯拉夫和中国的经验概念化为两种不同的策略，以应对同一问题重重的市场社会主义格局。尽管《The Land of Too Much》的主题与本文无关，但其比较论证的逻辑提供了一个生成性分析模型。我谨此感谢这份学术上的贡献。

⁶⁰² Robert Brenner, 1976,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ast and Present* 70(1): 30-75;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Origin of Capitalism*; Mark Cohen, 2015, "Historical Sociology' s Puzzle of the Missing Transitions: A Case Study of Early Modern Japa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0(3): 603-625.

⁶⁰³ Gil Eyal, *The Origins of Post-Communist Elites: From the Prague Spring to the Break-up of Czechoslovaki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Lawrence King and Ivan Szelenyi, *Theories of the New Class*. 强调精英内部斗争如何影响资本主义不同阶段兴衰的类似观点，请参阅 Richard Lachman, *Capitalists in Spite of Themselves: Elite Conflict and Economic Transi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First-Class Passengers on a Sinking Ship: Elite Politics and the Decline of Great Powers*, Verso, 2020.

⁶⁰⁴ Gil Eyal, Iván Szelenyi and Eleanor R. Townsley,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The New Ruling Elites in Eastern Europe*, Verso, 2000.

⁶⁰⁵ 这一论点源于我阅读了一些关于资本主义世界新自由主义转型的比较研究文献。在这些文献中，许多学者认为，不同国家经历了不同的新自由主义转型路径，但这些不同的路径仍然可以用一组共同的因素来解释。例如，参见：Marion Fourcade-Gourinchas and Sarah Babb, 2002, "The Rebirth of the Liberal Creed: Paths to Neoliberalism in Four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3): 533-579; Monica Prasad, *The Politics of Free Markets: The Rise of Neoliberal Economic Policies in Britain, France,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Malcolm Fairbrother, *Free Traders: Elites, Democracy and the Rise of Globalization in North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对当下和未来的反资本主义战略的影响

如果说这篇论文对当今探索资本主义之外的政治经济替代方案的各种社会和政治运动有一个关键的启示，那就是在未来任何后资本主义项目的经济规划中推进民主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民主是不可或缺的，不仅因为它在规范上是可取的，而且因为没有民主规划，任何后资本主义项目从根本来说都是脆弱的，容易倒退到资本主义。我在这里的论点涉及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关于如何改革国家社会主义的经典辩论：“市场社会主义”⁶⁰⁶与“民主计划”⁶⁰⁷之间的辩论。

市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认为，引入市场机制是国家社会主义下全能的党国官僚专制主义的解药。例如，塞勒尼·伊万（Ivan Szelenyi）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即在党国官僚机构主导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市场似乎减轻了不平等和个人自由的缺乏，而这些不平等和个人自由的缺乏是由官僚机构对生产和再分配的指挥所产生和维持的⁶⁰⁸。这一论点可以追溯到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在 1920 年代对新经济政策的辩护⁶⁰⁹。正如亚历克·诺夫（Alec Nove）雄辩地指出的：

“……把政治经济等级制度中垂直行使的经济职能的减少视为政治和社会民主化的必要前提条件（必要非充分，自不待言），不仅合乎逻辑，而且符合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精神。毫无疑问，垂直从属关系的唯一替代方案是水平联系。但水平联系，即生产者之间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无论是直接联系还是通过批发机构联系），等于生产交换，这（再次！）是某种市场。”⁶¹⁰

另一方面，民主计划的支持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一条死路：它不仅无法遏制官僚阶级的权力（他们找到了在市场上行使权力的新方法），而且还可能产生新的利益结构，将社会主义推向危险的资本主义。正如这篇论文所证实的，这一论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先见之明的。这些支持者认为，解决国家社会主义缺乏民主的真正良方不是用市场取代计划，而是彻底民主化计划本身。帕特·迪瓦恩（Pat Devine）是主要支持者：

“一种基于协商协调的民主计划模式。它是民主的，这使其有别于国家主义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它是计划的，这使其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不稳定性和缺乏自觉的社会目的。它基于协商协调，这使其有别于市场社会主义，后者是迄今为止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中唯一合理设计的替代模式。”⁶¹¹

本文站在民主计划的支持者一边。它强调，这种安排对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健性至关重要。我强调经济计划中的民主，这对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下的民主也有启示意义。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所提供的民主承诺，人们经常听到的一种“内

⁶⁰⁶ Włodzimierz Brus and Kazimierz Laski, *From Marx to the Market*; Alec Nove,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Revisited*, Routledge, 1991.

⁶⁰⁷ Pat Devine, *Democracy and Economic Planning*.

⁶⁰⁸ Ivan Szelenyi,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⁶⁰⁹ Stephen F. Cohen,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1888-193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⁶¹⁰ Alec Nove,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Revisited*, pp.171-172.

⁶¹¹ Pat Devine, *Democracy and Economic Planning*, p.3.

在批评”是，这种民主承诺还不够深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舞台上的一些民主参与是可以容忍的。但市场和私有制的力量意味着普通人通常被禁止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最重要经济事务的决策。伴随着反对这种经济专制的各种运动，资本主义的历史见证了大量在地方范围内引入和实践经济民主的努力。例如，对工人疗养企业⁶¹²、市政参与式预算⁶¹³和金融民主化⁶¹⁴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些努力。但这些研究结果还表明，如果没有宏观经济计划中的民主，这些地方和边缘的经济民主实践就会不断面临僵化和衰落的危险，其应用规模仍然受到高度限制。换句话说，这些经济民主的实例的长期可行性取决于宏观经济计划中的民主，而实现宏观经济计划需要超越资本主义。

上述讨论为我们理解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关于“真实的乌托邦”的著作所引发的战略争论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赖特提出，那些在当今资本主义下努力设想和建立反资本主义项目的人要密切关注“真正的乌托邦”——现实世界集体组织和实践的地方实例，这些实例体现了萌芽的反资本主义“乌托邦”理想，并从资本主义的“间隙”中出现。赖特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并非包罗万象，它支离破碎、不平衡，总是会留下一些“缝隙和边缘”，让后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可以在这里试验。他敦促学者和活动家不仅要研究这些实践的具体做法，还要研究它们扩大规模以改造资本主义以外的社会的潜力。赖特利用这些“真实的乌托邦”来指导反资本主义战略，教导我们“拥抱梦想与实践之间的这种张力：‘乌托邦’意味着发展现有制度的替代方案，这些方案体现了我们对一个所有人都能获得繁荣生活条件的世界的最深切渴望；‘真实’意味着认真对待那些可以让我们朝着那个世界前进的制度的可行性问题”⁶¹⁵。

许多批评家对赖特的战略表示怀疑。例如，马里恩·福卡德（Marion Fourcade）观察到，赖特及其合作者在资本主义缝隙中发现的现实乌托邦，对于“宏观经济组织或金融监管”是否可以以及如何重新设想，几乎没有任何说明。根据福卡德的说法，赖特的策略面临的挑战是“现代资本主义最有可能通过这些渠道影响人们生活的那些方面，尤其难以与解放目标保持一致，正是因为它们高度技术化的特性使它们特别容易受到专家垄断的影响”⁶¹⁶，金融和货币监管就是一个例子。理解福卡德批评的一种方式正是通过经济民主计划的视角：赖特所珍视的地方化的实验和创新无法告诉我们如何设想和实施对后资本主义项目来说不可或缺的民主计划机制。另一方面，迪伦·赖利（Dylan Riley）质疑这些资本主义间隙中的“真实乌托邦”是否提供了任何反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他认为，这些间隙实践的本质特征只能“由它们与它们所属的整体的关系决定。只有将它们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下，并询问它们是否有助于再现该社会，才能确

⁶¹² Katherine Sobering, *The People's Hotel: Working for Justice in Argent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2.

⁶¹³ Gianpaolo Baiocchi, *Militants and Citizens: Local Democracy on a Global Stage in Porto Alegr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⁶¹⁴ Greta Krippner, "Democracy of Credit"; Michael McCarthy, 2019,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zing Finance: A Radical View," *Politics and Society* 47(4): 611-633.

⁶¹⁵ Erik Olin Wright, 2013, "Real Utopia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Politics and Society* 41(2): 167-169, p.167.

⁶¹⁶ Marion Fourcade, 2012, "The Socialization of Capitalism or the Neoliberalization of Socialism?" *Socio-Economic Review* 10(2): 369-375, p.374.

定”。⁶¹⁷。无论这些“真实乌托邦”似乎体现了哪种反资本主义理想和原则，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总体中的实际存在意味着它们构成了这一资本主义整体的一部分。赖利随后提出，反资本主义战略可以从研究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包括 20 世纪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受益匪浅。

基于福卡德和赖利的批评，我认为，过去社会主义项目的历史经验可以为如何实践经济民主计划提供重要的经验教训，我认为这是不可或缺的。当今的反资本主义者应该认真对待这些历史经验。在这里，我同意福卡德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间隙“现实乌托邦”几乎没有提供这样的经验教训。虽然有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下的技术进步为大规模民主计划的实践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工具⁶¹⁸，但民主计划最终是一种政治实践。所涉及挑战不能归结为技术性问题。反资本主义者需要更好地了解民主计划可能带来的政治考验和磨难。这只能通过观察那些罕见但光辉的时刻来实现，即大规模民主计划实际上以初期形式进行尝试。这些时刻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很难找到，但可以在社会主义历史上零星地找到：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重大而有争议的过渡期间（例如 1917 年至 1927 年的苏维埃俄国），在尝试但失败的社会革命期间（例如 1936 年至 1939 年的西班牙内战），以及在国家社会主义下的短暂破裂期间（例如 1966 年底的上海），底层人民的叛乱使官僚计划机构陷入瘫痪，迫使工人和公民迅速发展自己的民主机制来组织相当复杂的经济中的生产和分配。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案例都没有成功建立持久而可行的整体经济民主计划制度。民主计划的早期实践通常脆弱而混乱。它们的存在依赖于机会之窗，而这些机会之窗通常很快就会被剥夺。然而，正是这些脆弱、短暂、以及萌芽中的实践，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认真听从赖特的号召，不仅要看现实，还要看可能性，那么对这些历史事件进行仔细的比较研究可能会非常有成效。换句话说，我同样建议我们认真对待“现实乌托邦”，但不要把这些“现实乌托邦”定位在资本主义世界；我也不认为“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现实乌托邦”。相反，我主张我们在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寻找“现实乌托邦”：那些珍贵的时刻，当时整体经济民主计划的早期项目得到了具体的实施，但最终却流产、耗竭、被压制或放弃。

最后一点对更广泛的问题有影响，即今天的反资本主义者应该如何面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痛苦历史并为自己定位。一方面，一些反资本主义者喜欢强调过去社会主义项目的积极成就。他们这样做的方式往往近乎浪漫化。他们的目标是证明过去曾经存在过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更好的世界，以便让人们相信这样的世界很可能再次降临。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说的“纪念碑式的历史”⁶¹⁹，其中历史被呈现为英雄叙事，其目的是激励人心，往

⁶¹⁷ Dylan Riley, 2020, "Real Utopia or Abstract Empiricism? Comment on Burawoy and Wright," *New Left Review* 121: 101.

⁶¹⁸ See, for example, Leigh Phillips and Michal Rozworski,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Walmart: How the World's Biggest Corporations Are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Socialism*, Verso, 2019.

⁶¹⁹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Untimely Meditations*, edited by Daniel Breazeale and translated by R. J. Hollingda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57-123.

往以牺牲史学准确性为代价⁶²⁰。另一方面，其他反资本主义者将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视为负担。对他们来说，当代反资本主义的努力必须摆脱这些历史的束缚，远离这些历史负担，才能从头开始。这种立场表现为多种形式，例如，人们声称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与当今的反资本主义项目无关，认为这一历史只提供了关于如何不与资本主义作斗争的负面教训，认为过去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项目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⁶²¹。与这两种观点相反，我建议我们将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视为未实现其潜力的历史。一方面，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人类追求解放的巨大潜力，虽然激发了许多社会主义项目，但始终未能完全实现。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人们如何努力实现这种潜力，如何将这种潜力付诸实践，以及他们的努力最终如何由于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而失败。这些历史为今天的反资本主义者提供了宝贵教训，既发人深省又鼓舞人心。

⁶²⁰ 对左翼政治话语中某些“纪念碑式历史”倾向的最新批评，请参阅 Simon Sihang Luo, 2024, “Reawakening a Revolutionary Party: The Ancient and Modern Princes in Wang Hui’s Political Theo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Online* First.

⁶²¹ 有关这最后一项主张的一个著名且影响广泛的范例，请参阅 Tony Cliff, *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 Pluto Press, [1955]1974.

方法附录

本方法论附录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本论文所基于的源材料类型以及收集这些材料的过程。第二部分深入探讨了如何使用这些来源，特别关注了两个方法论挑战。

资料来源及其收集

本论文以历史资料为基础。鉴于近年来中国国家档案馆的开放越来越严格，历史研究者必须想出创造性和多样化的方法来收集所需的材料。本论文借鉴了四种类型的资料。第一种是国家档案馆的文件。在七个月的时间里，我访问了六个档案馆：国家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和武汉市档案馆⁶²²。下面我将解释我是如何决定访问这些档案馆的。由于这些档案馆中保存的相关档案文件的数量和可访问性参差不齐，我最终只参观了某些档案馆几天，而在其他档案馆则待了几周或几个月。大多数档案馆对文件的复印都有严格的规定。因此，为这项研究“收集”的绝大多数档案文件都必须在我的电脑上打字，甚至不能手写在笔记本上。在仔细阅读数千份文件时，我必须快速评估一份文件是否相关以及哪一部分相关，并疯狂地打字（或写下）该文件的相关部分（始终按其文件编号索引）。为了谨慎起见，我对“相关性”的定义一直很宽泛。总的来说，这些档案访问产生了 500 多页手写、单倍行距的转录档案文件 word (.docx) 文件和 20 页手写在笔记本中的转录文件，外加大约 80 页原始文件的复印件（有些带有我的注释的额外页面）。

其次，我收集了 40 多卷文件汇编、文集、精选政治人物年表和回忆录。这些资料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特类型，是因为它们的汇编（或者回忆录的写作过程）是在最近几十年进行的，远远晚于所研究的历史时期。其中许多卷都是由官方认可的党史学家编撰并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最著名的是赵紫阳的回忆录和他的文集，是由独立研究人员编撰并在香港或台湾出版的。其他的例如房维中（前国务院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编撰的 12 卷系列政策文件、演讲和政治人物会议记录集《在风浪中前进》，对本文至关重要，从未出版，但已非正式地流传。除了这些书籍长度的来源之外，这类文章还应该包括我查阅过的几十篇长篇回忆录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作者讲述了一些我认为相关的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自己的经历。这些回忆录文章是从各种杂志、期刊、报纸和数字博客中收集的。

第三类资料是我在网上和线下跳蚤市场上获得的。近几十年来，跳蚤市场已成为现代中国历史学家收集数据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渠道，尤其是在国家档案的访问权限被收紧的情况下⁶²³。这就是一些历史学家非正式地称之为“垃圾学”的东西，意思是在“垃圾”中寻找资料 人们扔掉的纸质记录最终落入跳蚤市场卖家手中。其中许多卖家可以在 kongfuzi.com 上找到，这是一个专门销售二手书的在线跳蚤市场。我从这些卖家那里购买了政策文件、研究报告、培训手册、书籍、小册子、杂志和报纸的汇编。例如，1979 年至 1986 年，全总总部每年都会出版一卷政策文件汇编，供“内部流通”。我收集了全部 8-6 个不同卖家的系列丛书。这种资料类型与第二种资料类型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资料是在我研究的

⁶²² 我还参观了另外一家档案馆——厦门市档案馆，但其收藏的 1949 年后的文件完全不对访问者开放。

⁶²³ Jeremy Brown, "Finding and Using Grassroots Historical Sources from the Mao Era," *Dissertation Reviews*, Decembe 15, 2010.

历史时期编纂、出版和传播的。相比之下，第二种资料是在近几十年内回顾性地编写、编纂和/或出版的。

最后，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我联系到了8位消息人士，由于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曾参与过各种政策制定和知识界，因此对我感兴趣的历史进程拥有第一手的了解。我与他们进行了正式或非正式的深入交谈，有时不止一次。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我分享了他们至今仍保留的文件或其他材料，要么给我原件，要么允许我复印。这些消息来源来自个人私人收藏，构成了第四类。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项目中“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之间并没有时间上的区分。原始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是一个深度反复的过程。当我仔细审视已经收集到的资料时，我对相关历史过程的猜想不断被重构。重构后的猜想随后又将我引向新的问题，并将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历史过程被忽视的新方面。相应地，这些不断发展的猜想和研究方向决定了下一步要收集哪些资料。

总的来说，我在中国的实地田野调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20年11月持续到2021年2月。在这一阶段，我首先与几位受访者讨论了我的初步研究思路，他们就需要研究的关键历史人物、需要关注的政策事件以及一些需要熟悉的著作和历史文本提出了建议。循着这些线索，我开始了第一轮资料收集。在研读这些资料之后，我形成了更有针对性的一一有时甚至非常具体的一一想法，关于哪些历史进程的方面需要深入研究，以及哪些资料可以帮助我做到这一点。带着这些完善的想法，我进入了田野调查的第二阶段（2021年3月至11月），并继续以更广泛、更有针对性的方式收集和审查原始资料（第二类和第三类）。在这一阶段的研究过程中，我与受访者进行了更多对话。

在这一阶段结束时，我确定了一系列地方层面的政策试验、倡议和一些基层事件，这些事件在我之前查阅过的原始资料中被反复提及或在关键时刻被提及。我推测这些地方事件对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过程尤为重要。基于这些信息，我整理了一份要访问的市级和省级档案馆清单，并确定了哪些是优先访问的。从此，我进入了田野调查的第三阶段（2021年12月至2022年6月），在此期间，我重点密集地访问了之前列举的国家档案馆。需要指出的是，我最终访问的档案馆是由我的优先清单和可行性考虑共同决定的，因为这段时间恰逢中国持续不断的疫情爆发。随意的封锁政策和旅行限制极大地复杂化了我的档案访问之旅。这段时期，旅行安排和导航变得非常困难，一些我想参观的档案馆也彻底关闭了。尽管如此，这段时期的档案研究成果丰硕。诚然，档案访问的结果总是难以预测——人们事先永远无法知道他们是否真的能够找到他们想要的资料。我曾多次感到失望，因为我找不到任何与最初促使我访问档案馆的问题和事件相关的资料。但每一次失望都被更多惊喜所弥补。我最终收集了大量极其珍贵的文件，我之前并不知道它们就在那里等着我去翻阅。这段档案探险是我田野调查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

源材料使用的挑战

在使用原始资料构建历史叙事时，必须应对两大方法论挑战。首先，如何利用这些资料来解开决策过程和政治审议中固有的晦涩难懂的“黑匣子”，其中涉及当时中国的一些高层政治人物？其次，如何利用这些资料来阐明基层工人的声音和能动性，这些资料绝大多数是由那些在党国机构中占据一些权力位置的人提供的？

应对第一个挑战必然要求研究者像侦探一样进行研究。事实上，一些中国历史学家指出，历史研究在很多情况下确实类似于侦探的工作模式：利用各种原始资料作为线索和证据，揭示事件的真相。⁶²⁴尽管追随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学者对历史“真相”的概念表示质疑，但这种担忧对于研究具体政策制定过程的历史研究来说并不那么重要。这些政策制定过程是一系列真实的历史事件，研究者必须对其进行重构。

我发现，对于这种侦查式的历史研究模式，有三项研究任务尤为重要。第一项任务是仔细、批判性地阅读每一篇原始资料。仔细、批判性地阅读原文意味着研究者不仅阅读文本的字面意思，还要读懂字里行间的意义：关注潜台词、原文作者所持的基本假设和思维方式。文本中隐藏的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实际上可能具有重大意义（例如，同一篇文件的多个草稿之间的差异），以及资料来源对话的背景⁶²⁵。重要的是不仅要注意资料来源中记录了哪些行为或言论，还要注意可以从这些行为和言论的时间和顺序中了解到什么，以及哪些行为没有记录和没有说什么。仔细审查资料来源的制作过程也很重要。这种审查提出了一些问题，即资料来源中嵌入了哪些观点和立场，以及资料来源的制作者通过制作资料来源想要实现什么目标。

第二个关键任务是多个来源之间的三角测量。三角测量不仅仅是一种交叉检查的做法，以确保关键事实的准确性；它是关于让来源相互对话。至关重要的是要看到一系列历史事件在不同来源中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的例如，叙述、阐述和强调的内容每个来源都包含特定的观点和立场。通过这种方式，我研究了如何通过揭示相同或相关的历史事件来填补彼此之间的叙述空白和沉默，构建出一幅比任何单一来源所能提供的更完整、更有质感的画面。我还密切关注多个来源相互矛盾的地方，考虑这些矛盾可以告诉我们有关事件的复杂性质。对于本论文中详述的每一个政策制定过程，我发现我最终构建的历史记载只有在能够纳入所有相关来源的情况下才是令人满意的“纳入”意味着该记载要么与某个来源保持一致，要么可以解释为什么应该拒绝与该记载不一致的某个来源的某一部分。

第三，历史研究中难免会有一些猜测和推测。由于资料来源的局限性，研究者往往没有证据能够说明所研究历史事件的各个方面。需要一些“有根据的猜测”来填补剩余的空白。因此，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进行猜测，而在于猜测的合理性和严谨性，猜测是否与手头的证据密切相关，是否充分认识到关键的背景因素，以及猜测是否与历史事实相符。我们对相关历史人物的现有了解。最重要的是，这些猜测和推测的时刻以及它们所依据的证据和推理必须在历史叙述中透明化，以便读者自己判断猜测是否合理。这就是我在整个实证章节中努力做到的。

这篇论文不仅追溯了政策制定过程和政治审议，还展示了工人在基层的行动如何影响这些过程以及政策决策对车间动态的影响。后一个目标引发了第二个重大的方法论挑战。工人的行动和声音是历史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用来挖掘这些行动和声音的原始资料并非由工人自己制作。相反，原始资料绝大多数是由

⁶²⁴ Shen Zhihua and Wennan Liu, 2015, " 'Historical Research is like Retrying an Old Case' : An Interview with She Zhihua,"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9(2): 244-258.

⁶²⁵ 作为近期在中国现代史领域对资料进行了仔细和批判性阅读的很好例子，并成为我的研究实践的参照，请参阅 Sigrid Schmalzer, 2021, "Beyond Bias: Critical Analysis and Layered Reading of Mao-Era Sources," *positions: asia critique* 29(4): 759-82.

党国机构中占据某些权力位置的人制作的。因此，挑战在于，当我们所拥有的严格来说仅仅是通过党国的视角对基层工人的官方表述时，我们如何才能对基层工人的能动性有所了解。

我不是唯一一个面临这个问题的人。例如，那些在南亚历史“底层研究”流派中工作的人，四十多年来一直在应对类似的挑战：当有关底层人口的资料仅由殖民官员提供时，如何揭示底层人口的行为和经历⁶²⁶。追随这些“底层研究”学者的脚步，我认为利用权力阶层提供的官方资料来揭示基层行动者的行为、声音和经历确实是可能的，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对这些资料进行反传统的仔细解读。这在我的研究中具体意味着，我必须首先彻底熟悉这些官方资料通常用来谈论基层工人的常规话语。当然，这些常规话语揭示的是制作资料的官员必须遵守的“党国话语”，而不是工人的实际声音和行动。但对常规话语的深入熟悉使我能够准确地发现那些时刻，消息来源偏离了常规论述：当消息来源对工人的行为和声音的呈现不符合常规表述时，或者当消息来源提供的有关工人的行为和声音的细节超出常规表述通常所期望的内容时。

这些反常行为在方法论上具有关键意义，因为官方消息来源的制作者发现，他们无法将工人实际说的话和做的事情限制在传统表述的范围内。这种僵局需要坦诚或其他即兴的表达方式。换句话说，这是基层工人的行动和声音挑战党和国家话语的时刻。因此，仔细研究这些资料在那些关键时刻如何描述工人的行动和声音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仔细考虑哪些基层现实可能迫使官方资料的制作者诉诸非传统的表达方式。正是这两个维度之间的三角测量帮助我们真实地描绘出工人在基层的行动。

比这些反常行为更有力的是那些（相对罕见的）情况，即消息来源公开或隐晦地承认，工人的行为不符合官员们曾期望他们这样做，或者工人的行动给官员们带来了麻烦。当消息来源透露他们的官方制作人如何努力理解和设计对工人行动回应时，他们就直接证明了工人的这些行动确实影响了政治审议和政策制定过程。诚然，官方对工人行动所造成的麻烦的看法有时与工人行动的实际范围和规模不成比例。但这种不成比例本身也证明了工人的历史力量。出于这些原因，我在批判性阅读资料时特别注重寻找那些官方对工人行动和声音的描述中流露出遭遇意外、措手不及或只是恐慌的感觉的例子。

⁶²⁶ 有关“底层研究”学派学者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优秀范例，请参阅 Ranajit Guha, “The Prose of Counter-Insurgency,” pp.1-42 in *Subaltern Studies II*, edited by Ranajit Guh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